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美〕罗伯特·基欧汉 海伦·米尔纳 主编

姜鹏 董素华 译

门洪华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54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美)基欧汉,米尔纳主编;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ISBN 7-301-05986-8

Ⅰ.国… Ⅱ.①基… ②米… ③姜… ④董… Ⅲ.政治-研究-美国-文集 Ⅳ.D7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513 号

书 名: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著作责任者: [美] 罗伯特·基欧汉 海伦·米尔纳 主编 姜鹏 董素华 译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986-8/D·067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0.375 印张 298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委员会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顾问委员会

总　序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住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闪光的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编织了学理思想运动的脉络,形成了知识生成发展的宏线。国际关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显现出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宏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天地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成为无数国际关系学者毕其终生心血所奉献的事业。作为学者,他们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作为人,他们希冀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和人的幸福。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

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从 1948 年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发表,到 1979 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

虽然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华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是高度稳定的因素,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更变的。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峰巅,标志性著作就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 1979 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华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耀目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厦。在战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57)、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59)、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F.K. 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但是他们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减弱国际无政府性和因之产生的冲突。他们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何种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大结晶,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可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

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拉格(John Ruggie)等人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关系学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新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规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规制研究和争论的文章,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也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拉格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93年,鲍德温(David Baldwin)编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集,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天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i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拉格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1993)、巴赞和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1993)等。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具有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话,这个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关

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问世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它在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了 20 世纪 90 年代跻身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93 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重要过渡性著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建构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铺垫。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2 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冲突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学理辩论爆发了。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6 年,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也收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优秀实证性论文。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凯克(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边界的行动者: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8)、韦尔兹(Jutta Weldes)的《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属建构主义范畴的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1998年,《国际组织》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曾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共同主编了专辑,全面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趋于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称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学科的核心,也是智慧的精华。了解这些知识结晶,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大部分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走向。比如,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国际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显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20世纪90年代初,由周纪荣先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出版。这套翻译丛书贵在求精,尤其是收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另一部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精品。这套译著的出版不仅引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

科来说功不可没。十年之后，王逸舟先生主编了《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西方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介绍过来，其中既有反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重要著作和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新作，也有建构主义的专著。这套译丛贵在出新，使我国国际关系学子又一次接触到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作《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也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国际关系类著述。这些努力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毕竟还十分年轻，对西方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也还是起步伊始，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翻译缺乏体系，既没有充分注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也未曾有意识跟踪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宏线。比如，我们的翻译作品以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这样很容易使国际关系的学生和读者形成一种失之偏颇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也难免使人们受到现实主义一家之言过于强烈的影响，将其视为惟一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这些重要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理思维和对国际合作的积极认识也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知识谱系无法得到完整的再现，使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宏线在读者的认识和思考中出现断裂。进而，我们的译本多是根据译者自己的好恶作出的选择，这些译著之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散散点点，难以使读者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并且，国际关系译著中既有学理性著作，也有政策性分析，更有对国际关系走势和天下事态的大论宏议。虽然满目尽好书，但却不能系统反映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统主体、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

据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其宗旨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为蓝图、以主流理论发展宏线为

基准,以学理思想为根本,聚焦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交锋的前沿,重点译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

为了保证这一译丛的质量,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国际关系学著作翻译领域使用了中外方编委会合作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邀请我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赵宝煦教授担任中方编委会主编,编委会成员都是我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近十年内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和学理研究做出实实在在贡献的学者。他们既亲身经历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又谙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脉络。他们的加盟保证了这套译丛的系统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意邀请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为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主任,并由基欧汉教授本人邀请了六名国际关系学界一流教授出任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领衔学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选定的每一本著作都是经过双方精心挑选和认真磋商之后确定的,尤其是基欧汉教授对每一本书精心推敲的负责精神,对保证译丛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出版会使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体系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使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这套译丛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到他山攻错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

是为序。

秦亚青

2002 年 9 月 8 日于京西厂洼

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

国际力量压力下的国内政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各国内部政治经济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一体化的世界中，国际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介入并影响着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可以说，无论在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被打上的国际痕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与深刻。与此相呼应的是，如何从理论上认识一体化、国际化、全球化、或者相互依赖压力下的国内政治经济变迁，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将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进行综合探讨，就是此项学术努力的一部分，也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学最富活力和生机的领域之一。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英语文献中三本探讨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优秀论文集中，罗伯特·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编辑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毫无疑问可以名列其中。[①] 与另外两本重要的论文集《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和《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相比，三本书都试图利用比较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意在打通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人为界限，将全球化过程中的诸多国内问题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考察。所不同的是，《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关注的是跨国性的社会和制度力量对国内结构变迁的意义，《双面外交：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则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各

---

① 另外两本是《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和《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见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种政治力量在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双层博弈上,而《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引入的关键变量则是国际化,关注的焦点问题,诚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不在于探究国际化的原因,而在于国际化的结果[①],也就是说,面对商品、服务和资本加速流动的国际化进程,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国内的社会和经济行为者的机会、偏好乃至选择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是将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探讨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一本重要论文集,参与本书各章写作的作者均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极有建树的著名学者。该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研究文献中的地位和意义,自不待言。该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关注的问题上,于中国学者都有阅读和借鉴的必要。既然谓之导读,无非一要对本书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做一交代和梳理,二能对本书各个篇章逐一分析和评论。至于对各章的分析和评论,两位编者在序章与尾章已有精彩的阐述,所以,下文把重点放在相关理论文献的综述和比较上,对本书涉及的理论框架做一梳理与评价,以助读者更为全面地阅读并认识本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从很多方面看,20 世纪 70 年代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都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至少在欧美学界,此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是被摩根索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所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所沿用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诸如权力与利益研究、战争与和平分析,大抵脱离不了现实主义的概念与范畴。进入 70 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处于科学革命时期,传统现实主义既受到外围理论的挑战,也受到内部自身变革的压力。内部压力导致后来结构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重大修正,而外围理论,例

---

①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

如跨国关系研究和相互依赖理论，关注国际政治的经济与非国家因素，为几乎陷入"现实主义沉闷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注入许多新鲜的血液。新兴的国际关系流派从多学科的途径，而非只将国际政治研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附庸，对国际政治中非国家因素和经济力量给予更多的重视，从而开辟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局面和新气象。

跨国关系的解释范式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这一流派的代表学者们多半出于对把国际关系视为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附属地位的不满，以及对在这种附属状态下国际关系学到底能有多大解释能力而产生的怀疑，因此，他们力图把国际关系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足以提供对一体化和相互依赖世界中各种新出现的国内或国际现象进行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独特解释能力。1970 年，基欧汉和奈编辑出版了《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一书，对跨国互动与种种组织的作用，跨国关系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跨国关系下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降低，跨国关系对国家中心研究范式(state-centric paradigm)的冲击，以及跨国关系中观念的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探讨。[①] 该书对此后跨国关系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相比，其在概念化工作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正如后来有的学者所批评的，该书对"跨国关系"这一概念缺乏清晰严谨的界定，把跨国关系定义为世界政治中除了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外的所有内容[②]，从而使研究工作包罗万象，无所适从。另外，最为关键的缺陷是，该书还没有能够为跨国关系分析提供足够的概念化准备工作，对跨国关系分析模式的要件，以及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都缺少必要的理论阐述。这些缺陷导致该书描述多于分析，理论概括不够。对概念化

---

①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y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pp.7～8. 在《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导论中，基欧汉和奈并没有对跨国关系概念进行完整的辨析工作，他们只把跨国关系粗略地定义为"不受各国政府中央外交政策机构控制的那些跨越国家边界的联系、联盟与互动行为"(见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y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p.xi.)。

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是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古勒维奇1978年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一文,力主人们避免只从传统的国内政治透视国际关系变迁的"第二种设想"模式,也即不要只把国际关系简单地视为国内政治的衍生。古勒维奇主张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这就是其所说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解释模式。[①]古勒维奇此后在1986年出版的《艰难时代的政治:各国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进一步把各国国内经济策略与选择置于国际背景下认识,对国际力量压力下的国内政治经济变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堪称为将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结合的典范之作。[②]《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在基本分析框架上,按照编者在导论中所坦陈的,正是严格建立在古勒维奇"颠倒的第二种设想"(或"颠倒的第二意象")的基础上的。[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速行进的全球化浪潮,将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更多地暴露于外部世界面前,堪似"无形之手"的国际力量迫使更多的国家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内部变革与调整。将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结为一体的跨国关系研究非但没有衰微,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下,其研究可谓与时俱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了这本《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以外,伊文斯(Peter B. Evans)、雅各布森(Harold K. Jacobson)和普特南(Robert D. Putnam)1993年联袂编辑的《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以及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1995年编辑的《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非国家行为体、国内结构与国际制度》,堪为20世纪90年代跨国关系研究最重要的三本代表作。[④]

---

①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4, Autumn 1978, pp.881～912.

②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p.6.

④ 更多的相关研究文献概况还可以参考: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7～10.

跨国关系研究范式在理论上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该研究范式是在对传统的国家中心解释范式进行反叛和颠覆的基础上形成的。20 世纪 60、70 年代,“国家”这个概念在政治学研究中遭遇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多元政治理论和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集团和政治精英理论的质疑。[①]政治学分析中以“国家”这个概念为解释中心已日渐式微,换言之,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弈,而非国家本身,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中心。这种学术上的转向同样波及到国际关系研究。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一大批非国家的跨国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并对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为人注目。[②] 许多国际现象如果仅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认知途径出发,已经很难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实主义只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有时甚至是惟一的认识对象,在很多学者看来已经概括不了国际关系的内容和真相。“去国家”一时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人们一方面关注全球政治层次上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次国家层次上国内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党派在国家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的第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国家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单一的行为体,国家也非具有独立的‘人格’意义,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不简单地只是‘国家’的行为,而是国内各种行为体互相博弈、妥协的表现。并且,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的国内政治是等级制(hierarchy)的看法不同,该模式认为国内政治是平行的多头政治(polyarchy),各种行为体的偏好不同,行为也不同,它们共同分享着决策的权力。普特南在《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之逻辑》一文就对内部政治中各种行为体的折冲纵横在国家对外行为中的意义做了深刻

---

① 参考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p.17.

② 参见苏长和:《非国家行为体与当代国际关系》,载《欧洲》(北京)1998 年第 1 期;苏长和、朱鸣:《世界政治中的跨国利益集团》,载《现代国际关系》(北京)1998 年第 11 期。

的阐述。[①]第二个重要假设是国内行为体——联盟、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公司、工会等——都是理性的,以追逐自身最大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利益、偏好、理性等概念在该模式的分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基欧汉和米尔纳为《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撰写的导言中,以及书中其他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假设始终贯穿着全书。

第二,大致来说,跨国关系分析范式力图对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两个层面进行整合,同时更加强调国际力量在国内变迁中的独立作用能力。仅仅对跨国关系现象进行描述不是跨国关系分析范式的中心,跨国关系分析范式所要做到的是结合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对国内政治变动中的国际因素进行归纳与综合。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述的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模式。我们知道,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指出国际关系学者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三种常用模式,即从人性善恶出发分析战争根源的第一种设想(the first image),从国内政治体制的差异出发分析国际问题的第二种设想(the second image),以及从国际体系出发解释战争根源的第三种设想(the third image)。古勒维奇对沃尔兹的概念进行了改造,指出此前的政治学者们只重视国际政治的国内根源,而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现在应该是重视国际力量如何作用国内结构的时候了。[②]据此,他对沃尔兹的第二种设想进行了颠倒,把研究焦点集中在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上。在古勒维奇看来,国际体系中除了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外,有两种关键的力量对国内政治体制特征的塑造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其一为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分配状态,其二为国际经济中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状态。[③]换言之,战争和贸易

---

①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431~468.也可参考: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1~17.

②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p.881.

③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p.882.

状态影响着国内政治发展。古勒维奇的此项概念化工作——也即对作为独立变量的国际因素以及作为因变量的国内结构的重视——以后一直指导着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的发展。

第三,在不同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中,对国际变量的选择有所不同。如果说古勒维奇关注的是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的话,那么在里斯—卡彭的分析中,则强调国际制度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应该看到,跨国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制度化状态的加强。如何审视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等制度力量的作用,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议题。里斯—卡彭编辑的《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着力考察的就是跨国关系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等跨国社会运动力量对一些国家国内结构产生的作用。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还出现许多论述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此类研究假设国际规范成为塑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合法性身份的关键力量,反过来说,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进程越来越地受到国际规范力量的约束,互动、沟通、学习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被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①]而在《国际化与国内

① 里斯—卡彭编辑的《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对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国内影响考察的并不够。后来对国际机制和规范的国内影响的分析,可参考: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 Vol.40, pp.451～478;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No.1, Spring 2000, pp.65～87. 另外还有许多论述不同的国际规范力量对国家身份塑造能力的个案分析文章, 例如: Darren Hawkins, "Domestic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Pressure: Human Rights in Authoritarian Chi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4 (Winter 1997), pp.403～434; Jeffrey Checkel,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 No.4 (Winter 1997), pp.473～495; Jeffrey Checke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1999, pp.83～114. 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Harald Mulle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rinciples, Norms, and Rules by Governments: The Case of Security Regimes,"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政治》一书中，基欧汉和米尔纳则强调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带来的跨国经济力量，用他们的概念来说，也就是“国际化”，是如何塑造和影响国内政策与偏好的。

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的要素

概括而言，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所要探讨的问题除了前面述及的国际变量的选择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别为国内结构、沟通行为体的意义、国际力量如何被内部以及对国际力量的抵抗。

国内结构

国际力量要对国内政治施加影响，必须能够进入一国内部的政治体系，且能在内部赢得特定议题上的政治联盟，进而影响目标国的政治决策。同样的国际力量在不同的国内结构背景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如此，与各国国内结构的差异有关系。无论在《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还是在《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或者其他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文献中，国内结构都是一个关键概念。原因有二：第一，国内结构为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提供了基本的渠道；第二，国内结构的变迁也是观察国际力量是否作用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何为国内结构？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各国国内结构有哪些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会对同样的国际力量干预做出如何反应，或者说，为什么同样的国际力量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

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例如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里)只把国家看做“同类行为体”(unitary actor)不同，跨国关系—国内政治范式中的国内政治内涵是丰富的。如果说古勒维奇将国际力量作为独立变量对跨国关系研究的概念化工做贡献巨大的话，那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的被概念化同样对跨国关系研究的进步功不可没。在跨国关系—国内政治范式中，国家不再被视为是同类的行为体了，国家的概念也不再具有必要的研究价值，国内政治的特征及其在国际压力下的变迁才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与国内政治相关

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国内结构。

按照标准的解释,国内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结合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政策网络。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①]**或者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国内结构是由两个结构性部分组成的,即“决策权威组织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式”**[②]**。比较政治研究中有多种对国内结构模式的划分,而不同的国内结构在面对同样的国际压力时当然会有不同的反应,反过来说,国际力量要对国内结构施加影响,也脱离不了既有国内结构框架的限制,即使国际力量最终在国内结构变迁中扮演关键作用,但是在初始进入国内政治时,它仍然要在既定的国内结构框架下活动。因此,辨别并区分国内结构的类型就非常重要。在早期古勒维奇的研究中,他按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国内结构分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导型国内结构和弱国家—强社会的社会主导型国内结构。**[③] **考太尔和戴维斯则依据决策权威的集中程度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松紧程度关系,把国内结构分为四种类型,也即集权式的但国家—社会关系较为分离的国内结构、集权式的但国家—社会关系较为紧密的国内结构、分权式的但国家—社会关系较为分离的国内结构、分权式的但国家—社会关系较为紧密的国内结构。**[④] **在里斯—卡彭的研究中,则把国内结构分为六种类型,分别为国家控制型**(state-controlled)**、国家主导型**(state-dominated)**、僵局型**(stalemate)**、社团主义型**(corporatist)**、社会主导型**(society-dominated)**以及**

---

①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p.20.

②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p.454.

③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pp.897～898.**有关国内结构意义的更早分析还可参考**: Peter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s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30, No.1 (Winter 1976).**卡曾斯坦基本也是按照国家—社会关系来区别国内结构类型的。**

④ **参见**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pp.455.

脆弱型(fragile)国内结构。[①]尽管在《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中缺少对国内结构的细致区分,但是从各篇论文的主旨来看,作者们仍然借助了国内结构概念,探讨国际化压力下工业化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社会结构与决策网络的反应。

这里需要对三个与国内结构相关的问题做一概述,以便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国内结构区分的尺度。第一个与政治制度的特征及其集中化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行政权力是否集中在一个能够控制整个官僚体系中政府各部门的决策者(例如总统、首相或者总理)手中,以及政府能够多大程度上控制立法过程?其次,在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组织的强弱如何,及其社会压力的被动员程度;社会在意识形态和阶级分层上的异质性是怎样的?社会联盟和组织在表达其欲求的能力上有何差别?最后,在连接社会与国家的政策网络上,社会和政治联盟构建过程的特点是什么?概言之,在高度集权且社会组织很弱的国家,政策网络更可能表现为国家主导型的;相反,在社会力量控制政策网络的国家,一般具有高度同质的社会和社会动员能力,且国家结构是很弱的。[②]上述三个与国内结构相关的问题在理解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国际力量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与影响,不同的国内结构面对同样的国际力量或者不同的国际力量时,它们的反应为什么不一样,以及国内结构在某些情况下是如何抵抗国际力量的。

沟通行为体(linkage agents)的意义[③]

国内结构为外部力量在国内发挥作用提供了渠道,但是这一作

---

①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pp.23～25.

② Thomas Risse-Kappen, "Public Opinion,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Vol.43, No.4 (July 1991), pp.485～486.

③ 感谢 David Zweig 和 Kim Nossal 教授在对我的论文"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 The Domestic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n China's Politics, 1979～2000"的评论中使我注意到沟通行为体在联结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中的意义。这篇论文是提交给 2002 年 5 月复旦大学和加拿大女王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Globalizatoin and China's Reformes: IPE Approach)国际会议的论文,论文的中文稿以《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为名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0 期上。

用过程的主体(agent)是什么呢？在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中，沟通行为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在罗斯瑙编辑的《沟通政治》一书中，linkage 被定义为"一个系统内部产生的会引起另外一个系统做出相应反应的周期性行为后果"[①]。这样，所谓跨国沟通行为体，是指那些为着特定的政治目标，起着沟通内部政治与外部政治环境，从而使价值、规范、新的观念、政策条例、商品以及服务能够跨越边界地进行流动的那些行为体。按照这个定义，跨国沟通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政府内部涉及管理跨国交流的官僚部门、跨政府联盟[②]、媒体、文化组织、工会和商会，以及促进观念与价值流动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的相关文章尽管没有直接论述沟通行为体对国际化在国内的传递过程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沟通行为体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与本书相关的沟通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经济领域的跨政府联盟、工会或者商会等。在其他相关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著作中，有的独自论述跨国人才交流(移民因素)或者认知共同体的意义[③]，有的阐述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结构变动中的意义[④]，还有的专门论述观念的跨国流动在国内政治经济变迁中的作用[⑤]。

跨国沟通行为体在沟通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性作用。它们的出现是国际相互依赖加强的结果，也是当前世界

---

① James Rosenau, "Toward the Study of National-International Linkage," in James Rosenau, ed., *Linkage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45.

② **跨政府联盟**(trans-governmental coalitions)**特指那些在国际政治中的行动有独立于较高当局的相对自主性的各国政府下属单位之间的联盟。这个概念见基欧汉与奈：《跨政府关系与国际组织》，载西里尔·布莱克编，杨豫等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第 600 页。**

③ **例如**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例如**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一书中收录的许多论文。**.

⑤ **例如** Thomas Risse-Kappen,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Domestic Structure,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185～214.

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为非常活跃的行为体,其本身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学者的分析兴趣。它们的活动从根本上跨越并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推动着内外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一支激进变革力量。跨国沟通行为体可以自由进出一国的内部政治经济体系,既可以摆脱正统政治体制的控制,也可以被视为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角色的一部分,它们可以将外部政治经济议程引入内部决策层次,或者把内部政治经济议题上升到国际层次,使国内决策权威出现分散及被分享,进而对封闭的国内决策形成巨大的挑战。跨国沟通行为体拥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少有以国家为忠诚对象的,它们或者以追求全球商业利润为目的(跨国公司),或者以传播观念与意识形态为己任(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出于扩大本位权力的官僚机构(跨政府联盟),也有间接从事社会动员的许多认知共同体,它们正在成为全球和各国内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国际力量如何被内部化?

国际力量在国内施加影响,除了借助国内制度性的渠道(国内结构)以外,还需要依赖其被内部化以及在国内获得合法性认同的程度。传统上说,能够对国内政治产生作用的外部力量都是一种干预性力量。在主权的认知限定下,有些对内部政治形成影响的国际力量在法律上是被看做"干涉性力量"的,因而并不为国际法所肯定。在以往所有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中,对介入国内政治的国际力量所形成的行为与所产生的后果,都尽量避免使用"干涉"一词,大多的文献都隐含地假定,要么主权人为分割开来的国内政治事务与国际政治事务在国际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是没有意义的,要么在传统主权认识下,将那些对内部政治构成明显的直接的非法干涉力量(例如武装入侵)排除在分析之外。所以,已有的文献关注的不是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干涉",而是国际力量如何在国内政治中被内部化,或者被合法化。

那么国际力量是如何被内部化与合法化的呢?以国际规范为例子。国际规范是当前世界政治迈向组织化与秩序化的关键力量,以

机制、组织、制度为代表的国际规范是当前全球治理体制中的核心。国际规范体系的开放性需要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其中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的功能。这一过程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国家被纳入到全球治理规范体制中的时候，或者说全球规范体制被内化到国家内部政治中的时候，国际规范力量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冲突。

国际规范被内部化的过程初步体现在国际规范的合法性得到国内政治精英的理解和话语上的支持，直至逐步上升到立法层次的辩论议程上。这一点对许多本身内部体制与国际规范体制存在巨大差别，而且需要参与并融入国际规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为明显的。尽管国内政治中频繁出现与国际规范相关的话语并不是国际规范被内部化的充分条件，但是政治话语的变化往往的确是国内政治变迁的前奏，有时也确实是与政治变迁相伴相随的。①

国际规范被内部化还体现在与国际规范相协调的国内官僚体制与政治制度变革上。为了适应并在国内执行国际规范，国家需要在行政机构上做相应的变动，例如在相关的政府部门中设立对应的部门，处理与国际规范相关的事务。这方面的例子具体体现在环保、人权、经济与金融、社会组织、司法协助等国际合作领域。更进一步地说，在那些国内政治制度与国际规范体制构成张力的国家，国际规范的内部化甚至是以国内剧烈的制度变动为前提的。例如，WTO的规范在那些非市场型国家的被内部化，就是以后者内部经济制度的自由化变革为前提条件的。

最后，甚至是最主要的，国际规范的内部化体现在特定国家为了接受具体的国际规范而在国内实施的立法行动。原则上讲，具体的国际制度正式进入一国的政治生活，是以该国立法机构的批准为根据的，而当一国批准某项国际制度时，为显示对该制度的尊重，它还需要在国内配套进行一系列的立法行动，包括订立新法，修改旧的与国际规范不适应的法，以保证国际规范在国内通畅地得到执行与遵守。我们可以从国际环境领域的变化带来的国内立法变革，多边军

---

①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 Research Agenda," pp.70～72.

备控制协定带来的各国出口管制法和政策的变化,以及许多在各国得到立法支持的多边国际制度中看到这一内部化过程。

国际规范的内部化只是国际力量被内部化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论及的国际化过程中世界市场价格对国内市场的传递作用,也是一体化中世界价格"内部化"的一个例证。此外,偏重跨国社会力量作用的文献也着重分析跨国社会组织联盟如何内部化到国内政治中,借助国内政治制度框架获取国内活动空间。总之,内部化是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概念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化概念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将那些对国内政治经济只会产生偶尔的、短促的影响的国际力量驱除在研究之外,而将那些能够产生持久的并内化到内部政治经济体系的国际力量纳入我们的分析对象。例如,国际政治系统中的一般危机所引起一国国内的政治动员,确实会影响一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但是在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中,它往往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恒量。判断政治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对国内政治影响的程度,关键在于其导致一国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乃至决策网络变动的范围,也就是国际危机在这些指标范围内被内部化的程度。因此,不是所有引起国内变化的国际事件都可以被视为国际力量,只有那些持久的、能够被内部化到国内政治中的力量才是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的对象。

对国际力量的抵抗

假设行为体是理性的话,那么国际力量在国内的活动必然带来国内行为体之间,以及它们与跨国行为体之间新的利害关系。正如《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的一个主题所揭示的,国际相对价格变动会影响到各国的国家福利、社会财富分配和利益集团新的分化与组合。那些因为国际力量介入而得利得势的行为体成为推动一体化与国际化的坚定支持者,而那些因为国际力量介入而失利失势的行为体毫无疑问会成为抵抗国际力量的急先锋。新近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反全球化运动,正是抵抗国际力量对国内社会政治影响的一个鲜明写照。反国际化,或者反全球化的力量不仅只是国内的利益群体,那些在国内失利的利益群体同样会联结外部力量,组成跨国反

国际化联盟。国内利益群体除了以组织跨国联盟的方式反国际化以外，它们还会利用已有的国内制度渠道，抵抗国际化对它们利益的影响。[①] 换句话说，国内制度本身也可能会成为抵制国际化的力量。

如同我们一直强调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着重国际力量对国内的影响。关于对影响后果的研究，一般沿着两条路线展开，一条如《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坚持的，即国际化如何对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另外一条虽然受关注不多，但并不是不重要的，也就是：国际力量的介入会不会使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往趋同方向发展。其实，如果假设国际力量正在塑造着国内政治，那么逻辑上，相同的国际力量应该会促使各国国内政治变迁向同样的方向发展。新近的许多全球化理论就主张，国际经济竞争正在而且最终会促使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都将采取同样的制度，也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当然，历史制度主义者，例如在卡曾斯坦对美国和法国面对同样的 1970 年能源危机冲击的国内反应的研究中，就强调文化和制度路径依赖的作用会造就两国政策反应有别，因而两国经受危机的影响结果也不可能等同。[②]经济自由主义学者无疑沿着第一条路线开辟他们的研究，自由贸易在各个区域的胜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内部的确立，特别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试验，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佐证，是国际力量改造国内政治经济并使各国内部经济制度趋同的最好证明。

如果我们不考虑文化和路径依赖的历史制度主义因素，沿着第二条路线展开我们的思考的话，探索的结果可能迫使我们不得不审慎对待强大的跨国力量会给世界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假如跨国力量真的导致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的趋同，那么，问题就不在于跨国力量到底能够对国内政治形成多大的影响，而在于来自国际层次上的、会造就国内同质性结果的跨国力量（例如全球化），与那些力图捍卫

---

① 参见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导言，第 20～22 页。

② 见 Peter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s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国内异质性的力量所形成的有力交锋上。正如基欧汉和米尔纳在《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导言中所说的，国际化同样会在一些国家促发政治危机。我们最近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商业伦理与弱势群体文化与价值的冲突，等等，正是这两股力量交锋的写照。究竟是"大同"消弭"小异"，还是认"大同"存"小异"，确实值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深入思考。

结　论

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雄心勃勃地试图对一体化、相互依赖、国际化或者全球化过程中独立于单个国家控制之外的国际力量的国内影响进行比较与阐述。无论这种学术抱负最终会不会产生如霍夫曼所谓的学科上"哥白尼革命式的"意义①，从而使国际关系不再仅仅只是被其他学科随意解释的对象，而是成为有自身概念系统并能够对其他学科研究主题赋予新的解释意义的真正的独立"学科"，对此我们可以暂存不论，但是就其目前的研究积累及其"开放社会科学"态度而言，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确实为传统的政治学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正在重新书写甚至改写着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范畴。

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把过去为人忽视的国际因素引入一度囿于国家界限下的政治学分析中，该分析模式立足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层次的冲击与国内层次的回应两方面观

① 见斯坦利·霍夫曼著，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霍夫曼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政治学研究中把首要的重点放在世界事务上，用世界事务的眼光看待国内政治，也许能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甚至是比宏观分析取代微观分析这一改造了经济学的变化更大的革命。"不过，霍夫曼紧跟着也谨慎地指出，"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把国内事务当作世界政治的副产品，因为这和孤立地研究国内政治制度是同样错误的。……世界问题成了国内问题，然而，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行为，往往只有在外部世界没有给每个国家以沉重压力的那些和悦时期里，才能以本国历史以及和谐时期里产生的价值来解释。"见《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 6 页。

察国际力量对国内结构变动的深刻影响。《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正是这种分析模式的一个杰出代表。相信该书中译本的问世，会对国内国际关系研究问题领域的拓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大规模参与，国际力量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渗透乃至改造引人注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与素材。《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对此已有论述(见谢淑丽的文章)，而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理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贡献更多的智慧。

苏长和

2003 年 7 月于复旦园

前　言

这一项目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们最早是在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89年亚特兰大会议上,讨论编撰一本关于"相互依赖理论发生了什么变化"的书。该讨论引向一个更具雄心的方案,即组成一个关于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的研究小组,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可以一同参与关于这些问题的严肃对话。

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支持下,我们1990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9月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先后召开筹备会议。在这一系列会议上,我们从几位学者,尤其是戴维·A.鲍德温(David A. Baldwin)、彼得·J.卡曾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伊恩·拉斯蒂克(Ian Lustick)和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 Powell)提供的备忘录和评论中受益匪浅,尽管他们后来没有进一步参与该项目。在这些会议上,诸多想法展现出来,本项目受到了广泛而热情的鼓励。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全球冲突和合作学会(the 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赞助下,我们开始为1992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奥克斯纳德(Oxnard)召开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征集文章。在这次会议上,埃伦·科米索(Ellen Comisso)、柯仁·乔杜里(Kiren Chaudhry)、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的发言及阿历山德罗·卡塞拉(Alessandra Casella)、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艾伯特·菲什洛(Albert Fishlow)、Haruhiro Fukui、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黄亚声(Yasheng Huang)、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戴维·莱克(David Lake)、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曼纽尔·帕斯特(Manuel Pastor)、菲利普·罗德(Philip Roeder)、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阿瑟·斯坦(Arthur Stein)和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的评论使我们受益匪浅。莉莎·马丁(Lisa Martin)在会后做了富有价值的评论。

1993年6月,这些作者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再次聚会,对

每个人的文章进行最后讨论,并探讨如何将其融合成一本文集。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和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在助手罗兰·斯蒂芬(Roland Stephen)的帮助下,为本次会议和奥克斯纳德会议承担了重要的组织和后勤工作。

1993 年 9 月,我们向《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编委会提供了详细说明,并将原稿提交《国际组织》。在经过漫长的审查过程之后,《国际组织》主编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通读两遍原稿的两名匿名审稿人及各文章审稿人向我们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评论。尽管《国际组织》最终给了我们一个失望的答案,拒绝将本文集作为一期特刊,我们仍愿意承认,该刊详尽无遗的审阅使本研究得到了实质性的改进。《国际组织》和本文集的读者现在可以做出判断,该期刊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文集修订的最后阶段,我们受益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及另外九所大学出版社审稿人的及时审阅,也受益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亚历克斯·霍尔兹曼(Alex Holzman)的巨大帮助。当然,我们最大的受益还是来自参与本计划的同事们,他们对各文章进行自我批评,对文集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我们特别感谢马修·伊万杰利斯塔(Matthew Evangelista)、杰弗里·弗里登、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和彼得·兰格(Peter Lange)对本文集“导论”初稿提出的富有价值的评论。在这个持续过久的漫长过程中,所有作者都显示了巨大的耐心和高度的合作精神。我们特别感谢杰弗里·加勒特(Jeffry Garrett)、斯蒂芬·哈格德和西尔维亚·马克斯菲尔德(Sylvia Maxfield),他们的文章在先前已经被《国际组织》接受,但是在我们为将整个文集作为《国际组织》的一期特刊而再度努力时,他们同意推迟发表自己的文章。该项目确实是集体的结晶。对我们而言,与一些最严谨的学者和最投入的人士结为至交并增进旧知,这是该项目所提供的最大受益之一。

目　录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　工业化民主国家

第三部分　国际化与社会主义

第四部分　国际经济危机与发展中国家

第五部分　结　　论

第一部分

理 论 框 架

第一章　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导论

海伦·V．米尔纳、罗伯特·O．基欧汉

第二章　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

杰弗里·A．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

第三章　国际化、制度和政治变迁

杰弗里·加勒特、彼得·兰格

第一章

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导论

海伦·V.米尔纳、罗伯特·O.基欧汉

与历史上比较,在过去40年里,国际经济交换的迅速增长使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开放。最近的经济分析大多探究这种国际化对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国家竞争力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回报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政治和经济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期待会发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尤其是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应该体现出世界经济影响的迹象。本文集的核心主张是,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politics within countries)——我们仍然习惯地将其称为"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不同学者以不同方式使用之。在本书第二章,杰弗里·弗里登和罗纳德·罗戈斯基试图通过区分可见的那些货物、服务和资本的流动与"这些流动反映出的国际交换的外部改善",对国际化进行精确分析。可以衡量的流动——如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幅增长的国际资本流动,反映出国际成本相对于国内交易的更具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改变机会成本比流动本身的变化更为重要:为应对利率的变化或兑换率的兑换预期,资本国际流动的潜能可以对国家经济状况和政策施加深刻的影响,即使没有任何真正的资本流动亦如此。因此,恰如同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认识到的,对国际化的充分分析不能始于国际流动,而必须查究这些交易的根源。

尽管货物、服务和资本流动的可衡量性并非完美无瑕,但与之相较,"国际交换的外部改善"难以直接观察到。有鉴于此,在本文集中,国际化是通过以下指标来衡量的,即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或一个国家的净国外投资额与其国内总资产比率的变

化。在本文集中,国际化一词指的是,交易成本潜在变化产生的过程所造成的可以看得到的货物、服务和资本流动。正如以下分析所证明的,与国家经济规模相比,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交易都已经在过去20年里急剧增长。因此,我们所界定的国际化是有所增长的。[①]

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在他们的文章中特别关注国际化的来源。但是,本文集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心并非国际化的原因,而是国际化的影响。国际化影响社会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面对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即影响它们对何种政策最能实现其根本目标的选择,而不一定是行为体寻求的基本价值(如他们所界定的权力、财富或道德)。国际化也影响了国家财富的聚集、国家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政府所面对的机会和约束。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化产生的刺激变化,来观察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这些可能的变化包括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的自由化,国内市场管制的解除(deregulation),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为影响这些政策而设计的制度所体现的变化。

政治制度是被有意创造出来,以保证特定政策的追求,它反映了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但政治制度也有其独立的影响:它们创造决策规则,帮助建构议程,使某些团体获得优势而使另一些团体处于劣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强势制度甚至可以塑造行为体的政策偏好。由于制度产生的影响,人们如同对政策一样对制度产生偏好,而这些偏好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如果一个独立部门看上去不像立法机构那么喜欢提供关税保护,自由贸易者就应该愿意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而保护主义者则会反对。

---

①　由于与货物和资本相比,劳动力跨越国界流动的速度不那么快,我们没有把移民作为国际化的一个部分。在某些地区,如欧洲某些地区及美国西南地区,这一假设是有问题的。在将来分析国际化时,应该对移民给予更认真的关注。我们感谢阿舒塔什·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向我们提供了这一见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本文集的中心在于国际化,而非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民主化和国际化可能彼此关联,但它们决非同一事物。东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及当前的新加坡、中国——的发展说明,国家可以无需经过民主化,就可以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我们将国际化视为一个解释性变量,以探求它对各种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本文集中的某些文章将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进行说明,但我们系统分析的重点在国际化。关于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可参阅:Huntington(1991)。

国际化是贯穿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它涉及到国际交易成本的外部削减,这一削减可以通过与国内经济流动有关的国际经济流动的比重增长予以实际衡量。但我们始终认为,国际化的影响是通过国内政治制度予以协调的。其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包含如下两个方面:

1.在它们的政策行为中反映出来的、相关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对国家政策和国家决策机构的政策偏好;

2.国家政策和国家政策机构本身。

本文集主要围绕着两个核心主张组织起来,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在第二章、杰弗里·加勒特和彼得·兰格在第三章分别对其做了具体阐释。弗里登和罗戈斯基主要分析了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加勒特和兰格则集中于制度方面。其他实证分析各章则通过来自世界各国的证据考察了这两个方面。

弗里登和罗戈斯基认为,国际化以行为体的经济利益为基础,以各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国家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最为明显的是,它扩展了一个经济体中的可以进行贸易部分,减少了那些与世界市场力量脱离的经济活动的数量。在同等条件下,国际化增加了国家经济对世界市场趋势和动荡的敏感性。[①] 更为重要的是,在相互比较和与国外商品和要素进行比较时,国际化影响了国内生产商品或国内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变化对增长和收入分配都可能产生影响,由于这些价格变化而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经济行为体将要求进一步开放,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则会寻求限制、补助或保护。实证分析的各章均评价了第一个主张:政策偏好的变化将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化。

但是,国际化对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因国家而不同:既有制度环境制约了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的动机。因而,本文集的第二个基本主张就是:政治制度可以阻碍和改变国际化的影响。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在经济利益集团的基础上预测政治后果。联盟的形成有赖于战略判

---

① 国际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别处价格的更大敏感性;例如,如果短期资本国际流动的增长伴随着浮动汇率的趋向,某些国家将会实现其货币独立性的增长(Bryant 1980;Zevin 1992)。

断和实际操作,并且往往不可能仅仅从政策偏好来预测之。[①] 此外,是否维持现有制度或促使制度发生急剧变化的决定,不仅有赖于经济政策的偏好和战略判断,而且也取决于外生因素。[②]

在第三章,加勒特和兰格讨论了偏好、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给定一系列国内政治制度,经济开放部分(即贸易部门)规模和生产率的增长,一般不会带来相应的政治影响增长。加勒特和兰格通过一组程式化的模型提出:非民主政体对于国际化变化的反应比民主政体要弱得多;民主政体这一敏感性的变动程度与如下因素相关:工会组织的力量、选举规则、拥有否决权者的数目、中央银行等关键性官僚机构政治独立性的幅度。在结论部分,他们探讨了在什么情况下寻求重新选举的民主政府会追求制度变化的战略。尽管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明确指定的演绎理论来指导我们通过制度的丛林,但是关于偏好、政策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仍可以形成若干有意义的假说。

实证研究各章评价了不同形式的国际化如何影响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导致国内联盟、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它们还探讨了国家政治制度如何协调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改变其影响的诸多事例。杰弗里·加勒特、杰弗里·弗里登和弗朗西斯·罗森布拉斯(Frances Rosenbluth)分别撰写的第四至六章,探讨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情况;马修·伊万杰利斯塔和谢淑丽(Susan Shirk)撰写的第七、八章则探讨了苏联和中国的情况。斯蒂芬·哈格德与西尔维亚·马克斯菲尔德合写的第九章则分析了金融国际化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我们自己的观点体现在导论的第三、四部分,并在本文集的结论中予以详尽说明。

本文集无疑属于"颠倒的第二意象"(second image reversed)传统之列(Gourevitch 1978)。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以微观经济为基础罗列政策偏好理论;另一方面,强调既有制度如何塑造了国际化的影响这一论点。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集代表了深受经济学

---

① 关于战略分析的权威性章节出自马基雅弗里的作品。至于最近从战略视角认识制度影响的清晰陈述,可参阅:Shepsle(1986)。

② 例如,意大利议会发生的极大变化,将对意大利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态既受到了冷战结束的影响,也受到了腐败丑闻的影响。

模式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由“新制度主义”驱动的比较政治学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的工作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将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理论融合起来的尝试。

宽泛而言,本文集的政治经济学者和制度主义者都假定政治行为体是理性的。政治家对动机做出反应,这一动机既是由制度提供的,也是由世界经济的机会与约束提供的。因此,本文集中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途径之间的。这一争论,一方面关乎世界经济施加的约束和激励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关乎先前存在的国家制度的内在约束和激励。它同时也与国际约束和国内约束的相互作用相关。

以下部分将介绍早期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内政治经济的研究,解释本文集与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介绍了过去20年国际化的不同方面。在第三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化影响国内政治的假说,这些假说与第四部分提出的关于制度资源对国际化的线性影响是并列的。最后,我们通过强调本文集的核心观点做出这样的结论:国际化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的形式因制度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而异。

一、关于世界经济影响的早期研究

有两类重要的研究探讨过我们在本文集中提出的广泛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国际“相互依赖”研究聚焦于国家间越来越多的经济联系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方式(Cooper 1968, 1972; Deutsch and Eckstein 1961; Keohane and Nye 1972; Rosecrance and Stein 1975; and Waltz 1970)。随着这一研究的进展,他们采用了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45/1980)在一代人以前提出的一些概念(Baldwin 1980; Keohane and Nye 1977),关于相互依赖的含义以及相互依赖与权力关系的描述变得越来越准确。这一研究认为,相互依赖通过改变国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选择而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性质。在这一方面,相互依赖研究的核心观点与本文论点近似。但是,该研究所缺乏的是对国际化如何影响国内政治

的系统分析。[①] 比如,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的分析限定于国际层次,因此而"不得不将(国家的)利益看做主要是以一种我们的理论未解释的方式外在地形成的,(但是)自我利益定义的变化……一直出现在我们的个案分析中"(Keohane and Nye 1987:739)。在本文集中,我们探究相互依赖对国家内部政治的影响,而试图将对"国际化"的研究建立在相互依赖研究的基础之上。

作为对相互依赖研究忽视国内政治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研究。这一研究认为,国际力量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内政治以及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国际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利益和权力来影响国内政治中形成的联盟(Gourevitch 1978; Katzenstein 1978)。但是,从一开始,关于这些问题的创新性研究并非扎根于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国际变化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因果联系几乎从未明晰过。

诸多最近的著述尝试探讨这些问题,并扩展这一"颠倒的第二意象"传统。这些著述中最为突出的是四种探讨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不同影响的观点。在《贸易和联盟》(Commerce and Coalitions)一书中,罗纳德·罗戈斯基采用斯托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的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流动的变化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回报影响国家政治的联盟和分裂(Gogowski 1989)。[②] 罗戈斯基以赫克歇尔-俄林

① 库珀(Cooper)认为,经济增长的相互依赖损害了决策者控制其经济的能力。"通过国家市场的联合,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侵蚀了(国内)政策的有效性并且威胁到国家确立和追求其经济目标的自主性。"从这方面看,相互依赖和跨国公司的存在一样对国家产生了相似的影响。此后,基欧汉和奈在他们的著作《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中也探讨了政府如何"失去控制"。但是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并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无法证实这一说法,而且国家对相互依赖的反应也没有得到相关的考察。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确实更加注重国际经济的国内影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对此做出了最详尽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所有国家分成三个不同地位: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处于边缘的国家属于"弱"国家——它们无法抗拒国际经济征服其独立的压力。在这一传统方面,有相当多的著作探讨了不发达国家由于其国际经济地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以及它们国内的问题是由外部依附所产生的。如: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Dos Santos 1970, Evans 1979。

② 罗戈斯基提出三要素模型,即在给定国家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方面的禀赋之后,贸易层次的转变在国家产生了可以预见的国内政治转变。在专门部门的基础上,或依赖于国有公司与多国公司的区别,含有更多要素的不同模型可以预测分裂的不同模式。

(Heckscher-Ohlin)对国际贸易的分析为依据指出,从外部交换中得益和受损的要素促成了标志着国家内部重大政治分裂的政治联盟。因此,显示贸易层次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以及哪些要素从这些贸易流动中得益或受损,可以产生关于国家内部政治分裂的假说。

无论如何,生产要素是会与使用它们的经济部门发生联系的:这就意味着,对某些部门或行业而言,要素是"专有的"。只要这些专有要素的模型可以应用,联盟就是以部门而非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政治不会沿着阶级的阵线使劳工对抗资本,或者使城市对抗农村,而是会导向各种分裂,比如存在于可贸易与不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者之间,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或者多国公司与纯国有公司之间。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根据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分析证实,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国家的"生产状况"有助于解释其贸易政策(Gerschenkron 1986,尤其是第三章)。[①] 贸易流动以及部门竞争力的变化因此会重塑国家的偏好并改变其国内政治。正如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Frieden 1991b)所提出的,国际开放性可以使政治论争从利率转向汇率,使喜欢稳定汇率的国际贸易商、投资商与喜欢通货紧缩、为国内市场提供可贸易商品的进口竞争制造商之间产生冲突。

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贸易收益可能会更加具体——只发生在特定的企业而不是更广泛的部门或生产要素之间。因此,联盟取决于企业间的利益趋同。比如,海伦·米尔纳在《抵制保护主义》(Resisting Protectionism)一书中(1988)指出,企业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出口依赖性或生产多国化(multinationalization),影响了它们关于国际交易管制和国家政策的偏好。

最后,融入世界市场的不同水平也会影响国家政治制度的特性。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1978)指出,20世纪60、70年代对国际经济的开放是与大型公共部门联系在一起的。彼得·卡曾斯坦解释道,欧洲小国的社团主义结构(corporatist structures)设计是为了提供"一种制度化机制,用来动员忍受急剧经济变化的代价所必须的舆论"(Katzenstein 1985:200)。当然,这些制度所采取的确切形式

---

① 古勒维奇关于最近一个"困难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80年代早期的"危机"——的研究,并没有对生产状况的解释提供明确的支持。

因各国不同的历史实践而异。

其他研究者同样注意到了国家反应的不同。第一,一些作者宣称,国家的反应主要取决于现任政府的政党构成:左翼政府会对经济压力产生与右翼政府不同的反应。政府的政党关系至关重要,因为每个政党都有其不同的方案,这一方案吸引了不同的选民。为了赢得或确保政权,政党需要使其核心选民得到满足。这一看法部分建立在宏观经济决策分析的基础之上,它表明,一个理性的党派经济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政策决策者的行为。在这一模型中,如果左翼政党获得政权,则其控制的政府将会扩大经济,而右翼政党在当政之后则会收缩经济。但是,在高度国际化的经济中,这一简单的关系并不适用。阿莱希纳(Alesina)和鲁比尼(Roubini)发现,对贸易存在高度依赖的小国并没有显示出理性政党型宏观经济循环的迹象。这表明,高水平的国际化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Alsina and Roubini 1992; Alt 1985)。

第二,劳工和金融市场的组织似乎非常重要。加勒特和兰格认为,左翼政府或右翼政府的成功政策取决于兼容性的社会构成。当劳工力量强大并被集中组织起来时,左翼政府会取得最大的成功;当劳工力量弱小而更加分裂时,右翼政府的政策将最好地发挥作用(Alvarez, Garrett, and Lange 1991; Garrett and Lange 1986)。波利特·库泽尔(Paulette Kurzer)(1993)主要关注欧洲小国经济与世界市场之间的金融联系,他通过对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和瑞典的研究,表明这些金融联系是社会民主社团主义成功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第三,政治制度造成了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关于经济政策的大量研究证明了这一论点(Hall 1986; Katzenstein 1978; Shonfield 1965; Zysman 1983)。例如,卡曾斯坦认为,国家如何回应外部经济压力,取决于其政治制度是否足够“强大”、可以使其决策者摆脱紧迫的政治压力,或非常“弱小”、更易于受社会影响的渗透。拥有职业官僚悠久传统的国家——比如法国和日本,与缺乏这种发展良好的、独特国家制度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反应不同。本文集特别重要之处在于,它指出了某些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可以置身社会压力之外。这意味着,即使国际化可能在增长,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在变化,核心决策者也不会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或者会以它们自身的风格做出反应。

诚然,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论是否强调政党关系、劳工或金融市场或者国家制度——都怀疑这一论点:国家对国际化的反应只是简单地作为它对相对价格产生影响的一个函数。不论对第二章关于国际化影响行为体偏好的看法持何种态度,这一影响显然为国内政治因素所协调,并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实践。

二、国际化的证据

在过去20多年里,跨国界的经济交往急剧扩大。因此,正如我们以实证的方式确定的那样,国际化增长了。国际化可以增加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如果一体化可以被界定为这些市场内的商品、服务和资本价格的趋同。尽管国际化和一体化并不完全是共变的,也难以建构对价格趋同的尺度,短期利率之间的相互关联最近已变得非常高,已经回归到了只有在金本位时期才看得到的水平(Frankel 1991; Zevin 1992: 46～55)。由于我们所关心的是跨国界流动的政治影响,而不是它们对一体化的影响,我们回避了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之间关系这一问题。

国际贸易流动

世界贸易的数据记载了国际化的主要方面。[①] 在二战后的15年或20年里,贸易开放性尺度(例如进口项目与实际收入的比率)已经恢复,并高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平,但还没有达到1914年之前的水平(McKeown 1991)。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与此前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的增长相比而言,世界贸易急剧增长。进口项目占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880到1972年间这80年里一直保持在10%～16%,1973～1987年间,它增长到几乎占22%(McKeown 1991: 158)。1972年到1991年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进口增长率略微超过5%,相比之下,其实际国内总需求(都以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基础上的美元价格计算)的增长率只是3%(OECD 1992: tables R10和R8, pp.210, 208)。这意味着,在过

① 相比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统计,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服务贸易在最近几年里迅速增长了。鉴于相关数据可以获得,我们对贸易进行了集中考察。

去20年里,进口增长率比国内需求的增长率高了大约65%。大部分贸易是通过多国公司进行的:在80年代早期,大概40%的美国进口,25～30%的日本进口,以及30%的英国进口都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的交易(McKeown 1991: 168)。

表1和表2显示了1913～1987年间16个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变化——分别以当前价格和1987年价格计算,记载了这一变化的长期模式。除个别情况之外,这一比率在1913～1950年间有所降低,但在1950～1973年和1973～1987年间上升了。而且,不同国家间存在很大差异。表中列出的一半国家,1973年的比率仍然低于1913年(以当前价格计算);甚至在1987年,仍然有5个国家的比率低于1913年。但是,1950年之后,所有这些国家——除澳大利亚外——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都显著持续增长(以当前价格计算)。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最近的出口记录也同样有助于证明国家经济的国际化。巴西、墨西哥、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这6个国家和地区一般被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尽管富国的贸易偏好并没有比其他国家更为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们的净产出和出口在70年代迅速地增长了。1964～1965年间,这6个国家和地区大概占世界净国内生产的3.5%,世界制造业出口的1.9%,但是到1983年时,它们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6.2%和世界制造业出口的8.7%(OECD 1988; tables 1.1 和1.4, pp.11,14)。1964年,这6个国家和地区对经合组织的出口量还不到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量的一半;1983年,其出口就超过了进口(OECD 1988: table 1, p.17)。1964年到1985年间,经合组织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以每年23.6%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同期的总进口增长仅为13.6%(OECD 1988: 18)。受出口激增和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商品(包括工业制成品)出口比率从1980年的15.2%上升到1989年的53.5%;同期,南方的非石油类商品出口(包括工业制成品)所占比率从45.1%上升到70.9%(Wood 1994: table 1.1, p.2)。70年代和8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记录表明,世界经济充分地开放了,即使不存在任何专门的措施,一些穷国和地区仍然可以获得很快的出口和收入增长速度。

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

资本市场在过去20年里迅速地国际化了。各类全球资本流动急剧扩大,其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资本市场。正如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所指出的:“如果一个名叫瑞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金融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入睡,在20年后醒来,他可能会被国际金融行为性质和范围的变化所震惊。比如,在60年代初,大部分银行业务是国内的……但是20年后,很多银行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国际业务”(Krugman and Obstfeld 1988: 622)。

有三个因素造就了世界资本市场的这一复苏: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的管制解除;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流动;技术创新使资本的转移变得更快和更便宜(Turner 1991: 11～22)。这些变化是互相强化的:国际投资的增长促使政府对资本运动解除管制,后者反过来使投资和技术变化变得更为容易(Goodman and Pauly 1993)。

表1 商品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以当前市场价格计算)

	1913	1950	1973	1987
澳大利亚	18.3	22.0	13.7	13.5
奥地利	8.2	12.6	19.0	23.2
比利时	50.9	20.3	49.9	59.8
加拿大	15.1	17.5	20.9	23.9
丹麦	26.9	21.3	21.9	25.4
芬兰	25.2	16.6	20.5	22.5
法国	13.9	10.6	14.4	16.8
德国	17.5	8.5	19.7	26.4
意大利	12.0	7.0	13.4	15.4
日本	12.3	4.7	8.9	9.7
荷兰	38.2	26.9	37.3	43.6
挪威	22.7	18.2	24.4	25.7
瑞典	20.8	17.8	23.5	27.6
瑞士	31.4	20.0	23.2	26.6
英国	20.9	14.4	16.4	19.3
美国	6.1	3.6	8.0	5.7
平均值	21.2	15.1	20.9	24.1

资料来源: Maddison 1991: 326.

金融的各个方面在过去 20 年里都国际化了。在 80 年代末,国际资本净流动量上升到每年 6,000 亿美元(Turner 1991: 9)。流向工业化国家的国际资本(大部分来自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年平均值,从 1975～1977 年间的 990 亿美元上升到 1985～1989 年间的 4,630 亿美元,其增幅接近 5 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资本流动翻了一番,从 1975～1977 年间的 520 亿美元增长到 1985～1989 年间的 1,110 亿美元(Turner 1991: 23)。① 1993 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量达到了 1,513 亿美元(BIS 1995: 146)。国际银行短期流动净量在过去 20 年里也增长了 4 倍,从 1975～1979 年间的每年 115 亿美元增长到 1989 年的约 620 亿美元(Turner 1991: 75)。世界市场的净贷款额在 70 年代后期还只是每年平均 1,000 亿美元,1990 年达到 3,420 亿美元。1992 年,国际银行贷款量达到了 36,000 亿美元,是 1978 年的 7 倍。② 从 1986 年到 1989 年间,外汇交易翻了一番多,达到了平均每天 6,500 亿美元的水平,这几乎是每天世界贸易量的 40 倍。到 1992 年,这一交易量增长到几乎每天 10,000 亿美元(Turner 1991: 34, 9～10; Eichengreen 1993)。因此,关于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的增长远远地超过了国内生产的增长,遍及全球的资本运动甚至比贸易流动增长得更快。③ "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使贸易增长相形见绌。例如,国际银行借款量占经合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1973 年的 5% 增长到 1991 年的 20%"(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3, p.281.)。

国际证券交易和直接投资也有所增长。1979 年,国际股票的年交易额为 730 亿美元;到 1990 年,这一数字就增长了 20 倍,达到了 15,000 亿美元(Turner 1991: 53)。1989 年,世界经济总量为 20 万亿美元,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量为 1.5 万亿美元(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1: 3)。与 1975～1979 年间的

① 应当注意到,这些资本流动反映了当前账目不平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1914 年以前大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是,这些资本流动的实质在过去一个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一区别,参见 Turner(1991: 12～3)。

② Goodman and Pauly 1993, 引自表 1,第 54 页。

③ 在 1965 和 1990 年间,随通货膨胀调整的(inflation-adjusted)商品出口增长了 439%,但是,世界生产只增长了 136%(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3: 280)。整个 80 年代的世界贸易增长高于产出增长 50%(IMF 1992: 8)。

年均 280 亿美元和 1980～1984 年间的年均 530 亿美元相比,1989 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流动量剧增至 1,850 亿美元(Turner 1991:39)。1994 年外流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也达到了 2,300 亿美元的新纪录(BIS 1995:66)。外国直接投资在 80 年代以每年 30%的前所未有速度增长,比贸易增长速度快 3 倍,比世界产出增长速度快 4 倍(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1:table 1,pp.3～4)。80 年代末,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占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1%,而在 1980 年还只是 0.5%(Turner 1991:30～2)。外国直接投资比国内产出和国内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快得多。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资本构成的比率从 1980～1982 年间的 2.9%增长到 1985～1987 年间的 3.4%。同金融的其他方面一起,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经济更为重要的成分。

表 2　商品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以 1985 年价格计算)

	1913	1950	1973	1987
澳大利亚	10.9	7.7	9.5	12.4
奥地利	5.2	4.0	12.6	20.0
比利时	17.5	13.4	40.3	52.5c
加拿大	12.9	13.0	19.9	23.8
丹麦	10.1	9.3	18.2	25.8
芬兰	17.0	12.7	20.5	23.0
法国	6.0	5.6	11.2	14.3
德国	12.2	4.4	17.2	23.7
意大利	3.3	2.4	8.7	11.2
日本	2.1	2.0	6.8	10.6
荷兰	14.5	10.2	34.3	40.9
挪威	14.6	13.5	27.4	34.0
瑞典	12.0	12.2	23.1	27.0
瑞士	22.3	9.8	21.3	28.9
英国	14.7	9.5	11.5	15.3
美国	4.1	3.3	5.8	6.3
平均值	11.2	8.3	18.0	23.1

资料来源:Maddison 1991:327.

当然,巨额资本流动的事实并非真正一体化的资本市场——意

味着实际对冲利率应当相等——的必然或充分条件。由于不存在任何交易的障碍,作为信息流动和预期的结果,即便没有资本的实际流动,利率也会趋同。相反,至少可以想象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妨碍真正的经济一体化的资本流动性的障碍与实质性流动同时存在。[1]但是,我们可以通常认为在资本流动性和金融资产的实际流动之间存在联系。其他的研究——比如前面引用过的弗兰克尔(Frankel)和泽文(Zevin)的著作——确实表明,至少对于短期票据来说,对冲利率变得高度相关了。现有的国际化水平已经接近19世纪后期金本位年代所达到的高水平了。

正如我们的实证研究所显示的,在任何场合下,这些数据都表明国际化运行良好:在世界经济中,国际交往变得越来越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这一巨大变化的影响。但是一个给定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取决于其国家政策。现在仍然有可能将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至少是暂时隔离,尽管这样做的机会成本非常之高。古巴和朝鲜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就那些对外影响开放的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不相同。要素禀赋、群体组织、国家制度和领导者的政治战略不同,都会造成国家对共同国际趋势的不同反应。因此,理解国际化的影响,需要分析它对政策偏好和更广泛激励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集团对其影响所做出的政治反应、国内制度协调围绕开放展开的政治斗争的方式。

三、关于国际化的政治影响的假设

我们对国际化影响的分析,始于区分国际化对政策偏好的影响——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在第二章就此进行了讨论——以及国际化对政府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影响。我们首先从政策偏好开始分析。

国际化和政策偏好

一般认为,国际化将围绕更大开放的不同影响产生新联盟。与

① 戴维·安德鲁(David Andrew 1994)很好地分析了这一问题:"资本的流动性指资本跨越边界的能力,而不是货币的实际流动。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资本跨越国界的这一能力可能并非在任何时间都显而易见,因为在不同国家(相对)缺乏来自不同回报预期率的利润动机。"

其国家相对优势联系最紧密的生产者可能赞同促进更开放的政策;而处于劣势的生产者则可能反对它们。因此,国际化的赢家(winners)和输家(losers)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其他形式的分裂也存在于偏爱贬值的可贸易商品生产者和反对它们的不可贸易商品生产者之间,存在于其资本是不可流动的特定要素拥有者和流动资本的拥有者之间。而且,政策偏好的变化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政策和制度会如何作为国际化的结果而发生转变:我们还需要知道国际化对不同行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相关政治影响。

很明显,国际化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既不简单,又非一致。尽管国际化对各国可能会产生大致相似的影响,但它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看来是最重要的。其中有两点很明显。第一,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会对各国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按照经济理论的解释,这两个要素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影响:

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允许各国将其国家所特有的生产力多样化。因此,可以说,资本流动的增加促进了投资的反复无常。同时,将通货用于国际借贷的能力使消费变得顺畅。因此,增加的资本流动应该与更加顺畅的消费和更加反复无常的投资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转向商品市场,商品市场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直接导致各国经济就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最终)商品进行专业化生产。贸易壁垒(比如进口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会引起产业的地理集中和出口专业化。……简言之,增加的商品流动应该与增加的产出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Razin and Rose 1994: 50～51)

考虑到商品和资本流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认为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国际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上面指出的,比商品流动更大的资本流动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类型的震动。例如,这表明国家因不同类型的国际开放而经历不同的政治危机。

国际化产生不同影响的另一条途径是各国的不同要素禀赋或者它们部门专有性的函数。一般来说,正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指出的,国际化将导致要素或部门——有赖于一个人所使用的模型——相对价格的变化,这将导致它们政策偏好的变化,并最终导致政治联盟的

变化。但是,这一进程如何展开则因经济而异。例如,在资本丰富的国家,国际化会促使资本持有者推动更大的开放性;在资本贫乏的国家,这一反应则是相反的。虽然我们认为国际化的一般进程会改变相对价格,并且会改变团体的政策偏好和导致新的联盟,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国家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会很相似。我们所认为的相似性是指,支撑国内政治联盟的利益会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经济力量以各种不同途径所塑造。国内争论和联盟会变得更加集中于国际化进程等国际政策问题:涉及到国际贸易、汇率和外国投资的政策不仅仅会导致政治争论的增加,而且会占据更大部分的国内政治利益。

国际化和政府政策

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分析国际化对政府政策所产生的两个政治影响。各经济体间增长的国际贸易和资本运动增加了每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压力(可贸易部门)的开放程度,并且会增加国内经济对国际价格趋势和动荡的敏感性。就像 1994 年末和 1995 年初发生的墨西哥货币贬值危机所显示的,国际化意味着外部经济动荡会更全面和更快地波及国内经济。来自外部的经济动荡会产生政治危机,所产生的危机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们从根本上重塑了国家政策和制度。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国际化的发展会增加如下可能性,即经受巨大的经济动荡,并导致政治危机。正如制度主义者所指出的,这些非常相似的危机创造了政治家们从根本上重新组织国内政治所必需的“政治空间”(Goldstein 1989; Haggard 1988; Hall 1989)。

第二,国际化损害一些政策的效能,从而影响了政府政策选择的自主权。“国家减少了对商品或资本的国际障碍,为了更高的生活标准而牺牲国内自主权”(Razin and Rose 1994: 48)。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布赖恩特(Bryant)提出:“相互依赖增长后,一个国家既定规模的政策总是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变量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但只有少量影响会继续激发国内行动”(Bryant 1980: 181)。[①] 芒德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定律表明,

① Bryant 1980:181。请注意,这意味着外国的政策行为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比以前大得多的影响,它同时也意味着国内产生的动荡以前的影响小得多,因为它们扩散到了国外;与此同时在等水平的国际化下,国外产生的动荡则对国内具有更大的影响。

在固定汇率之下,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使货币政策在国内越来越没用;它变成一个只是维持汇率的工具。这可能是西欧国家现在为什么会愿意考虑货币联盟的原因之一:它们在巨大的资本流动面前追求固定汇率的愿望,几乎没给它们追求独立的国家货币政策留下什么空间。

“标准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standard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 model)对经济的性质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它认为,与一个没有资本流动的世界相比,在浮动汇率和完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财政政策会失去它的部分效能(Mussa 1979)。在短期内,市场对金融政策的反应会影响国内利率和汇率,其方式是抵消它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与固定汇率的情况相比,货币政策变化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开放经济中,该影响范围会因害怕资本外逃而阻止扩张的货币政策。这就是说,即使货币政策有所不同,货币自主权仍然会收缩(Andrew 1994; Goodman and Pauly 1993)。甚至是拥有相对独立市场的美国也逐渐意识到,国际化改变了政策选择的代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主席最近在解释不降低美国利率的决定时说,“一个内在一致的货币政策是我们全球金融体系所不断需要和回报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迅速扩张促使货币政策考虑越来越多。但最为重要的是,需要维持商品价格和服务的稳定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信任。作为跨国资本流动的结果,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其后果比一代人之前的经历更为严重”(*New York Times*, 21 June 1995, A-1 and D-9)。

政策自主权的丧失会对左翼、社会民主政府产生特别压力。如果左翼政府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而支持扩张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它们的政策偏好可能会比相对充分就业、优先稳定价格的右翼政府的政策偏好更受限制(Alesina and Roubini 1992; Hibbs 1987)。在浮动汇率下,资本的高度流动可能使扩张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变得无效(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固定汇率之下,资本流动使货币政策不那么有用,也可能会限制扩张性的金融政策。[①] 另一方面,实行收缩的政

① 在后面这些情况下,如果金融扩张导致通货膨胀或政府预算赤字,对汇率的压力将随之增加。最后,政府将受限于它对汇率稳定的承诺程度、其外汇储备及对货币收缩的承受力。

策或追求价格稳定的政策可能会得到市场的回报。因此,对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的限制看来有利于右翼政府——以其社会民主主义竞争者为代价,因为扩张性货币和金融政策的代价益发高昂。但是,就像加勒特在第四章所指出的,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金融政策——比如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可能是社会民主政府的一条替代路线。左翼社团主义政府可能处在奉行这种贸易增长的投资政策的最佳位置。

如果以上讨论和以下概括的假设是正确的,国际化会对国内政治产生久远的影响。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化,社会集团的政策偏好会变化,新的联盟会形成,产生国内政策和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假设 1: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化,贸易部门会扩张,经济会变得对世界市场的价格趋势和动荡更加敏感。随着国际化使经济更易于受外部经济动荡的影响,主要国内政策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会增长。

假设 2: 国际化会削弱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和效能。它对左翼政府行为的限制比对右翼政府行为的限制更为严厉。资本流动会比贸易开放产生的后果更为久远。

推论

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分析说明,国际化甚至会影响专制国家的经济,因为并不是流动本身而是变化的机会成本产生了主要影响。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界线在本土价格和外国价格之间造成区别,这要求从那些效率降低的经济中聚集机会成本,并且使那些在世界市场有竞争力的部门处于各类不公平地位。封闭有利于那些相对稀缺(或非竞争性部门)的生产要素,伤害了那些丰富的生产要素(竞争性部门)。能够从开放中受益的集团(比如丰富生产要素的持有者)会增加它们对政府的压力,要求其改变政策;另一方面,可能的输家则会努力游说政府以保持现状。如果行为体具有安全的产权,并且可以理性地预测这些可能的得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两个条件说明,封闭经济行为体的政治压力与那些开放经济行为体的压力是相似的。因此,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化,专制经济国家的机会成本将

会增大,新的联盟将会出现,要求政策变化的压力也会增加。因此我们提出:

推论 1: 国际化会影响那些甚至是经济不开放的国家。

第二个推论性假设始于承认国际化意味着更大的资本流动。如果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成本不那么高,那些能够“撤离”的资本持有者就会通过使用威胁撤离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或“声音”。(Hirschman 1970)来自资本转移的可信威胁对政治领导者施加了额外的压力,要求保持查尔斯·E.林德布罗姆(Charles E. Lindblom)(1977)所称国内情景之下的“商业优先地位”。最近关于四个欧洲小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显示:“劳工最持久的两难困境就是资本流动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的权力资源。这一流动的后果是,管理者、金融资产的持有者和跨国公司得到了好处,而劳工受到了伤害”。(Kruzer 1993: 12)在本文集的第四章中,加勒特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资产持有者越容易地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政府就会越强烈地奉行增加国内投资回报利率的政策”(Garrett, p.88)。斯蒂芬·哈格德和西尔维亚·马克斯菲尔德在本文集对四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分析中注意到,“看起来,资本项目的开放状况受到政治领导者恢复债权人和投资者信心努力的驱使”(p.234)。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会增加国际流动资本的政治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

推论 2: 随着国际化的发展,相比劳工和政治官僚而言,国际流动资本将赢得政治权力。

关于国际化的探讨提出了如下问题:即国家政策是否会向趋同发展。但趋同并不是本文集的一个主要议题。在理论上,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会导致价格的趋同。市场会惩罚那些采取价格扭曲政策的国家:利率费用或对效率的消极影响会不可避免地强迫其政府回到更为正常的价格上。当前追求“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反通货膨胀的金融措施、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削减国内政府干涉的组合——的时尚有时被视为趋同的证据。

但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国际化的政治影响的变化取决于具体情境——比如哪个生产要素或部门是有优势的,政治制度的适应力,经济对国际引发危机的敏感性。更进一步说,正如兰格和加勒特所强调的以及我们在下一部分所着重分析的,既有制度深刻地影响了特定国际化模式所能产生影响的类型。概括言之,向新自由政策的发展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把每个国家的情况描绘得更具体一些的话,其表现却非常之不同。例如,加勒特在第四章提出,尽管国际化已经存在,左翼-劳工政府一直保持了很重要的能力,维持与更保守对手的不同政策。即使在市场因素造成的利率费用的面前,这样的政府仍然会继续奉行扩张的金融政策。“趋同”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我们所能搜集的相关证据是含糊的。当然,它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对国际化影响的抵抗

如果以上所有假设都正确,则国际化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影响——将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对过去政治变化的观察,应该使我们谨慎预期国际化会产生这样直接的单方面影响。实际上,工会、政党和其他被国际化置于不利地位的组织化利益集团不大可能消极接受命运的安排,关于如何回应与世界经济接触的政府决策也不大可能接受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支配。

政治领导人在如何回应国际化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回旋余地。在很大程度上,其政策选择范围是他们必须运作的国内制度框架的一个函数。一般来说,先前存在的国内制度会使行为体抗拒国际化产生的压力。制度使可能成为国际化输家的行为体能够终止任何变化。制度可以帮助那些反对变化的集团组织起来,或者赋予它们特权政治途径。它们可能会拒绝赋予那些从国际化推动的变化中受益的集团以政治代表权。既有制度可能使新政策成为根本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国际化的面前,国内制度可能会轻而易举地阻止任何变化的发生。

在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相联系的过程中,国内制度施加三种不同影响,我们可以一一列出:(1) 它们可能阻止国际经济的相对价格信号进入国内经济,并因此模糊行为体的利益;(2) 它们可以冻结联盟

和政策到位,其方式是提高联盟和政策的成本;(3)它们可以引导领导者应对国际经济变化的战略。

首先,国内制度在早期可以阻止价格信号从国际环境释放出来。尤其是在那些实行中央计划或国家干预较多的国家,政府政策和制度可以在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之间发挥“隔离墙”的作用。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发生,但是由于国家干预的存在,它们不可能被国内感觉到。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因为专制机会成本的不断增加而遭受国际化的影响,他们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承受这一代价。正如加勒特和兰格所指出的,一个政治体系越是独裁的和稳定的,其领导者对国际化压力的抵抗就越久一些。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以长期存在的、多数主义为特征的“强大”政府更有可能实行资本控制,因为它们能够很好地使自己躲避开采取这些措施的代价(Alesina, Grilli, and Milesi-Ferretti 1994)。

第二,既有政治制度可能会通过“冻结”联盟和政策的方式,否决或修正世界经济的影响。国际价格信号会进入国内经济,但是政治也可能会继续冻结在陈旧的模式中。尽管国际化存在,拥有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特权集团会保留他们的优势;被剥夺了这一特权的群体甚至在国际化面前也不可能得到优势。那些可能从变化中获益的人士可能不会正确地解释价格信号,或者不能断定预期获益的大小;但是,被嵌入国际化的集团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捍卫自己的利益。

如同利普赛特(Lipset)和罗坎(Rokkan)所描述的,欧洲国家的政党体系处于“冻结”状态,其他制度也会锁住那些支持既有政策发挥作用的联盟(Lipset and Rokkan 1967)。早期通过的政策可能也会保留,因为围绕它们建立的制度使任何理性行为体都无法承受变革代价。这就意味着,新的联盟和政策难以形成;进入政治体系的代价越高,对变化的抵抗也就越大。如同加勒特和兰格所提出的,某些形式的选举法规也会有效地冻结旧联盟作用的发挥。

国内制度影响国际化后果的第三个机制是,引导国家战略的设计以应对国际层次的变化。这一进程不像前两个影响那么巨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却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每个国家对战略、联盟、政策和改革时间的选择都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严重地影响了这些选择。比如,为实现本国目标,与拥有独立中央银行的国家相比,一个缺乏独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不

同的政策和战略;相比无法控制分裂的劳动市场的政府而言,那些拥有团结一致的工会和雇主联盟——它们习惯于彼此合作——的政府拥有前者所不具备的选择。先前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决定了领导人选择何种特定战略和政策来回应国际化的压力。

制度的三个影响至少能在以下国家个案中的一个得到佐证。这些案例被选来为国际化发生的情景提供最大限度的变量。如果国际化确实是一个体系范围的全球进程,那么所有国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不同类型政治体系、地域、发展水平、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变化,使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否具有这些全球影响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情景。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政治联盟、政策和制度的体系转变吗?或者,当政治领导人仍然保持选择应对国际化特定战略的相对自由时,既有政治制度是在阻碍还是引导这些变化?国内制度和国际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始终如一的。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些线性趋势表明国际化不可避免地导致那些在第三部分提出的后果?或者,国内行为体和制度也许干预、阻碍或重塑国际化的这些压力?

结　论

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看来正在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内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一国的政府、企业和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动机也在发生变化。要求改变政策和相关制度的压力增加了。本文集系统地考察了这些变化并且描述了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在发生巨大制度变化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以及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模式结果。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受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是惊人的,而且这些影响的差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崭新的处理方法是,像伊万杰利斯塔和谢淑丽的研究所表明的,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影响的深度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

本文集的首要目标是国际化和国内制度的互动,其他因素也明显地影响了政府回应国际化压力的方式。通过单边和多边的行为,政府可以影响国际经济施加的限制。由于贸易开放,政府政策往往集中于促进国家工业的竞争优势,并推动经济快速适应国际化。如

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增长所表明的,在条件顺利的情况下,这一政策可能会取得成功(Haggard 1990; Krueger 1992; Wade 1990)。这样的国家工业政策也可能会像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走上绝路。即使根本要素禀赋只有在几十年以后才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在较短时期内对竞争优势模式具有重大影响。政府政策不会仅仅以“赢家”为目标,而且也会采取大规模措施——通过改善要素条件、增加需求和影响企业战略——来增加所有要素的生产率(Porter 1990: ch.6, pp.617～82)。但是,当前的中心问题是该战略能否紧跟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当前政府与1945～1980年间的政府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面对着范围和速度都无法预测的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应因此成为政策形成的主要因素。

考虑到国家的集体性国际行为所引发的积累性后果,我们的结论就变得复杂起来。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已经被制度创新所根本改变。这些制度是由大国激发的,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刺激了国际化的深入。有些制度创新是公共性的、多边的,如关贸总协定(GATT)的发展,其他则是私人性的或单边的。所有制度创新都受到大国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关贸总协定下的关税减让回合通过降低交易的壁垒,改变了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的关系。随着关税削减促进了市场开放,关贸总协定国家的经济行为体面对着新的获利机会和失败威胁。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国家也面对着新的机会成本,随着全球市场规模的增长,置身全球贸易体系之外的代价也在提高。欧共体的创建及其扩张成为欧洲联盟与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在70年代早期的崩溃同样改变了世界经济。以上每一事件都推动了跨国经济交易的增长。它们同样也影响了商品和服务的世界市场价格,并引起国内和世界的商品、服务相对价格的变动。这些变化产生积累性后果,对那些没有完全融入到关贸总协定体系或欧盟的国家而言,其竞争部门的机会成本因之增加。

在我们的分析中,政治选择和政治战略既是对国际化的反应,也塑造了世界经济的变化。我们认为,国际化并不是一个与政治无关、以简单适应由科技驱动的变化为特征的进程。相反,大国和它们所控制的国际制度有助于塑造——受制于经济和科技——国际化的变

化。比如,在 80 年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它们开放其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更加重视附加条件;在东京回合的谈判中,关贸总协定的行为准则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趋于要求发展中国家提供互惠;美国通过使用贸易 301 条款积极施压,要求外国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很多不同方面都受到了大国的质疑。如同世界经济一直表明的,权力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包括越南、印度、中国、南非、智利和墨西哥等各类国家——自 70 年代以来决定削减关税壁垒,开放资本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从社会福利政策后退。这些事实表明,国际化力量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经验研究表明,国际化并不是惟一的事态。国际化可能在每个国家导致不同的后果,因为每个政体对国际化创造的机遇和限制的反应不同。最后,我们将根据下面各章提供的证据探究此处所提出的一般化趋势。

第二章

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

杰弗里·A.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

不论以任何衡量标准，在过去30年里，跨国界贸易和投资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增长了。米尔纳和基欧汉在本文集的“导论”中介绍了关于工业化经济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不同贸易数据。即使在最穷国家(世界银行划分为“低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10美元或更少——的43个国家)中，1965～1990年间，商品出口也以平均每年5.2%的速度增长了(根据如下文献计算：World Bank 1992: table 14)。正如米尔纳和基欧汉指出的，资本跨国流动的增长甚至更快。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10年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跨国流动几乎增长了4倍，而发展中国家则翻了一番。

国际交易的这一大幅度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像我们在下面要谈到的，这些流动所反映出来的国际交换外部条件的改善——对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政治都产生了影响。有些影响方式是很明显的，如关于贸易协定、共同市场、非关税壁垒、移民和投资的争论。还有一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可能更为深刻，它们包括被广泛采用的、放弃有碍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管制和宏观经济政策。本章利用国际贸易理论，提出关于重要社会集团偏好的可测试的假设，以阐明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国内政治、政策和制度。

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定义本章所使用的独立变量和因变量：我们分别用它们指称国际变化的外部改善和我们所要解释的政治后果。在第三部分，我们提出如下观点，即外部改善影响政治的

感谢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杰弗里·加勒特、罗伯特·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给予的有益评论和建议。

主要方式是,影响相对价格,影响国际价格传递到国内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国内机会结构)的直接性。第四部分概括出外部改善——更一般地说,是国际相对价格趋势——影响国家福利和有关政策的方式。我们在第五部分探究了这些趋势如何影响国内行为体关于政府政策的偏好。第六部分主要讨论了制度的作用。第七部分总结了我们的论点,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一、独立变量

国际贸易和投资水平的提高反映了一系列远为深刻的变化:国际交易成本的外在削减以及回报的增加。从事跨国商业的成本变化和回报,其明显可见的后果是全球贸易和金融流动的增长。在这些变化的潜在原因中,我们认为有五个是最突出的。

运输成本(transport cost)显然影响了国际经济交换的回报:19世纪国际经济交换的大部分增长是要归因于海峡、铁路和蒸汽船提供的更廉价的运输(转引自 Rogowski 1989: 21～2)。同样,在过去1/4个世纪里,改进的航空、集装箱化和卡车也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容易。成本的第二个因素被广泛地称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国际通讯系统、移民、信用、保险和期货市场降低了与国际贸易和支付有关的总支出。以上变化有些源自技术,其余的——如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则是经济、技术和政策发展的共同后果。第三类成本是关于贸易和投资的政府政策(government policies)。最明显的是关税、配额、资本管制和"自愿"出口限制等壁垒,但是,也有一些政策——诸如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降低了成本。在这些外在地增加国际贸易回报的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是,以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为特征的生产过程的重要性有所增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跨国差距有所增大。①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影响国际经济行为成本和回报之外部要素的清单,但是它包括任何此类清单中的重要因素。

① 关于国际交换回报的增长,还可能有第三个理论原因。根据赖伯津斯基定理(The Rybczinski Theorem),国家的或区域的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别在扩大。但是,正如伍德(Wood 1994: 174～80)所注意到的,这一可能性几乎没有什么经验支持。

我们用国际交换的“外部改善”指称此类交易总体的成本降低或回报增加:或是贸易、投资、移民或支付的技术障碍、经济障碍和政治障碍的外部削减;或是生产过程或禀赋的外部变化增加了国际(作为国内的对立面)经济行为的回报。比如,过去30年肯定是以几乎所有相关成本的降低和至少是某些部门国际回报的增加为特征,因此这一时期是国际交换外部改善的时期。此处有两个基本观点:

1. 服务和资本的流动和商品的流动是相似的,并且可以被用于相同的分析工具。出于简化的目的,我们集中于商品贸易,并捎带考察了金融和投资的流动。我们用外部改善这一术语来强调那些带来国际商品贸易的成本和回报的变化。如果用于探讨资本或劳工的流动,这一概括性论点并不确切,尽管它在实质上更加复杂。确实有一些差异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为了不使这一论点湮没在细枝末节之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差异。
2. 我们不仅关注——并将之视为中心——国家政策的外在变化,而且关注抵制任何政府操纵的变化。政府通常选择试图将其经济与世界市场分割开——我们在下文将分析其影响。但是,只要它们缺乏全球管辖权,它们就无力影响如下事务:降低国际通讯和交通成本的技术创新,减少国际交换风险的制度创新,保证回报增长的生产过程,以及其他降低交换和投资壁垒的国家决策。当然,在最终分析中,所有政府政策都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内在因素。但是,对于我们的目标和第一位近似值来说,如下假设足可坚持,即国家以及国内诸团体将世界领导国的政策选择视为给定的。

二、因变量

我们最终的兴趣在于理解各国制定的经济政策。即使小国政府也可以在其国界内制定政策,这种权力是惟一的和重要的。尽管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支配国际环境,但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的政策可以对国际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不仅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感兴趣,也对这些政策赖以辩论和推行的制度感兴趣。根据这一看法,制度本身是“凝结的旨趣(congealed tastes)”(Riker 1980: 445),是为了保证对特定政策的追

求而创造出来的。另有一些人则持这一看法:制度只是汇聚利益,使它不必继续重新计算政治力量的平衡。还有一些人则赋予制度以更为独立的重要意义,本文集中加勒特和兰格就持这样的看法。在所有这三种看法中,制度都是重要的。那些对经济政策感兴趣的人必然对产生那些政策的制度感兴趣。

鉴于政策和制度是对那些个人和集团所承受政治压力的回应,[①] 理解这些社会行为体的政策的和制度的偏好也非常重要。这包括理解为什么行为体以特定的方式(比如说按地域)在政治上聚集起来,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比如说按行业)凝聚?比如,理想而言,我们试图预测一个特定的企业、部门或集团喜欢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社会经济和政治能动者(agents)具有政策偏好,政治制度影响了政策的采纳和推行,如果给定这两点,私人能动者就必须对制度本身有偏好。如果一个独立机构比另一个依赖于行政部门的机构更可能对关税提供保护,那些更喜欢高关税的人就会需要一个独立机构,而自由贸易者则不会。因此,我们第二次序的一组因变量是重要社会经济和政治集团的政策和制度偏好。

需要解释的第三次序的一系列事物与此前阐述的那些事物相对立。如果我们要理解第一阶段的政策和制度后果、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和制度偏好,它意味着我们含蓄地期望理解政治制度和政策后果之间的真实关系。只有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时,关于政策和制度的偏好、后果问题才有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制度是如何影响政策后果的。

这一方案中,关于利益的因变量是三重的。因变量始终都是国际经济交换成本或回报的外部变化。按照并不严谨的逻辑顺序,这些因变量是:

1. 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能动者关于国家政策和国家决策制度的政策偏好;
2. 在给定这些偏好的条件下,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政策制度的采纳和

---

① 我们应该特别指出,我们是用"偏好"来指政策偏好的,即政府可以借以实现期望目标的期望途径。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偏好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近似于目的和手段或者目标和工具之间的关系。

演化;

3. 在给定偏好、政策和制度的条件下,一系列既定制度和一系列既定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们提出的解释框架集中于第一组因变量,即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我们并不认为其他的就不重要,但是我们坚信应该在经济和政治经济的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制订方案。在本文集的文章中,杰弗里·加勒特和彼得·兰格更详尽地探究了这一问题的制度方面。

在下一部分,我们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这样做是有益的:将独立变量——国际经济交易成本和回报的变化——概括为反映在它们的主要后果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在随后的部分中,我们解释了相对价格变化和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

三、解释性联系:相对价格变化的国际经济趋势

在分析中,国际经济的变化可以被有效地看做相对价格的变化,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对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具有可预见的影响。第一,我们认为,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可以将国际经济趋势——包括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看做是相对价格的变化。

事实上,经济能动者的所有利益发展都与相对价格发生联系。价格之所以是紧要的,是因为它们是传递经济信息的基本信号,并且是工资、租金和利润最直接的(如果不是潜在的)决定因素。相对价格是紧要的,这是因为价格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比如,多少蒲式耳的小麦可以换一码布,多少小时的工作可以生产一辆摩托车。[①] 最后,大量得到广泛认可的文献告诉我们,相对价格变动如何影响了经济能动者的财富。

① 人们普遍将通货膨胀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并非所有的价格能够以得到准确预测的速度稳步增长的。相反,价格非常典型地以变化莫测方式增长。这就意味着,某些经济能动者赢了,而另一些则输了;所有的人都屈服于他们未来财富的不确定性。以比较的方式来看,执行完美的货币兑换(比如,戴高乐于1958年替代发行的"新"法郎,值100"旧"法郎),几乎不具备任何分配的影响。

有两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第一种变化是世界价格的一般趋势,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是由贸易壁垒的外部削减所产生的价格趋同。第二种变化是价格动荡,即那些因暂时短缺或过剩、技术创新和政治混乱而随即发生的世界价格的变化。价格趋同是直截了当的:小麦在土地丰富的阿根廷应该比土地稀缺的英国更便宜(换来更少的其他商品)。当两个类似区域之间的贸易顺畅之后,小麦价格在阿根廷变贵了,在英国变便宜了;如果不存在像关税、配额等贸易壁垒,价格在两个国家会向一个"世界"价格趋同。[①] 价格动荡在理论上更加复杂,[②] 但是,自 1973 年以来这就是现实中的常见现象:在一个充斥了小麦的世界,发现更便宜的供给来源或者其他多种原因,就会降低小麦与其他产品交易的世界价格,以及各小麦贸易区的价格。

几乎那些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记者所关注的国际经济的每个变化,都可以被替换为上述价格变化。技术创新、国际卡特尔(international cartels)、主要国家的金融或货币政策、战争和冷战、繁荣和萧条,都是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它们改变了世界价格和(或)改变了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之间的关系。

甚至在政府政策通过关税、补贴、分配、价格管制等扭曲这些价格变化时,这些变化仍然影响了决定行为体经济机会的"影子"价格。以下两个例子有助于澄清这一观点:(1) 很多共产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如果很多消费商品所设定的官方价格低于市场支持水平,"影子"价格(那些市场可能许可的价格)就会刺激黑市行为——排队等候及支付别人排队等候的费用。(2) 很多非洲政府为农民设定的价格低于世界水平,但是从相邻国家或沿着海岸传送来的世界价格刺激了走私、在黑市上出售或者迁徙到一个控制不那么严格的国家(Bates 1981)。正如我们在下面讨论的那样,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可以出乎意料地强烈影响那些相对封闭的经济——它们极力使自己脱身于国际市场之外。

---

① 在建立这些壁垒的地方,"影子"价格(shadow price)仍然会趋同并产生重要的后果。请见第三部分。

② 在理论上,期货市场和保险能够完全消除这些动荡并且降低经济能动者的附带风险;在实践中,很显然这并没有发生。

理清国际贸易外部改善的各组成部分很有意义。因为,与总体趋势相比,具体方面可能会产生更为新奇的影响。对于世界钢铁行业而言,变得便宜的远洋运输尤其重要,因为它可以对来自相对远距离铁矿石进行低成本的钢铁生产。这与日本更为相关,因为其钢铁行业完全依赖于原料进口。但是,船运的发展对于芯片行业只产生了很小(如果有的话)的影响。电信发展可能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远比贸易直接,并且造成了世界金融市场的爆炸性发展——这一发展是影响货币、金融政策的核心(关于欠发达国家,参见 Haggard and Maxfield)。20 世纪 50、60 年代,因运输管道和超级油轮而变便宜的石油运输,以及随之而来的很多国家对石油产品作为能源的依赖,意味着欧佩克(OPEC)提高石油价格对石油进口国家——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也使那些石油出口国变得富有。相比服装和食品加工而言,规模经济对医药和汽车生产的意义更加重要(Krugman and Obstfeld 1991: 139)。意识到这些特殊的发展趋势是重要的,它可以避免人为地把一系列经济发展合并到一个宽泛的趋势中,以至于所遮蔽的趋势远远大于所揭示的。

不管怎样,在过去 30 年里,一般的和特殊的发展趋势共同降低了国际贸易和支付的成本,增加了其收益。技术变革、国家政策及其他发展的结合急剧增加了市场跨越国界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一趋势对经济活动和国家总体水平收益的影响。

四、相对价格和国民经济:对整体福利的影响

为了提供分析的基线,我们首先一般性地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以及国际价格动荡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它对构成国家的个人和集团的影响。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依赖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洞察力。但是,这些理论主要是解释经济后果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而我们感兴趣的是它们对集团和国家的政策偏好、政治行为的影响。

首先,国际贸易的改善增强了全球经济趋势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政府政策导致其国民经济相对封闭之地。这是因为,贸易成本的降低或相对回报的增长提高了可贸易商品在各国经济中所占份额。按照其定义,如果地方价格和国际价格之间的差

额小于转移它的成本,一个商品就是不可贸易的。比如,在 18 世纪,远距离运输是非常昂贵的,以至于只有像香料、珠宝等重量价值比(weight-to-value ratio)很低的商品才可能进行跨洋贸易;在 19 世纪,运费更为便宜使谷物和橡胶等大宗日常货物成为可贸易商品。

如上所述,通过影响特定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的影子价格,这一影响甚至在那些经济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也存在。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国际交换是如何容易地激发了价格动荡——用贸易的术语来理解就是,出口价格对进口价格的比率波动——的潜在国内影响。当一个国家的产品越来越多地成为可贸易的,某个地方生产的或大量进口的商品——如沙特石油、加拿大小麦和日本汽车——的世界价格的有利和不利波动,都对国家福利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①]

国际交换的改善,提高了世界经济趋势向国内政治经济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关于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偏好有所强化。我们假设外部改善导致全球经济趋势“输入”到国内政治中来。这有可能是以混乱的方式进行的,但在最为普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从强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国家政治派生影响(ramification)的意义上讲,更顺畅的全球性贸易将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相似的“国际化”。具体地讲,我们假定那些与世界经济有关的问题将在所有国家内部显著增长。作为一个推论:只要国家间互相联系的经济发展对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加重要,随着国际交易的外部改善,这些利害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动力更容易进行跨国协调。

除增加相关国际问题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之外,外部改善还产生了相对明确的社会福利影响。第一,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贸易更顺畅不可避免地产生国家间价格趋同的经济压力。[②] 它对整体福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随着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的趋同,保护性壁垒的反常影响上升了。考察一个对世界贸易相对封闭的国家,我们就会很好地理解该问题。这样的国家因为在国内生产那些可以在

---

① 我们在后文参考标准贸易理论对该观点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讨论。

② 简单地看,可以考虑一下贸易外部成本降低的情况。两个地区之间商品运输的成本决定了它们国内价格的最大差距;因此,任何成本的削减都会使这两个地区的价格更加接近,向一个“世界”价格有限地趋同。正如金德尔伯格在 1951 年敏锐地提出的,19 世纪后期,急剧下降的运输成本实际上使欧洲和美国的谷物价格变得接近了,从而使欧洲农民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

国外便宜地买得到的商品而承受了代价。其中代价之一即,消费完全是分配性的:商品的消费者因为国内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而遭受损失,此类商品的生产者则获利。第二个代价就是聚集社会福利。保护造成的价格扭曲使资源被分配到那些并不能代表它们最大效用的活动中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被投资到那些只有在被保护的情况下才有利润的行业中去;没有保护,这些要素就会流动到更接近该国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去。这些(社会福利)的净代价代表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收入损失。

概言之,对世界经济封闭的福利代价随着被保护商品的"到岸"价格(the"landed"price,世界价格减去运费和其他贸易成本)和由国家保护政策造成的国内价格之间的差异而变化。一般而言,国内(保护)价格和世界市场有效价格之间的"差额"越大,保护的效率成本就越大(它的再分配影响也越大)。这是因为价格差距越大,这个国家的资源分配也就越"不合适"(相对其比较优势而言)。

国际交易的成本和回报影响了这一价格"差额"的大小以及封闭的福利代价。随着国际贸易变得顺畅,国家真实的或潜在的进口"到岸"价格下降了,其出口的世界市场有效价格(即其他国家在供给地的支付价格)上升了。[①] 如果被保护商品的国内价格保持不变,世界市场价格和国内价格之间的差距就会增加,保护主义政策的效率成本也会增加。

资本市场的一个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使国家利率低于世界利率的资本管制(其他条件相同)会把储蓄降低到、把借贷增加到不受社会欢迎的水平。效率成本与到岸价格和世界市场利率之间差距密切相关,差距越大,价格扭曲也就越大。如果外部动荡——金融危机、宏观经济趋势——提高了世界利率,世界利率和国家利率之间的这一差距会增长,对资源的政治控制分配和金融开放经济预期行为之间的差异会增加,资本管制的效率成本也会相应地上升。

随着国际经济交易成本或商品、服务的世界价格降低,经济封闭的机会成本将会增加。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和借贷越容易,或潜在获利越大,一个社会越会放弃减少跨国经济行为的政策。这些成本——封闭的静态效率成本——随着国际经济交换的改善而正在增

① 这种观点没有考虑需求弹性对特定商品的潜在影响,但是核心观点不受影响。

加。

最近几年，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潜在的封闭动态成本。大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忽略了短期的效率成本，聚焦于将国民经济从世界市场分隔开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关于这一研究有诸多理论分支，但大都赞同参与世界贸易和支付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复杂的、积累性的正面影响。[①]

可能最重要的是，国际经济出口激励国内经济能动者采取和适应新技术。在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上，较弱的竞争限制了创新激励。但是，任何参与世界市场销售的企业都不得不在技术、质量和市场方面与其全球竞争对手相匹配。鉴于大多现代经济活动都涉及边做边学，及其他——虽然难以捉摸却显然重要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制作工艺，国内生产者市场的扩大，允许（事实上是强迫）他们发展出一个封闭的国家市场不可能出现的新技能。[②]

分析者的所思所想反映在这一看法上，只有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增长考虑之外的东西——纳入考虑之中，经济增长才能得到理解。[③] 全要素生产率包括知识、技术采纳和适应、组织及其他一些东西；可能像依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一样，一个国家的福利依赖它如何发展和使用这些技术。[④] 很多人相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复杂工业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

---

① 在这一理论发展脉络中，最重要的是逐渐被称为"内源增长理论"的那支。重要文献有：Lucas 1988,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 and Romer 1986。克鲁格曼对此提供了颇有裨益的考察和评价（Krugman 1993a）。

② 特别有意义的事例是电信和信息网络，欧洲企业的发展被国家保护主义和欧盟的保护主义所抑制。参见：The Economist, August 13, 1994, pp.55～7,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1994, p.1.

③ 在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定理（Cobb-Douglass）符号中，产品（Y）是由资本（K）和劳动力（L）根据这一公式决定的：$Y = AK^{\alpha}L^{\beta}$，等于 $Y = \ln A + \alpha \ln K + \beta \ln L$。α和β都被假定处于(0,1)之间；这一范围的回报是根据α+β是否小于、等于或大于而减少、不变或增加。共同系数 A 在公式中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④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证据，参见：Dowrick and Nguyen 1989。

重要,对那些与电信有关的工业尤其如此。[①] 非常封闭的发展中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困难,并非是它们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无效率,而在于它们没有能力从创新、技术创造和更好的管理组织中产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Krugman 1994b: 64～9)。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任何高新技术部门(电信、计算机)受到保护,处于世界竞争之外,它们的技术迅速过时,其面临的困境并非短期"固定的"。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什么样的精确机制,国际交换的便利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国家保护(或课税)价格和世界价格之间的差距。在进口保护的地方,外部的改善增加了世界市场价格和被保护价格之间的差异,将更多的收入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手中,并且鼓励更多的(也是更加没有效率的)投资进入那些产品可以更低成本进口的行业。在出口被征税的地方,国际交换便利相应地加大了对国家出口生产者的回报和那些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回报之间的差距(被人为压制了),同时导致对国家可能在国外销售获利商品的投资不足。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甚至尤其在——非常封闭的经济中也存在这些预期。我们并不集中关注一国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支付如何开放,而是集中关注全球经济的外部发展。如果我们只考察前一个方面,这一看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更加开放的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更敏感。此处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经济交易越容易,维持经济封闭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大,全球经济趋势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就越大——不管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多么封闭。政府政策和计划的稠密网络可以协调这一代价及其影响——就像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那样,不管它们是否操纵之;在保护性壁垒最严重的地方,价格扭曲也是最大的,只有在封

① 关于组织及世界竞争激励的重要性,特别成功的芯片公司英特尔提供了富于启示意义的事例。为了领先其竞争者,"通过把一个设计小组(design team)发展到四个,三个在美国,一个在以色列,这些小组彼此间紧密联系,英特尔已经将其生产每一代新产品的时间减半;在奔腾的研究完成之后,其设计小组给英特尔的其他200多名芯片设计师提供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The Economist, July 3～9, 1993, p.22)。电子数据系统在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领域也以显著相似的方式获得了成功(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1994, p.1.)。

闭的国家里,自由化的总收益才是最大的。相反,这些经济继续封闭的损失——因前述动态收益和全要素生产率收益而加剧——是最大的;积蓄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成为压倒性的变革要求。

最后,我们注意到,在这种状况下,对贸易的障碍可能是——用最近美日谈判中的一个声名狼藉的词来说——“结构性”(structural)的,而不是由贸易政策有意制造的。管制、政府采购、甚至课税和法律都可能会有效地阻止跨国交易或投资,并且可以像任何关税一样有效地制造出世界价格和国内价格之间的“差额”。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可以使结构性壁垒在总福利方面变得成本更高,从而增加了自由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和标准一致化——的社会压力。[①]

这些考虑将我们引向一个非常特殊的、可以进行经验主义验证的因果结构,即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会(假定其他条件相同):

1. 增加每个国家内要求扩大国际贸易和支付自由化的压力,包括消除贸易的结构性障碍;
2. 随着国民经济原先对之封闭的程度增加,产生广泛的政治压力;
3. 随着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从可以获得的贸易(比如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获利的程度增强,产生变化的总体压力。[②]

但是,政府可能会抗拒呼吁自由化的压力,因为决策者很少会愿意像仁慈的社会设计者那样行动。整体利益被集中的代价所抵消;长期的社会红利则被短期阵痛所抵消。决策者很可能在改革的问题上有所顾虑,而愿意承担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的长期代价。我们将在后面的一部分对制度问题进行分析,但我们仍需要在此指出:不管什么因素使得决策者适应扩展社会利益或者给它们更长的时间期限,都会使他们更可能将增加国际贸易的利益内在化。具体地说,我们认为,更大的选区、基础更为广泛的(如“无所不包的”)政党,更具

① 卡塞拉就此继续进行了分析(Casella 1992)。

②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某些拥有很大贸易潜力的——包括了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社会出现相对倒退和极端封闭,很多部门强烈反对自由化。前东德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参与性的选举权、更长的平均执政时间、更稳定的政党忠诚都会增加更倾向于考虑整体福利政策的重要性。①

国际价格动荡影响了甚至在那些封闭经济中的整体国民福利。② 一个国家出口的相对世界价格的下降,或者是其进口价格的增长,都意味着贸易恶化和国民收入的减少。③ 这样的短期贸易动荡以一种与价格趋同非常相似的方式,影响了封闭的福利代价。比如这样一个国家,其政策——也许是通过被进口商品保护或者征收出口税——减少了一种特定商品的出口。如果这一商品的世界相对价格突然上升,推行出口限制政策的国家福利代价也随之上升。④ 从更一般意义上讲,贸易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封闭国家的静态福利代价,贸易条件的恶化则降低了这一成本。⑤ 由此,我们提出下述逻辑假说: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时,要求进一步参与世界经济的压力会增长;当贸易条件恶化时,要求降低对世界经济开放的压力则会增长。随着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这就意味着国际价格动荡更加直接地传递到国内并且急剧增加了封闭的代价,这一联系会变得更加明确。

迄今为止,我们考察了外部改善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这一点很重要,但有利于国家福利的可能与实际采纳的政策没有什么联系,只是政治经济学的老生常谈而已。前述背景显示了政治家担心经济趋势对整个国家的后果,但是,通常政治压力是从社

---

① 关于对选举权和选区大小的影响的研究,参见加勒特、彼得·兰格收录于本文集的文章。

② 我们并不是说,在贸易最开放的社会,外部动荡甚至是经济紊乱最重要的来源。国内动荡仍然会比它们重要。我们所说的是外部改善增加了外部动荡的影响。

③ 贸易最为开放的工业经济的国内补偿方案——卡梅伦(Cameron 1978)和卡曾斯坦(Katzenstein 1985)对此作了最出色的研究——可以被理解为解决这些贸易项目削减的社会保险、或者至少是缓释机制。

④ 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谷物价格的急剧下降,使欧洲农业保护主义的代价更为昂贵。

⑤ 正如先前谈论过的,这一讨论是从动态分析中提炼出来的。比如,有的分析认为,经济开放增加了国家对价格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

会集团——而不是从整个社会中——释放出来的。与便利的国际交换对国内经济和政治能动者的影响相比，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次要的。这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转向的话题。

五、国际价格和国民经济：对经济行为体和集团的影响

国际交换的改善，即国际交易成本的降低，对那些与国际交换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是有利的，比如出口者、进口者和进口消费者。相反，国际交易成本的这一降低则会伤害那些参与进口竞争的人。

国际化降低了进口商品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竞争商品生产者的价格。（考虑到细节上的差异，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国际支付和国际投资，但是我们仍然将此处的分析限定在商品贸易上。）前两个群体是受益的，最后一个群体则是受害的。随着更便利的贸易扩大了国内价格（被保护的或征税的）与世界价格之间的差距，它增加了进口竞争者游说贸易保护的动机，以及潜在出口者和重要的消费者抵制或取消那些妨碍它们想购买或出售的商品自由转移的政策的动机。

如果要超越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能够预测谁会出口，谁会消费进口，以及谁会面对来自进口的竞争。这一点在封闭经济中尤其重要，正如我们早已指出的，在封闭经济中，人们可能最强烈地感受到贸易改善的影响。但是，大量的价格扭曲模糊了自由化的潜在受益者和受害者的身份。虽然可能并不难预测那些拥有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的地区会从经济开放中受益，比如前苏联的石油和铀生产区域，但是那些更为不同的产品种类的生产者，比如巴西的钢铁生产者、乌兹别克的棉农、捷克的服装制造者，会赢还是会输这一问题则远远不是那么明确。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国家，它在特定商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些其产品与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最为接近的生产者会从世界贸易的改善中受益最大；那些离比较优势“最远”的（处于最大比较劣势的）生产者则会损失最大。贸易的外部改善增加了那些最接近国家比较优势的生产者获利的可能性，但是也增加了那些远离国家

比较优势的生产者要付出的代价。有三个主要的贸易理论——它们彼此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致力于确认谁更接近或远离国家比较优势，谁会从国际交换的改善中受益或受损。

以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为基本情境，斯托珀-萨缪尔森理论提出了解释该问题的有说服力和很大影响力的途径（Stolper and Samulsen 1941）。赫克歇尔-俄林方式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会趋于出口它所拥有的最丰富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那些它所缺乏的要素密集型商品。斯托珀-萨缪尔森理论可推论说明，生产价格增长式的商品，对急需要素的持有者而言，每个国家的回报都以绝对且不成比例的方式上升；生产价格下降式的商品，对急需要素的持有者而言，每个国家的回报都以绝对且不成比例的价格下降了。

相对钢铁来说，谷物是土地密集型的，钢铁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①] 本质而言，斯托珀-萨缪尔森理论告诉我们，如果相对于钢铁的谷物价格上升了，所有土地拥有者（并不仅仅是那些正在参与谷物生产的）的收入会绝对增长（能够购买更多的其他商品）；所有工人（不仅仅是那些正受雇于钢铁行业的）则会绝对地受损。总体上看，租金要价上升，工资要价下降。进一步说，产品价格变化引起相关要素价格发生更大的变化：谷物价格相对于钢铁价格10%的增长，引起地租相对于工资的增长远大于10%。

赫克歇尔-俄林方式产生了关于国际贸易改善影响分配的二级假设。它意味着，外部改善提高了那些特定国家丰富要素密集的商品生产的国内价格，降低了那些国内稀缺要素密集的商品生产的国内价格；因此贸易改善使一个国家的丰富要素受益，使其稀缺要素受损。因此，贸易的外部改善——使贸易的利益和代价变得更大了——增强了那些丰富要素拥有者使贸易自由化的动机，也增强了那些稀缺要素拥有者采取措施限制贸易自由化的动机。在这一情境中，我们将看到改善的贸易与劳动者、土地拥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关于对外经济政策和自由化的激烈冲突——其战线取决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相关。

对斯托珀-萨缪尔森理论的常见替代或补充方案，并不着眼于广

① 我们只是以此说明：生产一个单位的谷物所需土地的英亩单位与劳动量的小时单位之间的比率，总会大于生产一个单位的钢铁所需要的同类比率。

义生产要素的分配影响,而是着眼于相对狭义的特定要素的分配影响。这一所谓特别要素的李嘉图-维纳(Ricardo-Viner)方式强调相对价格变化对特定部门的影响。用于特别用途的要素承受了其产品全部价格变化的压力。如果一个区域的土地只适合于葡萄酒作物的种植,其价格就会随着葡萄酒(所设想的将来)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随着一般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那些用于特定用途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比如通常只用于飞机生产的——也是与产品关联的(product-linked)。[①]

李嘉图-维纳理论认为,很多生产要素都是非常专有的,因此我们通常观察相对价格变化和相似政治行为变化所产生的部门影响,而不是广泛的要素影响。例如,美国不管怎么看都是资本丰富和劳动力稀缺的。价格趋同或者有益于资本密集产品的贸易条件变化,会使美国的资本受益而使其劳动力受损;但是,如果劳动力和资本二者在一个进口竞争部门都是专有的,它们就都受到了伤害:美国汽车工业可能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史蒂文·马吉(Steven Magee 1978)曾经指出,部门模式通常描绘了冷战后美国贸易游说的特征。

最具体地说,这一模式意味着:(1)支持或反对自由化的压力将随着相关行为体资产(最显著的是它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专有性而不同;(2)所有部门将会分裂成在世界市场上有相对竞争力的和相对没有竞争力的;(3)政治分裂将是部门性的而非要素性的。在定义上,非专有资产随时被调配来回应价格变化和产生意外的收获或损失。在李嘉图-维纳理论中,只有部门专有资产的拥有者才有游说进行部门保护(如果它面临着进口竞争)或自由化(如果它面临着出口机会)的动机。

这一系列主张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式的主张明显不同,并且导向

① 这造成了一个常见的混淆——不得不有时交互使用"资产"和"要素"两个术语。在一些背景中,要素被固有地界定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广泛集合。生产要素则被界定为无所不包的"所有土地",或者是狭义地界定为"适合肉豆蔻生长的土地"。在这一情境中,赫克歇尔-俄林(斯托珀-萨缪尔森)和李嘉图-维纳(特定要素)模式这两种世界阐释理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相关要素的界定。对于前者来说,劳动力和资本是相关要素;对于后者来说,要素应该被界定更为狭义一些,应该是"在钢铁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正是从这一准定义的区别产生了这两种途径的不同政治预测。

不同的经验预期。[1] 预示支持或反对自由化的可能压力的,是特定行业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的专有性及其在世界贸易和支付中的地位,而不是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激化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相比,改善的贸易会导致国际竞争行业和非竞争行业之间的更大冲突,并在部门需要时同样团结劳工和管理者。

第三种理论视角与上面谈到的与规模经济及全要素生产率考虑有关的企业和行业相关。可能有一种与改善的贸易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全要素生产率福利影响相似的动态的分配影响。诸如大规模的产出、模仿学习以及技术适应等措施可以使企业和行业发展出利用经济机遇的特别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的。

以内部经济规模为特征的部门,企业的生产规模对于它的成本和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2] 在这些部门里,世界市场的开放增加了较大企业对较小企业的优势,这一优势随着参与世界市场途径的扩展而增长。例如,假定一体化的欧洲市场只有四、五家汽车制造企业——它们都坐落于大概 200 公里半径的区域内——可能幸存下来(Krugman 1991),鉴于那些最大的企业最有可能为从更大规模的经济中获利而进行必须的资产重组和物质迁移,这些企业将对一体化提供政治支持;相反,较小的企业则不会那么热情。[3] 在相当程度上,汽车制造者的技术是企业专有的,确切地说,他们在转移到一个更大的幸存企业时要付出代价(比如一种新语言),因此他们的偏好会与其雇主的偏好相似。

一个相似的案例是模仿学习,这尤其适用于国际贸易。一个企业开发世界市场的能力可能取决于供给商和消费者的网络,市场状况的信息及其他更复杂的企业专有要素。一个不具备进入世界市场途径的企业不会具有发展这一信息资本或其他形式资本的动机。但

---

① 另一方面,因为任何资产在长期的意义上都不是专有的,我们通常说李嘉图—瓦伊纳适用于短期分析,斯托珀—萨缪尔森则适用于长期分析。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这二者是互补的。

② 正规地讲,如果所有投入的加倍大于总产出的加倍,一个生产过程是以增加对规模的回报为特征的(同样地,成本函数显示其经济规模);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将所有投入增加 $t>1$ 的任何因数,将使产出增加大于 t 的因数。参见脚注 11 和 23。

③ 这一论点策略性地假定了相关资本的专有性。

是,如果参与世界贸易的净收益充分地增长了,这一企业有可能会被带动,逐步发展这一专门技能。如果因此建立的知识和网络是积累性的,国际交换的任何改善都会被放大,其方式是促进对国际竞争至关重要的特性。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卷入到全球经济活动——贸易、借贷、投资、许可——中的企业和行业可能会因为它们过去的行动而获得重要的成本优势,这将增强它们对进一步经济开放的偏好。

我们同样可以获得相反的看法:进入国际经济行为所需的实质性调整,可能会增加来自那些最需要做出这一调整者的反对意见。例如,因为参与国际贸易和支付的能力需要企业的管理组织和营销组织进行全面重组,这一企业就比那些不需要进行类似改组的企业更有可能抵制被抛入国际市场中。如同前苏联经济所表明的,在几乎所有企业都面临着重大而不确定的重组时,这一抵制可能超乎寻常。

换言之,随着对世界贸易和支付的参与增加(或减少),可能存在着相关的调整和信息成本。这些"动态"成本——重组复杂的管理结构、再培训雇员、重建供给商和消费者网络——可能是难以设想的、无法估量的。但是,对于决定国际经济政策的偏好来说,它们可能也是极为重要的。对于那些需要为跨国界经济行为自由化付出更大调整代价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会支持自由化;而那些面临着较低预期调整代价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则更有可能会支持自由化。具体地说,我们认为在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部门中(比如药品和办公设备,而不是鞋和食品),对自由化的支持将随着企业规模及现有的国际联系和经历而变化(Milner 1988)。

这几个理论视角都赞同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通常会对国内政治冲突产生强烈影响;但至少在短期看来,在国内政治如何确切地受到影响上,它们产生了分歧。但是,每个视角都提出了明显可以验证的假设。尽管彼此竞争,这几个模式预示了一个有趣而有效的研究方案。

比如,目前发达国家是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富足以及非熟练技术工人缺乏为特征的;不发达国家则是非熟练技术工人富足,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在人力资本和非熟练技术工人方面都是富足的,只是缺乏物质资本。赫克歇尔-俄林模式认为,国际贸易的外部改善增加了以下人的潜在收益——发达国

家的资本家和熟练技术工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熟练技术工人和非熟练技术工人,不发达国家的非熟练技术工人,他们被认为可以为了自由化而动员起来。与此同时,改善的贸易威胁了以下人的利益——发达国家的非熟练技术工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本土资本家,不发达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持有者,他们都会增强对保护或补偿的要求。伍德(Wood 1994)认为,我们应该在过去20年的经济史中仔细地考察这一发展。

李嘉图-维纳认为,外部改善的特定类型和特定的价格动荡更起作用。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廉价的运输刺激石油产品贸易繁荣,很多国家的煤炭业主和工人都动员起来,要求保护和进行补贴;由于他们的市场是随着廉价石油而扩张的,汽车制造业的工人和业主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极力维护市场开放;而政治领导者急于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举足轻重的代价,有时非常粗暴地压制了煤炭生产者的要求,他们为此付出的短期代价极其高昂(引自DeGaulle 1971:347～51)。

规模经济视角则强调以增加规模回报为特征的部门的独特性。[①] 如果一个行业的资本达到了专有的程度,贸易的外部改善就可能会激化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冲突,以及有国际经验的和无国际经验的企业之间的冲突。前者奉行自由化,后者则趋向于保护主义。比如,分析这一点可能是很有益的:英国药品行业(规模经济)的企业规模是否比英国食品加工部门(非规模经济)的企业规模更强烈地影响了它们对欧洲统一的态度。

除了贸易的外部改善对其自身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之外,特殊的相对价格动荡影响了国内社会经济集团的偏好。我们应该进一步注意到,相对价格的变化可以对一个更大范围的经济行为体产生间接影响。一次“冲击波”影响了那些遭受直接影响的、具有互补性或替代性商品的生产者。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升增加了对煤炭和天然气(替代产品)的需求量,减少了对高油耗汽车(互补产品)以及钢材的需求。追寻这种扩大的“冲击波”通常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① 在操作上,那些具有高水平的行业内跨国贸易或高度区域集中的部门通常被认为是规模经济的。

战后荷兰天然气的发现导致了价格动荡,这通常被描述为“荷兰病”。它可能是最著名的特定相对价格动荡。这一普遍现象是一次典型的出人意料的资源流入,与出口量或出口价值的增加相关。

这一过程通常被认为是随着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而开始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可能只是一种已知自然资源的世界价格剧增。这一增长导致资金流入到荷兰,流向那些卷入到自然资源生产的部门中去。显而易见,这有利于新兴部门。这一资源流入同时还对总需求产生了一个关联影响(或冲击波),由于新兴部门的参与者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国内需求随着增加。鉴于这一需求是针对非贸易商品(如房产)的,它通过房产价格上升而刺激了非贸易部门的发展。但是,随着新兴资源和非贸易商品的价格上升,国内贸易商品的生产者面临着输入成本的增加和进口竞争的增强。这一结果与汇率实际升值的结果相似,并且视为典型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不论是在现代的荷兰还是16世纪的西班牙。[①]

在这种情境之下,一种商品世界价格的大幅增长,导致这种商品的出口生产者和那些非贸易部门的生产者寻求能够实现这一积极贸易条件影响全面发挥作用的政策。但是,那些非新兴贸易部门(有代表性的是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者则希望政府——以保护、补贴或其他的手段——回击资源流入对其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消极影响。同时也会产生关于升值资源所增加的租金潜在分配的争论。

关于这一进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石油价格的剧增导致石油生产资料所有者抓住机会大发横财。非贸易商品的生产者欢迎资源的流入——因为这增加了对其产出的需求。石油部门之外贸易商品的生产者——具有代表性的是工业和农业——会向政府施压,要求保护它们不受升值和进口激增的影响,而这往往是因为没有相关协调政策而产生的。

因此,贸易的外部改善对国内经济能动者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对那些与国家比较优势接近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它产生了对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要求。从一个角度看,这种影响主要是要素性的,

---

① 关于后者,参见:Forsyth and Nicholas 1983。20世纪70年代后期拉丁美洲的资本流入和80年代早期美国资本流入都伴随着相同的现象——它们都导致了实际升值和“去工业化”情境。

比如,它有助于劳动力富足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制造业部门。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些影响主要是针对那些与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相比,拥有独一无二优势的部门和企业。不管这些优势是否与产出的规模或企业专有知识、管理能力有关。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远离其国家比较优势的人来说,贸易改善使他们要求保护的愿望变得强烈了。不管在什么基础上,这都是可以估量的。此前世界相对价格增长和降低都产生了类似影响,贸易改善增加了行为体对此类价格动荡的敏感性。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认为,这些影响甚至在相对封闭经济中也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外部改善会增加个人、企业和行业——他们能够在全球进行竞争——对贸易自由化的压力,即使在高度隔离的发展中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也如此。因此,特定的价格动荡增加了来自特定潜在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压力,甚至在那些政府明显企图庇护其国内经济不受全球价格动荡影响的地方也如此。这些预期的压力是否导致政策的实际变化,是复杂的联盟和制度条件的一个函数。我们将在下文简要探讨该问题,而杰弗里·加勒特和彼得·兰格在他们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

六、制度的作用

我们从贝克尔(Becker 1983)的重要观点入手——即至关重要的代价给政治领导人提供了机遇,通过建立能够克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抵制的联盟,他们可以在整体社会福利中为自己获得部分收益。因此,现行安排造成的重大损失越大,一些政治领导人成功改变它的可能就越大。如果适用于这些问题,贝克尔的洞察力就意味着:贸易的外部改善越大,自由化以及必要的有利于自由化的制度变革在每个国家——我们再次强调,这包括那些原本对世界经济最封闭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发生。

在我们的思考中,变革是如何顺利地开展——或者说,在当前的政体中它是否是有可能发生的——主要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现有支持者和联盟的广度;(二)政体承诺的信誉——以实践为基础;(三)主要决策者的时间期限。我们认为,这些广泛的制度方面既是外在的——即改革者面临着一系列既有制度,也是内在的——即改

革者出于对自由化的喜好而谋求改变这些制度。

(一) 如同我们在上面初步提到的,政治家们对整个社会越负责,他们就越会将整体福利内部化,最大限度地减少至关重要的代价。[①] 局限于土地持有者的参政权,将以对社会的更大代价优先保护那些集团(即土地持有者)的利益。在每个代表只是对一个很小的选区负责的选举体系中,她或他将选区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一个代表狭隘经济利益的政党,远不如一个"包容的"(Olsen 1982)政党习惯于考虑整体福利。因此,就国际交换的外部改善这一特定案例,我们提出这样一些假说:

1. 平均而言,民主政体比非民主政体更容易进行自由化。[②]
2. 在同样都是民主政体的国家中,以及在民主国家内部的不同选举实体间,自由化趋势会随着不同选民的减少而增加。
3. 在同等条件下,自由化的可能性会随着政党碎化的增加——比如雷(Rae 1967)所做的测量——而削减。[③]

在美国,第 2 个假设指出,实际上从单独一个国家选区中选举产生的总统通常会比从 50 个选区中选举产生的参议院更加支持开放。同样道理,参议院比众议院更加支持自由贸易。毫无疑问,1934 年的互惠贸易调整法案和批准贸易协定的"快车道"程序的缔造者,都期望通过授予总统更大权力来增大自由贸易的机会。

在所有民主政体中,第 2 个假设说明:那些从只有很少几个议会

---

①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活动中社会和政治资产的转化程度。比如,在 19 世纪后期,英国的精英阶层被认为是可以无需任何成本就从土地经营转入到商业或制造业;大陆的(尤其是德国的)土地持有者在这一过程中则失去了特权和权力。因此,在传统看法中,英国精英更好地将总福利的代价和收益内部化(internalized)了。参见 Mansfield and Snyder 1995: 27～8。

② 显而易见,一些早期民主政体,最显著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是高度保护主义的。或许是因为非熟练技术工人对于他们来说,既是经济上稀缺的,也是政治上有权力的。但是,在平均水平上,更具参与性的政体保证了对总福利的更大关怀。

③ 雷的政党碎片化指数只是一个关于政党成分的赫芬达尔(Herfindahl)指数。当 f_i 是政党总投票权(或者说是总席位的)的第 i 部分,指数就是 $1 - \Sigma f_i^2$。因此,如果一个政党获得了所有的选票,碎片化就是零;如果两个政党均分了它,碎片化就是 0.5;如果有 10 个政党每个都获得了 10%的选票,碎片化就是 0.9;以此类推。

选区进行选举的国家,比那些分成很多单一代表区的国家更易于进行自由化。迄今为止的数据看起来是支持这一说法的(Garrett and Lange,参见本论文集;Lohmann and O'Halloran 1994; Mansfield and Busch 1995; Rogowski 1987)。

(二) 虽然从贸易中获得的整体福利能够通过适当附加支付来保证自由化使每个人受益,很多行为体都不相信承诺的附加支付会实现。如果政治领导者对补偿的承诺达到可以信赖的程度,对自由化的支持就能够更容易地和更廉价地组织起来。历史表明:一个坚守承诺的政府将拥有更大的信用,因此也更有能力进行自由化,以满足国际贸易外部改善的需要。对政府信用可的可操作行动包括:金融债务的风险费用,司法部门的独立和中立性,能否通过像宪政法庭等中立机构强行获得宪法支持,对其国民关于政治信任的调查反应。我们认为,在同等条件下,那些法治根深蒂固和受到尊重的国家、那些通货和政府发行公债的国家可以期待国际化的改善。

(三) 通常认为(比如 Grilli, et al. 1991),较长的执政期限——以平均执政时间来计算——使政治家不那么愿意在赤字下运作。看起来似乎是,稳妥的领导人会将未来大打折扣,而更愿意为长期的社会收益付出短期代价。在美国,如同在很多其他国家一样,独立的能动者不断上升,他们对跨国交易的国家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其不那么受日常政治压力的左右,他们或许更可能在追求长期总体利益方面占据领导地位。就贸易政策而言,我们认为,在贸易外部改善的前提下,如下假设是存在的:

1. 一个国家内阁的平均寿命越长,国家就越可能进行自由化。
2. 在一个国家里,内阁越可能进行自由化,其主要人员就越稳定,其职位关系也就越稳定。
3. 在国际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相对独立于直接政治压力的能动者越有影响力,自由化就越有可能发生。

七、外部改善的贸易的预期影响

有必要再次扼要重述一下国际交易改善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在此,我们还是集中于它对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可能产生的影

响。

国家影响

在总体水平上,交换的外部改善增加了国家经济中的可贸易部分所占的分量,扩大了国内价格向世界价格趋同的压力,增加了对世界价格动荡的敏感性。即使在政府没有取消跨国界贸易和支付障碍的地方,更容易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也增加了国内经济行为体对国际状况的敏感性。在这个意义上,贸易的外部改善增加了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我们认为,随着跨国交易净收益的增加,以上变化伴随着国际经济问题在国内政治中增加的重要性——不管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对世界贸易和支付开放。

改善的贸易也提高了与世界市场隔绝的静态成本和动态成本。一般而言,这反过来又会增加降低对国际贸易和支付的障碍的压力。在同等条件下,在那些经济原本是最封闭的地方,以及那些实现贸易未分配收益机会最大的地方,这些压力可能会越大。

决策者对封闭的更高效率成本做出反应的程度,将取决于众多不同的因素,其中大部分是制度性的。一般来讲,我们预计贸易的外部改善会产生要求削减跨国经济活动障碍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压力。政府越能确切地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他们就越可能对这些压力做出回应,能够对潜在受损者做出可信赖的补偿承诺,并且拥有相对较长的执政期。

分配影响

在更为分散的层次上,成本不那么高的或回报更多的国际交换对国内集团具有不同影响。国际交换的改善鼓励实现专门化,也可能有利于福利的总体改善。但是,社会分裂为从进一步专门化中可能收益者和可能受损者等两个群体。

那些最有能力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新机遇的经济行为体,有可能会支持那些有助于它们伴随扩大的经济领域实现全面收益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包括:贸易和资本账目的自由化,刺激全球贸易和支付的宏观政策,为使跨国商业和投资变得更便利的管制或协调标准的尝试,以及许多其他倡议。

另一方面,更高水平的国际经济活动导致进一步专业化,使某些

经济行为体变为多余,后者会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政策保护自己不受全球经济趋势的影响。这些政策包括从贸易保护等广义政策到管制等狭义政策。过去的政策越是庇护这些集团,国际竞争的威胁就越大,对取消先前保护的反对也就越强烈。

这就引向这样一种预期,即贸易的外部改善促使相对有竞争力的集团要求更多的自由化,相对无竞争力的集团要求增加保护。这一假说的操作可能是多样性的,其原因在于,就经济行为体从国际贸易和支付的增加中获益或受损的问题,不同贸易模式得出不同的结论。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主要的行为体是像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广义的要素。当地丰富要素的拥有者是国际化的赢家,他们要求自由化,地方稀缺要素的持有者则寻求保护。李嘉图-维纳理论认为,相关的分裂出现于钢铁行业、谷物种植者和银行业部门之间。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那些最能(最不能)进行国际竞争的企业,在要求(反对)自由化时会像行业一样团结起来。鉴于规模经济和其他这样的(往往是无形的)特征对于企业或部门是重要的,大规模的、进行国际经营的企业可能成为自由化的主要支持者。这三个观点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部门有效,但是他们确实导致截然不同的经验预期。

特定价格动荡

特定的相对价格动荡也会影响国内社会经济集团的政策偏好。那些可能从全球动荡中获得潜在巨大收益的人,可能会促进那些能够允许他们捕获这些收益的政策。换言之,那些从这一动荡受损的人则希望寻求那些能够保护他们的政策。价格动荡所产生的全面政治经济影响——当它们的影响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去时——是巨大的,尽管这样说有些简单。"荷兰病"的例子说明,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策偏好可能仅仅来源于一个价格变化,尤其是当它是这个国家出口项目中的重要部分时。

因此,国际交换的外部改善——像贸易自由化这样的广泛议题以及像特定调节政策这样的狭隘议题——影响了政策偏好。在贸易改善对面向特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相对价格所产生预期影响的基础上,它对私人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以以一种合理的一致

方式理解。现存的政治联盟和制度当然协调这些偏好。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上文已经概述,更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见杰弗里·加勒特和彼得·兰格收录于本文集中的文章。

结　论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本文所阐述的这一框架既不是详尽无遗的,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我们忽略了很多影响个人或集团的偏好的因素。我们只想概括制度安排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因而有意地忽略了制度安排本身的起源问题。

本文提出的分析模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一组给定的国际经济变化会产生什么政策结果。比如,它并没有指出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强,战争可能性到底是减少了,还是保证了特定对外政策或国内治理模式的成功。其实,这只是一个避开给人印象深刻的概括的托词,我们实际上是有意识地转向那些所有相关个人都面对的利益和激励,并由此研究其行为的预期。我们希望,对这些基础的阐述有助于学者们关心对国际经济趋势之国内影响的系统研究。

第三章

国际化、制度和政治变迁

杰弗里·加勒特、彼得·兰格

在过去20年里，市场国际化与广泛的国内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但是关于这些联系的确切性质仍然是模糊的。虽然如此，最近有很多学者开始就国际变化对国内政治和政策的影响进行严谨的“开放政体”(open polity)分析。罗纳德·罗戈斯基的《商业和联盟》(Commerce and Coalitions)一书是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集中阐述了具有不同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的国内联盟政治(Rogowski 1989)。杰弗里·弗里登的《债务、发展和民主》(Deb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书考察了不同经济部门对国际市场条件变化的反应(Frieden 1991a)。在《抵制保护主义》(Resisting Protectionism)中，海伦·米尔纳讨论了单个企业竞争地位的变化所产生的政治后果(Milner 1988)。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在其收录于本文集的文章中，通过把国际经济相对价格变化和国内行为体资产的特性与这些行为体的国内政策偏好及其为实现这些偏好所形成的政治联盟联系起来，综合分析了这一论点的基本逻辑。

这一类研究为分析融入国际经济对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结盟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条审慎的途径。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一领域的研

我们非常感谢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研究小组的成员们——尤其是杰弗里·弗里登、斯蒂芬·哈格德、罗伯特·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对本文初稿所作的评论。同时也感谢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和巴里·瓦因加斯特(Barry Weingast)所作的有益探讨。加勒特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提供的资助表示感谢。兰格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对其研究计划提供的支持，并且感谢该中心夏季研究班举行的“全球趋势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对本文草稿所作的探讨。特别感谢阿莱内·格雷贝尔(Ilene Grabel)、洛里·利奇曼(Lori Leachman)、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以各种方式对本文所作的评论。

究者对偏好变化和政策后果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更少研究它们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机制。其含蓄的政治模式是“经济多元主义”,其中,政策后果被视为由不同行为体偏好塑造的政治冲突功能之一,他们的市场权力及其集体行为倾向突出了该功能。由此可以假定,国际变化对国内经济偏好的影响会迅速而真实地反映出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变化。知道哪个经济利益集团获得了经济力量,就可以了解谁同时赢得了政治权力,以及反过来政策是如何变化的。

在这一政治—制度的分析中,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今天,很少有人会争论制度条件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政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在政治变迁动态过程中的因果地位并不清楚。“新制度主义”中理性选择分支的大多数理论,都没有明确地探讨这一问题,因为其首要目标在于分析一组给定制度的结果。由于动态变化的问题突出出来,一种功能主义取向主导了博弈论研究。制度的出现是为了缓解市场失败,它们是由信息需求、承诺问题、囚徒困境或是周期多数所产生的(Krehbiel 1991; Milgrom, North, and Weingast 1990)。相比而言,这样的制度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问题并没有它们所发挥的功能更重要(Bawn 1993; Lohmann 1995)。[①] 相反,新制度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直接关注这些问题,这一分支是公开的反功能主义者(Thelen and Steinmo 1992)。从这一视角看,制度肯定比那些创造它们的利益群集更为持久,它们也因此给市场驱动的政策变化设置了障碍(Goldstein 1993)。但是,由于不能精确地划分那些强化制度惰性的因果机制及其对后果的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能力被削弱。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系统地考察如下问题:现存制度为什么、如何协调由国际因素所引发的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变化与其政治后果(包括政策变化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博弈论,但在不求助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模糊逻辑时,我们努力避免这一范式惯用的功能主义推论。我们将在以下部分概述我们的基本理论观点。然后,我们介绍了像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在本文集中所考察的、开放政体的国民经济结构由国际因素引发变化——处于国际竞争之中的外在经济成分增加——的程式化案例。随后的部分分析了这些变化如何在不同制度安排中影响国内政治。我们集中探讨了两

---

① 这也存在着少许例外(Bawn 1993; Lohmann 1995)。

种类型的制度:组织私人部门利益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将这些利益聚集到公共领域并决定政府敏感性的正式制度。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分析了不同类型政体内源制度变迁(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的可能性。最后,我们在结论里探讨了制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认识论地位。

一、国际化、制度和政治变迁

图一反映了我们对国际经济变化、国内制度和政治后果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第一阶段表述了通常伴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刺激因素类型——行为体的国内经济偏好群集的变化。鉴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文章主要探讨这一过程,我们并不准备过多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偏好变化是如何通过拥有不同制度特性的政治系统来影响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国内行为体的偏好”,而是“政府会如何回应这些偏好的变化”。

让我们首先从对政府行为的简单介绍来开始。政治领导者显然有其乐于促进的目标,从意识形态的目标看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特权。但是,所有政府基本一致的目标是保有政权,不管推翻政府的机制是选举、宫廷政变或是民众革命。在经济领域,这就必须寻求按政府核心政治支持者的意愿来再分配财富和负责处理扩大的社会蛋糕(Hibbs 1987; Kramer 1971; Londregan and Poole 1990)。①

分配游戏倾向于主导政府的议程,超过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关心。因为一旦在过渡时期失去权力,政治家就没有能力回答从长远意义上什么对整个社会有利的问题。避免这一命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利益分配给那些把他们推上执政位置的集团——即使给宏观经济形势造成不可忽视的代价也在所不惜(Cox et al. 1984)。从经济学家的长远立场来看,“不适合的”政府战略必然会改变。但是,从更广泛的时期来看,很可能会发生政治决策偏离经济效率路线的事情。

---

① 关于经济后果和政府与稳定民主有关的任期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Hibbs (1987) 和 Kramer (1971)。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经济后果对不那么有序的权力过渡——比如政变和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Londregan and Poole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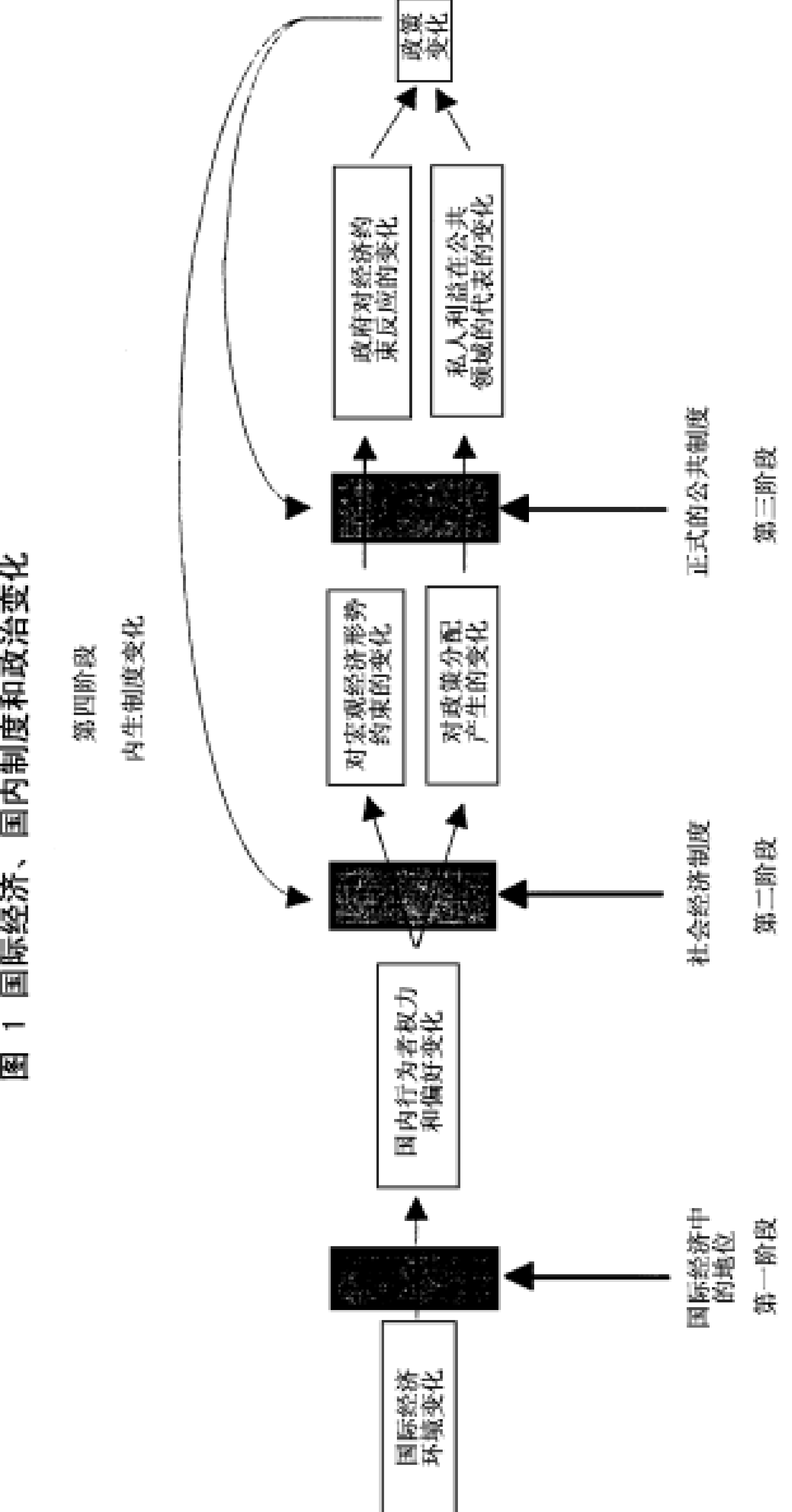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经济、国内制度和政治变化

我们以农业为例。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的政府都经常奉行明显效率低下的农业政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sub-Saharan Africa)的政府为了减少政变和地方暴动的可能性,就减少出口、在国内市场倾销粮食以满足地方选民(Bates 1981)。相反,因为某些制度安排——比如代表权是以地理而非人口为基础的——给予农村利益以特权,尽管国内生产的效率低下,农业在很多西方国家还是受到了严格保护。采取这些政策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从任职者短期执政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显然是政治权宜之计。

关于政策分配压力的强度变化以及政府操作所处的宏观经济约束变化,政府行为的一般模式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显然,就像经济学多元论者所证明的那样,社会偏好和联盟群集会影响分配的压力和宏观经济的约束。不同的是,我们集中探讨制度在协调原始偏好与政府行为之间的作用。

在我们模式的第二阶段,"社会经济制度"既限定了经济行为体偏好变化所导致的分配政策需要,也影响了与政府政策、国际经济条件的不同聚合相伴产生的宏观经济后果。这些制度显然影响了私人部门行为体的政治权势。正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点明的:在超越集体行动的问题上,对于行为体的有效政治能力来说,它们分享共同利益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在使集体行动变得便利方面,制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也对经济形势具有重要影响(Olson 1982)。最为系统化的分析涉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例如,卡尔姆佛斯和德里菲尔在其影响广泛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是 U 型的(Calmfors and Driffill 1988)。与新古典理论的预期一致,当工会很弱时,市场压力会导致强势经济增长和低通胀、低失业。当个别工会很强但在共同行动上缺乏协作时,其后果是更为恶劣的,因为它们会提高工资而不管这对整个经济或非工会成员的就业前景产生多大的有害影响。卡尔姆佛斯和德里菲尔指出,如果存在强大的中央劳动力联盟和国家层次上的谈判安排,工资战会得到缓和,宏观经济形势也会因此得到改善。

我们扩展该探讨,分析它对国际经济条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同聚合下的分配政策压力和经济形势的可能影响。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现存社会经济制度在全球市场变化条件下表现越好,政府维持那

些推进其分配利益政策的倾向就越大，甚至会不顾社会偏好的平衡，发生偏离了这些政策的变化。在这些情况下，政府从一个分配立场上渴望奉行的政策也会与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相一致，从而对新近获得权力的行为体要求变化的压力创造出有效缓冲。不论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发生了多么巨大的、不利的变化，这一动力有助于解释拥有强大而团结的工会运动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以及较低程度上的德国和挪威——的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连续性。

我们关于制度的第二组论点涉及公共领域的正式制度对不同政府行为的影响(即第三阶段)。这些制度既影响政府运作所处的宏观经济约束，也影响了政府对关于政策变化分配压力的敏感性。我们提出了四个具体的观点。

第一，政府对国内偏好变化的敏感性，将因政体类型而发生重大变化。反对者挑战现任政府的政策越容易，政治体系对社会偏好变化就越敏感(Barro 1973)。我们据此认为，在国内偏好变化差不多的前提下，稳定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变迁比较为独裁的政体——进入这些国家的政治障碍很高——更快、更顺利。

第二，制度特权集团越是形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核心基础，政府维系使这些选民——即使他们代表衰落的市场权力——受益的政策和制度的动机就越强。以现代工业民主国家中的农村利益为例，不论在实行单一不可转移选票(Rosenbluth)的日本还在参议院实行地域代表权的美国，由于政治体系过分代表了农村的利益——相对其经济重要性、乃至农村人口而言，农业能够赢得重要的贸易保护。

第三，政策和制度变迁对社会偏好特定变化的敏感性，会不可避免地与一个政治系统中否决权的数量联系在一起(Tsebelis 1995)。比如，美国政治体系的"栅极堵塞"(gridlock)是总统和国会两院分权内在制衡原则的自然副产品。同样，意大利历史上的治理问题，至少要归因于低门槛的比例代表选举体系，这一体系造成碎片化的政党体系，以及在这一政党体系和意大利议会控制之下相对较弱的行政部门。在另一个极端，属于威斯特敏斯特体系的政府采取迅速而果断——但并不总是慎重的——行动的能力是不光彩的。

最后，制定政策的权威越是掌握在独立的官僚机构手中，政策变化就越不会与私人领域偏好群集的特定变化联系在一起(Moe 1990)。其典型例子是，承诺保持价格稳定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比

如德意志联邦银行(German Bundesbank)。在这一情况下,政府有效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因为中央银行会用更高的利率来抵消赤字支出的膨胀性后果——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早期所发现的(Scharpf 1991)。

我们从对第二、三阶段的分析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变化会与经济多元论的预期显著不同。现存制度会对政府产生强大的压力,要求它们坚持奉行那些为利益集团群集所喜爱的、从根本上支持他们提高权力的政策;即使这些利益集团的权力已经衰退,这种做法也会对宏观经济形势产生有害的影响。

在这些情况下,政府会产生改变其政体制度结构的动机,以缓解分配政治和经济形势之间的紧张状态(即第四阶段)[①] (Keohane 1984; Krasner 1983)。但是,在短期内,这样的内生制度变迁成本太高,因为它会伤害政府现有选民的利益。我们认为,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奉行制度变迁战略:当它们愿意冒险时,当紧急关头的事态——比如国际经济状况——是有利的,以及公民要求政府解释其行动之前的较长时期。

二、国际化条件下的双部门经济:一种假设

为了深化关于制度在政治变迁进程中的作用的论点,我们采用了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设想的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类型的假设案例——它在我们所使用模型的第一阶段也有所反映。从经济多元主义的视角——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绝对前提——推导出政策变迁的预期之后,我们探究制度是否以及如何改变这些预期。

试想这样一种可以分为两个部门——可进行贸易的商品和服务以及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在可贸易部门,商品和服务的各国生产者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它们是价格的接受者,也就是

① 在本文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政府间关系对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集体行为,而这在过去 10 年里一直是很多学术关注的主题。关于这一问题,参见:Keohane (1984) and Krasner (1983)。

说,存在一个它们不能影响的世界市场价格。[①] 这一部门的就业和产出就是国际需求和与外国竞争者相关的国内部门生产力的函数。[②] 构成经济活动的不可贸易部分,基本上不受国际经济状况的制约。这一部分包括公共部门、建筑业和零售业,以及其他难以创造国际市场的商品和服务。[③] 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和产出主要受国内需求和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定义:对于不可贸易的商品来说,不存在“世界市场价格”。

在 t_0 时间上,这一假设经济的可贸易部门构成了经济产出的30%,雇佣了30%的人口——更加精确地说,维持了30%的劳动力及其依赖者(表1)。其剩下的70%产出和人口则属于不可贸易的。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力在 t_0 时间上是相同的。受国际经济外部变化的影响,我们这一假设经济结构在 t_1 时间上有两点不同。第一,用于贸易的商品产出所占份额从30%增加到70%。第二,由于从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获利,可贸易部门的生产力急剧增长了。其结果就是,在 t_1 时间上,偏好不可贸易部门的人口为51%比49%。

表1 国际变化和国内经济利益

部 门	经济结构	t_0	t_1
可贸易部门	产出	30%	70%
	就业	30%	49%
不可贸易部门	产出	70%	30%
	就业	70%	51%

如果每个部门的产出和就业在时间上都是一样的,不管其理论取向如何,都可以合乎情理地推定此时政府的政策会倾向于未参与贸易的部门。我们推断有四种政策可能成为 t_0 时间的经济特征。

① 这一假设对于所有现代经济——可能只有美国和日本除外——都是成立的。当然,可能有某些国内生产者因为地理位置、地方性知识和网络及其他类似东西,而拥有对国际竞争者的边际价格优势。但是,一般来说,价格接受者的假设是适宜的。

② 当然,可贸易部门不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者可能受到保护主义壁垒的保护,不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它们的福利最终仍然受制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③ 很难准确界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可贸易的。但是,这些部门的特定构成与我们的分析并不相关。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制度对一个特定经济的协调影响,而不是它的特定构成。

它们构成了60年代在西欧极为流行的“凯恩斯福利国家(KWS)”(Shonfield 1965),但是它们也很像同一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纳的战略——尽管后者不那么强调福利供应。

- 严重依赖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以保证国内商业周期顺利
- 强制实行资本管制——以增加国内需求管理的有效性
- 工业政策——以刺激特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
- 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实质性的公共供应——将财富再分配给社会贫穷人口

但是,t_1时间上的政策预期会随着一个人所使用的政治经济模型而产生重大不同。经济多元主义会强烈地支持这一观点——可贸易部门所占经济产出份额的急剧增长,会伴随实质性的偏离凯恩斯福利国家。从可贸易商品部门的角度看,赤字消费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毫无帮助,因为它们并没有刺激国际市场的需求,而只是刺激了进口。实际上,国内扩张可能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它们会导致更高的实际利率、实际汇率,更低的国际竞争力,并且最终导致可贸易部门更低的收益和就业。对跨国资本流动的限制表明,无效率的资本配置将带来重大损失。工业政策和福利国家必须由税收来维系,就其产量来说,贸易商品部门的支出不成比例——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该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变化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与现存制度条件偶合。在随后的两部分,我们将通过考察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和公共领域的正式制度来展开这一观点。我们的结论是:产生符合经济多元主义预期的政策变化的制度安排范围非常狭窄。

三、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

社会经济利益的制度组织以两种方式调节着私营部门和公共政策的市场驱动的偏好群集变化。第一,社会经济制度影响社会行为体加诸于政府的分配需求的类型。第二,社会经济制度影响政府运作的宏观经济约束。在这一部分,我们集中分析工人在工业民主社会被组织起来的途径及其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一讨论也可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或商业组织(Haggard 1990; O'Donnell 1974; Soskice 1990)。

我们将劳动力市场制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最接近于那种

“自由”劳动力市场:工会只组织起所有劳动力的一小部分,集体谈判也主要是在工厂和公司层次上——如同加拿大、法国和美国那样。在第二种类型中,工会在工厂层次组织起很大部分的劳动力,任何单个工会也都是强大的。但是,各工会之间只有很少工资谈判方面的合作,这是因为中央工会联盟势弱或者没有一个工会能够成为这一经济的其他部分的“工资领导者”(比如在比利时或意大利)。最后一个类型“社团主义”(corporatist)是以高度的工会化、单一而集中化的劳工联盟(比如奥地利)或者一个承担工资领导者作用的单一工会(比如德国的 IG Metall)[①] 为特征的(Golden and Wallerstein 1994)。

表 2 阐明了我们关于假设经济的这三种劳动力市场制度在时间 t_0 和 t_1 的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偏好的预期。我们认为,受贸易商品部门实力增强的影响,在 t_1 时间上政府对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政策的追求会长期削弱。但是,政府对凯恩斯福利国家的承诺,在 t_0 和 t_1 都会随着工会权力的增长而增加。

表 2　经济利益和劳动力市场制度

结果	(按经济活动划分的)主导部门	劳动力市场制度		
		弱、非集中化的	强、非集中化的	强、集中化的
政策[a]	t_0-不可贸易部门	5	3	1
	t_1-可贸易部门	6	4	2
偏好[b]	t_0-不可贸易部门	3 =	5	3 =
	t_1-可贸易部门	1 =	6	1 =

注: 数字代表排序,联系由“ = ”来表明。
[a] 对凯恩斯福利国家和资本管制的承诺。
[b] 诸如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经济集合。

与近期的研究相符,我们假定:与在那些单个工会是强大的、集体谈判是非集中化的国家相比,在 t_0 时间上,偏好在那些有很弱的或者是强而集中化的工会市场制度的国家会发生重大好转(Calmfors and Driffill 1988)。在 t_1 时间上,前两组制度被认为可以使国家通过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从贸易增长中获利,但是,由于可贸易和不

① 关于这些变量的详细分析,参见:Golden and Wallerstein (1994)。

可贸易部门之间的分配压力，这在"强大的和集中化的"那类劳动力市场制度中会从根本上被削弱。

为进一步解释这些假说，我们可以以此为佐证：政府为保住政权，试图将分配性利益给予那些最支持它们的选民，同时也会试图控制促进宏观经济产出以吸引新选民。在 t_0 时间上，凯恩斯福利国家可能既会是政治上有效的——保留不可贸易部门的支持，在经济上也是有效的——因为大部分经济与国际竞争相隔绝。但是，这一平衡在 t_1 时间上是不稳定的，因为经济形势严重依赖可贸易部门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而且，在政治有效和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潜在的张力。

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工资设定逻辑是完全不同的(Garret and Way 1995)。可贸易部门的工人福利直接受到它们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为了保住工作，那些在可贸易部门就业的人必须压制其工资要求，以满足全球市场竞争的需要。相反，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大致决定因素是政府偏好而不是全球竞争力，在困难时期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去支持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①] 其结果就是不可贸易部门的工人意识到，与可贸易部门的工人相比，他们可以提高其工资而不必过多担心失去其工作。可贸易部门的工人将会受到不可贸易部门的工资增长和政府扶持性政策的严厉打击。这是因为，更高赤字和通货膨胀会对利率和实际汇率增加压力，降低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这一动向对宏观经济非常有害。但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会对它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产生有力的影响。下面就依次来考察这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

如同我们早已提出的，在工会势力弱的地方，贸易商品部门经济比重的增长确实可以转化为政策变化的压力。在我们的假设经济中，政策变化的社会压力，在 t_1 比在 t_0 更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贸易商品部门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在工会很弱的地方，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缩减削弱了不可贸易部门工人提高工资的能力，通过对他们施加压力增强国内竞争力。如果政府不理顺商业周期而选择削减工业、福利政策，不可贸易部门对失业的忧虑会变得更加严重。工业民主社

① 这样做时，他们可以维持整体就业水平并通过借入将代价支付推迟到将来，而获得短期利益。

会很少见到此类政策—形势关系,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在大部分国家都继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英国和新西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推行了最接近这一类型的战略。

在我们的两个程式化部门中,由于缺乏一个强大的联盟来协调彼此,单个贸易联盟势力的增强并没有改变其政策偏好。但是,这一制度变迁更增加了不可贸易部门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和政治领域通过行动抵制那些可贸易部门偏爱的政策变化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尽管经济结构在 t_0 和 t_1 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可以预期经济政策发生了更少、更不一致的变化以及更差的经济形势。

这些预期直接来自弱势劳动力类型。自由劳动力市场和以强大但非合作性的工会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不可贸易部门的工人不仅有提高工资的动机而且也有此能力。这些受雇者从工资战中受益,即使这对其他经济部分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不可贸易部门工人有力量挫败政府——通过削减凯恩斯福利国家——将市场规律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比如,公共部门工会不仅可以通过罢工进行市场抵制,还可以对政策施加可观的压力。当单个工会没有动机去协调彼此的行动、促进诸如国际竞争力等公共物品时,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不言明的——有时甚至是公开的——消极联盟,来抵制那些有可能会损害其利益的政策变革。

我们由此可以预测,在 t_1 时间上——此时工会是强大但非集中化的,经济政策会是难以处理的,经济形势也会恶化。与实现从对国际市场力量增加的开放中的收益相反,这一制度安排将把这些潜在收益转化成为实际成本——由于不可贸易部门的强大工会有能力抵制那些从国际化中整体受益的经济政策。这一情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出现在英国和意大利(Gourevitch 1984; Lange, Ross, and Vanicelli 1982),并在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在丹麦和瑞典出现(Iversen,即出)。

最后,让我们考察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以下情况:通过一个拥有权威、代表所有劳动力进行工资谈判的单一伞状联盟,工人得以组织起来。这一制度安排减轻了各部门不同工资标准的破坏性后果。集中化的劳工运动领导人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整体就业,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个别部门的工资战产生消极的外部影响。增加失业的工资增长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看来,最佳工资设定机制增加了受制于可

贸易部门工资——由其国际竞争力所决定——的不可贸易部门工资。这就是澳大利亚——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挪威、德国和瑞典——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长期采用的奥克拉斯特模型(Flanagan, Soskice and Ulman 1983)。[①]

在这一类型的劳动力组织之下,可贸易部门规模增长的政策和实施后果比其他类型复杂得多。一方面,工会领导人理解贸易部门在就业增长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可以预期他们会拥护可贸易部门喜好的新自由政策改革;另一方面,中央联盟同时也关心不可贸易部门工人——他们要求为伴随自由化的秩序混乱得到补偿——的福利。一个垄断工会联盟的领导人会游说,要求采取既能维持外部竞争力又能促进所有工人团结的混合政策。

在 t_1 时间上,一个垄断工会偏爱的政策可能是双重的。首先,他们会通过扩张性政策和福利主义政策来补偿不可贸易部门工人因集体谈判强加的工资限制所造成的损失。第二,他们会尝试使经济结构调整变得容易——这就意味着使工作转向和转入可贸易部门。通过削减扭曲有效投资的政策,同时促进活性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干预主义的供应政策——比如在基础设施、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公共投资,这是可以实现的(Garrett and Lange 1991; Katzenstein 1985)。[②]反过来,这些政策可能会产生与弱工会类似的经济形势。

四、正式的政治制度

前一部分考察了社会经济制度如何通过影响从私营部门释放出来的分配政策需求和政府赖以运作的宏观限制,而限定了国际驱动的变化对国民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一部分则考察正式制度在公共领域对政府回应这些分配需求和宏观限制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分成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讨论社会利益集团能够进入决策进程的正式渠道。我们从探究广泛机制类型的差异着手,进而有所限定地聚焦于不同民主政体的变化。后两个部分考察政治体系对政策变化需求的

① 关于这一工资设定机制的详细分析,参阅 Flanagan, Soskice and Ulman(1983)。

② 关于强调协调竞争压力和补偿重要性的社团主义,参见如下政治经济学分析:Garrett And Lange(1991);Katzenstein(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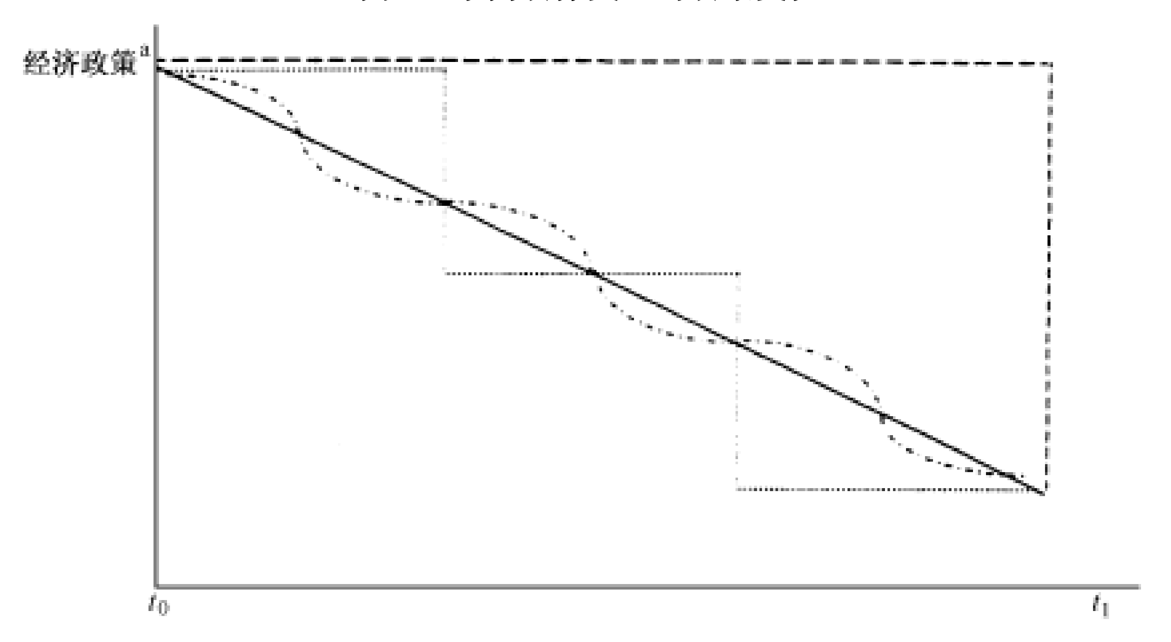
反应。我们从产生政策变化需要其支持的制度行为体的数量变化的后果入手,然后探讨官僚机构脱身于社会压力的后果。

政权类型和政府变更

政府对社会偏好群集变化反应最基本的制度决定要素,是任职者能够被顺利替代。反对政府的成本越低,政府就越会被推翻——如果他们奉行不为大众接受的政策,我们也就可以认为任职者对社会偏好变化的反应就越强。这说明政治变迁的动力可能会在以高水平的政治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和威权的、独裁的政体之间产生重大不同。

图 2 表示了在我们的假设经济中,民主的、独裁的政体和极权体系的政治变迁的一种构思——与经济多元主义的基线相比,部门间的权力平衡的变化会在政策变化中真实地反映出来。回顾一下,在 t_0 时间上,不可贸易经济构成了产出和人口的 70%,经济政策也时常求助于凯恩斯需求管理、资本控制、工业政策以及扩张性的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公共供应。在 t_1 时间上,作为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经济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明显有利于可贸易经济的倾斜,经济多元主义预测这会导致凯恩斯福利国家的严重衰退。

图 2　不同政体类型的政策变化



如果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我们就应该认为政策在民主政体比在其他政治体系更可能最大化经济多元主义的预期。其原因存在于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如果一个在职政府奉行不为大众接受的政策，它就有可能会在下一次选举中被取代。预料到这一点，政府领导人就会提前改变政策以避免被赶下台。如果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被取代，毫无疑问其政策也将改变。因为意识形态、选举偏好的不完全信息以及其他因素，政策的轨迹不可能完全遵循公众舆论的变化。虽然如此，政策变化的进程应该与社会偏好的变化大体吻合。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民主社会，偏好权衡的根据是分享它们(指偏好)的投票人数量而不是其经济重要性。[①] 作为其结果，在 t_1 时间上，偏离凯恩斯福利国家出现在假设经济中，不应该像在经济多元主义所预想的那样顺利。

政策变化在非民主政体——更替政府的法律和宪法程序在这儿很不成熟，同时也可能存在对反对现政府的强行禁止——可能会更加零散。在这样的体系中，政策变化的门槛可能比其他体系高得多。我们可以预测存在相对较长时期的政策稳定——即使大众加强对现政府政策的反对，并伴随着政府更替或现政府支持基础重组、发生急剧的政策变化。极权体系最为明显，因为政治反对是非法的并被强行禁止，国家也是被组织成一党制的——像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阵营那样。政策变化可能会被大大延迟，但当它发生时，其步伐实际上非常之快。

非民主政体中竞争性精英派系——比如具有不同种族或地区支持基础的独立军人或领导人——的存在，能够增加政府对社会偏好变化的反应。相比独裁政体而言，军事政变或者对军事政变的惧怕，迫使政府对大众偏好的变化做出更大反应。但是，缺乏透明的、可预测的政府更替机制，意味着这一进程会不可避免地比竞争性民主政体困难得多。这一模式已经成为 20 世纪诸多亚非拉国家的历史法则。

民主社会中的偏好聚集

民主的两个主要属性是：政府必须在定期选举中服从人民的意愿，所有公民的投票权平等。但是，有很多途径将选票转化为代表。

① 关于不同选举规则下政策变化速度，我们将在下文探讨。

这严重影响“人民的意愿”如何在公共政策中显现出来的问题(Rae 1971)。[①] 在我们的假设经济中,我们比较不同选举程式之下从 t_0 到 t_1 时间伴随经济结构变化而来的可能后果。表3指出了5种不同情景。在经济多元主义的基础事例中,政府政策是由两个部门的相对经济贡献——而不是任何聚集偏好的政治机制——决定的。

在剩下的案例中,偏好是通过正式的选举机制来聚集的,它们都是将其代表权建立在拥有共同利益团体的数量实力基础上,而不是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假设目前正式政治体系是以议会一院制的立法机构为特征的,存在一个政党代表两个部门的利益,每个部门的任何人都会为了他或她的政党而投票。可能出现四种情境。第一,在列表比例代表制(用于西欧大部分地区)下,各部门全体选民的分裂几乎会被准确地转化为立法机构的席位。[②] 第二,在单一议员选区(比如英国和新西兰)进行多数投票时,可能会发生相似的后果——但是只有在对两党的支持高度地理集中的地方(比如所有的可贸易部门投票者在 t_0 时间上分布在只占30%的选区内)(Gudgin and Taylor 1976)。[③]

表3 民主社会经济偏好的聚集

时间	部门	偏好聚集的方式				
		经济多元主义	比例代表制	单一议员选区(集中的)	地理单位(联邦主义的)	单一议员选区(统一的)
t_0	可贸易部门	30%	30%	30%	30%	0%
	不可贸易部门	70%	70%	70%	70%	100%
t_1	可贸易部门	70%	49%	49%	30%	0%
	不可贸易部门	30%	51%	51%	70%	100%

第三,比例代表制也可能会在这样一个政治体系——其议会席

① 雷(Rae)对此作了开创性的研究(1971)。

② 我们将不探讨比例代表制的其他形式,比如爱尔兰使用的单一可转换投票以及日本使用的单一不可转换投票。关于这些选举规则之下投票结果的分析更加复杂,即便如此,所有的多成员选区规则都会比第一名获胜的单一成员区域产生更合乎比例的席位分配。

③ 关于地理分配对投票选举结果影响的精彩分析,请参阅:Gudgin and Taylor 1976。

位是根据政治分区(比如州)而非人口比例分配的——中产生的(比如在美国参议院和联邦体系的其他高等议院)。但这一情况只有在符合一系列非常严格限定的条件时才可能出现:每个州只包含不可贸易部门或可贸易部门的投票者;而且,各种类型州的数量与两个部门在整个国家的总体分配相吻合(如表3所示)。最后一种情境是,每个选区都拥有相同比例的不可贸易、可贸易部门投票者的单一议员选区。在这一情况中,一个政党会赢得所有的席位。比如,在 t_0 时间,非贸易部门的政党会以70%对30%的比分赢得每个席位。

因此,当部门的生产力相等时,经济多元主义和不同民主方式之间在聚集公民的偏好上没有太多差别。但是,当各部门的生产力不同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想一下,我们的基线是经济多元主义,它认为在 t_1 时间上贸易商品部门的利益会是主导性的——鉴于它对经济产出的绝对贡献(占70%),经济政策会显著地偏离凯恩斯福利国家。

如同表3第二格所表明的,所有民主进程都会偏向于非贸易商品的部门,原因在于,这一部门的生产力较低,其公民所占比例持续下降。在国家比例代表制和单一议员选区——即每个部门的投票者是高度地理集中的——条件下,这一偏向的程度趋于最小。即便在此,假设立法过程中的决策是按简单多数原则进行,在维持既存的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时,不可贸易部门的政党总是能够使它所偏好的立法通过。

假设设计政党体系的目标是代表政治实体而非人民的话,在按照地理单位分配席位时,非贸易商品部门的政党会拥有一个更大的立法多数(70%)。因此,在 t_0 和 t_1 两个时间之间,即使不可贸易部门的"州"所占人口比例从70%下降到51%,也不会发生任何重新划分选区的举动。[①] 最后,在这一经典案例中,即支持每个政党的投票者在所有均匀分配的单一成员选区占据大多数,不可贸易部门的政党会在 t_1 时间上以每个选区51%的得票数赢得所有席位。

这一简单的案例表明,由于一人一票原则,民主选举总是会偏向满足较低生产力部门的政策结果。这一偏向的规模将随着选举规则

① 蒙大拿(Montana)州的人口可能会减少到只有一个人,但是,在美国宪法中,它仍然在华盛顿拥有两个参议员的代表。

而变化,但是,相比经济多元主义,民主选举总会给予不可贸易部门更多权力。这就强迫现职政治家不得不面对一个不愉快的现实。其选民偏爱的政策可能会有损于经济形势,同时也会使生产力更高的经济部门不再抱有希望。不过,奉行长时期有效的政策会危及一个政府在短期保有权力。我们将在第五部分分析政府会如何在国内制度变迁问题上减轻这一压力。

政府的回应——投否决票者

美国政治学者一直认为,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分权造成了一个强大的现状偏见。最近,一些学者对其他国家的两院制和总统制进行了类似考察(Shugart and Carey 1992; Waever and Rockman 1993)。蔡贝利斯对这些观点进行概括并指出,政策对社会偏好变化的反应与政治体系中的正式"否决票者"(veto players)的数量——即当政策变化时,需要表示同意的制度行为体数量——成反比(Tsebelis 1995)。这一论点以下述合理假设为基础,即:只要他们偏好汇聚的途径不同,否决票者的利益也会不同。比如在美国,只有总统拥有真正的国家选区。对于众议院来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参议员的代表权是以政治地域而非人口为基础的。

就我们的假设经济而言,这一论点对政治变迁动力的意义显而易见。可贸易部门对政策进程影响的增加导致的政策变化,与否决票者数量构成反比关系。在民主社会中,其反应将是立法和行政权威更为集中。因此,与德国(立法权威由议会两院分享,联邦议会和下议院)和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国会决议)相比,英国(只有一个否决票者——众议院)的政策将对偏好变化做出更多反应。简言之,我们认为,在非民主社会,军队、秘密警察及其他国家机器在某些时候能够充分独立,从而发挥否决权式的作用。在这样的地方,政策变化的步伐比更为集权的体系更慢。

政府的回应——官僚自治

至少在过去十年内,倡导"使国家回归(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学术努力认为,官僚机构对政治施加了一种独立的影响——而纯粹建立在社会需求的模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Evans, et al. 1985)。支持这一研究的两个观点是:官僚被赋予相当可观的权威,

官僚的偏好与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的偏好不一样。官僚不会完全按照政府或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来改变他们制定和推行政策的方式。虽然以上论点是正确的，但该研究一直缺乏对因果机制的说明以及严密的实证检验。

同样的结论并不适用于经济学关于中央银行的新近研究(Cukierman 1992)。[①] 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这一研究的基本论点。政府总是具有动机促使经济通货膨胀，以刺激需求和就业。经济行为者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其行为中植入通货膨胀预期。其结果就是，扩张性政策对实际积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是会增加通货膨胀。将货币权威授予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会构成一种能够解决这一"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可信赖承诺。其后果就是，出现在"自然"失业水平上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让我们来看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中央银行只有很少的独立性，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货币政策(比如在英国)。此时，私人投资者预测政府总是会使经济通货膨胀(比如，以每年5%的水平)以刺激需求和就业。作为结果，行为者会将其行为建立在通货膨胀的预测基础上。如果雇主和工人在实际工资应该保持不变的预期下签署未来的工资合同，这就意味着来年的合同会带来名义工资5%的增长。公司利润会因此在实际意义上保持不变，也不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但是，整个经济的价格会上升5%。

我们考察另一种情况：政府将所有控制货币政策的权威授予中央银行，并且通过立法授权中央银行通过提高利率来追求价格稳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年通货膨胀率为0)的目标，即使这会在短期内造成更高失业率(如同在德国或者是目前的新西兰)。由于所有经济行为者都知道中央银行将会如何做，它们也会相应地调整其行为。保护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的未来工资合同会带来名义工资的零增长。就像依附性的中央银行例子一样，实际公司利润不会受名义工资变化的影响，也不会创造新工作岗位。但是，价格会保持稳定。因此，将货币权威授予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不伤害实际经济的情况下制止通货膨胀。

① 关于国家对中央银行的统治——既包括理论上的也包括实践中的——艺术，参阅：Cukierman(1992)。

对于我们的假设经济来说,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很有必要注意这一点:中央银行威胁通过提高实际利率来抵制通货膨胀,这会对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Franzese 1995)。在可贸易部门,就业和产出是全球市场竞争的直接函数,但不可贸易部门并非如此。因此,中央银行提高实际利率将导致实际汇率的提高,贸易商品部门的竞争力随之下降。相同的政策对不可贸易部门会产生很小的影响,虽然它也会减少这一部门消费的进口成本。

因此,这一研究所分析的独立中央银行产生宏观经济后果,大多仅适用于可贸易部门。威胁提高利率,不会使不可贸易部门的工人减缓其工资战。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因为更高的实际利率提高了汇率并因此增强了他们的进口购买能力,他们将由此而受益。

表 4 显示,在我们的假设经济中,在中央银行独立性高或低的情况下,我们关于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是什么。在 t_0 时间上,不可贸易部门是主导性的。相对于政府而言,中央银行只有很少的独立性,这会导致强大的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但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政府奉行诸如在预算赤字运作中增加利率费用等类似政策。在这一案例中,中央银行独立性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后果是可怕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会使不可贸易部门最大限度地受益,但会伤害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因此在 t_0 时间上,当中央银行由政府来控制时,经济形势会好一些,因为它能够调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之有效地控制国内需求。

表 4　经济利益和中央银行独立性

结　果	主导部门(按经济活动划分)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高	低
政策[a]	t_0-不可贸易部门	2	1
	t_1-可贸易部门	4	3
经济形势[b]	t_0-不可贸易部门	4	3
	t_1-可贸易部门	1	2

注: 数字指代次序。

[a] 对凯恩斯福利国家和资本管制的承诺。

[b] 诸如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经济集合。

这一情势在 t_1 时间上会是完全不同的。增加贸易商品部门的经济力量，会降低政府对凯恩斯福利国家的承诺。而且，经济形势会使中央银行变得更加独立。在 t_1 时间上，中央银行威胁增加实际利率对大多数贸易商品部门都是非常有效的，政府财政政策也会趋于相对紧缩。在这些条件下，通货膨胀会一直处于低水平，参与全球市场的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将推动产出和就业。

小结

这一部分的目的在于，勾勒出正式政治制度如何协调社会偏好和政治后果之间的关系。我们表明了这些协调效应有可能非常重要的条件：何种社会偏好反映在公共领域，政治体系对这些有效表达的利益如何敏感。

五、内生制度变迁

前面两个部分说明了，在关于经济国际化的国内影响的假设案例中，只有在一系列严密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变迁进程才会与经济多元主义的预期相吻合。我们尤其提出，当满足下述制度需求时，贸易商品部门经济重要性的增长只会带来相应的凯恩斯式需求管理、资本管制和工业政策以及福利供应的削弱：

- 政治体系是民主的（政府官员对新的政策需要敏感）
- 工会很弱并且非集中化（不可贸易部门的工会无法否决不利于他们的政策变化）
- 经济强大部门的选举偏向是最小化的（列表比例代表制可能是最佳的）
- 政治权威集中在单个机构手中（存在很少的权威掣肘威胁）
- 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在可贸易部门促进了竞争性行为）

这样的政治经济实体并不存在。我们的分析表明，民主是经济多元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它降低了新出现的利益集团进入（政治体系）的障碍。但是，在主要的民主政体中，美国只是满足了弱工会和中央银行独立的原则；政治权威则是分散的，参议院的地域代表

制也不利于经济上强大的利益集团。德国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产生比例代表的选举体系,但是其工会太强大,政治体系也是两院制的和联邦制的。日本工会弱、政治权威集中,但是其中央银行受政治体系的控制,它的选举体系也偏向于农民利益。瑞士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多元主义政策预测所需要的制度需求要素,但是瑞士的政策变化被其内阁政府组成的普罗博兹(Proporz)原则、公民投票的广泛采用以及州权力所阻碍。

但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分析假定了政府赖以运作的制度环境是固定的。如果这一假定放宽以包括这种可能性——除了政策之外,如果政府能够改变制度,又会发生什么?我们将在这一部分考察国内制度变迁的政治问题。

让我们从对假设经济添加一些制度细节入手。假设在 t_0 时间上的制度设定可能产生强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强大的、但非集中化的;不可贸易部门的利益集团在决策领域比例过大;该体系存在多个投否决票者;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只有很少的独立性。如果这些制度在 t_1 时间上没有发生变化,政策就会仍然偏爱不可贸易部门,整体经济形势也会衰退。

在这些条件下,政府有动机加入到制度变迁中,以增强可贸易部门的地位。这是因为,在既存奉行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分配压力和这些政策的宏观经济后果之间存在着张力。[①] 当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维持其权力时——通过继续奉行使不可贸易部门受益的政策,一段时间过后,这些政策将导致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从而损害政府维持权力的能力。但是,制度变迁的收益不可能迅速见效。在我们的假设经济例子中,长期的经济形势会通过削弱有组织的工会而改善。但是,在短期内,这会提高失业率而伤害不可贸易部门,并给政府带来失去来自该部门支持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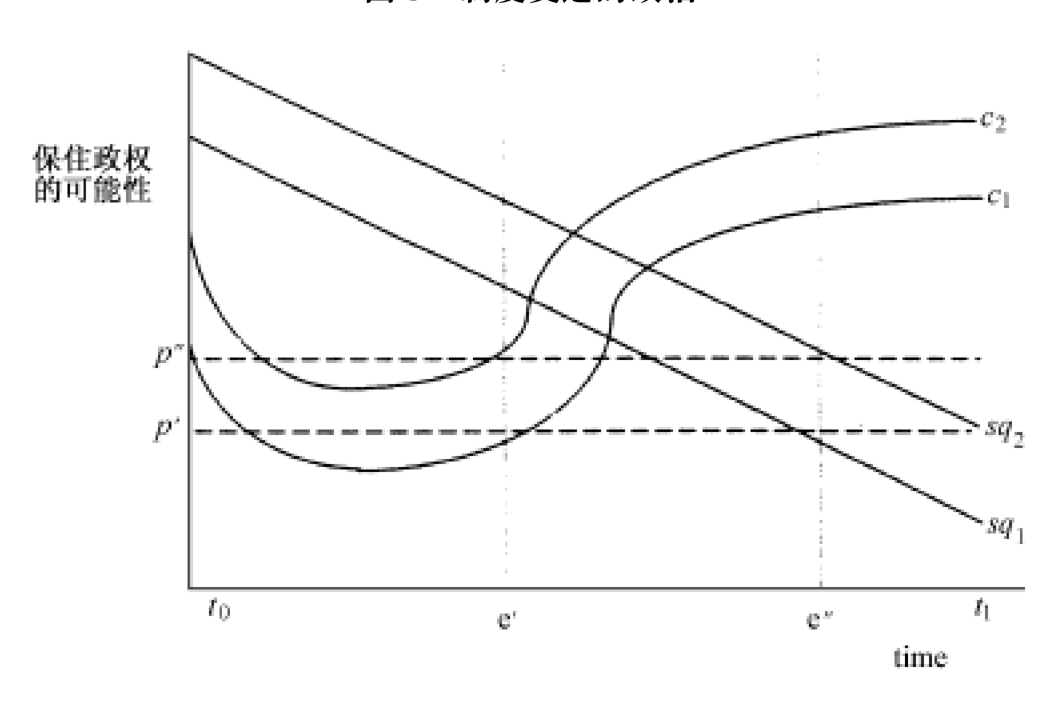
对于这一两难困境——在短期内保有权力但会伤及他们在较长时期内保有权力(通过维持既存制度),冒着在短期内失去政权的风险促进他们长期执政的前景(通过进行制度变革),我们应该期待政府如何去解决呢?

---

① 在不同的制度下,这一张力能被减轻。比如,存在强大的、集中的贸易工会,使凯恩斯福利国家能够与好的经济形势和谐存在,即使在我们的开放经济的 t_1 时间上。

让我们分析下面的事例(如图 3 所示)。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在于,保证其保有权力的可能性不能降到一个给定的阈限水平之下。此处有两种类型的政府,坚决反对冒险的政府(p″)以及更可能接受冒险的政府(p′)。更为接受冒险的政府,可能更愿意部分地牺牲他们保留政权的信心。相对于现在,所有政府对未来考虑的较少;因此,它们主要是从事可能保有当前权力的事情,而不是将来保有权力。

图 3　制度变迁的政治



p—表示政府所期望的保住政权的可能性。

sq_1, sq_2—表示不进行制度变革的效用。

c_1, c_2—表示进行制度变革的效用。

e′, e″—表示政府要对选民承担责任的时限。

小写的 1 和 2 分别指不利的和有利的事态条件。

政府可以奉行两种战略。他们可以维持制度现状,奉行偏爱不可贸易部门的政策(sq);或者改变制度,奉行偏爱可贸易部门的政策(c)。政府奉行 sq 的效用随着时间而呈直线状下降。相反,奉行 c 的效用是曲线的。在一个制度变迁开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政府保有政权的可能性会下降。但是,在某些点上,奉行 c 增加了政府保有权力的前景(最后,制度变迁的收益消失了)。

政府只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上对其政策选择进行解释。为了分析便利,我们简单区分出政府行动自由的较短的和较长的时限——

分别是 e′和 e″。在民主政体中,这一期限是由选举法决定的;在非民主政体中,政府会考虑他们的机遇时限,直到以反对派的权力和动员为根基的公民对其政策做出评价。在所有政治体系中,只有在他们对公民做出解释时,政府才会将其战略选择的基础扎根于维持或变化制度现状的可预测的效用之上。

最后,关联条件——诸如国际经济的好坏——显然对政府保有政权的可能性发挥独立影响。在图 3 中,我们区分了两种简单的案例,其中关联条件或者是不利的(1)或者有利的(2)。

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到一个合理的参数模型中考虑,它可能会影响一个政府决定是否奉行有可能在短期内付出成本但在长期受益的制度变迁战略。这一模型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比较数据。

最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很有可能会选择奉行制度变迁的战略:政府遭到反对的风险越少,政府被公民要求做出解释的时间期限就越长,关联条件就越有利。但是,这一逻辑并非直线的。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仅仅比较在将来的特定时间上——当他们被要求对其执政纪录做出解释时——的不同战略的预期效用。应该考虑到以下四种情境:

1. 在时间 e 上,来自 c 的预期效用小于政府所期待的阈限 p,而来自 sq 的预期效用大于 p:在这一案例中,政府不存在任何改变制度的动机。在图 3 中,这就是在不利关联条件下的 e′和 p′的案例。
2. 在时间 e 上,来自 c 的预期效用大于政府所期望的阈限 p,而来自 sq 的预期效用却小于 p:此时政府没有任何动机不去改变制度。这就是拥有不利关联条件的 e″和 p′的案例。
3. 在时间 e 上,来自 c 和 sq 的预期效用都高于政府期望的阈限 p,但是,c 比 sq 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显然会奉行 sq,但是只要它还关心将来,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参与到制度改变中去(拥有有利关联条件的 e″, p″)。
4. 在时间 e 上,来自 c 和 sq 的预期效用都高于政府期望的阈限 p,但是,sq 比 c 更大:这是一个政府所面临的最艰难决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政府会在这些条件下(比如 p″, e″和有利的关联条件)追求制度变迁。

我们相信这些判断抓住了政府不得不在现实世界面对的决策环

境的重要因素。比如,撒切尔的英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关于有利的关联条件和接受冒险的态度如何能够将一个政府引向奉行制度变迁的战略,即使这在短期内是代价高昂的。

英国保守政府意识到,组织较弱的工人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目标是非常重要的(Garrett 1993)。削弱工人组织的最直接途径就是让失业上升,但是这在短期内会造成很重要的选举代价。虽然如此,政府准备接受这一风险,哪怕它将导致选举的溃败(如同1982年民意测验预测的)。而且,由于关联条件减轻了失业的代价,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能成功地推行攻击工会的战略,并在90年代获得收益。最为显著的是,工党80年代的内讧——及其产生的社会民主党——意味着,由于诸多反对党分享了反保守党的票数,保守政府能够以刚刚超过40%的大众选票保有它在众议院的多数。

图3的其他主要寓意在于:一个政府必须对其公民做出解释的时限增加,会增强政府参与到经济有效的制度变迁中去的倾向。这明确地说明,民主政体对这样的内生制度变迁会比非民主政体抵制更大,也因此会更不繁荣。但是,这只有在非民主政府是“仁慈的独裁者”时才成立——如果给定改变制度的机会,它会以一种在长期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就促进整体经济形势而言)方式来做。有些学者指出,这正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之所在(Wade 1990)。

但是,对于不存在民主而经济成功的每个东亚案例来说,它们也存在另一种基于不适应的政策和制度的经济失败(这在前苏联阵营最为显著)。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非民主社会的政府都不是致力于促进整体经济形势的仁慈独裁者。相反,他们有他们想用政策来取悦的选民。如同这一部分前面关于正式制度所说明的,民主选举的缺失会增加对由经济结构变化导致政策变化的抵制。我们应该意识到,至少在制度变迁的案例中,这一抵制非常之大。

总之,本部分说明,就经济多元主义的政策预期要想实现就必须进行的制度变革而言,制度变革障碍重重。看起来,断定制度是现象的、与政治变迁进程无关是极为冒失的。因此,将内生制度变迁的前景放到我们的政治模型中,并没有改变本论文的根本论点:对于社会行为体偏好的变化如何影响有效政府的行为而言,先前存在的制度条件影响明显。

结 论

本文的基本目的在于,说明“制度”如何在政治变迁的动态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希望融合两类势不两立的研究: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最近开始探究经济国际化和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可能的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们很少涉及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收录于本文集的文章就是这一研究途径的杰作;另一方面,现代比较政治学者研究了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但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低估了国内政治内嵌于其中的国际环境急剧变化的重要性。国际—比较的分立越来越不合时宜。今天,对学者的重大挑战在于结合这两种视角的洞察力而又不忽视它们的特有贡献。

我们试图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完成这一任务,即通过一个“开放政体”的模型分析国内制度在私人领域行为体受国际驱动的偏好变化和公共政策后果之间的调和作用。我们将国家政府摆在分析的中心位置,提出制度条件的变化——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如何影响了政府对贸易商品部门规模外生增长的反应。我们的中心结论是:离开明显的制度范畴,政治变迁进程能够得到有效解释的情境范围非常狭窄。经济多元主义不加掩饰的假设,即私人领域偏好群集的变化会迅速反映在公共政策和制度的等量变化中,几乎可以被列入到本文所考察的所有制度条件中。

因此,添加明确的制度范畴,增强了我们对经济国际化的政治后果的分析效果。但是,这一研究战略对于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后果。研究国际经济变化对国内经济行为体偏好的影响,使其自身陷于过于狭隘的理论建构——如同弗里登、罗戈斯基和其他学者的尝试一样。这并不是制度途径的案例。

不存在任何简单的政治制度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相反,特定制度具有不同的后果。比如,劳动力市场制度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政策后果是复杂的,需要进行密切考察。而且,这些制度的影响不可能彼此之间独立。比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工资设定、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可能会受到与之相伴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影响(Franzese 1995)。但是,为了理解这样的互动进程并建立

更加全面的制度理论，有必要首先分离其各自的独立影响。

因此，关于政治制度后果的理论建构进程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在任何“宏大图景”出现之前，必须细致地分析一整套相关的、琐碎的、但却重要的关系。但是，如果只有补充关注政治制度语境的偏好和偏好变化的分析后，国内政治后果的重要变化才能得到解释，这就是值得为此付出努力的尝试。

第二部分

工业化民主国家

第四章　资本流动、贸易和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

杰弗里·加勒特

第五章　经济一体化与美国的货币政策政治

杰弗里·A.弗里登

第六章　国际化与日本的选举政治

弗朗西斯·麦考尔·罗森布拉斯

第四章

资本流动、贸易和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

杰弗里·加勒特

我们普遍注意到，在过去20年里，发达工业国家之间贸易、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国际一体化增长已经对经济政策的趋同——促使市场力量更自由地发挥作用——产生了强大压力(Andrew 1994; Goodman 1993; Kurzer 1991; Lee and McKenzie 1989; Notermans 1993; Scharpf 1991)。二战结束以来，直到70年代中期，相对封闭的国际经济使政府能够奉行扩张的、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福利国家(KWS)，而不损害其整体经济形势。有明确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政策对左派和工人组织具有吸引力。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国际经济更加一体化、竞争更为激烈，奉行此类政策的空间及其多数共识消失了。

相反，至少在70年代后期，有人认为，左派—劳工力量和凯恩斯福利国家之间的联合，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就对贸易的开放而言——而增强了(Cameron 1978; Kazenstein 1985)。而且，最近关于经济增长和劳工组织宏观经济影响的经济学研究对该论点提供了新的支持。"新增长"(New growth)理论认为，有活力的政府干预经济——如对教育、基础设施、研究和开发的公共投资——会通过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物品而真正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Aschauer 1990; Barro 1989; Lucas 1988; Romer 1990)。它认为，当强大的、集中组织的劳工运动能够减少伴随这些政策而发生的工资战时，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效果是突出的(Alvarez 1991)。由此看来，国内存在强大的左派政党和贸易工会("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的政府，会对国际化做出干预主义和更具扩张性的政策反应，因为这会将财富和社会风险再分配给工人和穷人，并且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因此,关于经济国际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现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它们产生了关于全球经济中经济政策进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说。一方面,那些集中关注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人们主张,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加会导致凯恩斯福利国家的长期衰退和政策的跨国趋同。另一方面,专注于国内要素则意味着,市场一体化不会损害凯恩斯福利国家,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政策方面的跨国差异也会继续存在,如果不是增加的话。

本文通过分析1967～1990年间经济国际化和左派—劳工力量在15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对政策的互动影响,评估了这两种途径的价值。[①] 与先前国际化和国内政治之间关系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贸易增长之外,我们还考察了资本流动的影响。贸易工会的数据来自那些新研究,它们对劳工组织的力量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历史比较(Golden and Wallerstein 1994)。最后,我们还考察了一组宏观经济政策的统计指标:政府支出、预算赤字、资本税[②] 和利率。

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比现有研究所描述的更为复杂。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在同样的情况下,国际化降低了政府的激进主义。比如,贸易和资本流动性的增长导致工业化国家普遍降低预算赤字。而且,国际化的增长缓和了左派—劳工力量和干预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也同样获得了支持。尤其是,当左派—劳工力量强大的独立后果是提高资本税时,这一关系在更高的贸易水平上是相反的。[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解放市场资本主义的激进选择在经济国际化力量面前失败的共识是正确无疑的。恰恰相反。首先,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的结构基础一直都很稳固。在所分析的这一时期里,没有发生任何的左派和劳工组织力量的逐步削弱,左派—劳工力量

---

① 关于利益变化可靠的跨国数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都是无法获得的。

② 资本税变量将对公司收入的征税与雇用者的社会保险捐献结合在一起,在操作上,它实际上是对公司收入的征税。感谢德博拉·米切尔建议我注意该操作。

③ 但是,在左派和有组织劳工力量强大的国家,贸易总是比较高。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国家就做出了削减资本税以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决策。

的跨国差异也没有显著缩小。如果国内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福利国家的诱因,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们在80年代就不再是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财政政策的证据与趋同论观点有着尖锐的冲突。强大的左派政党、强大的贸易工会、资本流动性和高水平的贸易吻合,导致更大的政府支出和更高的赤字运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民主社团主义和凯恩斯福利国家之间的联合显然强于60年代后期。左翼—工党政权不得不为财政扩张付出代价——就更高的利率来说,这些利率费用随着更大的资本流动性而增加。但是,在1990年以前,这一利率费用并没有达到足够使存在力量强大的左派和贸易工会的国家政府放弃财政激进主义的地步。

但是,这些利率费用终究会侵蚀社会民主社团主义—凯恩斯福利国家轴心。当存在力量强大的左派和贸易工会的国家长期对贸易开放时,它们也同时拥有相对封闭的财政市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1990年,所有国家的资本流动性都显著增长了。但在今天,那些由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工统治的国家,仍然比那些左派政党和工会较弱的国家对跨国资本流动施加更多的管制。万一这些国家保留下来的资本管制被取消时,如果财政市场继续需要更高的利率以支持这些国家的贷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迫削减支出和赤字。但是,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出现对财政赤字的这一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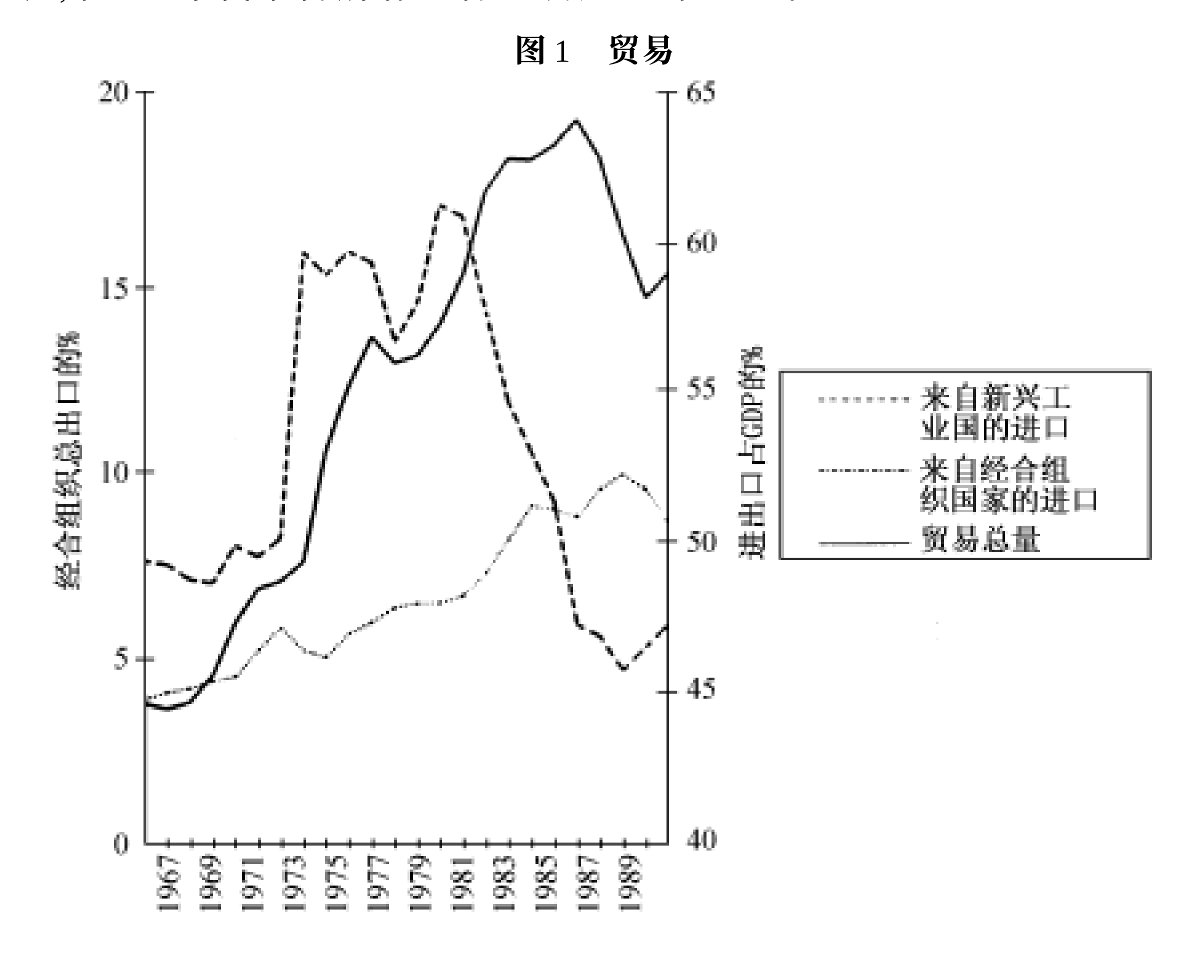
本文其余部分进一步阐释了这些论点。第二部分描述了60年代中期以来贸易、资本流动性、左派政党力量和劳工运动组织的变化。第三部分就市场一体化和国内政治对经济政策的互动影响提出了一些假说。第四部分对这些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本文分析的基础上,最后一部分再次评价了关于经济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的争论。

一、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环境

毫无疑问,从60年代到1990年,国民经济的国际一体化急剧增加了。就贸易而言,(本文所研究的15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平均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大约45%上升到60%(见图1,右边的刻度)。而且,这一增长大部分都要归因于它们与经合组织之外国家间的贸易增长(左边的刻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之间,来自经合组织的进口占整个经合组织进口的大约15%,但是

这一比例随着石油价格的下降而降低了。相比而言,来自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的进口在这一时期稳步增长,在80年代末占所有经合组织进口的10%。

图1　贸易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各时期的"历史统计数据"。总贸易数据是15国年度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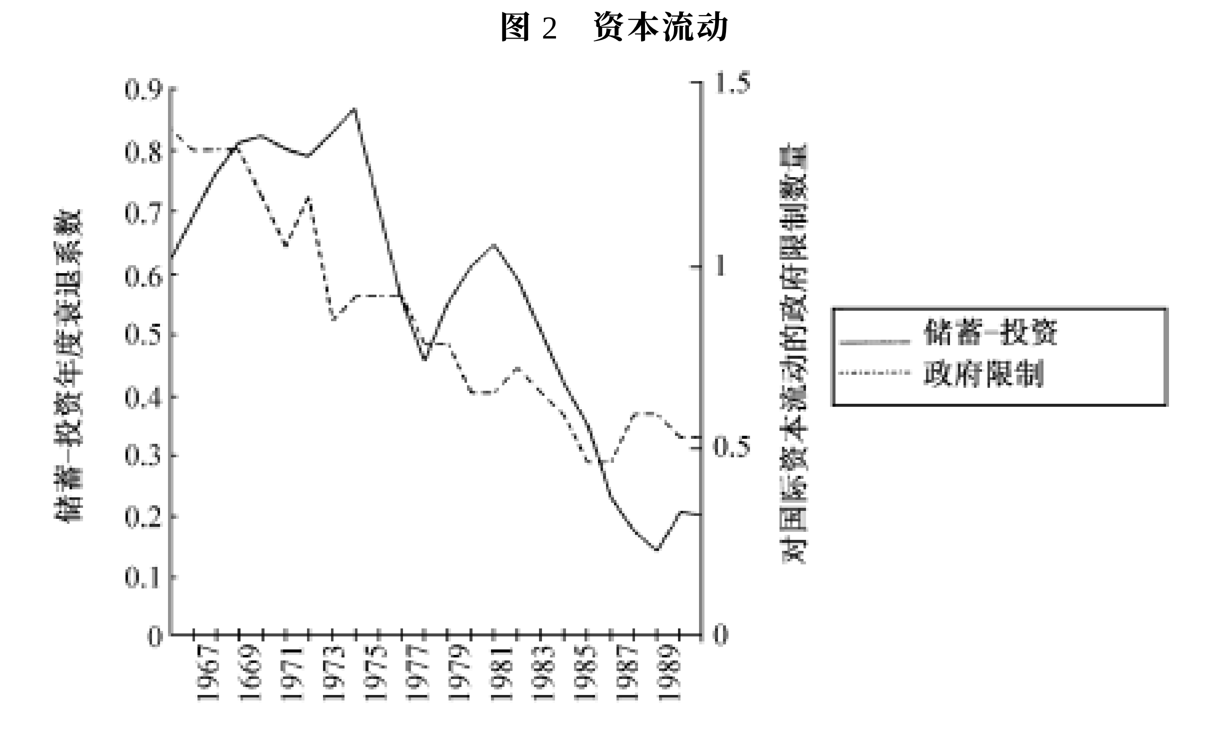
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更难衡量。作为金融一体化最明显的指标,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剧增并未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更大的跨国资本运动可能是资本跨国运动障碍的减少所造成的投资环境任何变化的结果。有若干不同的指标被用来衡量金融一体化的实际程度。[①] 图2描述了其中两个。[②]

左边的刻度说明,本文所研究的15个国家的国内私人积蓄和国

① 关于金融一体化替代尺度的讨论,参见Frankel(1991)。

② 使用弗兰克尔偏爱的指数——"对冲"利率(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和远期外汇汇率)跨国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关于远期外汇汇率的数据在这一分析中既没有覆盖所有国家也不包括所有年份。

图 2 资本流动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各时期的"历史统计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交换协定和交换限制的年度报告。政府限制系 15 国年度平均值。

内私人投资之间关系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①] 右边的刻度描绘了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政府限制——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资本管制的分类——的平均值变化。[②] 这些变量显然是不同的。一个考察了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并衡量了其行为的微小变化;另一个衡量政府的政策,是较为粗线条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后(r= .77),这两个标准是高度相关的。在 6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间,国内储蓄对国内投资的限制明显下降了,这意味着资本持有者将其资金在世界范围内转移、以获得最大回报率的自由度显著增加。经过同一段时间后,政府对跨国金融流动的限制也明显下降。

① 所介绍的数据是 1967 到 1999 年间私人国内积蓄对私人国内投资影响的年度跨国(这 15 个国家的)回归等式的参量估价。关于这一研究途径的著作,参见:Feldstein and Horioka (1980)。本文使用的衡量标准转引自 Bayoumi (1990)所介绍的费尔德斯坦-霍瑞奥卡途径(Feldstein-Horioka approach)变体。

② 这一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如下著述: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这些类别包括资本项目的限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双边支付及与非成员国和外资之间的双边支付。使用了这些数据的最近研究还包括:Alesina (1993), Eichengreen (1994);和 Epstein and Schor (1992)。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原因，而是评定国际化的国内后果。根据最近的研究，国际化可以被视为国内行为者不得不做出反应——不仅仅是自觉的政策结果——的外生发展。即使政策自由化肯定是会增加贸易和资本流动性，其他要素——比如技术和交通成本的变化——显然在因果关系上优先于政策变化（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Goodman and Pauly 1993）。

关于经济国际化对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的影响，通常有两种看法。第一，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减弱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力量和团结，以及削弱对左派的政治支持，市场一体化削弱了社团主义的国内基础（Kitschelt 1994；Piven 1991）。第二，其他学者提出，商品、服务、资本市场的全球化，限制政府奉行比全球趋势更具扩张性或干预的经济政策的能力，即使仍然存在这样做的政治动机（Kurzer 1991；Lee and McKezie 1989；Notermans 1993；Scharpf 1991）。下面，让我们逐一考察这两种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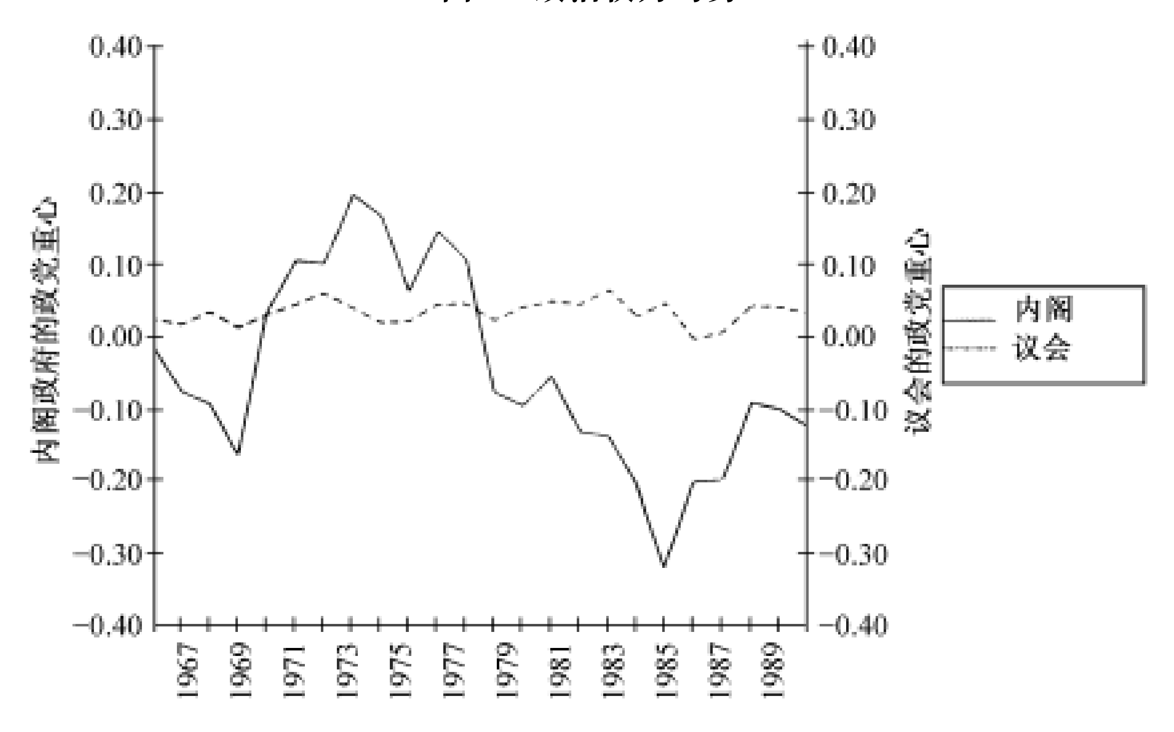
国际化产生了新的偏好群集，它们跨越了传统的劳资分裂（Frieden 1991b；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随着劳动力国际分工的增加，同一企业、部门或区域的工人、管理者和业主彼此之间，比它们和各自的"阶级盟友"之间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对于贸易工会的结构、力量以及对左派政党的政治支持来说，这一打乱劳资分裂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强大的劳工运动产生自愿工资限制和对左派政党提供强大政治支持的能力，对社会民主社团主义是极为重要的（Alvarez et al. 1991）。与市场全球化相伴而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包括制造业工作减少、服务部门扩张、公共部门就业增长和兼职工作（part-time work）的增长，显然可以降低工人的组织水平，削弱中央联盟的权威，并且减少左派的核心政治选民。

但是，这一证据并没有充分证明这些观点。图3显示了"政党重心"（partisan center of gravity）在这15个国家的内阁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年平均值。[①] 内阁标准描述了不同政治党派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直接控制。立法机构标准表明政府运作所依赖的广泛政治限制——

① 基于Castles and Mair（1984）提供的分类，政党重心的中心值反映了每年各政党所拥有的内阁部长职位和议会（在参议院）席位。议会席位的数据来自：Mackie and Rose（1991）。内阁部长职位的数据来自：Keesings's Contemporary Archives（各期）。

不管其党性划分。[①] 对这两个变量而言，“0”都表明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和谐的权力均衡；正值和负值则分别表明左派和右派的主导地位。

图 3　政治权力均势



注：该数据系 15 国年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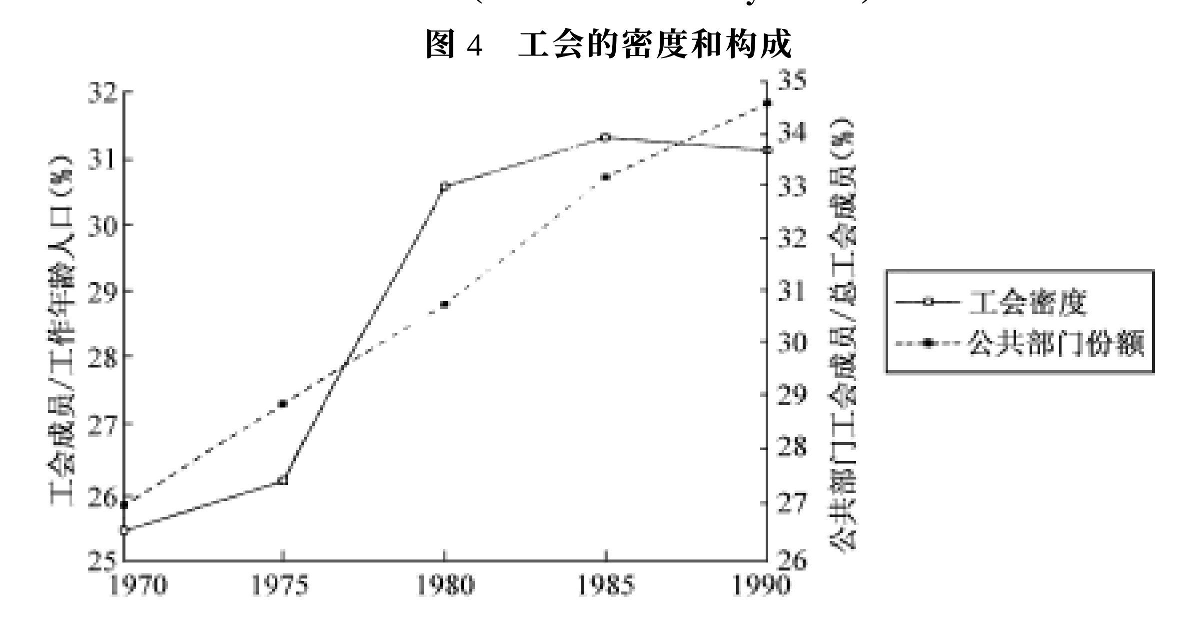
在投资不足的时候，立法机构的跨国权力平衡在这一政治光谱的中心显然是稳定的。但是，内阁政府的平均政党重心具有更多的变化。在 70 年代早期，左派政府更为得势，但是，内阁政府的重心在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早期摆向了右派。左派的力量在这 10 年（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早期）结束后再度增长，并回复到大约 60 年代末的水平。在投资不足的时期中仍然持续增长的经济国际化并不能解释这些变化。相反，政府的命运看来是与国际商业周期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当欧佩克石油动荡袭来时，很多左派政府在 80 年代都向右转了。但是，当后来的国际萧条袭击时，造成了左派在 80 年代后期处于较好形势。

---

① 这些尺度之间的相互关联远非完美（r = .69）。在分权体系中，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选举是分开的。在比例选举体系中，政府的构成经常在立法机构权力平衡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发生变化。最后，在威斯敏斯特体系中，在立法机构拥有 50% + 1 的席位就足够统治内阁政府。

图 4 和图 5 提供了 60 年代中期以来的工会结构变化的数据。[①] 衡量工人组织力量最简单的标准就是工会密度，即工会成员的平均数(相对于有资格的人口而言)。工会密度从 1970 年到 1985 年都在增长，并在 1990 年稳定下来(图 4，左边的刻度)[②] (Visser 1991)。但是，仅仅在密度的基础上判断工会力量是不明智的。关于工会组织影响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设定所有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新近的案例研究对无差别工人的假设是否有效提出质疑，在过去几年里显然并非如此(Iversen 1995; Swenson 1992)。与这些研究比较一致的是，图 4 显示出从 1970 年到 1990 年，公共部门工会的力量(右边的刻度)显然增长了(Visser 1991)。公共部门工会和可贸易部门工会的分裂，显然会削弱劳工运动集体行动——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的能力(Garrett and Way 1995)。[③]

图 4　工会的密度和构成



注：该数据系 15 国年度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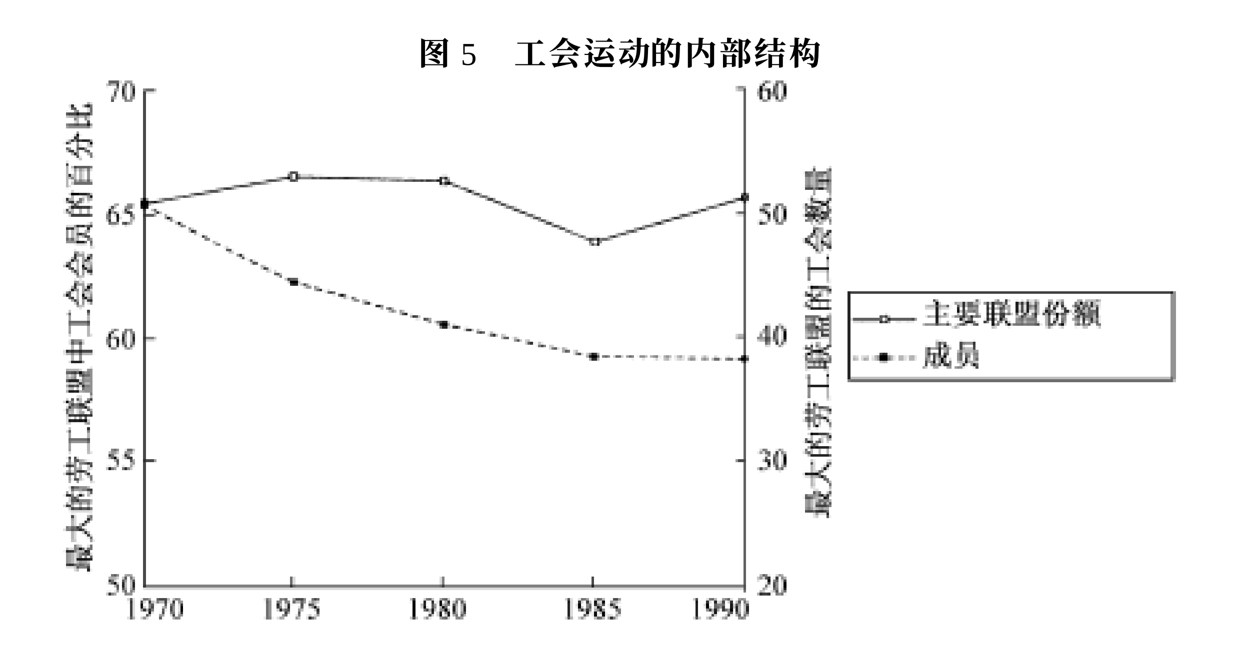
---

① 除了工会密度之外，这些数据只是在 1970 开始的五年时期里才是可用的。

② 有些学者指出，集体谈判协议所包括的工资契约部分是一个比工会密度更好的衡量指标(Traxler 1994)。但是，只有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有“有效范围”的数据。

③ 公共部门工人的战略意图与开放部门工人的完全不同。工资增长对开放部门工人的福利有着重大而迅速的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状况决定的。因此，产出和就业的变化直接受劳动力成本(与生产力有关的)的影响。这一关系在公共部门则弱得多。就业的大致决定因素是政府偏好，而不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对于公共部门产品来说，不存在一个近似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东西。而且，政府倾向于在困难时期用公共部门的工作来刺激就业，因为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从就业机会创造中赢得短期的利益，而一直等到将来再支付代价(通过借入的方式)。

图 5　工会运动的内部结构



注: 该数据系 15 国年度平均值。

但是,关于社团主义的大多数研究认为,工会权威的集中减轻了不同工人利益差异所造成的离心趋势(Golden 1993)。图 5 提供了工会集中——所有参与工会的工人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最大劳工联盟成员的比例——以及这一联盟所吸收的工会数量的两组数据(Golden and Wallerstein 1994)。这些数据表明,最高劳工联盟的组织力量没有任何削弱。从 1970 年到 1990 年,这一最大联盟的工会成员在 15 个国家的平均比例非常稳定,而这一主要联盟所包含的工会平均数量则有所下降。如果它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就是削弱了集体行动的障碍。

总的来看,图 3 到图 5 证明,认为左派和工人组织的力量被经济国际化削弱的一般观念是错误的。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市场一体化会对经济政策产生什么影响。比如,随着市场一体化的进行,在整个西方国家,扩张性的、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遭到明显减弱。这在左派政府和劳工运动结盟时最明显。此处有一个没有言明的假说,即左派能够保持它在这个新经济环境中选举竞争力的惟一途径就是模仿右派的政策。本文其余部分将详细考察这一观点。

二、国际化的政策后果

国际化会如何影响工业民主国家的政策进程呢？让我们首先来

区分资本流动和贸易的不同影响,然后介绍国内政治状况,最后再分析它们的互动后果。

资本流动

可以这样简要描述资本流动影响经济政策的进程:资产持有者将其资本转移到国外越容易,政府奉行增加国内投资回报率政策的动机就越强。鉴于在厂房设备方面有固定投资的资本家比那些投资于股票、债券或货币的人更难以转移其资产,在一个充斥流动资本的世界中,金融市场的预期反应是对政府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

金融一体化最明显的政策后果是,它在货币政策方面所创造的跨国趋同的压力。在汇率和高水平的金融流动结合起来时,资本抽逃的可能前景,使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动机拉近国内利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发挥着价格制定者作用的国家,比如美国——利率的差距。当汇率浮动、不存在任何资本流动管制时,利率也会趋同。虽然扩大国内货币供应会因为降低汇率而产生短期的刺激效应,但是这些效应容易遭到更高进口价格的伤害。而且,外汇市场是多变的,会对经济基础成分(比如利率、预算平衡和通货膨胀)的细微变化做出剧烈反应。因此,在一个资本高度游动的世界中,货币投机是阻止政府奉行"有控制的贬值"尝试的有力因素(McKinnon 1988)。[①]

资本流动应当伴随着政府支出的缩减、更小的预算赤字以及更低的资本税率。资本税的例子是最简单的。政府对来自投资收入的征税越多,预期回报率就越低,资本抽逃的动机就越强。在对跨国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限制的地方,这种前景会导致政府取消资本税。在财政政策方面,资本管制的取消增加了政府用于可获得的货币储备,因此可能会产生政府扩张公共经济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可能会由于金融市场关于政府支出的怀疑而过于沉重。今天的支出必须在将来偿还,或者用增加的税收,或者用更高的通货膨胀来偿还。不管怎样,市场会对公共部门的扩张做出反应,要求向贷款支付更高的

---

① 一个特定时间点上的汇率聚集,反映了货币市场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信心。这些货币市场对政府发出的任何信号都高度敏感。比如,如果一个政府宣称推行新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或者造成他人认为它有可能在将来这样做,在政策变化的实际经济影响方面,货币市场的反应将会是非常迅速的,并且往往"过头"。

利率。而对利率的预期也会促使政府削减支出和赤字。

贸易

贸易增长影响经济政策的机制与资本流动有所不同。众所周知,金融市场玩家的时间期限是短暂的,对于他们所进行的套汇行为而言,政府政策的长期后果远远不如稍瞬即逝的机遇重要。相比之下,政府所面对的来自贸易增长的制约,并不是金融市场那样的日日波动,而是较长时期本国生产者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那些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大的经济来说,其开放前景是严峻的。失业会上升,经济增长会放慢。继续出现大额贸易赤字在长期是不可行的,因为政府必然要为此承担资本的外流。进行广泛保护的政府(更不用说自给自足的政策),将面对整体福利的严重损失,国民经济的增长也变得越来越少(因此获得规模经济和开放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竞争力限制是否创造出了与资本流动相似的政策动机呢?新古典理论视角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为了刺激竞争力,政府必须削减支出,因为(政府)支出是对生产者而言的。他们必须平衡预算,以免使下一代背上巨额公共债务的重负。应该降低资本税以激励企业创新。[①]

但是,这一看法并不被所有的经济学家所认可。最近关于经济增长内生原因的大量研究提出了与新古典理论相反的看法,即政府支出能够通过产生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集体物品增加生产率和竞争力。支持新增长理论的基本论点是,在提供最终造成增长的商品和服务安排方面——从培训工人到提供诸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集体行动问题和规模经济逻辑使政府比私人行为者更有效率(Aschauer 1990; Barro 1989; Lucas 1988; Romer 1990)。这一理论看法并不主张赤字运作,也不提倡对资本课以重税。虽然如此,新增长理论提供了一种关于"大政府"的经济原理。我们因此应该有所保留地推出这一主张,即对贸易增长的开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共经济的

---

① 新古典理论不会对利率产生任何明确的预期,因为竞争压力会降低对凯恩斯需求管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更高的利率)的依赖,但是更高的利率会趋于抑制投资并削弱竞争力。

收缩。[①]

国际化和左派—劳工力量的互动影响

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研究的基本论点是:第一,左派政党优先奉行在工人和穷人的立场上再分配财富和社会风险的政策;第二,通过限制其通货膨胀后果(这是通过自愿工资限制实现的),强大的、集中化的劳工运动增加了这些政策的宏观经济效能。其结果就是,在同等条件下,更大的左派—劳工力量会带来更多的公共支出、更大的赤字、更高的资本税和更低的利率。

但是,在全球经济中,更有趣的问题是,左派政府与强大的劳工运动联合,对贸易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会做出何等反应。我们可以列出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聚焦于奉行不同经济政策的政治动机因素。国际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秩序混乱。例如,如果全球经济处于萧条中,这将会在所有国家造成失业的增加。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国际体系联系越紧密时,这一关系就越强。因此,如果一个由强大的左派政党和与之结盟的劳工运动统治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减轻这些市场混乱,随着对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更多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在左派—劳工力量和扩张的、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之间的正比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强。这可以被称之为"补偿"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Katzenstein 1985)。

其替代观点——"效率"假说(efficient hypothesis)——聚焦于国际化的宏观经济后果(Kurzer 1991; Notermans 1993; Scharpf 1991)。从一种新古典理论视角看,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增加政府支出、对资本课以重税和奉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能力,会随着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开放而下降。根据这一看法,补偿性政策总是无效率的,奉行该政策的宏观经济代价随着市场一体化只增不减。但是,应该记得,如果内生增长理论是正确的,在增长的贸易和公共支出之间就不会存在反比关系了,即使政府只关心效率。相反,我们可以想得到,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越大,政府就越会奉行新增长途经

---

① 这并不是说新增长理论涉及政府支出的所有类型。例如,很难认为家庭补助或企业补贴构成了提高生产力的集体物品。

——高公共支出、技术熟练工人、高附加值和高质量的生产——以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因为这些政策也有利于工人和穷人。

假说

表1概括了经济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状况对政策的假设后果。资本流动增强的独立影响和贸易一样,虽然这两个方面的国际化影响政策的机制不同。在同等条件下,国际化增强会削减政府的支出、赤字和资本税。但是,新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和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成正比的。只有资本流动对利率产生了很强的影响,但是,其假设后果是产生跨国趋同,而不是更高或更低的利率。与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研究的基本要点相一致,左派—劳工力量的独立后果可能是国际化。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增强,应该与更高的公共支出、更大的赤字、更高的资本税和更低的利率交织在一起。

表1　假设的资本流动和左派—劳工力量的互动影响

				资本流动 左派—劳工		贸易 左派—劳工	
	资本流动	贸易	左派—劳工力量	补偿	效率	补偿	效率
政府支出	-	-/+	+	+	-	+	+/-
预算赤字	-	-	+	+	-	+	-
资本税	-	-	+	+	-	+	-
利率	n/a	n/a	-	-	+	-	n/a

注:“+,-”表示假定的关系方向;n/a表示不适用的。

最后,关于左派—劳工力量和国际化之间的互动影响,存在两组不同的预期。补偿假说认为,左派—劳工力量和扩张性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并将随着贸易和资本流动而增长;与此同时,为市场混乱提供补偿的政治动机也增加了,从而导致了国际化、左派—劳工力量关于支出、赤字和资本税的正系数。在这一案例中,补偿假说同时指出,在高水平的国际化中,利率在左派政府会比在更为封闭的经济中甚至更低,这就是利率等式中互动因素的反系数。相反,效率假说认为,左派—劳工力量和扩张性的、干预主义政策之间的正比关系会随着更大的国际化而削弱,因为新增长理论认为,在政府支出的限定条件下,进行补偿的宏观经济代价增加了。

三、对国际化、左派—劳工力量和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经验评估

独立效应

本部分通过使用1967年到1990年15个国家年度观察数据中的跨部门离中回归、时间自回归的组合回归方程式,对前一部分假说进行了检验。[①] 这一等式通过包含了国家名义变量(dummy variables),来控制跨部门的“固定后果”。我们用滞后因变量替代了变量,以免违反在右边的变量和错误项之间存在的零相关回归假设(Alvarez et al., 1991)。这一评估等式的一般形式是:

$$\begin{aligned} POL_{it} = {} & a + b_1 POLZ_{it-1} + b_2 CAPMOBILITY_{it} + b_3 TRADE_{it} \\ & + b_4 LLPOWER_{it} + b_5 CAPMOBILITY.LLPOWER_{it} \\ & + b_6 TRADE.LLPOWER_{it} + \sum (b_j COUNTRY_{jit}) \\ & + \sum (b_k X_{kit}) + \mu_{it} \end{aligned} \tag{1}$$

等式中,POL代表经济政策的四个因素——政府支出、预算赤字、资本税和利率。a指截距(intercept)。b's指参量估计(parameter estimates)。工具变量(POLZ)是通过将滞后因变量回归到其第二延迟指标以及经济管制的延迟指标而产生的。CAPMOBILITY指政府对跨国金融流动的限制尺度,为便于说明,以“-1”为其最大值——也就是说,更大的数据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流动。[②] TRADE指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LLPOWER指议会和立法机构(左派力量的)政党重心、劳工运动的密度、构成和集中化(劳工力量)的标准化数据这一附加性指标。[③] j(指以美国为参照系的14个国家)国家名义变量是由COUNTRY来表示的。经济控制变量(X)指经济

---

① 此处没有使用完整的克门塔模式(Kmenta model),因为当应用于具有较短时间序列的鞍形数据组,这一过程对标准错误产生了一个向下的偏向(如同此处的案例;Beck and Katz 1995)。

② 来自年度储蓄—投资回归的系数只表示了给定年份里跨国资本流动的特征。因此这些并不适合于分析跨国——和短暂的——资本流动变化的影响。

③ 这些数据在附录里有更具体的描述。

增长和失业(及通货膨胀和利率等式中的美国利率)。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所观察的国家和年份。μ 指错误项。

表 2 展现了该组合回归方程式。几乎所有的国家名义变量都是高度相关的,这说明此处使用的固定后果评价是合适的。[①] 关于滞后因变量的大而相关的参量估计,在经济政策的所有四个方面都是相当有弹性。以经济增长和失业为代表的商业周期,也对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利率方面,美国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利率对各国利率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不必在此处的这些关系上多费笔墨。设置这一组控制变量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评价经济国际化、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可信度。让我们回到这些变量上。

政府支出　同等条件下,更大的资本流动对政府支出施加了下降的压力,但是,这一系数只有在 .1 水平上才是相关的。增长的贸易对公共支出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这并没有支持新古典理论或新增长理论的预期。与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的研究相反,在支出等式中,左派—劳工力量的参量估计是消极的(但是并不相关)。而左派—劳工力量和经济国际化之间的互动是相关的、积极的。左派—劳工力量和高水平的国际化结合造成了更多的政府支出,这支持了补偿假说,而不是效率假说。

预算赤字　预算赤字等式与公共支出等式非常相似。在同等条件下,增长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与更小的赤字(在 .1 水平上是显著的)相伴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际化限制财政扩张的观点。左派—劳工力量的参量估计还是与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的预期相反——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越大,财政政策就越紧张。但是,这一系数是无关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互相影响项之间的参量估计是相关的、消极的。这一点再次支持了补偿假说:国际化水平和左派—劳工力量越大,财政政策就越宽松。

资本税　贸易和资本流动性增长的后果是增加资本税。尽管这一关系只有在贸易中才有效,这些后果仍然是有趣的,因为它们对税收和竞争力的大部分看法提出了挑战,它们认为,公司税应该随着国际化而削减。与支出和赤字等式相反,左派—劳工力量的参量估计是相关的、积极的,这与社会民主社团主义的经济看法相一致。但

① 出于简化的目的,在此没有介绍这些系数,但是它们可以从作者处获得。

是,左派—劳工力量贸易系数是消极的、相关的。这与效率假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尽管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存在提高资本税的政治动机,全球经济中的这一政策类型仍然受到了很大限制。

利率 贸易对利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更大的资本流动与降低的利率有着重要联系。重要的是,左派—劳工利率的参量估计是积极而显著的,它意味着,金融市场总是将利率费用与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联系起来。而且,左派—劳工力量、资本流动系数总是积极的、显著的,说明这些利率费用随着资本流动的增加而增加。可以推测,这些后果影响了市场对政府——其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力量是强大的——坚决奉行"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怀疑。

表 2 1967～1990 年政府支出、预算赤字和利率

	政府支出	预算赤字	资本税	利率[a]
截距	16.20[d]	-1.73[f]	-0.7	.32
	(1.27)	(.93)	(.53)	(1.24)
因变量$_{t-1}$[b]	.51[d]	.84[d]	.26[d]	.26[d]
	(.04)	(.07)	(.02)	(.04)
经济增长	-.27[d]	-.27[d]	-.02	.01
	(.04)	(.04)	(.01)	(.025)
失业	.81[d]	.28[d]	-.01	-.09[f]
	(.07)	(.06)	(.02)	(.05)
通货膨胀				.10[d]
				(.02)
美国利率				.55[d]
				(.04)
资本流动[c]	-1.22[f]	-.88[f]	.04	-1.06[d]
	(.66)	(.55)	(.23)	(.38)
贸易	-.01291	-.0516[f]	.0649[d]	.027
	(.0326)	(.0300)	(.0135)	(.023)
左派—劳工力量	-.40	-.35	.45[d]	.52[e]
	(.27)	(.27)	(.11)	(.24)
左派—劳工力量[f] 的资本流动	.53[d]	.30[d]	.03	.15[c]
左派—劳工力量[f] 的贸易	.0227[d]	.0150[d]	-.0081[d]	-.002

续表

	政府支出	预算赤字	资本税	利率[a]
	(.0054)	(.0047)	(.0021)	(.004)
观察	360	360	360	312
P^2	.933	.828	.964	.685

注:固定后果(也就是说,包括 n = 1 国家名义变量)组合回归估计使用了克门塔(1986:eqn 12.32)的跨部门离中回归、时间自回归模式。圆括号中的数据是标准误差。

[a] 芬兰和美国除外。

[b] 以因变量 t - 2、经济增长 t - 1 和失业 t - 1(以及利率等式中的通货膨胀 t - 1 和美国利率 t - 1)为外生变量的工具变量。

[c] 资本流动是最大值为"- 1"的资本管制数值。

[d] 在 .01 水平上显著。

[e] 在 .05 水平上显著。

[f] 在 .1 水平上显著。

条件性效应

本分析的首要目标是左派—劳工力量和国际化对经济政策的互动影响。我们不可能通过表 2 得出的结论来准确描述这些关系。特别是,互动各项的系数只是表明了贸易、资本流动和左派—劳工在其独立影响之上的复合影响(正如这些变量的非互动评估所显示的)。等式(1)必须被重写,以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随着资本流动增加,左派—劳工力量和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国内政治状况是否影响了贸易和赤字之间的关系?"

$$\begin{aligned} POL_{it} = {} & a + b_1 POLZ_{it-1} + b_2 CAPMOBILITY_{it} \\ & + b_3 TRADE_{it} + (b_4 + b_5 CAPMOBILITY_{it} \\ & + b_6 TRADE_{it}) \cdot LLPOWER_{it} + \sum (b_j COUNTRY_{jit}) \\ & + \sum (b_k X_{kit}) + \mu_{it} \qquad (2)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POL_{it} = {} & a + b_1 POLZ_{it-1} + b_4 LLPOWER_{it} \\ & + (b_2 + b_5 LLPOWER_{it}) \cdot CAPMOBILITY_{it} \\ & + (b_3 + b_6 LLPOWER_{it}) \cdot TRADE_{it} \end{aligned}$$

$$+ \sum (b_j COUNTRY_{jit}) + \sum (b_k X_{kit}) + \mu_{it} \quad (3)$$

在等式(2)中,($b_4 + b_5 CAPMOBILITY_{it} + b_6 TRADE_{it}$)是$LLPOWER_{it}$有条件的参量估价。也就是说,左派—劳工力量的大小是不同水平的资本流动和贸易的系数。相反,在等式(3)中,($b_2 + b_5 LLPOWER_{it}$)和($b_3 + b_6 LLPOWER_{it}$)在不同的左派—劳工力量水平上,分别是资本流动和贸易的条件系数。

左派—劳工力量　表3介绍了左派—劳工力量的条件系数。出于简化的目的,此处只介绍了从数据组中提取的四个典型案例。最高和最低的一行代表了对贸易和资本流动开放最大联系的国家一年观察的参量估价(这两个维度是同等重要的)。具有最高国际化结合水平的案例是1985年的比利时,其贸易构成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6%,对跨国资本流动不存在任何管制(按IMF的定义来划分)。国际化结合的最低水平是1976年的芬兰,其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IMF所监控的四个类型的资本管制在芬兰都出现了。[①]中间两行显示了(15个国家)关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有条件参量估计的中间值,在研究的第一年即1967年,贸易为40%,存在两种IMF界定的资本管制[②];在研究的最后一年即1990年,贸易为52%,没有资本管制。[③] 这些案例代表了所研究时期的经合组织各国国际化增强的一般趋势。

表3　左派—劳工力量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影响[a]

国际化水平[b]	政府支出	预算赤字	资本税[c]	利率[d]
最高	2.96[e]	1.84[e]	-.72[e]	.52[f]
(比利时1985)	(.76)	(.46)	(.23)	(.24)
中间值	.81[e]	.44[e]	.03	.52[f]
(1990)	(.25)	(.15)	(.06)	(.24)

① 在其他很多案例中,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一个更低的比例。但是,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对资本流动都只有很少的管制(像在美国),国际化结合值(以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标准值的总和为基础)也都高于1976年芬兰的值。

② 1967年,贸易的中间水平在加拿大出现,资本管制的中间值在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荷兰、挪威和瑞典出现。

③ 1990年,贸易的中间水平出现在英国。资本管制的中间值出现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续表

国际化水平[b]	政府支出	预算赤字	资本税[c]	利率[d]
中间值	- .54[f]	- .35[e]	- .13[f]	.22
(1967)	(.23)	(.11)	(.06)	(.23)
最低	- 1 .30[e]	- .76[e]	.03	.08
(芬兰 1976)	(.43)	(.25)	(.06)	(.30)

[a] 条件系数来自表 2 中关于左派—劳工力量、贸易、资本流动和它们之间的互动的参量估价。括号中的数据是有条件的标准错误。

[b] 本表中使用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数据是在文章中界定的。

[c] 左派—劳工力量、资本系数在资本税等式中不显著,并被排除在条件系数和标准错误的计算之外。

[d] 左派—劳工力量、贸易的系数在利率等式中不显著,并被排除在条件系数和标准错误的计算之外。

[e] 在 .01 水平上显著。

[f] 在 .05 水平上显著。

条件系数模式生动地显示了贸易和资本流动增长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在这一数据组中,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最高结合水平上,左派—劳工力量增长是与更大的政府支出和更高赤字具有重要关联的(与补偿假说相一致),并与更低的资本流动和更高的利率也具有重要关联(如同效率假说所预测的)。在 1990 年国际化的中间水平上,这些关系是相似的,但是较弱一些(资本税系数并不相关)。在 1967 年的中间案例中,有条件的左派—劳工力量系数在支出、赤字预算和资本税等式中是显著的,但与高国际化案例中的这一系数是相反的。最后,在分析案例中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最低结合水平上,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的有条件的参量估计甚至更大。因此,在较低的国际化水平上,增长的左派—劳工力量会带来更低的政府支出、更紧张的财政政策和更高的资本税,但是对利率则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简单的虚拟事例来估量这些后果的实际大小。在一个事先给定的国际化水平上,如果左派—劳工力量出现了一定的差异,经济政策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 为了通过使用左派—劳工力量和国际化分配轨迹产生没有夸大其后果的估计,让我们将这些虚拟后果建立在 1967 年和 1999 年的国际化中间案例的基础上,并且考察左派—劳工力量分布从 25 位百分值(3 .36,在 1977 年的澳大利亚)变成 75 位百分值(6 .24,1977 年的奥地利)的政策后果

——大概是 2.88 个标准单位的差异。

在 1967 年贸易和资本流动结合的中间水平上,左派—劳工力量增长在这一数值上会削减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1.6%的公共支出,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 1.0%的预算赤字,但是会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 0.4%的资本税。相反,在 1990 年的国际化中间水平的情况中,左派—劳工力量从 25%增长到 75%,会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 2.3%的公共支出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 1.3%的赤字,但是却会降低 1.5%的利率。这些虚拟估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流动 表 4 介绍了资本流动(在不同左派—劳工力量水平上)的条件系数。由于资本流动或左派—劳工力量、资本流动项都是不显著的(参见图 2),我们没有估计资本税等式的系数。这一次,我们仍然只分析了四个情境。其中包括了左派—劳工力量的最高(8.42,1970 年的奥地利)和最低(.94,1968 年的法国)案例与两个中间案例——左派—劳工力量分布上的第 25 位和第 75 位百分值。

在左派—劳工力量的最低水平上,增加的资本流动趋向于降低政府支出、赤字和利率(尽管只有最终条件系数在传统水平上是显著的)。在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更大的地方,这些关系被削弱了。在 75 及其以上的百分值上,增长的资本流动的后果与左派—劳工力量最低水平的后果是相反的,即更高的政府支出、更大的赤字和更高的利率(尽管最后一个并不显著)。

这些后果的实际大小可以通过与前一部分使用的相似的虚拟分析来说明。此处,让我们考虑一下——在左派—劳工力量分布上的第 25 位和 75 位百分值——资本流动从 1967 年的中间水平(有两类资本管制)到 1990 年中间水平(没有任何管制)的变化。在 25 位百分值上,资本流动增加会导致占国内生产总值 1.1%的政府支出增长(使用当有条件的参量估计是显著的惟一等式时)。但是,在 75 位百分值上,两类资本管制的取消会导致占国内生产总值 4.2%的政府支出增长,以及预算赤字的 2.0%的增长。这些发现支持了补偿假说,而不是效率假说。

表 4　资本流动对经济政策的有条件的影响[a]

左派—劳工力量[b]	政府支出	预算赤字	利率
最高	3.24[c]	1.64[c]	.19
(奥地利 1970)	(.46)	(.32)	(.19)
75 位百分值	2.09[c]	.98[c]	-.13
(德国 1979)	(.28)	(.20)	(.26)
25 位百分值	-.54[e]	.12	-.57
(澳大利亚 1977)	(.33)	(.28)	(.35)
最低	-.72	-.61	-.93[d]
(法国 1968)	(.56)	(.47)	(.43)

[a] 条件系数来自表 2 中关于左派—劳工力量、贸易、资本流动和它们之间的互动的参量估价。资本税等式被省略了,因为其互动项不显著。括号中的数据是有条件的标准错误。

[b] 本表中使用的左派—劳工数据是在文章中界定的。

[c] 在 .01 水平上显著。

[d] 在 .05 水平上显著。

[e] 在 .1 水平上显著。

贸易　表 5 介绍了不同左派—劳工力量水平上的贸易系数。本表的结构与资本流动的是一样的,其结果也是非常相似的(利率等式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受贸易水平的影响)。在左派—劳工力量的最低水平上,增长的贸易对支出和预算赤字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但是却与资本税的增加有显著关联。相反,在左派—劳工力量的最高水平上,贸易与更大的支出和更高的赤字联系在一起(对资本税则没有任何影响)。

让我们再一次在左派—劳工力量的 25 位和 75 位百分值上估量一下这些影响的真实水平,并假定贸易从 1967 年的中间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 40%)增长到 1990 的中间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 52%)。在 25 位百分值上,贸易的增长会导致政府支出增长 0.7%,以及资本税增长 0.5%(这两个数据都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75 位百分值上,贸易增长 12%会带来国内生产总值 2.1%的支出增长,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0.9%的预算赤字增长。

表 5 贸易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影响[a]

左派—劳工力量	政府支出	预算赤字	资本税
最高	.172[b]	.074[b]	- .002
(奥地利 1970)	(.019)	(.016)	(.008)
75 位百分值	.123[b]	.042[b]	.015[c]
(德国 1979)	(.012)	(.012)	(.006)
25 位百分值	.057[b]	- .002	- .038[b]
(澳大利亚 1977)	(.016)	(.017)	(.008)
最低	.002	- .038	.057[b]
(法国 1968)	(.027)	(.026)	(.012)

[a] 条件系数来自表 2 中关于左派—劳工力量、贸易、资本流动和它们之间的互动的参量估价。利率等式没有包括在其中,因为其互动项不显著。括号中的数据是有条件的标准错误。

[b] 在 .01 水平上显著。

[c] 在 .05 水平上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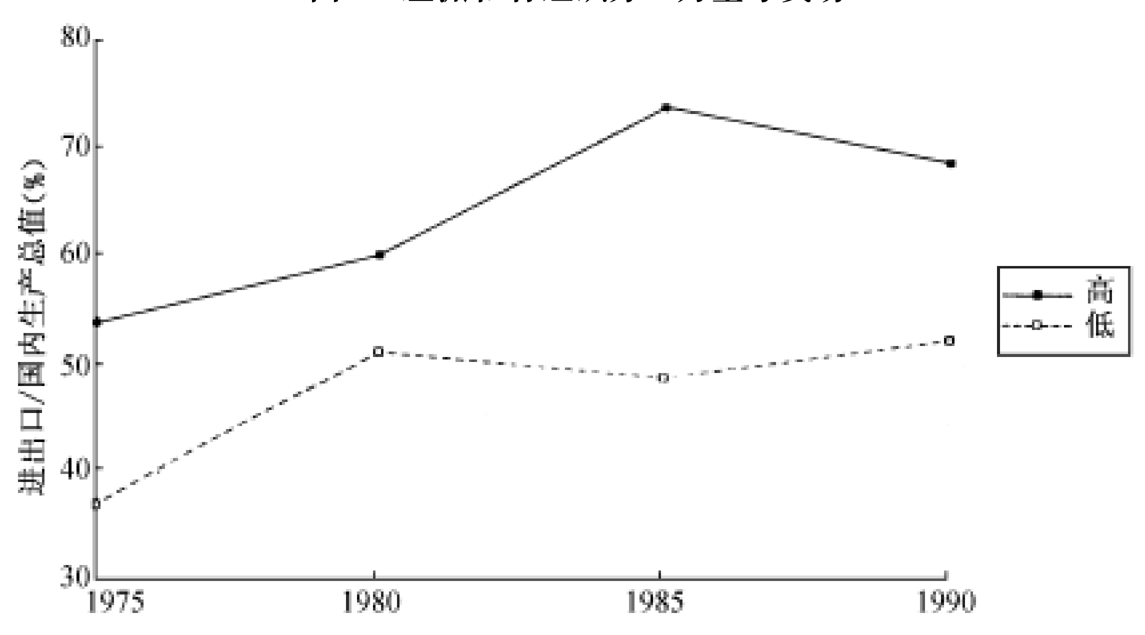
[d] 在 .1 水平上显著。

国际化的跨国不对称

在概括本文发现及其对当前发达工业国家经济政策政治的意义之前,需要观察一下贸易和资本流动在不同国家的混合情况。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西方各国之间出现了长期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增加的跨国发展趋势;但是,基于国内政治状况,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结合在各国都有着体系性区别(见图 6 和图 7)。在左派和劳工力量更强大的国家,贸易也更高。贸易的经济动机在小规模经济(就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而言)更大,与此同时,小规模经济被证实对贸易工会和左派政党的成长提供了肥沃土壤(Cameron 1978)。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总比那些右派更有力、贸易工会更弱的国家对跨国资本流动施加限制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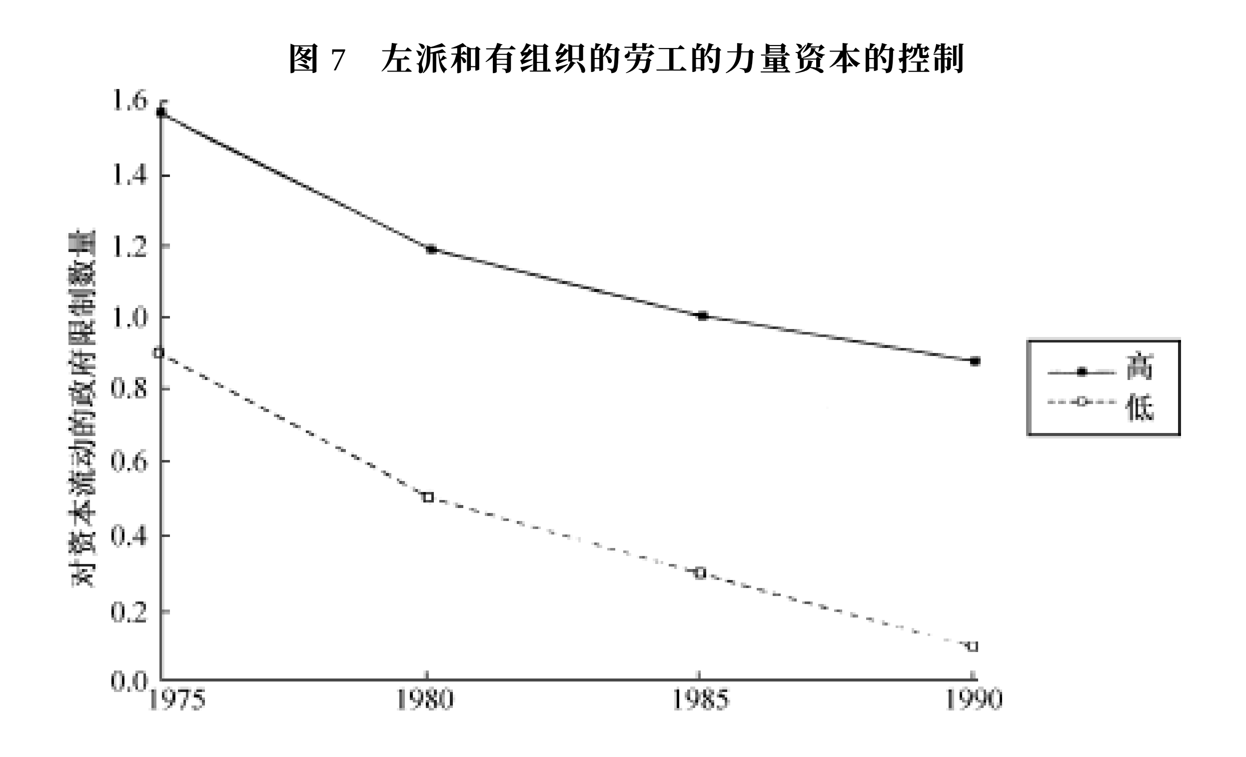


图6　左派和有组织劳工力量与贸易



资料来源：参见图1。该数据系1967—1974、1975—1979、1980—1984以及1985—1990年间的最高的七国和最低的八国的左派—劳工力量平均值。

图7　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资本的控制



资料来源：参见图2。该数据系1964—1974、1975—1979、1980—1984以及1985—1990年间的最高的七国和最低八国的左派—劳工力量平均值。

出于当前的目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不对称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不同国家如何、什么时候感受到国际化的影响。在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强大的地方——如北欧的小规模经济,在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进行竞争早已经是几十年的现实。但是,这些国家只是在最近才感受到资本流动的影响。即使今天,资本管制仍然在强大的左派—劳工案例中很流行。这说明,这些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受金融一体化限制的影响比受贸易增长的影响更大。例如,芬兰在 1990 年仍然有 IMF 监控到的三类资本管制。这些资本管制为了加入欧盟而随后取消,结果在 1992 年秋天的货币危机中产生了毁灭性的宏观经济后果。

相反,在大部分战后时间里,大部分工业经济的资本流动一直都是一个生活现实,只有贸易竞争的重要性新近变大了。[①]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贸易问题主导了最大的(但就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却是最小的贸易)两个西方国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随着贸易开放的增加,这些国家内部关于如何进行最有力竞争的争论只会变得更激烈。

结 论

宣称经济国际化削弱了左派传统的再分配议事日程,这几乎已是陈词滥调了。20 世纪 80 年代的所有成为头条新闻的事件,看起来都和市场对国家的胜利有关,撒切尔的 10 年,里根-布什时代,社会民主党在北欧的跌落,甚至还有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我们是否听到了保守主义的自我庆祝式的欢呼或者是左派的悲观的抱怨,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结论都是相同的:国家只有留神采纳新古典经济的药方,才能在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中繁荣,政府也才会生存下去。

本文说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见解过于简单也有些过头。赤字—支出的倾向是社会民主的政治经济绝对必要条件。但是,随着国际化增强的出现,左派—劳工力量和财政扩张之间的关系增强了,而不是受到贸易和资本流动增强的限制。未经进一步分析,是不可能

① 实际上,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贸易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仍然很微小。

说明这是否是改善生产秩序混乱的政治动机增长的结果，或者是特定类型的政府支出提高了竞争力（如同新增长理论家所宣传的）的结果。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一发现都与广为接受的见解截然相反。

不过，国际化对左派及其传统的议事日程还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贸易增长减少了资本税，但是这一后果早就在社会民主社团主义堡垒出现了。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显著提高了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利率费用；这是随着跨国资本流动障碍的取消而增加的（可以预测到，将来甚至会出现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后，我们可以预测到，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受这一负担。考虑到单个国家根本无法控制的欧元市场以及其他金融进程的扩散，对资本流动重新设置障碍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Goodman and Paully 1993）。金融市场一体化或许会成为社会民主的丧钟。另一方面，仍然有可能会出现新增长理论的预期。这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对政府支出持更为接受的态度（即使它在短期内是接受赤字资助的）。如果真的出现这一情况，资本流动对社会民主的限制性后果会削减。

最后，我们也思索贸易增长对更大范围的西方经济的影响。本文的结论说明，只要左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在这些国家仍然很弱，政府会继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对进一步贸易开放做出回应。但是，更高的贸易水平也会增长政治压力，要求对那些受到市场力量不利影响的社会阶层进行补偿。在这一情境中，左派的力量和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流行会增加，如同德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情况。结合新增长力量的理论支持，左派力量在大规模经济中的增长会导致跨国经济政策的趋同。但是，这一趋同会以干预主义政府为中心。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能判断哪一种情景将会发生。虽然如此，本文明确表明，应该审慎对待过去 10 年间关于政治经济的习惯看法。

附录:1967～1974年

国家	政治力量			工会运动的结构					左派—劳工力量(排序)
	议会	内阁	左派(排序)	工会密度	公共部门份额	主要联盟份额	会员数量	劳工(排序)	
奥地利	0.44	0.57	2	33	22	100	16	1	1
瑞典	0.43	1.00	1	45	23	66	29	2	2
芬兰	0.31	0.59	3	22	26	69	31	7	3
挪威	0.30	0.06	4	30	29	80	35	4	4
丹麦	0.09	0.01	9	36	22	77	45	3	5
德国	-0.04	0.52	6	21	29	83	17	5	6
比利时	0.01	0.25	7	33	27	48	19	6	7
意大利	0.25	0.15	5	11	17	56	24	9	8
荷兰	0.18	-0.1	8	18	31	36	16	12	9
英国	0.04	-0.14	10	30	29	84	150	10	10
澳大利亚	-0.1	-0.43	12	27	31	68	55	8	11
加拿大	-0.29	0.00	11	18	30	51	85	11	12
日本	-0.22	+1.00	13	16	18	37	63	13	13
美国	-0.43	-0.71	14	15	23	62	122	14	14
法国	-0.51	-1.00	15	10	60	66	55	15	15

附录(续):1975～1979 年

国家	政治力量			工会运动的结构					左派—劳工力量(排序)
	议会	内阁	左派(排序)	工会密度	公共部门份额	主要联盟份额	会员数量	劳工(排序)	
奥地利	0.45	1.00	1	34	24	100	16	1	1
瑞典	0.38	0.16	4	59	26	63	25	2	2
挪威	0.31	1.00	2	36	33	77	35	6	3
芬兰	0.24	0.51	3	44	24	65	27	4	4
丹麦	0.11	0.56	5	45	22	74	40	3	5
德国	-0.04	0.75	8	23	28	84	17	5	6
意大利	0.31	0.02	6	18	17	55	24	8	7
英国	0.02	0.67	7	35	30	85	111	10	8
比利时	-0.10	-0.20	10	38	29	52	19	7	9
荷兰	0.19	0.09	9	18	34	39	15	11	10
澳大利亚	-0.33	-0.67	15	31	35	64	45	9	11
加拿大	-0.35	-0.17	11	20	24	43	78	13	12
日本	-0.13	-1.00	12	16	19	36	64	12	13
美国	-0.35	-0.50	14	16	24	63	112	14	14
法国	-0.25	-0.74	13	11	61	66	45	15	15

附录(续):1980～1984 年

国家	政治力量			工会运动的结构				左派—劳工力量(排序)	
	议会	内阁	左派(排序)	工会密度	公共部门份额	主要联盟份额	会员数量	劳工(排序)	
奥地利	0.45	0.80	1	34	26	100	15	1	1
瑞典	0.35	0.52	2	66	29	62	25	3	2
芬兰	0.17	0.50	5	51	28	63	29	4	3
丹麦	0.14	-0.06	7	55	25	73	38	2	4
意大利	0.35	0.24	4	18	18	52	24	7	5
挪威	0.11	0.16	6	43	35	64	34	8	6
德国	-0.03	-0.19	9	23	28	83	17	5	7
比利时	-0.12	-0.38	11	40	30	57	19	6	8
荷兰	0.11	-0.25	8	17	36	60	17	11	9
澳大利亚	-0.05	-0.20	10	30	37	65	42	15	10
法国	0.25	0.64	3	10	55	57	42	15	11
英国	-0.19	-1.00	14	34	31	94	109	9	12
日本	-0.17	-1.00	13	16	20	37	50	12	13
加拿大	-0.33	-0.20	12	19	28	38	64	14	14
美国	-0.40	-0.80	15	13	25	64	104	13	15

附录(续):1985～1990

国家	政治力量			工会运动的结构				左派—劳工力量(排序)	
	议会	内阁	左派(排序)	工会密度	公共部门份额	主要联盟份额	会员数量	劳工(排序)	
奥地利	0.38	0.50	2	33	31	100	15	1	1
瑞典	0.35	1.00	1	70	38	60	24	4	2
意大利	0.37	0.24	4	16	23	53	20	7	3
芬兰	0.14	0.21	6	55	34	56	24	5	4
澳大利亚	0.12	1.00	3	30	37	66	38	8	5
挪威	0.16	0.45	5	45	44	61	29	9	6
比利时	0.03	-0.02	9	39	35	57	18	6	7
丹麦	0.00	-0.75	10	59	35	69	30	2	8
德国	-0.02	-0.83	11	22	30	83	17	3	9
荷兰	0.11	-0.16	8	15	43	59	17	12	10
英国	-0.26	-1.00	13	28	32	82	76	10	11
日本	-0.24	-1.00	12	15	17	62	81	11	12
法国	0.03	0.08	7	7	51	26	38	15	13
美国	-0.40	-1.00	124	11	34	80	91	13	14
加拿大	-0.52	-1.00	15	21	35	36	58	14	15

注:关于奥地利和比利时的主要联盟份额(公共部门份额)的数据是缺乏的,并被转换成其他 14 个国家的中间值。左派、劳工和左派—劳工的力量排序是以它们的组元标准值为基础的。

第五章

经济一体化与美国的货币政策政治

杰弗里·A .弗里登

国际经济一体化对货币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本章,我将探讨它同样对货币政策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政策通过加深自己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变得更加政治化了。这是因为,高水平的资本流动意味着国家货币政策影响了汇率,造成得失分明的分配后果,从而导致了政治分化。与此同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高水平的世界贸易使汇率成为一个关键价格。当经济开放造成国际价格动荡的一般后果时,受其影响的集团就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去寻求货币领域的补偿。经济国际化导致了货币政策政治化的增长、社会经济类型变化及政治分化。

事实上,美国经历过经济一体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其货币政策都逐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际上,货币政策一度处于美国政治的中心。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货币问题”(与关税问题)是美国政治争论中最永恒的议题。它曾经带来了以救世主自居的民众狂热、提心吊胆的保护、在国家历史上两次比较成功的第三党以及从国会议员席到堪萨斯麦田的生动演讲。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货币政策似乎脱离了政治议事日程,尽管某种程度上它在最近几年里再度回来了。

作者感谢国际商业教育和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所提供的支持;感谢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彼得·凯南(Petetr Kenen)、罗伯特·基欧汉、戴维·A .莱克(David A . Lake)、南斯奈尔·立夫(Nathaniel Leff)、莉莎·马丁(Lisa Martin)、凯瑟琳·麦克纳马拉(Kathleen McNamara)、海伦·米尔纳、罗纳德·罗戈斯基、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肯尼思·谢普斯利(Kenneth Shepsle)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给予有益评论和建议。

本章认为,美国国际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变化,有助于解释为何货币政策在半个多世纪里是高度政治性的,然后又从政治议事日程中消失了。本文断定,货币政策在 1930 年以前政治地位突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与世界其他部分存在着广泛联系。在 1930 年和 1970 年之间,美国经济是非常封闭的,货币政策逐渐被大众遗忘,在学术上变成乏味的论题。自 1970 年以来,国际金融和商业一体化急剧增加,使得货币政策更具有政治重要性和竞争性,也有可能会改变进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政治分化和制度安排。

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模式的这一分析有助于支持如下观点,即国际经济状况对国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美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水平和特定相对价格一体化的水平,导致利益集团的发展既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决策制度结构的影响,也影响了这一制度结构。国际经济趋势改变了制定货币政策的环境,也对社会经济集团产生了不同的分配性影响,这导致了实质的政治冲突。

圆满评估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货币政策演变,远远超出了当前的研究范围。本文的目的在于,展示一种建立在本文集提出的研究途径的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视角,并尝试将之应用于大部分的美国货币历史。鉴于这一途径的系统经验评价是完全有可能的,我相信此处提供的历史证据至少有助于建立本文论点的可信性。[①]

本章评价了国际化对过去 120 年间美国货币政策政治的影响。在第一部分里,我概括了国际金融和商业一体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考察了美国在一个相对开放经济(从内战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及在一个相对封闭经济(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的货币政策实践。在第三部分,我考察 1970 年以来增长的国际化如何影响了美国货币政策。第四部分则探讨了这一研究的意义。随后是结论。

---

① 实际上,我所提出的是更为系统的评价。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这包括对一系列货币政治情境的政治的详尽分析。与本文相似的一个评述是 Frieden (1994b);我的《关于 19 世纪美国货币民粹主义的新解释》(Monetary Popu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 New Interpretation)(未发表的手稿)提供了这一个关键时期的数据;弗里登(Frieden 1994a)提供了对当代欧洲货币政治的分析。

一、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治

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通过两种渠道来发挥作用:对特定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响,以及对经济能动者(economic agents)的偏好和偏好强度的影响。考察这一点最清楚的方式就是,看分别关于非常低水平的和非常高水平国际化的两个极端案例。[①]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名义价格水平发挥影响。货币刺激提高了价格,因此降低了实际利率、鼓励了支出。[②] 通过这一渠道,货币政策能够影响诸如增长和失业等广泛的集合。鉴于货币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降低了名义合同的实际价值,政治分化有可能在贷款者和储蓄者之间产生。几个特别的行业会喜欢宽松的货币(loose money),尤其是房屋建筑业和某些耐用消费品——他们严重依赖消费信贷的实际成本;金融部门和债权人则通常喜欢紧缩的货币(tight money)。由于封闭经济货币政策影响了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对价格,它具有宽泛而分散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

据此,可以合理地认为,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会导致相对较大的政治分化。少数几个范围狭窄的集团——房屋建筑行业、金融部门——会形成高度的利害关系,但是,受到一般宏观经济趋势影响的是大多数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货币和资本项目的情况是不同的。金融一体化使国内利率受世界水平的限制,而商业一体化则将可贸易商品

---

① 关于本文的分析框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本文所考察的相对价格变化,主要是那些影响了国际经济活动整体吸引力的相对价格变化。分析也可能聚焦于特定国际价格变化对国内货币政治的影响。我在个案评价时讨论了这一点。限于篇幅,我强调国际经济一体化增强的影响。特定国际价格变化的影响是相对直接的,在任何事件中,其产品价格下降的生产者希望货币政策能够逆转这一下降。

② 在下文大部分地方,我忽略了那些不能避免的——与理性预期变革相一致的——有可能低估名义变量之实际影响的异议。不论其机制如何——劳动力市场刚性、信息不足、体制变化信号等;也不管是以名义价格水平还是以汇率的形式,货币出其不意变化的重大而真实的影响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关于当前国际货币经济学争论与困惑的概述,参见 Krugman (1993)。

的价格捆绑在一起。[①] 在这样一个经济中,货币政策对汇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货币扩张使通货下降,使当地生产的商品比进口商品相对便宜,并且降低了它们的国际(外国货币的)价格。当然,货币政策也能影响名义价格水平和利率,因为它们是随着实际或预期的汇率变化而相应调整的。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是与国家通货价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封闭经济的货币政策对相对价格产生的影响比对名义合同产生的影响小,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则直接影响了很多相对价格,尤其是可贸易和不可贸易商品与服务之间的相对价格。与进出口竞争有关的行业,比净名义债务人和债权人更明确地形成集团,贬值和升值对它们的影响也明显大于整体名义价格水平变化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影响。这使我提出如下预期:当影响汇率时,货币政策在政治上更突出;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中会比封闭经济中更具有竞争性。

这一分析的第一个意义在于,经济一体化使货币政策在社会政治上变得更突出。这是通过使货币政策对与界定严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有关的相对价格产生比在封闭经济中更直接的影响而做到的。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的政治趋于围绕着汇率运动的集中分配后果来组织,因此可能会推动集团政治发展出关税等东西。不管怎么说,关税都是真正的贬值替代物。

第二个意义在于,经济国际化改变了围绕着货币政策的政治分化。在封闭经济中,主要的冲突存在于那些名义债务合同各方与更容易受到贷款影响的少数行业之间。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对汇率无法回避的影响,对宏观经济集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②]

各集团的分歧产生于它们各自所期望的通货价值。可贸易商品生产者喜欢通货贬值,以提高他们出口的商品以及与其竞争的外国进口商品的(国内—通货)价格。不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者则喜欢通货

① 准确地说,对冲(汇率调整)利率是被迫相等的。这一观点源自著名的芒德尔-弗莱明分析方式(Mundell 1962, 1963)。这一讨论所蕴含的模式是这样的:资产价格比商品价格调整更快,可贸易商品价格比不可贸易商品价格调整更快。这些特征产生了此处探讨的"过头的"和真实的贬值/升值。虽然在这些和其他现代货币经济学特征之间有争论,这一视角有可能做到兼顾彼此。具体理论阐述可以在任何一本探讨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发现;科登(Corden 1986)对此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评述。

② 关于这些问题更详细的探讨,参见:Frieden (1991 b, 1994 b)。

升值,以提高他们的产品相对于可贸易商品的价格。这是一种与封闭经济中存在的划分不同的划分:可贸易—不可贸易(开放经济)划分与债务人—债权人(封闭经济)划分是明显有别的。

此外,开放经济面对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的选择,而这在封闭经济中则显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那些坚决信奉跨国贸易和支付的国家,会从通货易变性中受损,而更趋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国际经济机会的吸引力越大,那些有可能从中得利的人要求采取固定汇率的动机就越大。在这一情境中,国际贸易和支付的水平越高,希望汇率稳定的已经具有和潜在拥有全球活动的经济行为体就越多。

但是,那些仅在国内市场运作的人,对增加通货价值的可预测性则不那么感兴趣。这包括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大部分生产者,以及以国内为导向的贸易部门的生产者,比如进口竞争者。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为了固定汇率而放弃货币自主性是一个十足的牺牲——以政府放弃影响国内货币状况的能力为代价,一个它们不关心其易变性的价格被固定下来。

因此,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政治分化。封闭经济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包括海外宏观经济集合;其政治典型地划分出名义债务人和债权人。开放经济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包括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价格的关系,以及汇率的可预测性;其政治划分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以及国内取向和国际取向的集团。

商业开放对经济行为体的货币政策看法具有相似的影响。它使更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依赖于国际相对价格变化。这导致更强烈的要求,即采取通货政策来抵消不利的国际价格趋势。

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对汇率变化特别敏感;随着更多的商品变得可贸易,更多的生产者更加关心通货价值。[①] 随着贸易扩张,即使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也更加关心汇率,因为进口在它们投入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了。贸易增长提高了生产者的收益,使汇率朝向有利于它

① 我再一次将商品和服务的可贸易性视为外生的。在本文集的用语中,可贸易部门地方经济份额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国际运输成本、国际支付体系的稳定性或其他国家政策的外生变化。在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中,东道国的贸易政策会使某些商品变得不可贸易。由于这既构成原因也构成后果,我把对不可贸易性的讨论限定于那些一般认为由于技术原因——而非(内生的)政策——而难于进行跨国贸易的商品和服务。

们的方向发展:在封闭经济中,汇率是影响相对价格的软弱工具,但在开放经济中却是很有力的工具。[①]

有必要认真限定所有这些结论。[②] 对于本文来说,我的观点很简单:经济国际化对货币政策的国内政治有两个一般后果。第一,货币政策从通过名义价格水平产生其主要影响,转变为主要影响可贸易和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意味着更为集中和固定的经济利益。这使货币政治在开放经济中比在封闭经济中更具有竞争性。

第二,货币政策分配影响的变化与汇率重要性的增加——它影响了政治的内容——相一致,这影响了政治阵线。冲突随即发生在更高汇率和更低汇率的支持者之间——尤其是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之间。那些对稳定通货感兴趣的人,会反对那些主要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人。因而,沿着不同的汇率水平和汇率稳定程度,产生了政治分化。

从这一分析中,还可以得到第三个结论。当货币政策与通货价值联系在一起时,它与贸易政策具有类似的影响。在功能上,贬值等同于增加贸易保护或出口补贴,而升值则具有与削减贸易壁垒或征收出口税相似的影响。但是,名义价格水平的简单升降对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没有任何系统影响,与贸易政策也没有关系。在开放经济中,贸易保护可以被用来减轻货币扩张(贬值)和收缩(升值)的压力,但在封闭经济中则无法做到。

---

① 不幸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只有很少的经验性研究文献。Akhtar and Harris (1987) 指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耐用行业的产出波动有 2/3 归因于汇率变化,1/3 归因于利率变化;家用建筑行业产出的波动则完全归因于利率变化;也可参见:Ceglowski and Hilton (1987: 403～500)。Branson and Love (1988) 则聚焦于汇率变化的不同后果,Goldberg (1990) 则提出了相似的启发性后果。

② 比如,关于汇率水平的偏好强度有很大不同: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是对其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函数。不论价格提高可能对获利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它都必须扣除更高价格对需求、新竞争者进入的消极影响。

其他特性也很重要。比如,进口产品的密集消费者对贬值充满敌意;这些消费者可能是进口商品的集中工厂用户。海外投资者乐于从增值的通货中获得更大购买力,但是,这一增值也损害了它们海外收入的国内通货价值。

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范畴通常是被忽略的。固定汇率意味着强通货,浮动汇率则意味着弱通货。在这一案例中,出口者将不得不衡量他们对汇率稳定性和弱汇率的期望,并且决定哪一个对他们更重要。

因此,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是潜在互相替代的,但在封闭经济中则非如此。这一事实可能具有重要的后果。与进行整个经济范围的贬值相比,生产者可能更有能力组织起来进行专门产品贸易保护。但是,组织一个广泛的奉行贬值的联盟,可能比组织一个保护主义集团更容易。我没有对其更细致的影响进行考察,而只是简单地观察到:在开放经济中,在贸易和货币政策之间会有很强的联系,而在封闭经济中则没有这样的联系。

一组某种程度上更为深思熟虑的预期,应当可以解释货币政治如何在美国政治框架中找到它们的制度表达方式。[①] 虽然有其地域界定的选举利害关系,国会议员特别容易受具有较大数量成员的特定集团——比如工会或农场主——的影响,这一点是广为接受的。另一方面,拥有全国性选民的行政官员,则尤其关注诸如增长和通货膨胀等整体性经济事务。通常援引的解释是:国会议员没有完全将国家政策的政治利益(或成本)内化,与总统——对全国性后果承担责任(或者信誉)的人——相比,他们为之操心的动机少得多(Lohmann and O'Halloran 1994; 其他论述参见 McCubbins, Noll, and Weingast 1987; Weingast and Moran 1983)。[②]

在封闭的美国经济中,广大选民对国家经济状况的注意力分散,这使行政机构具有最强的动机致力于货币政策。这就使着眼于全国选举事宜的总统,在形成封闭经济的货币政策方面比国会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关心货币政策的集团,比如房屋建筑业和金融部门会聚焦于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等对货币和金融具有特别责任的机构。在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应该首先与行政机构和联邦储备系统有关,我们可以通过像选举周期等整体政治状况对其进行周密分析。

另一方面,开放经济货币政策将阵线分明的生产者拉入政治斗争中。由于大集团——制造行业、农场主——在这一问题上被动员

① 我认为,应该注意到,这一方案对其他国家的制度环境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虽然一般逻辑完全可以适用——那些最有可能对政策后果承担责任的决策者关心它的动机最大,但其含义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异。

② 将现代政治经济学应用于美国政治的新兴重要文献,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假定制度偏好。此处假定的不同意图是说明性的而非严格推理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叙述中看到它在实践中是否如此。

起来,这会导致国会渴望在货币政策的主要位置。来自制造业或农业区域的国会成员,力求影响对其选民至关重要的相对价格政策,以实现其政治收益(或支付成本)。因此,经济开放会导致国会更多地卷入到货币政策中。

这些分析能够承受得起历史的和当代美国(货币政策)纪录的检验。在这一有限的篇幅中,不可能对这一论点进行详细而严密的评价,但是,我确实发现了对这一途径的可行性支持。在下文,我展示了两组这样的证据。第一组数据是对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货币政治起伏波动的概括,它所涵盖的既有经济开放时期也有封闭时期。第二组数据是对1970年以来更为具体的评价,由于我对当代趋势的兴趣更大,我用了一个部分的篇幅来进行这一评价。在第二个分析中,我评价了逐步增长的经济开放在多大程度上与我所预测的后果联系在一起。

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内战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其经济相对开放。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其经济相对封闭。大概从1970年以来,经济变得对商品和资本流动越来越开放。我期望这些变动是与美国货币政策制定有关的政治优先事务、政治分化和国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二、1870～1970年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中的货币政治

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贸易和投资都处于极高水平。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末期之间,美国经济在通货和资本项目上相对封闭。其表现很简单:在内战和20世纪30年代之间,美国经济与世界其他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随后的时期里,美国对国际贸易和支付非常封闭。[1]

---

①　如同上面提到的,我在此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在某种程度上,战后时代国际贸易和支付的逐步复苏是美国政策的结果。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封闭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行为。对于这一分析目的来说,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整体水平被看做是给定的;而一个更丰富的分析应该考虑到,美国政策和制定这一政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表1 1869～1992年美国经济开放性指标

A.商业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a]

时期	年均贸易总值(10亿美元)	年均国民生产总值(10亿美元)	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869～1878	1.1	7.4	15.3%
1879～1888	1.5	11.2	13.6%
1889～1900	1.9	14.4	13.1%
1901～1913	3.3	29.5	11.1%
1920～1929	10.7	88.6	12.0%
1930～1939	5.0	76.5	6.5%
1946～1959	23.9	345.1	6.9%
1960～1969	48.8	683.0	7.1%
1970～1979	205.2	1632.9	12.6%
1980～1992	664.8	4355.6	15.3%

B.跨国投资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b]

年份	(A) 在美国的外国私人资产(10亿美元)	(B) 美国的海外资产(10亿美元)	(C) 国民生产总值(10亿美元)	(D) (A+B)/C 百分比
1869	1.5	0.1	6.6	24.2%
1897	3.4	0.7	14.6	28.1
1914[c]	7.2	3.5	38.6	27.7
1930	8.4	17.2	90.4	28.3%
1950	19.5	19.0	284.8	13.5%
1960	28.9	49.3	506.5	15.4%
1970	80.7	118.8	992.7	20.1%
1980	309.4	516.6	2633.1	31.4%
1992[d]	1380.7	1105.4	6045.8	41.1%

a=总贸易等于商品出口加上商品进口。

b=只包括私人资产(短期的和长期的)。

c=1914年的跨国资产值是6月30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数据。

d=以按通货价值估价的外国直接投资为基础。按市场价值估价会将美国的海外资产增加大概1110亿美元,将外国在美国的资产增加2001亿美元,总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跨国资产和美国银行的债务没有包括在内,它们多是企业内部转移的,可以彼此抵消。这些大概分别是6669亿美元和7007亿美元,总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6%。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224, 565和864～865页;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各年。

表 1 只是提供了一些参照性数据,因为衡量资本和商品市场国际化是很困难的。[①] 但是,贸易流动和投资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份额,对于初步评估来说是一个合理尺度。前者在 1869 年和 1929 年之间急剧下降了 11%～15%,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则降到大约 6%或 7%。后者在第一个时期下降了 24%～28%,在第二个时期则下降了 13%～15%。在这两个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的贸易流动和跨国投资总量,大概是内战到大萧条之间的一半左右。也可以注意到,贸易和投资数据自 1970 年以来一直在增长,大约达到了 1930 年以前的水平。当然,整体数据掩盖了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当我们考虑到美国早期出口集中于初级产品(primary products)时,情形尤其如此:19 世纪 80 年代,大约 1/5 的美国农业产出被用于出口,在 1879 年,美国 30%的小麦和 60%的棉花产量被用于出口。

对这两个时期——一个是普遍开放的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一个是两者都较封闭一些——的货币政治差异来说,上面的分析具有四个意义。

第一,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应该与汇率有密切关系,意味着限定明确的利益集团,并获得政治突出地位。与之相反,在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会更关注广泛的宏观经济整体,明确的分配性分化是少见的。

第二,当世界贸易和投资规模很大以及经济是开放的时候,政治分化与封闭经济时期有很大不同。在开放经济中,笔者认为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会特别渴望弱(贬值的)通货,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则青睐强(升值的)通货;国际导向的经济行为者会主要关心保证通货稳定性,国内导向的行为者则漠不关心或反对这一做法。在封闭经济中,政治差异显然在净债务人和净债权人之间比较明显。

第三,在开放经济中,货币和贸易政治之间显然存在很强的联系,但在封闭经济中则非如此。

① 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体化水平和商品、资本流动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学者们一直试图在美国资本市场和大西洋另一边的资本市场——尤其是伦敦的——之间寻找联系。例如,Neal (1985) 和 Officer (1986)的研究集中于利率在伦敦和纽约的同步变化,从而发现这两个市场是非常紧密联系的。其他研究指出,在 1980 年以前,美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并不突出,在这之后它们变得越来越一体化了。Feldstein and Horioka (1980) 介绍了战后时期相对较低水平的国际资本流动;Frankel (1991)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1979 年以来,美国金融一体化显著提高了。

第四,在开放的美国经济中,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国会具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它指代了具有选举重要性、阵线分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封闭经济的货币政策对国会利益的影响小得多。不幸的是,很难有什么简单的尺度来评价这些争论。在下文中,笔者简要地展示了一些历史纪录来显示那些不支持这些预期的证据。应该指出,这一历史描述并没有包含什么特别新奇的或争议性的东西;其创新之处只是在于,笔者试图以一种更广泛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它。

1865 年和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之间的货币政治一直很突出,但是在下面三个时期出现了特别激烈的爆发点:美钞民粹主义(Greenback populism)(1865～1879 年),银本位民粹主义(1888～1896 年)和价格稳定性(1920～1935 年)。[①] 第一个情境来源于这一事实,1862 年中期,战时通货膨胀的美元脱离了金本位(准确的历史描述参见:Unger 1964)。内战后,"硬货币"的呼声要求回到战前比价的金本位,这意味着实质上的升值。其主要支持者是国际金融和商业共同体。华尔街积极促动美国债券在欧洲上市,而这一买卖依赖于美元的可信度。美国的国际银行家和交易者相信——可能他们是正确的,除非美国实行金本位,否则他们的国际商业会遭受损失。回到金本位的努力确实导致了一次重要的实际升值:如同表 2 所显示的,可贸易价格比不可贸易价格更迅速地降低了。

表 2　1869～1894 年相对价格指数(1869 = 100，1879 = 100)

产　　品	1869	1879/1879	1894
贸易商品			
农业	100	68/100	81
制造业	100	66/100	66
矿业	100	56/100	75
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			
建筑业	100	75/100	116

资料来源:数据出自 Robert Gallman,"Commodity Output, 1839～1899", in Trad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2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3～43.加尔曼的变量 A 用来指建筑业。

① 应该强调,对于下文所提及的东西,历史学家们没有什么争议。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每个学者都知道谁支持和反对金本位、银本位及其相关政策建议。笔者的表述和大部分其他分析不同的是所用的途径,笔者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来解释这些政治差异。但是,这些事实的大致轮廓在任何可看到的争论中则非如此。

“软货币”的支持者希望保有战时发行的、现在已经贬值的纸通货(美钞)。最强烈的早期美钞支持者是钢铁制造者,他们将贬值的美元视为对关税的补偿。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铁路行业和联合起来的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们,他们开始赞誉浮动通货所允许的再度通货膨胀政策。

1873 年以后,国际价格变化将两个更为重要的集团拉入美钞阵营。在那一年,白银和很多农业产品的价格都开始迅速下降。随着欧洲国家实行单一本位制的金本位标准和开始出售他们的银储备,以及新发现了丰富的银矿,白银的价格降低了。由于运输价格的下降,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南美大草原(the pampas)和其他农业区域的开放成为可能,谷物价格也大幅度降低了。

意识到贬值的通货意味着他们的庄稼拥有更高的美元价格,农场主倒向了美钞运动。银矿工人也随着银价的跌落而加入进来。白银的联系是复杂的。经过 19 世纪 70 年代的发展之后,美钞运动调整了它的立场,要求按白银对黄金 16:1 的比率来实现自由的银本位币制。这将使国家脱离金本位而实行贬值的银本位标准。除了对银生产者的直接补助之外(政府被迫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来购买白银),其经济影响与贬值的纸通货的影响基本相似。从美钞到银本位转移,其战术后果就是保证支持银矿工人,它在人口稀少的洛基山以西地区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且因此控制了很多参议院席位。

国会赞成美钞和银本位的想法,只是在 1875 年 1 月,由于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的操纵和国会的无能,曾经回到过金本位。当时所通过的《恢复法案》(The Resumption Act)后来被国会再度推翻,但并没有获得推翻总统决定所需的 2/3 多数票。1879 年 1 月 1 日,美国再次回到金本位制。

随着世界农业价格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跌落,反对金本位的呼声再度增强,并随着 1888 年开始的农业萧条(见表 2)而加速。农场主彻底意识到,在银本位旗帜下的通货膨胀和贬值能够提高农业价格。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银矿工人继续支持银本位币制。民粹主义者因此呼吁实行纸币—银本位标准,要求用浮动的、贬值的美元取代金本位(Hicks 1931,这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东北部的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仍然处在硬货币阵营的核心位置。如果说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银行家的立场变得更强硬了。不

仅国际贸易和投资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急剧增长，华尔街现在也渴望成为一个国际金融领导中心。对于它来说，对金本位的坚决承诺是一个先决条件。由于三个原因，制造业也不像在 19 世纪 70 年代那样极力支持软货币了。第一，制成品降价得到了生产力提高的更多补偿，因此很少有制造业者由于实际升值而感觉到不利。第二，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一些美国行业已经成为国际导向的：制造业出口扩展了，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增长（Lake 1988：91～118，它介绍了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第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进口竞争制造者已经有能力获得高关税。贸易保护实现了银本位能够和已经（不像银本位那样）获得的目标。

经过了近十年的鼓动之后，这一问题在 1896 年总统选举中成为一个重头戏，那场选举主要是围绕着金本位展开争夺的。民主党人（Democrats）和人民党人（Populists）联合推出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布莱恩反对他大力抨击为使国家饱受折磨的“金本位十字架”。共和党人（Publicans）的回应是，组成了一个硬货币—高关税的联盟。总统竞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具有完美的保护主义纪录，他曾筹划了 1890 年的关税；尽管曾经长期支持银本位，他在 1896 年转向了金本位。硬货币国际贸易、金融利益集团和高关税制造业的麦金莱联盟，最终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布莱恩的农矿业主联盟。

第三个情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就开始了，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结束。[①] 尽管战争打断了国际贸易和金融，它们在 1922 年之后迅速地恢复了。但是，农业价格在战后急剧下跌并一直处于萧条中；在 1919 年和 1928 年之间，农业价格比建筑原料——一个典型的不可贸易部门——价格下降了两倍（见表 3）。国际导向企业认为，通货稳定的重要性不可动摇，而农场主则关心促成一次贬值。农场主和很多制造业者实际上要求保障“价格稳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改变战后的价格趋势。他们谴责道，当联邦储备局对金本位做出新的承诺时，很多可贸易部门价格却出现相对衰落。像以前一样，对金本位的支持

① 笔者忽略了 1907～1913 年间对建立联邦储备的争论。这些争论集中于具有采取最后手段和国际谈判功能的中央银行领导人，对此可参阅：Broz（1993）。这一争论与货币政策相关，但与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争论没有什么显著区别。因此出于简化的目的，笔者省略了对它们的介绍。关于这一阶段情况的突出的介绍是：D'Arista（1971）；其他文献包括：Kettel（1986：18～44）和 Wooley（1984：30～47）。

来自国际金融、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对于“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集团的核心来说,美元的全球地位是重要的。很多制造者再一次对此漠不关心,因为它们受到高关税的保护,免受进口竞争的影响。

表 3　1919～1933 年代表性的相对价格指数(1919 = 100,1928 = 100)

产品分类	1869	1879/ 1879	1894
贸易商品			
农产品	100	67/ 100	51
金属产品	100	75/ 100	83
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			
建筑原料	100	82/ 100	82

资料来源: 以上数据来自 George Warren and Frank Pearson, Gold and Pric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35), pp.30～32。

这些争论涉及到货币政策的内容和联储结构。硬货币的支持者希望让货币政策留在纽约联邦储备局(the New York Fed)手中。弱货币的拥护者希望由华盛顿的专门委员会(Board)做出决策,并希望由国会来控制这一委员会。有数十个议案被提出来,以促成更多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贬值和国会控制联邦储备局。但所有这些议案都被行政当局和参议院——由参议院银行与商业委员会(the Senate Banking and Commerce Committee)代表的金融保守主义卡特尔把持——所阻挠。

在大萧条期间,围绕着货币政策产生的冲突增多了。[①] 在早期

①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献显然是为数众多的。到大萧条的第一阶段的分析包括: Barber (1985), Batchelder and Glasner (1992), D'Arista (1971: 117～31), Frankel (1990: 88～91,100～5,133～4), 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299～419), Kettel (1986: 29～44) 和 Wigmore (1985)。

关于通货膨胀和贬值的大部分看法,与乔治·沃伦(George Warren)——一个信奉贬值会提高商品价格的康奈尔经济学家——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就像那些贬低他的人称呼的那样,“橡皮美元(Rubber-dollar)沃伦”得到了一些不足称道的负面评价。如同艾肯格林(1992: 340～1)所指出的,在沃伦的机制中有两个滑动源头——在金价格和汇率之间,以及汇率与商品价格之间,因此其关系并非无懈可击的。不仅如此,贬值事实上有利于提高商品(更一般地说是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在某些方面,沃伦的思想更接近于现代实际汇率分析,而非他更为保守的同时代人的思想。关于其观点特点的介绍,参见: Warren and Pearson (1935)。

萧条期间,价格趋势的最大受害者是贸易产品的生产者,尤其是农场主(见表3)。1929年到1933年间,按名义价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6%,耐用商品产量下降了67%,农业产品的产出则下降了53%,服务产出下降了28%。同时,国内和国际需求使得联邦储备局疲于应付。捍卫美元加速了国内经济衰落,激发了国内的抗议。①

国会一再试图强制进行通货膨胀和贬值,但是共和党控制下的白宫和参议院阻止了这些尝试(Batchelder and Glasner 1992; Crawford 1940: 14ff; Crawford and Glasner 1992)。随着萧条的延长和世界经济的螺旋下降,尤其是在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之后,对贬值的赞同有所增加。即使很多持金本位正统观念的典型人物,也开始考虑短期内实行更宽松货币的必要性。② 此外,在1932年大选中,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并获得了总统职位。1933年4月,罗斯福政府将美元与金本位脱钩,将美元对英镑的比率从1933年4月的水平贬值44%。③

在30年代中期之后的30多年里,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对较弱,美国对世界贸易和支付非常封闭。这一时期的货币政治非常低落。特别是与1935年之前的那10年里不断升温的争论相比,更是如此。汇率几乎没有成为什么政治问题,对货币政策也没有什么政治争论。有一些证据表明,广泛的全国性(尤其是总统)选举对货币政策还是产生了影响。尽管这是一个受到激烈争论的话题,很多研究者还是相信像全国选举等因素影响了货币政策(Alesina and Sachs 1988;

---

① 有少数政治经济学文献涉猎于此,它们倾向于认为联邦储备政策是对其成员银行——而非宏观经济——需要的反应。参见:Anderson, Shughart, and Tollison (1988) and Epstein and Ferguson (1984)。

② 1933年3月,清算协会(the Clearing Housing Association)主席和汉诺威中央信托银行(Central Hanover Bank and Trust)董事长承认,金本位标准已无法维持:"今天的数据表明,我们已经偏离了金本位,不管这一事实是否被合法地记载了"(Wigmore 1987: 748)。这次危机结束之后,银行家渴望稳定——由于1936年的三方协议,他们也得到了稳定。这时发生了一次有趣的小插曲——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卷入其中(Steel 1980: 302～9)。在摩根(Morgan)的两位领导伙伴的说服下,利普曼写作了一篇专栏文章,论述放弃金本位的必要。该专栏文章在1933年4月18日发表,被罗斯福多次引用来论证其决策。

③ 特明和威格莫尔(Temin and Wigmore 1990)实际上认为,贬值是支持"新政"恢复的关键性政策变化。

Beck 1991, Grier 1987)。

虽然很难想象关于这一现象的客观尺度是什么,也很少有观察者会怀疑这一判断——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后期的货币政策,在政治上远远没有此前的 70 年那么显著。这一时期,也不存在国家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明显联系。

除了货币政策在政治上的突出性有所下降之外,货币政策决策的场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30 年之后,货币和汇率政策不断地脱离国会控制,而分别转向联邦储备局和财政部。

“新政”(the New Deal)时期开始出现国会在货币政策上的相对消极局面(Crawford 1940; Green 1981)。1933 和 1935 年的《银行法》重组联邦储备局,提高了华盛顿委员会的权威、扩大了行政当局对委员会的影响。1934 年的《金储备法案》赋予财政部部长汇率控制权。[①] 这一货币政策的再分配和分工,由 1951 年的财政部协议(the 1951 Treasury Accord)而得到深化。这一法案授予联邦储备局可以不管财政部的借贷成本,来保证货币政策的正式权威(Eichengreen 1985: 66～81; 关于背景介绍,参见: Kettel and Garber 1991)。1961 年,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同意联邦储备局使用自己的基金在通货市场运作。这使通货政策进一步偏离了立法领域。[②]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早期,美国货币与汇率政策逐渐变得相对不受国会监控。这种状况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并得以持续,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所代表的事实说明了国会没有影响政策(McCubbins, Noll, and Weingast 1987)。但是,1930 年以后,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和以什么方式,国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显著削弱了。[③]

---

① 托德(Todd 1992)提供了有趣的论述,而赛拉(Sylla 1988)则提供了更为超然的考察。

② 奥尔巴克(Auerbach 1990)事实上认为,这一安排明显是被设计出来回避国会对汇率政策的影响。关于这一普遍接受的法律情势的概述,参见: Destler and Henning (1989: 86～8)。

③ 学习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学生,可能会在国会的贸易授权行动和“新政”的货币政策之间发现很强的并行联系。实际上,最初探讨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贸易政策对等物——《互惠贸易协定法案》(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在《金储备法案》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就通过了(Haggard 1988)。

这一概述将证实笔者的预期。当国际经济活动对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美国经济也很开放时,货币政策与汇率问题(金本位)联系紧密,使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与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国际导向部门与国内导向部门彼此竞争,这是国会关注的焦点,也与贸易政策联系在一起。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美国经济相对封闭,其货币政策政治就很不同。宏观经济状况和汇率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对金本位堡垒的攻击。主要利益集团对这一问题也不关心,没有再出现 19 世纪 90 年代或 20 世纪 20 年代的激烈政治。国会很少注意货币领域,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各自的轨道上分别发展。笔者相信,国际经济活动的小规模和同期美国经济的相对封闭可以解释这一趋势。

如果笔者的论点是正确的,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改变了货币政策政治。现在笔者将转向对这一预期的评价。

三、1969 年至今日益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治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贸易和支付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由于这一发展,美国与世界经济融入到一起。表 1 的数据指出,贸易和投资流动自 1970 年以来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这些尺度现在说明,美国经济至少像 19 世纪后期一样开放。

以上论点说明,这些变化应该产生于 1935 年以前所看到的类似货币政策格局。更多的美国人对国际经济活动感兴趣,因此也关注货币的稳定性;更多的美国人受到不利国际价格趋势的影响,因而更会提出贬值的要求。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和汇率之间的联系会不断增长;利益集团对这一话题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国会在这一问题上也具有更多的利益;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捆绑在一起。笔者将在这一部分提出,该发展方向意义众多。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国际化稳步增长的事实意味着,笔者至多期望变化增多,却还是难以提供关于这一后果的系统支持。但是,笔者相信这样的趋势明显可见。它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途径进行的运作是看得见的,1969～1973 年间的美元脱离金本位,70 年代后期的美元贬值,以及 80 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美元升值皆是如此。笔者并没有宣称以下考察支持了

我的论点,但它表明,货币政策政治的类似变化在进行之中。

1969～1973 年的贬值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发展之后,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通货的比率实际上升值了。[1] 这对美国的进口竞争者产生了最大的影响:1967 到 1970 年间,不可贸易部门价格的增长速度比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快两倍,对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产生了很大压力(见表 4)。[2] 1967 和 1971 年间,就实际单位而言,商品出口提高了 24%,而商品进口则提高 47%,耐用商品进口提高了 55%。在战后时期主要是顺差的汽车贸易,1968 年转为逆差,到 1971 年大概造成了 29 亿美元的赤字;商品总贸易在 1971 年转为赤字(参见各个时期的《总统经济报告》)。

表 4 1967～1973 年代表性的相对价格指数(1967 = 100,1970 = 100)

产品分类	1967	1970/ 1970	1973
贸易商品			
工业商品	100	110/ 100	115
制成品	100	110/ 100	116
汽车	100	109/ 100	109
农产品	100	111/ 100	143
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			
社会保障	100	124/ 100	114
所有服务	100	122/ 100	114
公共交通	100	129/ 100	112
医院护理服务	100	124/ 100	116

资料来源:各个时期的《总统经济报告》。来自讨论中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指数。

① 关于这一事态的经典描述有:Calleo (1982: 62～117), Eckes (1975: 237～71), Gowa (1983), Odell (1982),和 Solomon(1977: 176～234)。

② 可贸易—不可贸易关系很模糊,实际汇率的衡量尺度则是混合的:大部分估计显示,在这一时期,美元实际升值了 3%或 4%。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贸易比重,尤其是加拿大在美国贸易中的压倒性地位。这一问题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现在足以指出,对贸易部门的生产者而言,分散的价格趋势意味着显著压力。

由于进口激增,很多美国工厂都关注它们所面临着的价格压力。一些人认为货币政策太紧了,美国贸易伙伴——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通货定价太低。但是,大多私有部门的注意力集中在贸易政策上。诸如纺织业、制鞋和炼钢等受到影响的部门的制造者,嚷着要求进口保护。劳联—产联(AFL-CIO)从普遍支持贸易自由化转向要求贸易保护,保护主义的政治行动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巅峰。

美国国际导向的银行和公司普遍支持稳定汇率,但是,存在两个复杂的现实。第一,捍卫美元几乎就肯定意味着维持资本管制,这是国际企业所反对的。[①] 第二,实际升值被保护主义呼声所夸大,这令具有重要海外业务的企业感到烦恼。全球企业(global firm)有反对保护主义活动增长的充足理由,实际上,六十多个美国最大公司组成了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American Trade)进行游说,反对贸易保护。[②]

随着美元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很多自由贸易者开始将美元贬值看做是两个灾难中较小的一个:贬值的美元总比贸易保护或资本管制或这两者都好。正如彼得·皮特森(Peter Peterson)——一位华尔街的常客,第一届尼克松政府的商业部长——在两年后所评价的那样:"这是我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对美元采取非常有力的行动,就肯定会走向保护主义之路"(Peterson 1973: 40)。

选举周期也产生了影响。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看来,他1960年总统竞选的失利主要是因为紧缩货币政策,他希望避免这一情形的再次出现。在1970年和1971年的困难局势中,他关心的是保证在1972年总统选举之前使经济复苏。尼克松可能已经开始将固定汇率体系——以及体系中美元的定值——视为其选举抱负的障碍。就这次重要竞选的准备而言,对金本位承诺看来限制了经济政策自主权(Gowa 1983; Wooley 1984: 154～80; 1950)。

由于美元实际升值了,出现了一些要求更宽松的货币、在汇率上

---

① 阿伦森(Aronson 1977: 137～50)分析了这些发展。关于资本管制和固定率之间的权衡,参见:Maxfield 1992。应当指出,那些可能的选择内在地排除了国内宏观经济调控——它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紧缩经济,普遍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② 美国贸易应急委员会成员拥有的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42%,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44%。关于这些集团一般地位的介绍,参见:Destler and Odell (1987)和 Milner (1988)。

采取行动的立法压力。1971 年 6 月,国际汇率和支付国会小组委员会(Congressional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Payments)的亨利·罗伊斯(Henry Reuss)向国会建议美元浮动。8 月 6 日,该小组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要求实行贬值,它可能帮助将政府最后推向了 8 月 15 日的贬值之举。

尽管国会看来想要更加宽松的货币和贬值,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货币政治中显然不像在 1935 年之前那样积极。国会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最重要地位,已经开始威胁保护主义立法。1970 年,众院税收立法委员会(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投票罢免保护主义的“米尔斯法案”(Mills Bill),但是这一决议没有在参议院通过。1971 年,国会的活动集中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法案(the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ct),即著名的伯克—哈特基法案(Burke-Hartke bill)。这代表了自大萧条以来对美国自由贸易政策最严厉的挑战。尽管伯克—哈特基法案没有通过,围绕它展开的斗争揭示了保护主义情绪的深度和广度。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人们目睹了国会货币行动主义的全面增长。1975 年,亨利·罗伊斯成为众议院银行委员会(the House Banking Committee)主席,此后便着手降低联邦储备系统的重要性。1975 年 3 月,国会通过了 133 号参众两院一致决议(the House Concurrent Resolution 133),要求联邦储备系统向国会做更多的汇报;1977 年 11 月,联邦储备法(the Federal Reserve Act)就此修正。这一切反映了自 30 年代中期以来国会参与货币政策中的层次提高。[①]

尼克松政府最终让美元贬值,化解了大部分保护主义压力,取消了资本管制。经历过 1970 年的事态后,政府持一种越来越强硬的反对进口竞争——尤其是来自日本和德国的——的进攻性立场。1971 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总统使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作为包括国内工资和价格控制以及 10% 进口附加税的一揽子方案的一部分。1971 年 12 月,主要货币大国就汇率修订进行了谈判,包括决定美元贬值

① 国会的意图在于获得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多的联邦储备系统回应,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支持者能够将这一要求变为相对松宽的立法。关于这一情境以及相关的发展,参见: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78), Kettl (1986: 140～66),和 Wooley (1984: 144～53)。

8%。1973年2月,尼克松进一步将美元贬值10%,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如同表4所表明的,美元贬值扭转了对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不利的相对价格趋势:可贸易部门价格在1970到1973年间几乎以不可贸易部门同样的速度增长了。

此处解释的局势与极开放和极封闭之间的经济环境——处在本人观点的核心——相一致。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很多争论都关乎美元的价值及其稳定,多数利益集团的构成就像预期的一样;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其他问题。与美元相比,进口竞争制造者更加关心的是贸易政策;国际性集团则强调反对保护,促使取消资本管制。与过去30年相比,国会在货币政策上更为积极,它将主要精力都放在贸易政策上。方方面面的选举考虑对政策结果很重要。总的说来,这一案例或许出现在两种情况——即1935到1970年间普遍不考虑汇率和1935年之前对汇率强烈而明显的关注——之间的某处。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实质上比此前时期降低了,或者说开始降低。

1977～1979年的美元贬值与防御

在美国企业越来越易受到进口竞争的时候,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成为总统。鉴于劳工运动在70年代对民主党的影响以及有组织的劳工集中于进口竞争企业中,毫不奇怪卡特政府关注美元贬值。在这一情境中,在国内货币状况和美元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鉴于美元贬值满足了那些在国会最具代表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者,国会几乎没有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行动的需要。货币政策所要承受的政治压力,主要来自国际导向的企业担心政府降低美元汇率的意愿。

下车伊始,卡特政府就采取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政策为两个互相联系的目标所驱动:第一,刺激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同时扩张("火车头"途径),第二,鼓励马克和日元对美元升值。在第一方面,政府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促使"三边"经济协调性的通货膨胀。在第二方面,政府进行了贬值,既为了帮助美国可贸易部门生产者,也为了更普遍地刺激经济。

在卡特执政的第一年,尼克松任命的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仍然担任联邦储备局主席,但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

(Michael Blumenthal)在表达政府看法上更为直言不讳。其结果就是美元在选举和1977年8月之间按实际价格贬值4%。[①] 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美国政府被认为是在引导美元贬值——也被打上"恶意的忽视"或"张口索价操作"的标签。[②]

1977年10月,美元开始迅速下跌。1978年,美元对马克和日元进一步贬值10%。这次贬值并没有因为1977年2月任命G.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接任伯恩斯而减弱,实际上,对米勒的任命导致马克和瑞士法郎在一天之内对美元升值2%。

美元贬值与国会的期待是一致的。在(福特政府的后期,亨利·罗伊斯要求美元对日元进一步贬值,卡特班子实际上实现了这一点。但是,美元滑落成为国际导向的美国企业关心世界金融市场的原因。金融界的代表尤其反对弱美元;纽约联邦储备局主席也发表了警告性的评价,尽管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看来对联邦储备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美元贬值似乎得到了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支持,尤其是当通货在1978年夏天稳定下来时。

表5　1976～1985年代表性的相对价格指数(1976 = 100, 1980 = 100)

产品分类	1976	1980/1870	1985
贸易商品			
工业商品	100	152/100	118
制成品	100	145/100	
汽车[a]	100	135/100	128
农产品	100	130/100	91

① 这一部分和下一部分的所有实际有效汇率数据,皆来自阿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统计的一组数据,他向我慷慨地提供了这些数据。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汇率统计数据,略微有些混乱,尤其是美元对不同通货的兑换变化不同——对加拿大元升值,对其他主要通货则贬值。考虑到加拿大在美国贸易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在有效汇率的计算中,低估了美元的贬值。对这一点来说,我既指有效汇率趋势也指美元对马克和日元的变化。对于月份趋势,我使用了实际有效汇率;由于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短期造成了一些差异。当然,就长期而言,它们还是有所不同的。

② 这一时期的文献有:Cohen and Meltzer(1982:15～64),Destler and Mitsuyu(1982),Golub(1986),和Kettel(1986:167～79)。关于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外交,参见:Putnam and Bayne(1984:67～136)。

续表

产品分类	1976	1980/ 1870	1985
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			
社会保障	100	156/ 100	136
所有服务	100	149/ 100	141
公共交通	100	145/ 100	160
医院护理服务	100	145/ 100	151

[a] 80 年代的汽车价格趋势被进口“自愿”限制原则所扭曲。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贸易障碍,汽车价格会上升得更缓慢。

资料来源:各个时期的《总统经济报告》。来自讨论中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指数。

最后,美元再次下降。新的反通货膨胀一揽子方案并没有减缓这一贬值。现在,政府受到了来自国际商业界以及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强大压力,要求支持美元。11 月 1 日,卡特宣布美元防御一揽子政策,包括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用 300 亿美元在外汇市场刺激通货。但是只收到了一般成效。1979 年,卡特用保罗·沃尔克替换了米勒,前者早就宣布要实行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对美元的进攻性防御。

这一情境不那么容易分析,因为卡特政府的货币、汇率政策政治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考察。但是,还是有一些关于它们的宽泛趋势存在。从表 5 可以看到 70 年代末的价格趋势。由于美元贬值,可贸易部门生产者成绩相对较好。可贸易部门价格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和不可贸易部门价格同步上升。某些可贸易部门——尤其是汽车和农业——面临困难,并且实际上在 80 年代嚷着要求支持并且也得到了。但是,在 1976 年和 1980 年之间,可贸易部门相对价格的变化是非常有利的。据计算,美元在 1977 年和 1980 年的第二季度贬值 12%,因此美国进口价格比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紧缩上升了 8%。① 这一进口相对价格的上升,对可贸

① 圣路易斯的联邦储备银行,1986 年。下面提供了统计差异的例子,1976 年到 1980 年间的实际有效贬值范围从 13%(各个时期的《总统经济报告》)到 2%(各个时期的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中间还有 7%(126 页注释①提到的梅尔策统计数据)、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批发价格指数基础上提供不同版本的数据)以及 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数据)。在某种意义上,表 4 提供的可贸易—不可贸易数据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显示了美国生产者在美国市场所展示的相对价格趋势。

易部门生产者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制造加工扩大了。事实上，1979年出现了美国工业就业的最高值。

在此情境中，国会的弱货币利益集团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由于政府进行了美元贬值——特别是对日元，可贸易部门生产者面对着有利形势。贸易政策争论有所缓和，尽管一些部门（尤其是钢铁）继续游说，要求采取保护。对政府政策的主要政治压力来自不满或反对通货不确定的美国国际银行和公司。由于国际通货市场对美元的攻击和欧洲、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支持美元，这些压力得到了加强。

有一段时间，政府奉行了弱货币利益集团所渴望的政策，卡特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传统模式。但是，利益集团联盟的发展与我的预期吻合。可贸易部门生产者满足于美元贬值，而国际导向的企业——尤其是国际金融企业——则抗议美元贬值。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得到了它们所想要得到的，这解释了它们何以相对沉默。硬货币利益集团虽然游说联邦储备系统和政府，但在1979年之前它们一直不成功。与此同时，大众对通货膨胀的关心增长了，这或许也有助于政府的政策变化。

1981～1985年的美元升值

美元从1980年末到1985年中期一直在升值。这一升值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保罗·沃克尔在1979年7月被任命为主席之后，联邦储备局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早期。第二个原因是，里根政府实行税收削减和军事开支增加，造成联邦预算赤字。这两个政策都趋于提高美国的利率，将基金引向美元，提高了美国通货的价格。尽管根据它们如何计算，而数据有所不同，有一组数据显示，美元在1981年1月里根就任和1985年3月的美元峰值之间实际升值64%，此后到1985年9月主要金融大国同意合作尝试降低美元价格时，美元贬值12%。[①]

① 数据来自梅尔策的统计数据（在126页注释①介绍过）。联邦储备数据说明，在1980到1985中间有64%的名义有效升值，56%的实际有效升值；参见联邦储备系统不同时期的文件。对同一时期，Morgan Guaranty的数据表明，有40%的名义升值和36%的实际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为基础，指出有38%的实际升值，而那些以相对批发价格为基础的数据则指出有36%的实际升值。

美国的相对价格变化反映了美元升值,因为可贸易部门价格相对于不可贸易部门价格下降了(见表5)。制成品价格指数在1980～1985年间上升了19%,而所有服务的价格甚至上升了两倍还多,达到了41%。当然,某些特殊商品和特殊服务的变化有所不同。加上进口配额之后,汽车价格比其他可贸易商品上升得更快,农业价格实际上下降了8%;公共交通和医院护理价格甚至比不可贸易价格上升得更快。

由于美元升值,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者遭受到强烈的价格压力。有数据显示,在1980年第二季度和1985年第一季度之间,美国进口价格相对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紧缩下降了29%(圣路易斯的联邦储备银行,1986:1)。其结果就是,制成品进口从占制成品产出的20%上升到32%,而制成品出口从占产出的26%降低到18%;制成品贸易从占1980年产出的6%的顺差变成1985年14%的逆差。在这些年里,美国贸易赤字从120亿美元增长到(按1982年美元价格计算的)1360亿美元。外国竞争导致了可贸易部门就业从1980年到1985年8月降低了5%,同期不可贸易部门就业却增长了13%(Frankel 1985: 31)。

我的很多分析预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美国货币、汇率政策在市场和政治上都联系在一起。利益集团对美元的积极性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涨,并且通过国会对汇率的主要动议权找到宣泄口。贸易政策几乎迅速地被卷入到货币和汇率的争论中来。[①]

随着美元升值,美国可贸易部门生产者要求摆脱其产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不仅美国商品在第三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而且它们在国内也失去了主要市场份额。卡特皮勒拖拉机厂(Caterpillar Tractors)董事长李·摩根(Lee Morgan)从1982年后期开始领导对强美元的攻击。将强美元称为"美国惟一最重要的贸易问题"(Destler and Henning 1989: 33)。摩根动员现有的美国工厂降低通货价值。对弱美元的狂热随着通货升值而增长:1983年年中,商业圆桌(the Busi-

① 关于这一情境的杰出作品是:Destler and Henning (1989),它对1980～1985年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历史和专业的分析。除了个别例外,此处的分析与他们一致。Frankel (1994) 和 Funabashi (1988: 65～8) 也是值得参考的。

ness Roundtable)支持摩根,制造者国家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在1984年2月也跟着要求贬值。到1985年,甚至那些先前支持政府的人也开始在立场上变得有敌意或中立了(ibid: 35～7)。

国会深深地卷入到这一进程的每一步。实际上,国会在货币政策上的行动主义在80年代早期达到巅峰。1979和1985年间,每年平均有65件关于货币政策的法规、决议和提案在国会被提出;美元贬值后,1986和1989年间,这一数字降低到每年10件(Akhtar and Howe 1991: A-22)。或许最具震撼力的事例是,关于1983年政府增加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的法令——这只是一个得到了所有成员国同意的形式程序而已——的国会辩论。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法采取了对政府的国际货币政策进行公民投票的做法,它几乎导致了这一法令在美国的失败。

不久之后,伊利诺斯州——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州和卡特皮勒的大本营——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提出一个决议,要求政府讨论美元价值的对等贬值;这一决议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里根政府对此没有回应。1985年5月,参议院通过了另一个决议,要求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单边的外汇市场干预——来使美元贬值。到1985年底,国会共提出7个法案,包括对汇率问题的特别法律(Destler and Henning 1989: 107～10)。

由于明显没能力去影响汇率政策,可贸易部门生产者灰心丧气,并迅速将其注意力转向贸易政策。这两者的联系可以被明显地观察到,也得到了广泛的评论。如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所评论的:"如果价值过高的美元具有与25～50%的(对外)关税相似后果的话。没有一个贸易协定——不管是怎样合理的,没有一个贸易法——不管是如何强制的,能够给美国一个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机会。"(Destler and Henning 1989: 104)。

尽管美元贬值能够产生想要的后果,但是,似乎任何私人的和国会的压力都不足以使保罗·沃尔克放松联邦储备政策,或者使里根政

府提高税收降低支出,或者使货币权威干预来降低美元价值。[①] 但是,国会能够更直接地影响货币政策,进口竞争制造者们也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一方面。国会疾风暴雨般提出了一系列贸易法案,从而掀起了一股由民主党人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在参议院、丹·罗斯滕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和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在众议院发动的保护主义立法高潮。受到影响的制造者也通过行政途径、从重要的进口竞争中获得救济。他们向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提出了数量空前的控诉:例如,反倾销案例从 1977～1981 年间的年均 24 例,发展到 1982～1984 年间的年均 61 例(Deardorff and Stern 1987: 26, 33)。

国际导向的部门受到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增长的威胁。很大部分的美国经济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几年里,美国国际银行和公司并不关心强美元,甚至可能感激它对商业带来的影响(Destler and Henning 1989: 131～6)。但是对美元贬值的支持(或漠不关心)由于这一现实而缓和:它正在点燃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

在国际商业公司看来,调和美元升值的最好途径是减少财政赤字。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外汇市场干预,唤起了卡特风格的贬值幽灵。另一方面,预算赤字对全球商业并不有利,实际上更接近于意味着将来放松货币。增加税收和降低支出,比将来冒通货膨胀风险更好。在彼得·皮特森领导下,主要的国际导向公司的领导人在 1983 年初开始游说,要求削减预算赤字。这一"两党请愿书"(Bipartisan Appeal)由 5 位前财政部长和全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多国公司的代表一道签署。[②] 进口竞争行业显然没有什么代表参与。尽管这一努力并没有获得突出成就,它可能还是明显有助于议会和行政控制赤字的尝试。

不过,当寻求政策保护美国可贸易部门生产者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时,美元在整个 1984 年和 1985 年初都保持了强劲势头。在

---

① 我并非想澄清这些政策尺度的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会事实上导向贬值。不管经济学家怎样判断这一事态,可贸易部门生产者相信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干预会分别对美元价格产生肯定的、可能的可想象的影响。

② 带有原始发起人名单的请愿书原件刊登在 1983 年 1 月 25 日的全国报刊上。

一次主要的价格动荡中,政府在 1985 年早期开始暗示它认为美元“太强硬”。五国集团(the Group of Five)在 1985 年做出了一些温和声明,用来暗示对美元贬值的期望和共识。不管是否出于对这些政策变化或经济基础的反应,美国通货在 1985 年 3 月开始贬值。到 8 月,已经降低了近 10%,但在随后的夏天再度升值。最后,1985 年 9 月,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旅店(Plaza Hotel)聚会,宣布他们将进行协作干预,以降低美元的价值。在随后的 12 个月里,美元贬值超过 20%,到 1987 年末,美元已经回落到 1980 年的水平。

这一时期很多变化与笔者的分析预期相吻合。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之间的联系,在所有卷入到这场争论中的事态中都得到反映,其主题则尤其明显。利益集团和国会行动在货币和汇率问题上变得比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重要。它们与贸易政策之间也发生了明显的联系。

在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引人注意的升值和贬值之后,美元变化就不再那么激烈了。1987 年以来,美国通货相对稳定,也相对较弱。从 1987 年到 1993 年,美元与贸易比重指数相比降低了 3.8%(按实际标准则只降低了 1.1%)。与美国主要的进口竞争对象相比,通货实际下降更多:对日元降低了 23.2%,对德国马克降低了 8%(不同时期的《总统经济报告》)。似乎美元的一般弱势使可贸易部门生产者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基本稳定也没有给那些关心通货易变者担心的理由。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在 1987 年之后,美国对汇率的政治关注明显下降。

认为这时的美国货币政治看上去很像它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那种状态,这是夸张之辞。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的货币政策发展,确实与 30 年代和 60 年代之间有控制的、冗长的货币政策争论显得有实质上的不同;尤其是在这个 10 年的早期和中期,看上去有些像 1935 年之前的那个时期的局势。这并非认为历史可以重演,而只是认为某些具有潜在政治重要性的经济状况会一再发生。

我们能够获得的补充证据是与我的政治论点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科克和德莱瑞(Kock and DeLeire 1994)的研究事实上发现,在最近几年间,汇率在美国货币政治中的重要性实际增长了。与本人观察结果最相关的是,虽然汇率在 1982 年之前没有引起美国任何货币政策转变,在那之后它至少引起了 1/3 的转变。这与我的论点

是一致的;如果这一变化发生,不发生相似的政治变化将是出人意料的。

随着世界金融和商业流动变得越来越快,美国的卷入也飞速增长,美国货币政策也正在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开始影响汇率,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治在美国变得更具对抗性,更多地为明显的利益集团压力所主导,更加充满了国会行动,也更紧密地与贸易政策联系在一起。

四、观察与影响

笔者重申,此处提供的历史回顾没有构成对本人论点的系统经验支持。但是,笔者确实相信,这一对历史证据的关注确实趋向于支持这一观念,即国际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变化与美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变化是相联系的。经济一体化改变了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的途径,使汇率变得至关重要。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支付看来也增加了美国国际企业降低通货不确定性的愿望。商业开放和金融开放增强了许多美国人对全球价格趋势的脆弱性,看来也增强了汇率的重要性,由于他们也试图抵消不利的价格运动。在这方面,本文的分析与本文集基本论点是一致的,即经济国际化深刻地影响了国内政治。

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国货币政策或国际经济变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的全面解释。它只是意味着,指出将开放经济考虑引入到美国货币政治分析中的重要性。但是,历史纪录也提出了某些需要澄清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对观察到的趋势的替代性解释,以及某些相关的观察。

此处有必要澄清两点。第一,我所预测的种种看法,并非意在暗示相关的行为体使用本分析中所使用的类型种类。实际上,这一问题的很多条件一直到最近之前还不存在。本论点针对我认为给定了一组经济条件的政治分化。这取决于宏观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体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并不取决于他们像我在事后所做的那样界定其利益。我的框架解释了为何农场主和制造业者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和 80 年代偏爱特定的货币政策;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需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或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笔者的工作是分析论证,而非描述政治行为体思索或谈论这些

问题的方式。

第二个要澄清的,涉及到弄清楚我对历史文献中一个常见事例的低调处理,即货币民粹主义(monetary populism)使负债的农场主对抗抵押银行家。我对这一分裂并无争议,只是认为它不足以解释这些争论。既有分析上的理由,也有经验上的理由,相信政治冲突在早期受到了可贸易部门—不可贸易部门划分的强烈影响。①

我们可以推导出几种可能的替代性解释。这样做可能是刻意作为的,因为据笔者所知,这些解释从来没有在文献中出现过。虽然很少学者会不同意笔者对过去120年的货币政治——尤其是1935年之前和1935～1970年间的比较——的跌宕起伏特征的宽泛描述,但据笔者所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这些跌宕起伏的学术尝试。虽然如此,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可能的分析的。

美国的国际地位,或许对1970年之前美国货币政策争论的沉寂提供了一种解释。因为不受限制,美国货币政策很少成为问题:美国是如此地统治了世界经济,以至于其政策决定了全球货币状况,因此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不存在(权衡彼此的)交易。这或许是与认为货币一致要归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束缚——美元的价值在体系中被固定在每盎司黄金35美元上——的主张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两种主张都指向潜在重要的国际因素,但是任何一个都无助于解释经过一段时间后的更多变化。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至少像它在20世纪60年代一样,与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联系很大。这意味着,即使美国政策决策者方面没有任何这样的意图,美国20年代和30年代的货币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但是,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国内争论在更早些时候极其高涨,在随后的时期实际上则并不存在。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尽管这一机制的存在提高了贬值的代价,在70年代早期,美国事实上还是将美元贬值了,不管有没有国际货币机制的存在。实质上,一直到70年代,没有什么政治行为体看来具有足够的关心,以使汇率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

①　对本人观点的间接支持,事实上可以从关于民粹主义时期的少量现代文献中找得到,尤其是它们指出农业价格(而非债务)是货币民粹主义者抗议的首要决定因素。例如,McGuire(1981)发现民粹主义狂热与价格不稳定紧密相关,Bowman and Keehn(1974)则发现农民政治动乱在农业价格下降时期上升了。

另一个潜在的解释方案,可能聚焦于上面讨论过的制度变化的独立重要性。有些人会认为,货币政治突出性的减弱是国会授权的结果而非原因。这或许是因为国会意识到,可以通过将责任委托给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获得效率。从这个观点看,联邦储备实际上以这样一种方式推进了真实的国会偏好,即保护国会不必为不受大众支持的政策负责任。[①]

但这一观点并不符合两个事实。第一,1907 年到 1935 年间,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制度结构产生了激烈争论,利益集团和关于制度的国会偏好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了。这不太像 30 年代国会绕过不知情的选民偷偷摸摸地搞制度变化:在过去 50 年里,选民坚持不懈地在制度需求问题上攻击国会。这些需求在 30 年代完全消失了。第二,1970 年之后,国会给与联邦储备货币政策自由的表面意愿急剧下降了。一旦它们不再反映具有选举重要性的选民利益,国会就忽略了货币和汇率政策,就像在 1935 年和 60 年代后期之间的美国封闭经济中那样。

笔者并非意在坚持认为这些争论不存在任何真理,只是认为它们没有明确地支持笔者的看法。对这一争论更全面的评价,需要一个关于替代性假设更明确的阐释,以及更系统的经验证据。与此同时,可以在此处提供的分析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几个观察。其中一些直接遵循笔者的分析,其余的则指向了某些不同的方向。

第一,关于对汇率的政治行动显示出不对称。就是说,当实际升值和贬值都具有分配性影响时,实际升值导致了更显著的政治反应。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后期美元实际价格下降,却并没有什么政治反响。另一方面,19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早期以及 80 年代早期的实际升值,都带来了货币和贸易政策方面的重要反应。

因此,伤害了可贸易部门生产者的相对价格运动,比那些伤害了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的相对价格运动在政治上显得更为突出;实际升值比实际贬值在政治上更显著。这或许是因为升值的代价比其收益更为集中,或者相反,贬值的收益比其代价更为集中。实际贬值

① 关于 RTAA,参见 Haggard (1988)。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大量文献及其评价,参见 Grilli, Masciandaro, and Tabellini (1991)。

(升值)以直接而显而易见的方式,帮助(伤害)了可贸易部门生产者。鉴于实际升值的主要负面影响是对可贸易部门消费者产生的,这一后果可能只是生产者趋向于比消费者更好组织起来的共同现象的一个部分。

一个真正的困惑在于,当经济能动者面对着消极的价格趋势时,政治需求为何显得尖锐得多。也就是说,贬值的需求看来只有在通货升值或可贸易部门价格因为某些原因而降低时,才有可能上升。没有什么理由说明,为什么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从贬值中获益。但是,随着相反的价格运动出现,他们看来更为坚决地要求贬值。如同对贸易保护的要求,没有任何明显的根据说明这不是持久的。但是,正如对保护的要求是反周期(countercyclical)的一样,对贬值的要求看来也是昔日贬值的一个函数。为什么这样,仍然有待解释。

第二,相对价格变化真正外在地改变了经济能动者的反应程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无疑地,谷物价格在19世纪后期或20世纪20年代的降低,可以被视为是由世界经济的广泛趋势造成的——尽管美国农场主当然也对此产生了影响。但是,19世纪70年代的实际升值,是美元回归金本位的预期后果,而1968～1971年和1980～1985年的实际升值则主要是美国经济政策趋势的结果。对这些情境的全面解释,实际上不得不揭开那些导致实际升值的理由。但是,笔者只是聚焦于对它们的政治反应。

第三,1935年以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汇率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汇率水平与其弹性之间的普遍联系。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人们可以选择贬值的固定汇率,也可以选择升值的浮动汇率。但是,在实践中,利益集团分成了两大阵营。“硬货币”利益集团想要强而固定的汇率;“弱货币”利益集团则想要贬值和浮动汇率。换言之,当考虑是否将美元贬值时,稳定汇率的偏好被忽略了。

对货币政策以上两方面的忽略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这一问题,对于全面理解这一时期的利益集团、议会政治以及政策后果是非常重要的。看来与证据相一致的一个可能性是,关于汇率的最强烈的偏好实际上是对稳定性的偏好以及对贬值的偏好。由于上述原因,对弹性和升值的偏好——比如那些不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对强浮动汇率的偏好——可能不是特别强烈,其集团也不是特别集中。但是,这

只是推测。

第四,尽管分析了一些制度问题,笔者主要聚焦于利益集团。这一点在历史纪录中显得很清晰:当行政机构和联邦储备倾向于对国际商业界的需求反应更敏感时,国会对可贸易部门生产者的需求会特别敏感。笔者在上面提供了一些有可能成为这种情况的事态,但是它们并非严格引申来的。同样,笔者对国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如何以及为何将汇率政策委托出去的研究,也是很肤浅的。至于美国货币政策当前的制度特征以及这些制度的演变,也还有待全面解释。

第五,尤其在最近一些时期,笔者低调评价了讨厌通货膨胀对普通民众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并不是一个议题,通货膨胀当时更多地被视为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20 世纪 70 年代末普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不满有所增长,这一情绪造成了 1979～1981 年货币政策的逆转。但这些广泛的压力如何与政策发生重大关系,仍有待探究。

最后,笔者就政策偏好、制度和后果之间的关系略谈一二。笔者所分析的是,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中,围绕着货币政策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分裂的突出性、性质和制度表现。这显然是一个能够试图解释这些政治争论后果的更广泛分析的关键基石,但是,它并非这样的一个解释。它只是通向一个更复杂分析的第一步,尽管是必要的一步。杰弗里·加勒特和彼得·兰格收录于本文集中的文章所探讨的诸种因素对理解这一领域的政策后果无疑至关重要。

结　论

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政治受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一体化程度变化的显著影响。经济国际化与国内和国际的货币政治变化联系在一起。

金融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对汇率具有强大的影响。商业开放性本身就使更多的经济能动者对通货价值变得敏感。这两者加在一起意味着金融和商业一体化会导致货币政治更加集中于汇率上。

由于汇率影响了相对价格变化,而名义价格水平的整体变化却做不到,经济一体化也意味着货币政策政治更受利益集团集中的影响。鉴于国会对选举上的重要利益集团特别敏感,政府对广泛的宏

观政治趋势特别敏感，汇率增长的重要性和它们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可能会比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更趋向于促使国会行动。最后，由于汇率明显与进口竞争相联系，它应该在政治争论中与贸易政策联系在一起。

在本文中，笔者比较了三个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1935 年之前，高水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相对较低水平的金融和商业流动；以及 1970 年以来，世界经济活动的增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变化局势与美国货币政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随着货币政策转向汇率，尤其是当美元实际价格升值时，利益集团被动员起来。国会与该问题领域利害关系的加深、公共领域贸易和汇率政策之间联系的增长也与此相关联。

本文关于美国货币政策未来发展的结论是尝试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当前水平——尽管很高——可能不会像它们在古典金本位时期那样高。由于宏观经济和部门的困难燃起了很多人阻止商品和服务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欲望，以上水平尽管会变得更重要，但可能是不稳定的。不过，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继续增长，至少有一点是可能的，即此处探讨的种种货币政策趋势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六章

国际化与日本的选举政治

弗朗西斯·麦考尔·罗森布拉斯

引言与综述

在1993年夏天从权力顶峰跌落之前,日本自民党(LDP)几乎拥有大众选举一党政府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①] 由于其统治带来了一个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一功绩显得更为突出:从战争破坏中复苏,重新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迅速的城市化。

乍看起来,日本不是一个国际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价值实例。考虑到世界经济中日本惊人的战后成功,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自由贸易联盟的胜利,或者至少是赢得了影响。但是恰恰相反,由于日本的市场多有政府帮助,众所周知,它是难以进入的。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回合降低关税的多边、双边贸易谈判,只是带来了更高的、更多的卡特尔管制和习惯商业行为等非关税壁垒。尽管东京向来有与外国文化联系起来的高等时尚,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看起来只是单行道。

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了日本国际化的国内影响。如同本文集所有文章都指出的,如果全球竞争部门更喜欢自由贸易,我们就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是什么造成了自民党近40年的保护主义政策?笔者在本章提出,日本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其选举法,在很长时间里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增强了生产者集团(无论是竞争性的还是非竞争性的公司)的力量。

在很多民主社会里,组织上和信息上的劣势困扰着消费者,但

① 实际上,除了在1976年与新自由俱乐部(the New Liberal Club)结成的短暂联盟之外,自民党的统治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93年。瑞典工党拥有极其少见的最长执政纪录——从1932年到1976年。

是，对这一不利条件的政治反应，部分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属性。我们需要解释，为何日本的保护主义导向的选举法，在战后时期支持日本紧密卷入到世界经济中。为此，我们需要插入一个政治要素：即便全球竞争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也渴望在其封闭的国内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只要外国政府能够容忍。[①] 事实上，日本的贸易伙伴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允许其单边保护主义，允许其有利于生产者的选举法存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非常不同的情景——实际上就是罗戈斯基(Rogowski 1987)为欧洲小国所展示的，即选举政治早些时候满足国际施加的开放市场要求。

第二，国际经济如何促成了日本最近的政治重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国际力量明显地促成了自民党统治的垮台，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外国政府威胁采取报复，在日本参与全球竞争的生产者和那些在非竞争部门拥有专有资产的生产者之间造成了分裂。我们也应该能够发现，那些推翻自民党、推行改革的政治家会采纳市场开放措施。相反，如果公众辩论的议题完全是国内议题，国际力量将很难发挥作用。但是幸运的是，对于国际化议题来说，关于其世界地位的争论事实上在后自民党的日本政治领域突出存在。

第三，最近的国内政治制度变化，对日本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正如米尔纳和基欧汉在本文集的导论中所指出的，与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影响的研究相比，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早已得到了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国内制度本身至少部分地是应对国际力量而建立的，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到外交政策决策是与那些力量相一致的。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动议性的。但是，承认国际影响的可能性，使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假说，让事实去检验。

概括而言，日本的个案并没有否定国际化，而只是降低了国内政治制度在将国际力量不时引向无法预料方向的重要性。独立的世界环境不足以理解国内政治，多数国内变化仍是未知的。与此同时，单独分析国际力量会引导观察者远离这一目标。在今天的日本，离开另一个，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个。

---

① 这一点回应了米尔纳(1988)关于法国企业可能赞成自由贸易的论点。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首先概括协调市场力量的日本政治制度,并且试图解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国际化,这仍是本文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这些制度塑造了日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第二部分,分析要求变化的国际压力以及国内人口的变化;第三部分,更深刻地考察自民党政策制定的三个案例,以展示国际、国内力量在过去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第四部分,回顾关于选举法的国内争论,并将其动力至少部分地归结于国际压力;第五部分,与传统上关注官僚统治不同,我主张关注日本政策制定中的选举刺激;最后,我在结论中提出一些关于日本的世界经济地位可能如何演变的看法。

一、自民党长期执政与日本的选举规则

日本多成员选区的选举体系(1925～1942 年;1947～1994 年)是独特的,它迫使寻求多数的政党在大多数选区提出一个以上的候选人。在众院选举中,日本的投票人只有一票,尽管选区的大小从一到六个候选人不等。[①] 当一个投票人的第一选择已经通过了选举时,其票数不能像爱尔兰和芬兰的单一可转移选票系统那样转移给同一党派的其他候选人。在日本,任何在所有选区提出一个以上的候选人的政党都遇到这一问题,即如何在其候选人中分配选票以赢得尽可能多的席位。

自民党在其候选人中分配选票的方法是,让该党的候选人利用可以用来竞争选票的政府资源。通过使用凯恩、费瑞约恩和菲奥里纳(Cain, Ferejohn, Fiorina 1987)所称的"个人选票战略"(personal-vote strategy),每个自民党候选人在他所被称赞的政策偏好基础之上,建立起个人支持集团。毫无疑问,所有的自民党国会成员共享其政党标志。但是,他们也通过特定类型的议会服务来彼此区别。例如,如果一个候选人与农业界建立起很强的联系,另一个就聚焦于小零售商,再有一个聚焦于建筑行业。每个自民党政治家提供何种服务的选择,都是一个定位市场(niche-market)的决定;自民党成员身

---

① 在这一旧规则下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日本有 1 个单成员选区,4 个双成员选区,42 个三成员选区,37 个四成员选区,41 个五成员选区和 1 个六成员选区。

份使立法者得以提供好处。[①]

自民党在其候选人中划分选票的需要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即拥有有组织的、可靠的选票。这增加了那些能够提供大规模选票——如农民和小商业经营者——和能够为候选人培育其个人支持网络提供大量资金的集团影响。[②] 考虑到特定选民投资在自民党成员营造其支持基础中的重要性，毫不奇怪，超过 40% 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从他们的父亲或宗师(mentor)那里"继承"其选举组织(Ichikawa 1990)。

个人投票战略是昂贵的。除自民党候选人从政府分配中所获资金外，仅他们在选举年从竞选捐赠人获得的资金就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政治评论家估计，日本五个主要政党总共要花掉大约 30 亿美元来赢得 1990 年 2 月的选举，自民党一家就花掉了其中的一半以上(The Economist 1990)。[③]

自民党从哪儿得到这笔钱？为什么它能够聚集如此大的数目？公司捐赠人倾向于资助自民党，因为它们可以得到回报，获得牺牲中间投票者而取悦于它们的政策。制造商为了它所满意的预算、税收和管理协议，而向自民党捐款。尽管对很多政策都漠不关心，投票者继续投票给自民党候选人，因为自民党候选人通过向这些公司捐赠人施加小恩小惠赢得了他们的忠诚。至少在众议院选举中，换取个

---

①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对自民党候选人的意识形态区分是一种划分选票的更为方便的替代方案，但这将产生个人投票战略所没有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无法预测性。仅仅凭着政纲，几乎不可能知道谁会投票给谁。第二，政党将会因此危害到其政党的纲领以及个人的选票。如果自民党候选人攻击彼此的政纲，投票人将难以领会政党的目标和意图。过多的负面竞选甚至会使政党失去而不是赢得选票。我感谢卡里·考克斯(Cary Cox)为我指出这一点。关于日本的选举规则和自民党的选举战略之间互动的更全面解释，参见麦卡宾斯和罗森布拉斯(McCubbins and Rosenbluth 1995)。

② 因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和台湾一直是世界上惟一实行多成员选区和单一的不可转换选票(SNTV)选举规则的国家和地区，很难对特殊论进行实证检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前的意大利，投票人可以按其偏好列出三或四个候选人(而不是按照该党开列的名单)，基督民主党的成员花费了大量资源构建其个人支持网络。换言之，意大利选举规则给予同一党的竞选个人彼此竞争的动机这个方面，与日本很像。

③ 也可参见一群自愿公开其收入和开支的年轻自民党国会议员于 1992 年 5 月的出版物(Wakate giin no kai 1992)。他们声明的目的是，通过对日本的金钱政治管窥震撼公众，以刺激选举改革。根据这一报告，这些主要处在第一和第二任期的自民党成员，1991 年——并非选举年——的平均开支超过 100 万美元(按 130 日元兑换 1 美元的汇率)。由于日本较弱的竞选财政公开法，这些对自民党财政的部分曝光显得非常有价值。

人偏好的忠诚使很多投票者很少愿意投票给其他政党的成员,即使他们对自民党提出的广泛政策并不完全满意。

考虑到这种选举规则对政策的强烈影响,或许会奇怪它一开始是怎么产生的。1925年,三个政党——没有任何一个控制议会多数——将多成员选区体系作为彼此间所能同意的、最大限度的妥协方案,每一个政党都可以合理地期待赢得一个选区的多个席位中的一个。[①] 但是,不久后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即控制内阁的政党能够使用政府资源,在每个选区的多位候选人中分配选票(Ramseyer and Rosenbluth 1995)。

1947年,吉田茂(Shigeru Yoshida)首相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保证放弃占领军制定的比例代表制。他认为该体系应该对1946年选举中日共的突然崛起负责,这个论调在像关心日本的政治稳定性一样开始关心"共产党威胁"的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了同情。在随后的选举中,保守政府(由自民党在1955年成立的)在投票时,能够使用多成员选区体系来支持其表现,通过使用预算和其他政府资源来划分选票,其竞争对手则无法采取这一手段。

因此,尽管这一规则产生了选票划分问题,为何自民党没有在很早以前就放弃多成员选区的选举制度这一问题就非常清楚了。只要自民党拥有议会多数,并因此控制政策制定进程,它就能够通过分配私有物品来在其候选人中划分选票。与此同时,其他的政党缺乏相匹敌的资源来进行施舍,这使他们与自民党相比,在解决其选票划分问题上处在极其不利的地位。但是,自民党在每个选区使用私有物品而有效地划分选票,是假定投票人集团是可划分的和可设定为目标的。如同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的,城市化使这变得很难以实现,而国际化使之变得成本高昂。

二、自民党算计的变化:日本国际环境和国内人口的变化

如果自民党通过其个人投票选举战略收买日本的投票人,日本战后有利于生产者的经济政策也取决于外国政府对日本拒绝互惠市

① 参见Kawato(1992)以及Soma(1986)。

场途径的容忍。通产省的官僚并不是为了国家而炮制了某个方案，以最佳地利用外国的善意。正如第五部分更为详细地分析的，通产省官僚有必要在政治制约下运作。相反，日本企业——真正受通产省管理的行为者——以他们对自民党的财政支持做交换，“购买”了生产者管理制。这一生产者管理制包括阻止国内的可能竞争者和外国竞争者进入国内市场。通过不同形式的法定援助和行政指导，自民党同样获得了农业、小商业和金融部门的支持。

尽管在很多年里，日本增长导向的政策环境保持稳定，这一安排仍然有几个部分开始变化。第一，在海外贸易和投资方面拥有巨大利益（且该利益不断增长）的国际导向企业，开始关注外国贸易报复的威胁。为转移外国对他们的批评，这些企业主张解除庇护日本最没有竞争力的部门——农业和小商业——的保护性壁垒。①

由于商业界感受到日本面临的国际经济机遇结构变化，从而产生了变化的第二个压力。对于很多有能力在海外非卡特尔化市场进行竞争的国内公司来说，国内卡特尔管制不再像过去那么有价值。这些企业不太情愿为了生成生产者管制，而支付巨额资金保证自民党选举机器运转。海外的出口商和投资商在他们的成本效益计算中必须权衡进入国内壁垒和贸易报复的预期代价，以及他们不得不为自民党选举胜利提供的捐赠。

损害日本对传统保护主义政策的政治承诺的第三个因素是人口变化。1960年，根据政府人口普查数据，80%的选区是农村。到1975年，只有35%的选区还是农村（Jichisho Gyosei Kyoku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Administrative Bureau], 1988）。这一变化也是由国际因素驱动的，因为日本的出口成功给城市工业区带来比农村更大的回报。

日本的城市居民开始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变得更具流动性。城市工人也开始通过固定工资挣到更多的收入，相比之下，农村的农民和小规模制造商的收入变化与他们部门的利润更紧密。城市投票者因

---

① 这一观点并非说，日本的企业越来越依赖外国进口而希望关税削减。日本的行业内贸易是出名的弱，或多或少地通过制造部门进行（Lincoln 1990）。问题在于，日本的出口商害怕外国报复，促使政府至少开放国内农业和零售市场。公司看来也担心较高的国内农业价格间接造成更高的劳动力成本（Honsho 1985）。

此开始产生比生产者利益主导的农民和经营者更为分散的利益，其中大部分与其消费者地位联系在一起。[1] 这一稳定的向城市移民的进程迫使自民党改变其政策，转向消费者利益。[2]

三、政策变化例子

最近几年，国内人口变化和外国对商业界的压力的结合，迫使自民党开始减少对其政党的一些传统支持者——农民和小商业——的支持。自民党的政策取向只是缓慢地越过了很多"普通议员"(backbenchers)尤其是农村议员的反对。另一方面，代表竞争性企业或城市选区利益的政党成员则推动政党走得更快。但是，这并不是自民党可以安全行走的钢丝绳。像我们在下一部分所看到的，随着自民党分裂的选民利益不断相背，自民党的领导变得步履蹒跚。

(一) 农民

日本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受保护者之一。由于禁止大米进口和大米价格支持的政策，日本农民的大米定价几乎八倍于世界大米价格(Calder 1988)。作为保护不受市场价影响的交易，日本农业合作社全国网络动员农民在选举时投票给自民党候选人。尽管农民占日本人口不到 12%，其中兼职农民占这 12% 的 8% 或 9%，只要选举体系需要在自民党候选人中划分选票，自民党就重视不可划分的农业选票。正是农业选票的可测性使农民获得其影响力。

进一步论述农业选票对自民党的重要性，就是众所周知的有利于农村区域的、不公正分配代表权的选区。1947 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对其选区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当时的日本远比现在农村

① 参见 Arai (1988) 和 Kobayashi (1987)。自民党候选人的选举差数的变化随着选区的城市化而增加，这使自民党的在职者在选举时不那么安全。自民党在职者的选举不安全感反过来又增加了有派别支持的独立候选人。那些"战战兢兢的"在职者变成选举改革的天然支持者(Cox and Rosenbluth 1995)。

② 除了需要更低消费价格等公共物品，城市投票者也想要在他们的街区建设更好的学校和公路等一系列广泛的私人物品安排。但是，由于城市投票者比农村投票者更为分散，城市选区的自民党代表不得不为城市投票人支付更高的人均代价——主要是组织成本。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由于更多的消费者关注更高的城市好处费，自民党联盟变得更昂贵而难以维系。

化。在随后的年代里，一些人口激增的选区增加了一些席位，而人口减少最多的选区也被临时减少了一个席位。但是，这种边边角角的修补造成了人均代表权在选区两端之间的4:1的鸿沟。

1983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任何超过4:1的代表比率皆是违宪的。这给自民党在处理分配问题上留下一点喘息的时间。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自民党不愿意采取过激行动。只要选举规则仍然需要自民党在大多数选区的多个候选人之间分配选票，高度组织起来的农民就是有价值的、值得作为工作目标的投票人。但是对于自民党来说，试图打开日本农业市场的外国政府并不像日本最高法院那么容易平息。

作为一个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对日本实质上不可进入的农业市场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面对这一压力，自民党的立场松动了一点。70年代，日本政府在牛肉和柑橘进口配额上放松了一些，这两种产品主要代表了美国的特殊利益。1990年，日本政府最终同意着眼于逐步的进口自由化，将牛肉和柑橘配额"关税化"。但是，日本政府只是在遭到最强烈抵制时才做出每一次让步，并且小心回避对大米——日本农业的主要产品——进行一揽子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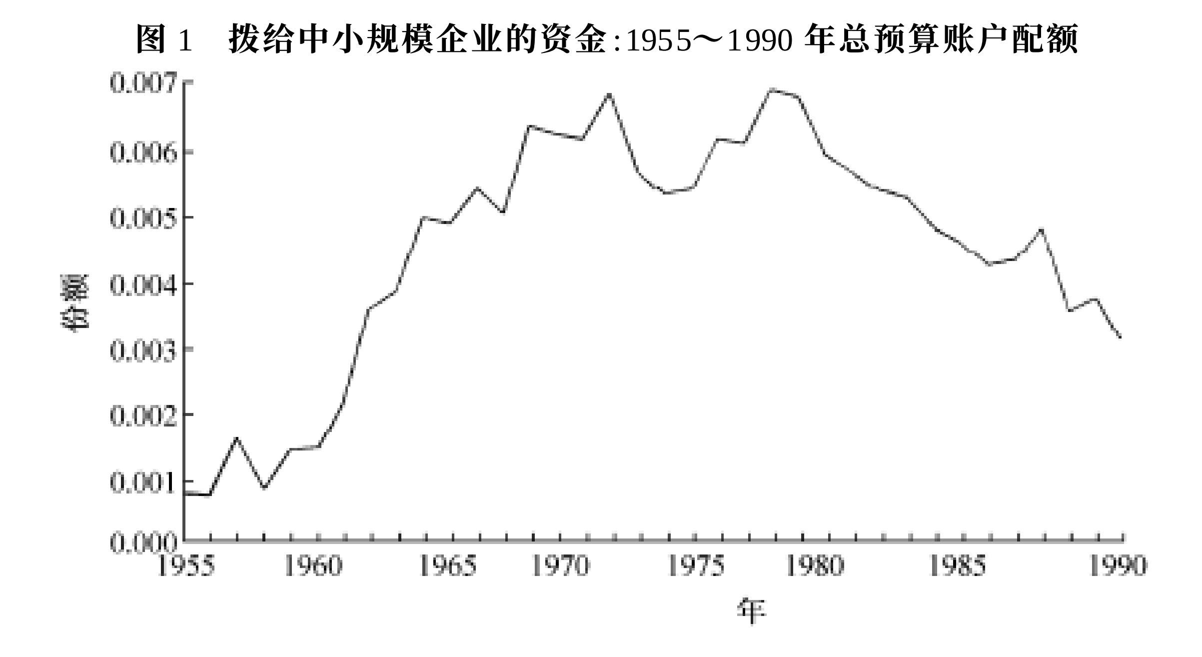
1991年6月，自民党领导层开始间接地讨论取消大米进口禁令的可能性。自民党领导层得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商业联盟"经团联"的支持，后者曾经通过一个决议，要求行政部门尽快开放农业市场。特别行政改革促进理事会(The Ad Hoc Administration Reform Promotion Council)——一个由商人、学术界和媒体代表组成的首相顾问团——在1991年7月提交的中期报告中，也认可部分开放大米市场。

自民党设定了一个农业自由化的进程。但是变化步伐极其缓慢，因为自民党不得不面对多成员选区选举规则下的农民。自民党成员的选举动机就更缺乏实质性变化——这将包含选举规则的变化或更巨大的人口变化，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希望的是极少的大米进口配额以及对其他农产品宁可僵硬地征收关税。[1]

[1] 关于对自民党坚持农业保护政策的压力，参见："Yureru kome seisaku", Nihon keizai shimbun (November 11, 1992: p 5)；"Kome mondai", Nihon keizai shimbun (Nov. 24, 1992: p.1)；"Kome kaiho 'joken toso'", Nihon keizai shimbun (November 25, 1992. eve: p.1)；"Kome kanzeika o kyohi", Nihon keizai shimbun (December 4, 1992: p.2)。

下面的图 1～3 比较了农林水产省以及厚生省的预算额度。虽然有些粗略,这一比较低估了自民党对其选举战略的逐步再定位,以应对人口统计的变化和国际机会结构的变化。确实有一段时间,日本政府逐步减少对农业的补助,增加了对主要针对城市居民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项目的投入。正如预算分配变化所显示的,自民党无法无视城市选民的增长。自民党所做的调整只是边缘性的,因为在多成员选区选举制度下,自民党离开了农业部门的支持就不能生存。

图 1 拨给中小规模企业的资金:1955～1990 年总预算账户配额



注:竖轴代表拨给中小规模商业项目(Chuso kigyo taisakuhi)资金的总预算账户配额百分比。这些拨款大部分是通过通产省的中小企业局经手的(Chuso kigyo cho),但是有些资金也是通过其他部门分发出的,包括厚生省。

资料来源:日本大藏省发布的各年的《政府预算案》(Kuni no yosan)。

(二) 分配部门

使无竞争力企业的利益与那些更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利益竞争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分配部门的保护。由于小商业主处于自民党个人支持网络的核心,他们在日本的代表权过大。1937 年的《大规模商店法》(The Large Scale Store Law)在 1957 年再度生效,它通过限制商店面积、给予小商店在商店站点决定中的否决权,保护不受更有效率的商店的"过度竞争"(Upham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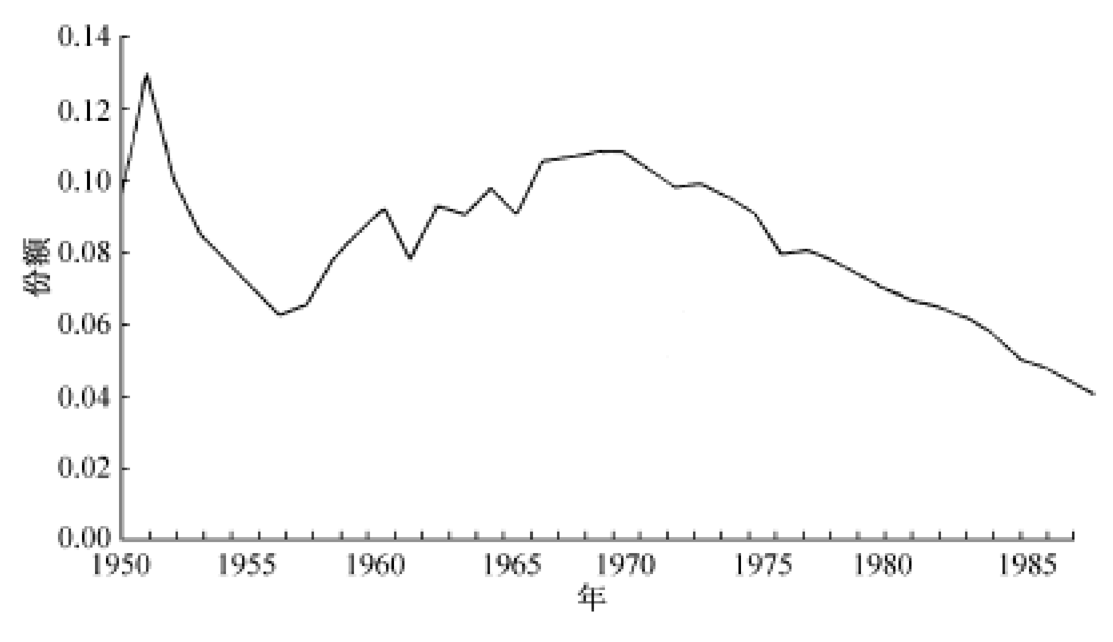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了回应外国政府对日本多层分配体系减缓日本进口的抱怨,自民党开始逐步放松保护。预算分配、管制

图 2　厚生省:1952～1989 年总预算账户配额

注:竖轴代表分配给厚生省的总预算账户配额。

资料来源:日本大藏省发布的各年的《政府预算案》(Kuni no yosan)。

图 3　农林水产省:1952～1989 年总预算账户配额



注:竖轴代表分配给农林水产省的总预算账户配额。

资料来源:日本大藏省发布的各年的《政府预算案》(Kuni no yosan)。

和税收政策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开始成为减少保护支持的可见模式。大概自 1982 年以来,政府减少了财政投资和贷款项目对小商业资助贷款的预算额度。

这些措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89年,《大规模商店法》开始照顾美国贸易谈判者的优先权。日本政府在1989年修订了该法案,一定程度上既削弱了大的零售卡特尔,也削弱了小零售商在彼此邻近的地方建立新店点的否决权。但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小企业并没有失去他们限制大规模商店扩张的追索权。

由于大企业的推动,自民党也开始减少小商店主传统上享有的税折扣。1989年4月生效的销售税调整,就是自民党为减少公司和个人收入税的负担而采取的行动,这意味着削弱小企业主的税收优势。日本政府给予小企业特权,允许它们低报自己的所得,这导致了民间所谓的为"9—6—4"制,即城市工人对其收入的90%要交税,而小企业主只需对60%的收入交税(农民则是收入的40%)。[①]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后期,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度达到高峰,公司部门担心通货膨胀或更高收入税,要求实行间接税(Mabuchi 1989;Shindo 1989)。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一法案的最终版本还是保护了小企业主。销售税只是简单的最终商品税,而非增值税——将产生生产和分配每个阶段的成本和销售纪录。最初,小企业仍是相对自由地低报他们的利润。但是自从这一法案通过后,自民党开始严格要求这些企业提供报告。[②]

图1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小企业在政府预算中所占份额逐步萎缩。预算变化与具体调整同步:自民党在过去若干年里减少了它对小商业部门的支持。但是,只要在选举时期,自民党就不得不在大部分选区在多个候选人中分配选票,自民党承受不了疏远小企业这样一个无处不在又高度组织的集团的代价。由于缺乏选举改革,小企业政策的任何政府变化就仍然是递增的。

(三) 银行和利率管制的解除

在其近40年的统治中,自民党以利润补充管制(profit-padding regulation)来回报银行慷慨的竞选支持。这一保护性管制方案的支柱之一,是1947年制定的《利率控制法案》,该法案规定存款以低于

---

① 根据1985年自民党的报告,1983年只有20.3%的农民和49.6%的非农小企业主支付了所有的税(Maruyama chosakai 1985)。

② 一群自民党普通议员在自民党内部建立了一个反销售税小组,但是面对被自民党排除在党的领导层之外的威胁,他们迅速地解散了(Ishikawa and Hirose 1989)。显然,领导层判断税收的收益大于政治代价。也可参见 Nihon keizai shimbun (April 24, 1991)。

市场的利率来支付利息。借贷卡特尔使银行能够将一些低息借款(cheap money)作为利润,而不是都将其全部交付给公司借款人。

在银行的大额银行业务方面,来自欧洲共同市场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摧毁了金融卡特尔。如果日本企业能够绕过国内银行的高成本在伦敦和其他地方筹集资金,解管制是银行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小额银行业务上,由于顾客没有国内银行或邮政储蓄的合适替代者,解管制发生得很慢。解管制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美国政府,它威胁日本如果日本不对美国银行开放日本市场它就限制日本银行在美国的商业机会(Rosenbluth 1989)。

但是,大额银行业务市场的金融解管制,不像农业自由化或分配部门的解管制那样,并没有给自民党制造什么危机,因为它并未伤及小的、不那么有效率的银行。这是因为那些小银行倾向于将其业务专门化,集中于小额业务或贷款给由于太小而不能有效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企业。毫不奇怪,在小额业务或小规模银行存款利率的解管制方面,即便是面对美国的威胁,自民党步伐也非常缓慢。自民党不那么关心保护大银行,因为它们早已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并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受到美国报复的打击。自民党担心的是,一旦银行服务价格由市场来决定,每个选区里成百上千的小金融机构就会崩溃。

最终,外国报复的威胁提高了保护小银行的成本,自民党逐步地从其一揽子立场上后退。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财务省甚至允许小额储蓄的利率趋向市场水平。但是,其措施远远不足以平息外国银行及其政府对日本银行部门仍然被不公正地操纵着的认识。

四、制度调整的压力

自民党变得越来越不满意其对低效率经济部门——诸如农业和小企业部门——严重的选举依附。如同在第三部分简要论述的,自民党保护这些部门的成本由于三个原因而上升。第一,有效率的出口商面临对日本关闭市场的报复,要求自民党改变其政策。例如,日本最大的商业组织"经团联"率先推动农业自由化和选举改革。事实上,正如下面要讲到的那样,"经团联"的会长 Gaishi Hiraiwa 主持着自民党内部的小泽/羽田支持改革的资金筹集组织(Inoue 1993:

79)。第二,有竞争力的企业不那么情愿资助自民党开销庞大的选举机器,以换取卡特尔管制。商业界进一步对自民党施压,要求放弃多成员选区体系,认为其他的选举规则将通过降低激烈的政党竞争,使自民党能够更经济地角逐权力。[①]

第三,除了来自商业界要求变革的压力之外,自民党的个人选票选举战略,在城市和郊区既花费巨大又效率低下。关心选举体系不改革的后果的大多数国会议员来自城市选区,他们的选票大部分来自白领工人和消费者。其委托人很难被纳入到传统的个人支持网络,因为他们还没有组织成为生产者集团或邻里联盟。除了满足他们的成本之外——比如帮助贷款或学校申请,政治家还不得不承受的成本首先是,区别和组织这些投票人,从无到有建立起个人支持网络(Iseri 1991:77~78;Takahashi 1988:58~79)。

这些问题虽然听起来很严肃,对日本政治的长期观察者仍怀疑,它们是否真的聚集起来产生了改变选举规则的足够压力。毕竟,自民党长期统治着这一选举体系。自民党以前曾经在选举中遇到麻烦,比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但是它针对问题进行调整并且很好地恢复了活力。无论如何,一直到 1993 年,还不存在任何严酷的竞争。最大的反对党社会党将自己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致使大多数投票人发现自己与之并不相关。

尽管有符合自民党偏好的这些因素——自民党拥有与其对手明显的无竞争力相对的适应性——为何还要改变一切?选举改革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不可能完美地预测一个不同的选举体系的后果。就此产生了争论。

制度保守的个案并非没有价值。尽管指望对手的无竞争力总是不明智的,选举规则本身不利于除了主要政党之外的任何政党。如同笔者所主张的,在单一的不可转换选票(SNTV)和多成员选区体系中,私人物品战略胜过公共物品战略,因为私人物品比公共物品或诉诸于公共物品更能有效地划分选票。

---

① 企业家们几乎每天都在媒体上谴责日本的多成员选举规则。关于这些谴责的几个例子,参见:“Shusho ni seiji kaikaku ikensho”,“Shikin atsume, atarashii hoho de”, Nihon keizai shimbun (eve. January 7, 1993: p.3);“Seiji kaikaku danko o”, Nihon keizai shimbun (October 7, 1992: p.5); Nihon keizai shimbun (October 9, 1992: p.5).

自民党面临的危险不是某些对立党派可能会赶上它。自民党只是可能会失去一些席位，丧失议会多数和私人物品战略惟一提供者的身份。其次，越来越多的自民党议员——很多是来自城市选区的——发现，自民党的标签意味着来自自民党的私人物品很少得到补偿的倾向。对于他们来说，实行生产者政策在选举上是成本高昂的。正是这些考虑到自己选举前途的自民党成员在 1993 年 5 月脱离了自民党，这样做就摧毁了自民党的多数地位。

自民党领导人用了若干年考虑对日本的选举体系进行重大的变革，完全是因为它严肃对待对其多数地位的威胁。但是，自民党等待了太久，因此，它在 1989 年失去了参议院多数。自民党领导人现在就不得不驾驭来自自民党普通议员利害关系和反对党攻击的双重麻烦。1990 年 4 月，自民党宣布的第一个方案是将单一成员选区和比例代表的双票体系(double-ballot system)结合起来。为照顾大政党而设置的 300 个单一成员选区，比当前按比例的多成员选区体系更能赋予自民党(在稍弱程度上的社会党)适当的选举优势。剩下的 171 个席位通过比例代表制分配给各政党，给更小规模的对立政党一个生存机会。显然，这是一个旨在通过反对党控制参议院的法案。①

但是，这一方案在 1991 年 9 月搁浅，当时很多在职的自民党议员都怀疑他们自己有无能力在新的重新划分选区方案下再度当选。因为很多人不得不在新的选区进行竞选，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太多、甚至根本没有赖以取得相当部分选票的个人支持网络。经过自民党“政调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几次激烈斗争，自民党领导人放弃了双票方案，转而同意重新制订方案(Takahashi 1991)。

1992 年秋天，自民党提出了一个新的选举改革方案，支持简单的单一成员选区体系。该方案比前一个明显优越的地方是，这一方式满足了普通议员。通过保证至少是占压倒性优势的政党人士分配

---

①　参见：Takahashi(1991：48～50)。回到前面注释中提到的意大利案例，比例代表和优先投票的结合并未迫使 DC 在竞选人中划分选区。其结果就是党派可以而且确实像在支持者和好处基础上竞争一样在议题基础上竞争。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DC 选举竞争的花费，减少了党内对政府预算的再分配压力。但是，偏好投票计划无疑鼓励对特定偏好的依赖，因此与真正的经济开放不一致。欧洲一体化看来刺激了意大利最近寻求选举改革的运动。

到包括在其现有范围内的选区,自民党的单一成员选区方案平息了在职者不得不从无到有地迎合选民的抱怨。毕竟,自民党现职人员正确地将其选举获胜归结为,在满足偏好和把投票人组织成个人支持网络方面的竞争力。很多人都对在新的规则——将削弱他们与其投票人之间的个人联系或者是将他们受自民党领导人同情而将其列入候选人名单——下赢得选举的能力没有信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与前一个草案相比,自民党的不利之处在于,它更难在参议院通过。

但是,当他们不在位时,在职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与自民党的长期利益相一致。个人捐款使自民党在职者在多成员选区规则下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但却未必在单一成员选区或比例代表投票情况下最适合于支持政党标志。例如,言语游说技巧将使选票组织技巧黯然失色。

正是在不同选举规则下的才能区别,使任何类型的选举改革都成为精打细算的事。一方面,自民党在职者希望其政党保住议会多数。就自民党的选举基础被侵蚀而言,很多在职者愿意采取措施——即便是过激的——来维护自民党的多数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确实希望自己是这一多数的现有成员,并且不被另外不同的——也许更具合适才能的——人取代。

在职者最终支持他们的领导人对其利益负责任,自民党在职者甚至以党的生存为代价,拖延选举改革的进程。毕竟,从在职者的立场看,失败就是失败。对于一个在职者来说,因为党的改革太快——因为变化的人口构成将其选民从其控制下拉走——而失去政治职位是可悲的,即使党因此重新谈判其方案。

在众议院的自民党普通议员和控制了参议院的反对党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毁掉了自民党的选举改革方案。宫泽喜一首相身受自民党内部酝酿的领导变动以及参议院的强硬反对派的压力,孤注一掷,投入更多时间推行改革。其最好的情况是在 1995 年,自民党重新获得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拥有了两院多数之后,自民党能够起草它所愿意的任何改革规则了。对于自民党来说,不幸的是宫泽喜一输掉了。1993 年 12 月,由小泽一郎和羽田孜领导的一个改革小组成立了一个新的派别,维持自民党在推进选举改革方面的缓慢步调。出乎宫泽喜一(以及其他大部分观察家)的意料,这一集团——有 45 人之多——在 1993 年 6 月帮助反对党通过了一个反对宫泽喜一的

不信任案(Nihon keizai shimbun, June 19, 1993)。在一个月后的选举中,自民党失去了其多数地位。自民党也因此在过去38年首次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

取代自民党的多党联合体难以维持长期统治。诸如日本新党成员细川(Hosokawa)等自民党的脱离者,支持对经济解管制和开放市场。小泽一郎在选举前出版的书,强调日本要实行自由贸易和成为“正常国家”(Ozama 1993)。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多数,这些脱党者被迫与经过若干年后变得远比自民党更具城市基础的社会党联合(Curtis 1988)。但是,这些党同意必须改革旧的选举规则,这也是他们竞选纲领的惟一共同之处。他们指责这一规则造成腐败、一党统治、贸易摩擦和一大堆其他政治经济弊病。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不同的政党争夺联合政府主导权,为了如何把单一成员选区和比例代表精确地结合起来而讨价还价。1994年1月29日,国会通过了一个与海部最初方案相似的选举改革法令,要求在单一成员选区设置300个席位,并把另外200个席位给区域比例代表选区。由于反自民党政府缺乏议会多数,从而需要自民党投票在国会通过这一法令,毫不奇怪,这一法令与自民党的第一个改革方案的结局非常相似。

1994年夏天控制了政府的自民党-社会党联盟,比它所取代的反自民党联盟更具有农村基础(Asahi Shimbun, July 7, 1994: p.2)。一旦处在控制选区划分细节的位置上,这一政府为了维护其农村代表,竭力把选区划得支离破碎。在政策上,该政府在农业自由化问题上原地踏步,这使日本的商业界非常失望(Asahi Shimbun, July 5, 1994: p.5; July 6, 1994: p.3)。

但是,不管哪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控制了政府,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长期地位来看,最重要的发展是减少多成员选区产生的党内竞争。正是党内竞争及其导致的选票划分战略导致了日本政治家强烈的保护主义偏见。相反,在新的规则下,政治家将在政党平台的基础上竞争。与呵护拥有昂贵私人偏好的小投票人集团相比,他们具有更强烈的动机考虑多数投票人关心的议题。

这并不是说仅靠选举改革就消灭了贸易保护主义。依靠将选区的界线最终划在何处,农村区域可能仍保留了一些优势。此外,即便没有选区划分问题,组织起来的集团显然比任何代议民主制中的无

组织的个别投票人更具政治效率。虽然如此,政治进入的重要障碍减少了,政治团体将更易于将争论转向更多投票人关注的议题。在某些方面,发生在日本的制度变化可能很像19世纪发生在英国的情形。在英国,1832年取消多成员选区之后的几年里,政党进行了重组,一度是保护主义的保守党开始支持自由贸易。[①]

五、选举制度真的起作用?政策制定中的政治控制与官僚控制

至此,我们通过政治家的选举动机分析了日本的政策趋势。但是,传统认识强调官僚机构在塑造国家政策选择方面的核心地位。日本的官僚机构与混乱的选举和内阁变更是相分离的,就此来说,选举规则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我在下一部分提出,至少与历史是官僚控制的论点相一致,它也是由选举驱动的。

最近的学术文献承认,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家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不断加强(Krauss and Muramatsu 1987; Pempel 1987)。[②] 这些文献含蓄地提出,在自民党统治的前20年,自民党成员很少干预官僚机构的政策制定,自民党成员可能很想这样做,但却没有能力。这些作者谈到了在与官僚机构争夺对政策制定的控制权时自民党政治家面对的障碍,比如在信息、专门技术和威望上的劣势。

官僚机构主导学派认为,自民党普通议员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明显干预,实际上只是在70年代中期后变得广泛起来。但是这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一方面,普通议员对内阁引导的政策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政党在聪明的官僚面前不称职。但是,自民党在职者变得越来越不满意,自民党领导人开始回应选民的城市化。在赢回70年代

---

① 大多数政治学分析强调,英国的工业化转变了经济和社会集团的偏好(McKeown 1989: 379; Rogowski 1989: 34～6; Schonhardt-Bailey 1991: 52)。但是,舍恩哈特-贝利(Schonhardt-Bailey)强调"集中的和分散的利益集团共同"在赢得自由贸易政策上的"作用"的研究,与英国选举制度变化的观点相一致。关于更为明确地分析政治制度地位的资料,参见Blake (1967),特别是Cox (1987, ch.4)。

② 一些学者,其中最有名的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86, 1995),反驳这一看法,即政治家确实从官僚机构手中夺取了权力。

输给反对党的选举基础的努力中(参阅表1.各党拥有的地方立法机构席位),自民党开始分配更多的预算资源给那些反对党成功地支持的公共物品。自民党采取了空前的环境管制,分配更多的资金给社会福利支出,并且建立起一个开支巨大的全国健康保险体系(Anderson 1987; Campbell 1991; Krauss and Simcock 1980; McKean 1981)。

虽然从私人物品的转移在政治上可能是必要的,它在不满的自民党普通议员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支持。在职者早已为构建其个人支持的基础做了大量的特定投资,并且依赖私人物品的流动来保护这些投资。尽管自民党领导人估计到,对公共物品的更慷慨的供应会延缓政党整体的选举失败,私人物品的供应仍然是个人成员所拥有的划分选票并保证其再度当选的最有效手段。因此,自民党所谓的看似对政策更大的控制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只是自民党领导人勉强的许可,允许更多的普通议员"欺骗"党的政策,继续提供私人物品。

表1　1963—1987年各党拥有的地方立法机构席位(百分比)

	自民党	社会党	社民党	共产党	JCP	其他
1963	67.9	19.8	3.2	1.6	0.8	6.7
1967	60.3	21.8	3.8	3.9	1.7	8.5
1971	60.6	18.5	3.5	4.4	4.5	8.5
1975	53.4	16.1	3.9	6.4	3.6	16.7
1979	53.1	14.3	4.0	6.8	4.6	17.6
1983	55.9	14.0	3.8	6.8	3.2	16.3
1987	51.8	16.6	3.9	7.0	4.4	16.4

注:"其他"一栏主要包括独立竞选人,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个或多个政党的松散成员。1968年的《地方政府年鉴》将独立竞选人分为"保守的"和"进步的",但在后来并未这样划分,大概是因为不断增多的竞选人开始稳步推进其与自民党及其反对党的联系。

资料来源:《地方政府年鉴》(Chiho jichi nenken)。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在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保持平衡的特别调整有其局限性。自民党公共物品战略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分配选票。另一方面,更纯粹的私人物品战略的问题是,在一个商业支持者极力削减其捐献的时候,城市化使其成本越来越昂贵。由于无法采取选举改革,自民党继续只是在边缘地带做政策变化的修修补补。

在后自民党时期,联合政府发现比自民党更难于驾驭官僚机构。但是他们的困难并非来自官僚机构的聪明托词和信息优势;考虑到有可能被发现和受到惩罚,反对冒险的官僚不愿意以其职业来赌博。[①] 相反,联盟可能会首先在形成一致目标上就遇到困难。官僚机构仍然不得不努力去预测政治家想要什么,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更为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他们机动空间仍然像以前一样受到政治的限制。[②]

结 论

在评估国际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时,我们研究了三个问题:

1. 什么造成了日本市场开放的滞后?
2.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国际力量驱动日本发生制度变化?
3. 那些变化对于日本未来的世界经济地位产生了什么后果?

尽管我们指出了重要的国际压力,我们发现的却不只是国际力量的单方面影响,而且还有既有制度和选举算计之间的互动。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既有国际又有国内因素。在国际层次,毫不奇怪日本没有像一个"自由贸易霸权国"一样行动,即通过开放其市场的大门促使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日本在其自由贸易支持者美国的羽翼下享有更好的运气。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使日本事实上免费进入其市场,并且帮助日本进入其他市场。只是在日本过去 20 年在世界市场取得显著成功之后,美国才开始对日本进入美国市场附加条件。但是对于日本来说,这些条件与任何可以想象的替代方案比起来,都仍然是廉价的。

在国内,支持自民党的利益集团构成发生了几次变化,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策也应该跟随发生变化。但是,日本的个案显示政治制度在塑造和引导政策制定者动机上的重要性。当制度将其自身作为独立力量时,例如,创造进入政治舞台的障碍,它们

① 参见 Keiwiet and McCubbins (1991)。
② 官僚机构悲哀地确认了这一点。参见 Asahi Shimbun (July5, 1994: p.3)。

可能产生不再确切反映社会力量平衡的政策。

如同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日本权衡替代政策选择的成本和收益的过程主要是选举算计。但是，选举规则如何塑造政治家的动机也很重要。自民党在最重要的选民意愿基础之上制定内外政策。在日本的多成员选区选举规则下，竞选捐献人和组织起来的选票集团——主要是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利益得到了最好维护。

这使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国际力量如何——如果有的话——有助于日本的国内政治重组。日本个案意味着，在某个转折点，要求变化的压力——滤过国内利益集团——会变得足够强大，迫使制度本身发生实质性变化。但是，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在本文集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很难实现评价新的选举利益集团聚集起来的力量何时将导向政策变化"。我们并非指责弗里登—罗戈斯基模式在没有任何模式能解释的地方也失败了。缺乏控制无数的介入变量的更多个案，我们将仍旧无法得到精确的标准。

除了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对国际经济力量的强调之外，我们注意到了国际政治压力的重要性。日本的出口部门感到越来越易于受到贸易报复，催促自民党减少对最没有效率的经济部门的保护。自民党不得不那怕是以痛苦的缓慢步调争取维持一个胜利的选举联盟。最终，支持自民党的生产者利益集团——一端是无效率的，另一端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变得分裂以至于不能维持。

随着商业界的利益集团变化，城市"流动票"在日本的扩大对自民党施加了压力，迫使其调整农业和小商业政策。但是，在日本旧的选举规则下，自民党在计算不太容易预测的城市选票时大打折扣。当自民党在边缘地带改变某些政策时，完全跟从消费者的利益并不是一个胜利的选举战略。在最后的分析中，自民党做微小调整的坚定步伐使其无处可去。由农民、小企业主和大企业主所组成的、步履蹒跚的自民党联盟在 1993 年 7 月瓦解了。

关于随后发生了什么的第三个问题显然是最难回答的。米尔纳和基欧汉提醒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前难以认识什么是基本的变化。日本政治可能会继续在选举中保持过渡态势。各政党将花费一些时间调整适应新的选举动机，将他们联合成为可运作的联盟。但是，对于日本的国际经济关系来说，重要的是日本不再被一个采取私人物品战略来划分选票的主要政党所统治。新的选举规则将使政党及其

更广泛的支持基础彼此竞争，而不是给予竞选者个人的人情回报。

在短期内，由于政治家和政党寻求最佳联合伙伴，日本政治将继续漂泊不定。首先出现的支轴是一个脆弱的城乡划分。但是这将是短暂的，因为新的选举规则实质上矫正了不公正分配代表权问题。自民党临时与其冷战时的死对头社会党结盟，其保持多数地位的尝试是徒劳的。但是这两个党注定要被削弱，正如1995年7月参议院选举显示的，除非等到他们纠正其农村偏见，能够形成具有更广泛吸引大众的支持平台。

无论自民党是否设法恢复其选举好运，经过调整后的选举体系将可能对日本的投票人以及日本的贸易伙伴产生重大影响。在新的选举规则下，政党必须更迎合投票人的利益。这并非因为任何倾向新道德原则的转化，而是因为这将是他们当选的原因。日本可能迟早会采用新闻记者贴在其身上的标签："持久的任人唯亲文化"、"顽固排外"、"根本反感开放市场"。

但是，外国政府不应轻易得出日本会迅速成为顺从伙伴的结论。首先，日本的政党将花费一段时间进行新的政策平台重组，如同19世纪英国政党或今天改革之后的意大利政党。再者，日本答应对自由贸易开放大门之日，也就是日本解除自己对美国负债感的日子。日本不必被接受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对美国的安全合作提供金融支持——来购买美国对其保护主义的忍耐。小泽所写的"正常国家"将是一个比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所看到的更为自信、自我取向的日本。

第三部分

国际化与社会主义

第七章

苏联国际化的制度障碍

马修·伊万杰利斯塔

我国的经济是一种超级中央集权制的,而且是过度中央集权制的。其结果就是一种悖论的出现: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竭力向外扩展边界,因之,欧洲计划于1992年全面对外开放,创立单一的经济体系。从根本上看,这样做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苏联还试图分割成地区性经济呢?

——西西伯利亚库赞巴斯地区煤矿工人罢工顾问,1990年2月(Mandel 1989～91:7)

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认为,工会的核心矛盾是:它们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界定的。实践证明,说服工人按照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制度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即采取一种革命式的而非改良主义的策略,是极其困难的。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身上:他们的利益由旧的经济制度结构所界定,并处于该结构之下。

——彼德·拉特兰(Peter Rutland 1990:322)

与诸多国家相比,苏联在解体前的最后几十年中,其经济国际化程度是最低的。即使把苏联经济统计的可疑性考虑在内,其总体状况

感谢下列机构在研究和创作本文过程中的支持:密执安大学的Memorial-Phoenix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全国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委员会以及哈佛的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我还要感谢"国际化研究课题"的参与者、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PIPES研讨会以及在哈佛苏联研究中心举办的俄林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对该章早期内容所作的评论。在研究过程中,沙伦·沃宁给予了我出色的帮助,在此对她表示特别的谢意。

仍然引人注目。1988 年,即苏联国际经济活动的高峰之年,苏联是世界第二或第三经济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3.6%,但整个苏联的对外贸易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1.7%。当时,苏联出口产品的产值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6%。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总量大约是苏联的 1/7,但它在世界贸易所占的比重高出苏联(当时中国的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1.9%)。1988 年,中国的出口值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3.6%(Feinberg et al.1990:5~8)。甚至在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全面推行之后,按国际标准来说,外国投资在苏联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微不足道。[①]

然而,苏联一直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尽管这种关联处于低水平。19 世纪 70 年代,由于苏联出口能源产品并进口机器和粮食,这种关联和参与显著增加(参见图表 1)。的确,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到 80 年代后期,苏联贸易的增长可与经合组织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相提并论(正如米尔纳和基欧汉、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著章节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参见表 1 和表 2)。从这一方面来看,苏联参与贸易扩展构成了本章分析的出发点。

表 1 1955~1989 年苏联与国家集团的对外贸易

(单位:十亿卢布)

	出口至				进口自			
	世界	经互会	经合组织	欠发达国家	世界	经互会	经合组织	欠发达国家
1955~1959	3.8	2.9	0.6	0.3	3.6	2.7	0.6	0.3
1960~1964	6.0	4.3	1.0	0.7	5.9	4.1	1.2	0.5
1965~1969	8.8	5.9	1.7	1.2	8.0	5.4	1.8	0.8
1970~1974	14.6	8.8	3.4	2.4	13.9	8.5	3.8	1.6
1975~1979	32.7	19.0	8.8	4.9	31.6	17.6	11.0	3.0
1980~1984	62.4	34.4	18.6	9.4	55.7	30.6	18.2	6.9
1985~1989	69.0	43.9	15.4	9.7	66.0	42.9	17.2	5.9

资料来源:OECD 1991,from Vneshniaia torgovlia SSSR annual.

① 根据一位学者的估计,1989 年,外国公司向苏联经济提供了价值 500~800 万卢布的商品和服务,或者说,远低于 GNP 的 0.1%。(Kuzmin 1990:52)。

然而，对以上论点的三个主要限制条件是可以接受的。首先，到本世纪 60 年代末，贸易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乎其微，在如此小规模基础上，即使贸易的扩展比较显著，苏联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中。根据出口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进行排序，在 126 个国家中，苏联倒数第一（Samuelson 1990:154～5）。其次，贸易的扩展并没有对苏联的经济产生国际贸易理论或他国范例所体现的有益影响。[①]尽管苏联经济向世界经济局部开放，在所有主要的经济指数上，它都在继续遭受一种长期的衰退，尤其是在整体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参见表 2）。第三，苏联贸易的特殊结构使这个国家与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割裂开来。用两位苏联改革派经济学家在 80 年代后期著作中的话说，这种经济结构是"殖民地性质的"，依赖这样一种结构，苏联出口原材料，进口代表先进技术的机器（以及粮食）。因此，"尽管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苏联的对外贸易额无论是在相对和绝对的意义上都有所增加，苏联经济基本上仍然是封闭的——封闭得严严实实，因为它几乎没有参与到那些深刻的质变中，而这些变化构成了国际经济纽带发展的特征"（Shmeley and Popov 1989:223～4）。

表 2　1961～1990 年苏联经济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a]	劳动生产增长率（%）
1961～1965	4.8	3.4
1960～1970	5.0	3.2
1971～1975	3.1	2.0
1976～1980	2.2	1.4
1981～1985	1.8	1.3
1986～1990	1.3	NA

[a] 中央情报局预测，与苏联的行为相一致，其国民生产总值将不直接增加物质产出的服务业排除在外。

资料来源：CIA 1988b；Gregory and Stuart 1986：331，335；Ofer 1988：15；Noren and Kurtzweg 1993 .

① 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指出，"恰恰在最封闭的经济中，自由化产生的累积性最大"。参见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文章（本书第二章）。

这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许多改革家认识到,苏联经济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对苏联——特别是在苏联工业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正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勾勒的政治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样。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发动经济改革,其部分动因在于,想把苏联更完全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并且从正在发生的、激动人心的国际经济变化中获益。

苏联与世界经济隔绝留给其制度的遗产,对以上这种融入世界经济的努力造成了重大的障碍。这种隔绝构成了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尽管这种保护主义对整个经济有害——使特殊的利益集团从中捞到好处,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业中的工人,更不消说那些政府官员了,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要管理这种封闭的经济(Hough 1986:489～503)。这一见解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分析是一致的。然而,造成苏联经济与外部世界孤立开来的那些制度,使得国内那些倘若在一种开放的经济中可能繁荣发达的经济行为体,甚至难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更不用说因此采取适当的行动。这一发现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期望落空,并且还表明,国内制度的作用甚至比加勒特和兰格(Garrett-Lange)的制度主义思想框架所预见的作用还要显著。

照这样说来,对于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关系所作的制度论解释来说,苏联的例子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很浅显的个案。与此相对照的是,对于苏联来说,要证实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在第二章提出的论断——即"相对价格的变化对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倾向(尤其是对他们的行为)具有可预见的影响"——却似乎相当困难。

从另一方面看,人们对于苏联是如何终结的普遍印象,进一步彰显了苏联与西方经济竞争的结果,以及与外部世界孤立所造成的苏联经济衰弱这一后果。在米哈伊·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的最后几年,甚至尤其是在鲍里斯·叶利钦统治俄罗斯的头几年,出现了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增加的明显趋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确凿的证据,证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假定的政治机制的确解释了实际情形。他们论证说,贸易的"外部改善"会"增加来自个人、企业和行业——他们能够在全球进行竞争——对贸易自由化的压力,高度隔离的发展中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也如此"。不仅如此,"特定的价格动荡增加了来自特定潜在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压力,甚至在那些政府明显企图庇护

其国内经济不受全球价格动荡影响的地方也如此”。弗里登和罗戈斯基一再坚持认为，他们的“期待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实话说来，我们尤其期待在非常封闭的国家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形”（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他们如此强硬的论断值得研究。

在把政治经济学与苏联国际化的制度主义研究方法联系起来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苏联经济制度的基本情况。本章第一部分指出了控制苏联主要经济资产的行为体，并讨论了他们如何发现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本章紧接着讨论了在苏联政权成立的头12年中，为了控制国际经济对苏联经济的影响，苏联建立起制度壁垒。我特别着重讨论了具有价格均衡机制的外贸垄断，讨论了中央计划的“行政指令”体系，还讨论了一个关键的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如果说，我的论述对于苏联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入门知识，这些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比较经济学这一垂死领域的学者，都谙熟苏联经济体系的详细情况。而那些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人，满脑子设想的是市场制度，并且经常是民主政治。他们对苏联经济体系的基本情况就不那么熟悉了。我对苏联的经济行为体及其制度的论述似乎使人觉得，经济政策的政治极不可能按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设定的方式运转。

即使国际经济没有按照某些政治经济学文献所预料的方式直接运行，它与苏联的政治也几乎毫不相干。本章的下一部分仔细考察了对国际化作用——即它推动改革自由化，并最终促成苏联解体——的三种可能的、但并不相互排斥的解释。这些解释来自各种学术性论述和普通描述，在某些方面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模型相似。第一种解释论证说，70年代西方的价格上升逐步间接地侵袭苏联经济，并且最终对削弱苏联的经济起了一定作用。第二种解释描述了在战后阶段，苏联经济的“半开放”如何产生了一个“新新阶级”，这一阶级为建立一个支持戈尔巴乔夫当时所尝试推行的那种经济和政治改革联盟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解释对苏维埃集团的国际经济参与如何影响了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以及如何决定了苏联自身的命运，做出了概括性的分析。

按理想的情形，检验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假设适用于苏联的情形，会用到关于苏联经济行为体的偏好和行为的详细信息。不幸的

是,尽管苏联已经不存在了,[①] 基本上仍然无法获得这种信息。因此,我对国际化影响的这三种解释——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它们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模型相类似——似真性的批评性分析,只能姑且充当对他们研究方法的一种可能性的准检验。

本章结论部分重点讨论了苏联的能源部门,它是苏联硬通货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苏联藉以增加其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主要途径。首先,我考察能源生产的地区性政治情况,揭示了苏联制度如何阻碍把国际经济刺激直接转化为刺激政治经济学文献所预料的国内政治行为过程。然后,我对煤矿工业做了一个简明的个案研究,目的是试探性地论述在巨大的经济动荡不安时期,当旧制度被粉碎而新制度尚未出现并取而代之时的阶级、部门以及地区冲突政治。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会发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所期望看到的某些动态,但是即使如此,在苏联本身终结之后,斯大林体制的制度遗产仍然对煤矿工人的运动(前苏联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也如此)保持强大的影响。

本章的结论部分概括了苏联制度如何形成与国际经济相对的国内经济行为体利益,国际经济的变化如何通过苏联的制度折射到苏联、影响其国内政治。

一、资产、利益和制度

在苏联,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产都由国家控制着。[②] 这一基本事实——即根本不存在资本的私人所有者——与世界其他地区即使是最封闭的、由最专制政权所统治的经济情形形成尖锐的对照。苏联资产的“所有者”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利、垄断经济交易的人。

苏联的“统治阶级”

垄断权利的“最终储藏室”是共产党的政治局(Hewett and Gad-

---

① 在当前的后苏联阶段,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这样一种严格的检验似乎是不可能的。Stephan De Spiegeleire and Klaus Segbers at the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Ebenhause, Germany 正在进行的一项数据收集和分析是一个有特别美好前景的项目。

② 自50年代以来,甚至集体农庄(kolkhozy)——没有被国家直接拥有的主要制度——也已经越来越类似国家农庄(sovkhozy),或者干脆被国家农庄所代替。成员领取工资,对名义上集体所有资产的处置没有任何发言权。

dy 1992 :20; Pejovich 1990)。党的中央委员会、政府部长会议以及最直接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实施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之下,是一大批官僚在管理着苏联的经济。这些人从斯大林式的行政指令体制和追求自给自足的"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中获利最大,对观察家们来说,这一点在该制度产生时就很明显了。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的称呼——干部也罢,官僚也罢,大多数分析家们指的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经济阶层。对里昂·托洛斯基来说,干部"本质上是统治和命令的机关。干部'崇拜'最重要的是指官僚主义崇拜、官场崇拜、会要手腕的贵族阶层统治崇拜"(Trotsky 1937:238)。

尽管托洛斯基不愿意把官僚视为一个阶级,继他之后的分析家们却明确称之为阶级。迪吉拉斯认为,"可以说,这一新阶级由那些凭借手中掌握的行政垄断而获得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构成"(Djilas 1957:39; Winiecki 1989)。沃斯伦斯基(Voslensky 1984:11)评论道:"这些行政官员完全符合列宁对阶级的定义。由于这一阶级在苏联的生产和所有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发挥最主要的作用,它是苏联的统治阶级,是压迫其他所有阶级的阶级——由此产生了我们国家的阶级仇恨(对抗、敌视)。"

尽管苏联社会包含形形色色、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它们在范围上超过了以上概括所揭示的内容,[①]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斥之为心怀怨恨的逃亡者(Voslensky)或精英权利斗争失败者(Trotsky, Djilas)的夸大其词。理解职位(nomenklatura)在苏联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对分析特殊利益集团如何追求其经济利益——相对于国际经济及其他——是必不可少的。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说,党政官员(apparatchiki)的统治阶层以及经济领域的行政官员建立起了一种产权结构,其目的是凭借经济垄断来最大化其"租金"(Winiecki 1989)。在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体制中,这些人的工资和其他凭借其权利而得到的额外好处(尤其是可以享受短缺的商品和服务),与其在职位任命名单上——必须由各级党组织批准的一系列职位名单——的位置直接相关(Voslensky

① 例如,可参见苏联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所作的有关论述:Tatyana Zaslavskaya (1990: ch, 4)。

1984)。这种职位结构在整个苏联都发挥作用,甚至在一个名义上的联邦体制中,资产的最终控制权仍在莫斯科。

人们可以提出一个似乎合理的论点,即苏联社会的统治阶层既通过与国际经济孤立、又通过有选择地接近国际经济来维护他们的权利。在某一个时期,他们的这一手段还充当了一种经济发展策略,用严格控制的国际贸易来补偿其制度缺陷——这种制度,用"官僚主义式的中央集权主义"来概括再合适不过(Arato 1978; Luke and Boggs 1982)。在这些缺陷中,最明显的是缺乏技术创新(Amann and Cooper 1982; Amann, Cooper, and Davies 1977)。无论是作为发展策略还是维护政治权利的手段,苏联方式为它以后自己的灭亡播下了种子。[①]

中央计划和外贸垄断

试图把苏联的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孤立开来的两大主要制度,是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及中央计划的"行政性指令体制"。贸易垄断在指令性经济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它是列宁本人不顾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其他人的反对而建立起来的。列宁认为(引自 Hough 1988:11～12):

> 我们的国界与其说是由习俗或边防战士所维持,还不如说是由外贸垄断所维持……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穷国和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的时代,没有任何……都是无效的。任何富裕的工业国家都可能彻底打破这一保护。我们可以把俄国变成一个工业大国,不依靠任何关税政策,而纯粹依靠外贸垄断。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任何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都完全是假的——是纸上的保护主义。

正如杰瑞·霍夫(Jerry Hough 1988:12)所指出的,"列宁的后继者继续推行其政策,但它被真正地制度化并得以强化,并不是通过外贸垄断,而是通过 30 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体系"。尤其重要的是如

---

① 在这一点上,卢克和伯格斯的文章最有预见性。他们的文章写于苏联解体 10 年前:Luke and Boggs: 1982 .

下事实的存在:价格由中央政府所决定,并且被用作计量手段,而不是作为资源分配的信号。这样一来,苏联的发展过程就能够不受重大的国际干扰,例如说大萧条。当然,对苏联这一世界上面积最大、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来说,这一政策帮助苏联实现了一种特别有利的地位,来努力建立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政策。

甚至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已经开始通过扩大国际贸易从自给自足中走出来,苏联还是能够弱化世界经济变化对它的影响。与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情形不同,国际经济的变化不是直接通过价格这一媒介来影响苏联经济的。设置中央计划体系的本来意图即使不能说是为了使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丝毫不对苏联经济起作用,也是为了缓冲和延迟这种影响。它的确在很多方面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苏联采用所谓的价格均衡体系,即通过税收和补贴,补偿出口和进口产品外币价格的变化,从而使苏联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分割开来。结果,苏联外部价格的变化影响了苏联的国家预算,但正如最近一份重要国际研究报告做出的结论(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1, 1:363),这对苏联的"国内价格、生产或消费却丝毫没有影响"。与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正好相反,1987 年之前,苏联的汇率也像国内价格一样被用做一种计账单位,在资源的分配中不起任何作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1, 1:363)。

苏联蓄意设立外贸垄断,其目的是使苏联的出口商品生产者和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与其国外顾客和供应商隔离开来。苏联企业附属于中央计划组织及各部门,并且被迫强制性地服从中央的指令,而不是遵从国外市场的信号。艾德·休维特(Ed Hewett 1984:13)解释了该苏联体制如何一直运转到了 80 年代的后半期:

> 中央对外贸的控制是整个体制的组成部分。大凡有点重要性的苏联企业,没有一个有权利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出口或进口商品。它必须通过各部来获得进口许可证,或者由各部告诉它应该出口什么商品。实际的交易由一个外贸组织(FTO)所操纵,这个组织专营所涉及到的产品,并且还要接受外贸部的监督管理。把某产品运到一个外贸组织来出口的国内企业,得到的是工业批发价格,不管这一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相对来说是高还是低。

在旧的体系下,价格没有发挥调节企业生产这一作用。如果某一个别的企业生产出了一种出口产品,而这种产品的国际价格正在上涨,这个企业在自己的收入方面不会发现什么变化。额外的利润会转到国家预算中。

以上制度安排导致了两种后果。在外方与苏联一方之间进行国际交易时进行干预的官僚主义结构,经常增加了交易成本,并且导致不那么理想的结果——例如,苏联的公司为完成某一方面任务而要求得到西方技术,但当他们得到西方的技术时,却发现这一技术不适用于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价格均衡体系所带来的后果,苏联的企业都没有扩大出口的动力。物质刺激——例如以工人或管理奖金的形式——都与计划的完成相挂钩,并且国内商品的标准比出口商品的标准普遍要低。正如两位学者(Shmelev and Popov 1989:221)所指出的,"出口商品的交货所得到的报酬,与国内市场上的交货得到的是同样多的卢布,享受同样的价格。但是,出口商品的交货,比为当地消费者所专门生产的某一产品的交货要更麻烦,因为当地的消费者并不是那么难以打发"。这样一来,苏联的企业宁愿完成国内市场的产品计划(Bykov:1988:14; Ryzhkov 1992:252~3)。

民主集中制

苏联的经济制度,例如中央计划和外贸垄断,明显造成了与国际市场打交道的企业和工人所面对的那些经济刺激。苏联的集体和个人又进一步受到关键的政治制度——即民主集中制的约束。按照这一制度,共产党的领导通过负责各级经济和政治管理的职位任命制度来加强纪律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集体和个人能够在国际经济的大背景下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也不能总是按照这些利益来采取适当的行动。

二、国际化的间接影响

尽管苏联有意识地创立一些制度来削弱国际经济变化对苏联经济的影响,几位观察家还是发现了国际化可能影响苏联政治和经济的间接途径。我在这里探讨如下三种途径:第一种主要是经济方面

的；第二种主要是政治方面的；第三种则是政治、经济兼而有之。

国际化、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

苏联的经济体制对国际经济影响所设置的障碍，使某些观察家也一致认为，"如果说，70年代的国际经济动荡还算曾经影响过苏联经济表现的话，这种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苏联经济管理的原则……有效地阻止了苏联发生这样一种转化：即为了全部就业率、稳定增长和价格稳定的缘故牺牲微观经济效率，从而将外在的经济动荡转化为自动的、自我繁殖的内部不平衡"（Rosefielde 1980）。

声称外部经济变化对苏联经济毫无影响，显然是言过其实。事实上，一些分析家认为，尽管苏联的中央计划者们尽了最大努力来使苏联的经济与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隔绝开来，从一个方面讲，他们却一败涂地。即使关键的贸易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从来没有以国内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苏联经济却遭受与西方同样的后果，即通货膨胀。尽管这并不总是在价格方面表现出来，某些通货膨胀——按照他们的这一论点——却是从西方进口到了苏联体系之中，并且在不知不觉之间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通过"隐性通货膨胀"、受遏制的通货膨胀及巨大的预算赤字表现出来。[①]

我们的基本论点如下：苏联是一个主要的出口国，在20世纪70年代，当石油价格猛涨时，苏联大发硬通货横财。苏联是最重要的黄金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当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签约国对金本位不再感兴趣、导致黄金价格下跌时，苏联也从中获益匪浅。[②] 苏联人利用他们新的石油美元储备，通过进口小麦来补偿一连串坏收成造成的农业产量不足。他们还购买西方的机床和装备，目的之一是使他们的油田和炼油厂更新换代。

苏联的计划者们使其进口产品上涨的价格未能影响苏联国内的价格，这部分看起来是通过主观规划达到的，部分看起来出于偶然。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解释了这一做法背后的心理因素："在苏联的计划

① 欲了解隐性通货膨胀和受抑制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区别，请参见 Kornai（1992：255～7）。

② 以下诸多观点取自 Moody（1991：21～5）。感谢彼得·兰格（Peter Lange）使笔者注意到这一点。

经济中,基于平衡方法,一种既趋向对外经济关系又趋向某一部门的做法逐渐生根了,此时,进口产品充当一种补偿国内短缺商品的手段,而出口产品则被看做是必要的邪恶,表面上看来仅仅是为了给进口商品付款”(Bykov 1988;Shmelev and Popov 1989:221)。结果,缺乏一种使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协调一致的机制。正如弗拉德密尔·特雷梅尔(Treml 1980:185)所指出的:

> 勿庸置言,外部经济动荡的传递,与通过国内价值表现出来的、对外贸流通的内部计划及管理密切相关并且取决于二者。尽管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就国内价格而言,苏联(过去和现在的)计划体系的运转完全缺乏一种明确承认的或单独准备实施的、有关商品进出口的国家计划……缺乏一种总体计划来表明按照国内价值计算的外贸流通与其他经济活动融为一体。

将国内经济与外部价格动荡孤立开来,是苏联故意采取的政策,其背后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及实用主义动机。从最世俗的层次上讲,苏联官方不愿提高面包的价格。即使硬红冬麦——苏联所进口的主要小麦品种——的价格从1970年的每一蒲式耳1.54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4.45美元,从1955年直到现在1991年,一公斤面包的价格却一直维持在0.2卢布(Moody 1991:23)。苏联的计划者们开始采用补贴的办法,补偿物资采办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距,从而弥补上面所提到的亏空。[①] 1982年,补贴数额是299亿卢布,两年之后,数额增加到达547亿卢布。1984年的补贴数额占当年政府预算的14.2%(Hewett 1987:133)。

苏联增加补贴之时,正值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经历长期大幅下跌之际。奇怪的是,80年代早期,当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开始下跌时(参见表3),苏联当局却决定提高供给国内工业消费者的石油价格——增加了一倍还多。如果企业承受不了这种价格上涨,它们就干脆把这种上涨的价格转嫁到政府头上,要求进一步增加补贴——政府可不允许它们破产。结果就导致了中央预算赤字。政府通过加

① 并不是所有的进口商品都是以此种方式补贴的。例如,消费品的标价就反映了世界市场上的价值,某些中介商品也是如此。请参见Treml(1980)。

印卢布为这种赤字"提供资金"。当消费品短缺最严重的时候,苏联市民发现他们手头可支配的收入反而多了。甚至黑市——它与国家部门不同,因为它的价格的的确确反映出通货膨胀——也无法补偿过量的消费需求。腐败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勃列日涅夫领导阶层与苏联人民之间的契约破裂了(Millar 1985)。很明显,早在戈尔巴乔夫 1985 年上台之前,很多苏联人就已经准备改革了。

表 3　1973～1987 年苏联内部使用的石油价格与世界市场石油价格

(美元/桶)

年　份	苏联内部使用的石油价格[a]	世界市场石油价格[b]
1973	4.63	3.39
1974	4.53	11.29
1975	4.77	11.02
1976	4.56	11.77
1977	4.60	12.88
1978	5.01	12.93
1979	5.21	18.67
1980	5.28	30.87
1981	4.77	34.50
1982	10.87	33.63
1983	10.64	29.31
1984	9.69	28.70
1985	9.46	23.49
1986	11.19	17.90
1987	12.45	17.82

注: 所有价格至多是近似的,其意图仅是反映趋势。

[a] 苏联的石油消费企业支付的石油价格(与表 4 所示的石油生产者接受的价格相对),按照当年官方汇率从卢布转换为美元。

[b] 经合组织国家的官方平均售价(1973 年实行的是固定价格,因而除外)。

资料来源: Hewett 1984; CIA 1986, 1988a.

然而,正如休维特和盖迪(Hewett and Gaddy 1992: 13)所指出的,当时的国际经济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利:

在 1985 年至 1989 年间,石油价格下跌了 40%——价格下跌几

乎都发生在 1986 年——从而使苏联向发达国家的所有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被迫下降 25%。因为进口产品的价格是稳定的(的确,谷物的价格甚至还略有上升),苏联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在这些年间减少了 20%。1986～1989 年,苏联出口产品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给苏联造成的年均损失高达近 50 亿美元。

苏联计划者们主要通过向外国借债来补偿这种损失,从而使苏联的净美元外债在 4 年间翻了一番(Hewett and Gaddy 1992:13; Ryzhkov 1992:229～30)。

苏联所发生的这一切似乎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模型相一致,尤其是与他们的假说——即“(贸易的)外部改善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趋势输入到了国内政治中”——相一致。然而,这一说法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难道国际化是当时苏联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的原因?通货膨胀当时有重要的国内根源,很多原因是中央管理的“短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由于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军事部门,又使情形进一步恶化。[①] 人们无需以国际经济为理由解释苏联为什么经历了通货膨胀(Kornai 1992: 278～86)。同样,除了贸易额减少这一原因之外,预算赤字还有其他很多原因(Birman 1990)。事实上,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平衡预算的看法相反,国家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好几次故意制造赤字——最突出的一次是在 1953 年,60 年代中晚期又故态复萌。很显然,出现预算赤字是对国际发展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国内政治紧急事态——这些事态是某些苏联领导人建立联盟策略的一部分——所做出的反应(Roeder 1993: 151～3)。最后一点是:在苏联这样规模的经济中,贸易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很小一部分,人们不会期望外界的冲击——主要是价格的急剧变化——对整个经济产生显著影响。[②]

如果支持弗里登—罗戈斯基的假设,人们也许会争辩说:由于苏

---

① 在保持着详细记录的 1987 年政治局会议上,财政部长出示了一份关于通货膨胀的报告,人们对当时内部资料的很多内容进行了讨论,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国际经济(Cherniaev 1993:145～6)。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在其回忆录中(Ryzhkov 1992: 229),的确提到了 1986 年石油价格猛跌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苏联对外贸易的能源出口依赖结构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错误”之一,但不是一个主要的错误。

② 感谢黄亚胜(Yasheng Huang)就该观点及以下论述提供的帮助。

联贸易的特殊结构,它比人们所预料的更容易受到进口通货膨胀的伤害。例如,1986 年,在苏联的进口产品中,农业产品和机械占主导地位,分别占 17.1% 和 40.7%,其中,后者主要是苏联当时所匮乏的、先进的技术车床。这两个部门的价格上涨可能波及到整个经济。在出口方面,1986 年,能源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占苏联出口产品的 64%(燃料和电力这两项就占了 47.3%)。即使当局竭力保护国内工业,防止为能源投入付出更高的世界市场价格,它对国内能源使用补贴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也是相当可观的。

因此,对"全球趋势输入"这一假说的准检验,结果是很复杂的。在很多方面,该假说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同样有力的、基于经济表现糟糕之国内决定因素基础上的解释。

国际化与改革派联盟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发起苏联经济改革战役之始,就遇到了不利的国际经济发展的阻碍(主要是贸易额的下降)。这些阻碍因素,连同极其严重的国内政策失误,最终削弱了改革。然而,据某些解释,正是国际经济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苏联在 50 年代对国际经济的部分开放,为改革派联盟提供了最初的基础,而这一联盟又使戈尔巴乔夫得以掌权。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切将如何发生,亚历山大·亚诺夫提供了一个格外饶有趣味的观点(Yanov 1977)——他几乎在改革前 10 年就著书立说对此加以分析。笔者用他的论述作为代表性解释,这些解释将苏联改革派政治的出现与经济衰落联系在一起,而人们把这种衰落主要归因于与世界市场的脱离,以及缓和时期对西方的部分开放。乍看起来,这些解释似乎使人们更相信关于国内外联系的、更为正式的弗里登—罗戈斯基模型。

亚诺夫认为,改革苏联体系的最佳可能性,是由知识界、才能卓越、训练有素的企业经理以及苏联的"贵族"——即那些想使自己的利益更稳固,甚至使之成为世袭的、享有特权的精英——之间的潜在联盟所提供的。亚诺夫(1977:3)认为:"只有当苏联变成一种半开放的制度时,当与西方的商业、科学、文化以及技术的接触开始迅速地扩大时,后一阶层是可能出现的。"那时,他们"获得了去西方旅游的专利",对西方的消费品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变得习惯了。亚诺夫

称之为"新新阶级",他们感觉到需要经济改革,为其特权对人民做出补偿,向人民提供"至少最低的欧洲生活水准"。

这一新新阶级该与"技术结构"——那些富有才智的经理和工程师——找到了共同的行动目的这一"技术结构"认为,地方党组织的老板("小斯大林")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国家计划部门的盟友自作聪明,其指导碍手碍脚。这些经理和工程师"被技术革命的思想完全吸引住了,他们对苏联的落后、苏联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苏联的低人一等感到耻辱"(Yanov 1977:29)。[①] 这两个群体与主张西化的知识界联合起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在 70 年代就担心苏联正将自己与全球的"科技革命"孤立开来,他们担心,如果苏联不使自己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就会在经济上落后(Arbatov 1991;Burlatskii 1991; Hoffmann and Laird 1982;Parrot 1983,1985)。亚诺夫(1977:15)在这三个团体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纲领,它会"使保证特权(精英中的积极部分)成为可能,使经济重建[②] 的保证成为可能(为了经理这一阶级),使保证基本人权成为可能(为了知识界);并且它使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即一个积极的社会制度中的所有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系"。

在预测最初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派联盟及反对并最终试图推翻戈氏的集团方面,亚诺夫的分析相当成功。[③]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随即出现的大多事件——尤其是政治家、知识分子、军官以及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经理的回忆录所描述的——似乎与亚诺夫的解释相一致。每个人似乎差不多是按照亚诺夫所预测的那样认清了自身利益之所在,并尽力打造适合的政治联盟(Aszhubei 1989;Akhromeev and Kornienko 1992;Arbotov 1991;Burlatskii 1991; Cherniaev 1993;Falin 1993;Ligachev 1993; Mikhailov 1993;Ryzhkov 1992;Shevardnadze 1991;Shmelev and Popov 1989;Zaslavskaya 1990)。不仅如此,亚诺

① 关于苏联经济无法与西方竞争给苏联人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亦可参见如下类似观点:Halliday (1992)。

② 亚诺夫从来都是把他提出的经济改革称为"重建"。按照最原始的俄文版本,可能是"perestroika"。

③ 欲了解关于改革早期的高层政治,以及各个领导人的选民情况,请参阅 Aslund (1989)。想了解知识界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观点,请参阅 Flaherty (1991),Schwartz (1991)和 Singer (1991)。

夫把国际环境视为国内变化的刺激,这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与各回忆录提供的证据相符。[①]

从表面上看,亚诺夫的解释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模型有很多共同点:与国际竞争隔离造成了技术上的停滞不前;更大程度的开放和自由化的倡导者形成一种联盟,反对那些鼓吹继续实行孤立和保护政策的人;部分的开放导致更进一步要求开放。然而,事实上,某些相似只是表面上的,还有可能是假的。例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认为,自由化的支持者是世界市场价格正在上涨之资产的所有者;亚诺夫认为,自由化的支持者可以是任何一个部门的经理,只要他们有能力,并对党的统治和计划感到灰心失望。当然,技术停滞是亚诺夫解释和弗里登—罗戈斯基模型所共同关注的,但事实上,任何从理论(以及非理论)角度对中央计划失败进行的分析都涉及到了这一点。最后一点是,亚诺夫假说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取决于非经济因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西方文化和旅游的诱惑,人权和个人自由的价值,经理们渴望在一种理性的、能人统治的环境中工作的欲望。从这些描述中寻求对改革的解释,很难将如此荣誉赋予国际经济,难以将刺激经济自由化的动力与要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改革的压力分清开来。对那些行为体本身而言,情形很可能也如此。[②]

国际化与帝国的终结

将苏联参与国际经济与国内政治变化联系起来的第三种分析,涉及到了与东欧的经济关系。在这一分析中,石油价格又发挥了关键作用。基本的论点认为:尽管1973年之后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苏联继续以特许价格——通过5年平均浮动的机制——向其东欧盟国出售石油(Bunce 1985; Marrese Vanous 1983)。因此,苏联因为没有按照世界市场上石油的完全价值出售、因为不卖石油以换取

---

① 卢克和伯格斯与亚诺夫的描述相一致。卢克和伯格斯认为,他们所称的"从上而下的技术官僚改革"与苏联不得不进行的技术革新和世界市场所进行的调整极为兼容,尽管他们正确地预料到,"这不会解决不平衡增长的基本矛盾"(Luke and Boggs 1982:123～4)。苏联很多回忆录的撰写者采用了类似的分析。

② 例如,可参见如下文献所提供的细致描述:Remnick (1994),Smith (1990)。

硬通货而忍受了某些机会成本(参见表4)。[①] 不仅如此,东欧共产主义政权逐渐依赖享受补贴的能源进口产品,作为维持足以使其老百姓安分的经济增长率的手段。紧接着西方银行向东欧政权大批贷款这一阶段之后,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使苏联盟国陷入危险的经济状况中。波兰的形势表明,经济增长是维持这一地区稳定的、亲莫斯科政权的一个必要但是也许不是充足的条件。

表4 1971～1982年世界石油价格与苏联石油生产和出口的价格比较

(美元/桶)

年份	苏联价格			世界价格[b]
	向生产者支付的价格[a]	向西方出口的价格	向经互会出口的价格	
1971	3.33	2.42	2.28	1.75
1972	3.63	2.42	2.73	1.90
1973	4.05	4.58	2.96	3.39
1974	3.96	11.23	3.29	11.29
1975	4.17	11.45	6.40	11.02
1976	3.99	12.31	6.68	11.77
1977	4.02	13.88	8.61	12.88
1978	4.38	13.41	11.15	12.93
1979	4.56	25.52	13.01	18.67
1980	4.62	34.76	14.59	30.87
1981	4.17	35.81	17.20	34.50
1982	4.14	33.00	NA	33.63

注:所有价格至多是近似的,其意图仅是反映趋势。

[a] 苏联向石油生产者支付的价格(与表3所示的苏联石油工业企业必须支付的价格相对),按照当年官方汇率从卢布转换为美元。

[b] 按照中东轻原油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Hewett 1984:135,155,163;CIA 1986.

随着国内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以及能源生产的停滞不前,苏联领

① 70年代,苏联继续向东欧之外的国家按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石油而获得滚滚利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石油都是按照这一价格卖出去的,因此苏联仍然不得不付出机会成本。

导人开始寻求另外的可能性，来替代他们正在向其盟国所提供的沉重补贴。当米哈依·戈尔巴乔夫上任时，重新思考苏联的政策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我们仍然不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确切看法。起初，他似乎赞成更大程度地融入经互会，作为改善苏联经济前景的途径。后来，他似乎认为，允许与西欧更多的经济接触，尤其是东西两德之间的关系，会使经互会得以从西方技术和投资转移中受益(Gorbachev 1987:164～9)。不管他的意图如何，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政治推行的"公开性"政策及其外交"新思维"，使苏联的保护国家中人民长期压抑的、强烈的政治和经济不满爆发了出来。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第一次遭到削弱，也随着波兰共产主义者和后来被推翻的团结工会之间"圆桌"联合政府的建立，示威运动的影响从东欧波及到苏联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人们可能争辩说，在这一方面，苏联集团的国际化在苏联解体中也起了作用。

很明显，如同其他两个个案，该事例证实了弗里登—罗戈斯基模型的某些关键点，尤其与如下现象相关：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上涨时，它通过维持人为的低价格而导致经济扭曲。一位曾亲身经历与东欧关系的前苏联官员估计，价格差距使苏联每年损失相当于60到80亿美元，消除这一切、直接转到一种以硬通货为基础的关系上会对苏联的保护国造成不稳定(Falin 1993:451～452)。

但是，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对该形势政治含义的论述与苏联几无相似之处。尽管他们期望"个人、公司和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工业——在何种情形下苏联的石油工业——会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贸易自由化"，我们发现，要求变革的动力，削减向东欧石油出口补贴的计划，并不是能源部门官员院外游说的结果。与东欧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外交政策涵义。相关决定是由中央政治局最高层做出的(Akhromeev and Kornienko 1991:67～9; Gherniaev 1993:81～2; Falin 1993:451～2:Gorbachev 1987:164～9)。地区或部门经济利益集团的压力根本不起作用。的确，正如以下部分所论证的，苏联制度的性质阻碍了经济行为体在面对国际经济时追求、甚至认清自己的利益——如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定义的那些利益。

三、制度限制与利益认识

新古典贸易理论及其派生的政治模型(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模型)可能认为,随着世界贸易的扩大,苏联与国际经济脱离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一般而言,国际经济交易越容易,维持经济封闭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大,全球经济趋势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影响就越显著——不管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封闭程度如何”。然而,尽管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未能完全保护苏联经济免受世界市场变幻莫测的影响,它们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还继续存在),扭曲了国际经济变化对苏联国内行为体的影响。

苏联制度的扭曲性影响,在苏联的地区政治中表现尤为显著。在这里,一种假定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政治之间直接的、未经制度调和的关系模型会预测到,针对某些国际机会变动——如价格波动引致的机会——所做出的地区性反应。根据这一逻辑,那些因直接进入世界市场而获益最大的地区最有可能要求自由化。根据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这样期望,因为他们承认“在非常封闭的经济中……大规模的扭曲使潜在的自由化获利者和吃亏者的身份变得模糊了”。然而,他们认为,这些扭曲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前苏联石油和铀产区——最不起作用。因此,苏联对外经济政策的地区性政治应当构成对弗里登—罗戈斯基假说的公平验证。

地区性政治和能源部门

我们最期望在能源部门观察到国际经济对苏联地区政治的影响。1985 年,能源出口占苏联向非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产品的 57%(其中军备占 16%),仅石油出口就占 44%(Hewett and Gaddy 1992: 11)。根据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勾勒的分析框架,人们会认为,70 年代,随着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猛涨,掌握石油储备等资产的人会从石油价格上涨中获取好处。但是,当时哪些人掌握着这些资产呢?在苏维埃制度下,在苏联的任何地区,当时控制着经济资产的人是莫斯科相关部门的部长们、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最高层的

中央政治局。这些官员的确采取了行动,以便从“他们的”资产——例如石油——中获取最大的回报,但是这种利益还是限制在其他目标的范围内,例如维持东欧稳定,向能源产品提供补贴以防效率低下的国内企业债务缠身。

根据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框架,人们还有可能假设:地区经济官员和企业会把自己视为当地资产的合法拥有者,并试图强化对这些资产的控制,以便从世界市场的价格变化中获利。然而,中央制度的力量太强大了,地区性和其他行为体在国际经济面前基本上不能领会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甚至即使不顾那些可怕的反对赞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机制的禁令也无济于事。中央计划体系通过其对国内经济的效率低下的经营管理,实际上为围绕经济改革本身的辩论确立了议程和条件。任何一位改革者——包括地区经济当局——其议事日程的第一项是削弱中央计划者的权力,减少过度中央集权及官僚主义的主观臆断。简言之,其利益可能受到国际市场变化影响的那些人,首先必须与行政指令经济的制度做斗争,这些制度阻碍了他们清楚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更不用说为此采取行动了。

“社会主义的联邦主义”制度以及行政指令经济,阻碍了人们追求局部的利益,但并没有消除这些利益的所有外在表现。不过,人们很难争辩说:在能源丰富的地区,地区性行为体的行为是对外部经济趋势(如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变化)的反应,而不是作为苏联经济和政治制度缺陷的功能而出现。相反,正如巴瑞(Bahry 1987:87～8)所主张的,“早在70年代能源危机将国家政府议程表上的能源、燃料以及自然资源的位置往前大大推进之前,这些东西已经是地区官员所全力关注的目标了”。学者们已经发现了证据,说明煤产区、天然气及石油产区为了争夺中央投资的优先权而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存在于一种全然不顾国际形势的中央计划性短缺经济中(Biddulph 1983:41)。

苏联当局有意识地限制国际化对苏联国内能源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影响,其手段是依赖对相对价格的操纵。例如,尽管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了很多倍,从1967年到1982年,对苏联石油生产企业来说,国内石油价格几乎保持不变(见表4)。尽管这种人为的国内价格稳定可能减少了潜在的中短期地区冲突,但从长远看来,它造成的经济后果是削了弱苏联制度。正如休维特、古斯塔夫森及其他

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试图使苏联经济免遭国外市场的压力削弱了能源部门以及整个经济中重要的政权目标。保持恒定的国内石油价格没有刺激企业保护能源,例如,石油勘探队发现新石油,本来是要得到报酬的,但是因为价格的恒定,这种潜在的报酬就不可能了。另外,它还抹杀了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积极性(Gustafson 1989; Hewett 1984: 14)。这些后果,正是弗里登和罗戈斯基预言并视为经济封闭所付出的静态和动态效率代价。

从政治立场看来,由价格平均体系、政府审查制度及对世界能源价格信息的洽谈限制所代表的制度障碍共同作用,使受到潜在影响的群体不能在国际经济面前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甚至辨别自身利益之所在,这些方式是开放经济中类似群体所采取的方式。请注意:苏联制度限制的这种特征,与加勒特、兰格评价制度的影响的方式不同。加勒特和兰格仅仅集中在"自然的偏爱与政府行为之间制度的调和作用",并且特别考虑到政府对国内偏好的变化及中央银行等独立官僚机构影响的反应。笔者认为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更强些。中央计划、外贸垄断及民主集中制扭曲了集体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实际理解(perceptim),以及如何将偏好转化为国家政策。

斯大林式的经济制度,其实质内容一直持续到苏联阶段的终结,在其早期阶段,这种制度可能一直作为实现高速工业发展和建立军事力量的一种战略来发挥作用,它还发挥了缓冲30年代"大萧条"的危险影响这一作用。然而,到50年代,人们普遍(至少在知识界是如此)理解到:这些制度变得毫无用处,已经成为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障碍,尽管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这一事实才产生高层共识(Arbatov 1991; Burlatskii 1991; Medvedev 1974)。用熊彼特的话说,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变成一种返祖的、反生产力的东西。[1] 只有当那些过时的制度遭到攻击时,而且世界经济的特定领域(如能源)发生变化,地区及其他的利益集团才有机会按照人们所预料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利益。

---

① 杰克·斯纳德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现象时(Jack Snyder 1987/88)采用了熊彼特的观点。

四、制度遗产和新机遇

我们发现,国际经济的变化、苏联的参与程度与苏联经济和政体中的某些变化——尤其是通货膨胀的加深、预算赤字、生活水平的下降、改革派联盟的出现——在时间上恰好重合。但是,从经验角度看,将国际原因和国内原因区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认为,国际经济的变化对苏联国内的资产持有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对那些资产的控制高度集中于政治精英身上;其二是制度调和并缓冲了国际交易。

评价制度因素作为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之间干预变量,其方法之一是改变它们,看会出现什么情况。令人高兴的事,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苏联的情形就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实验"。即使苏联本身仍保持完整无损,但消除共产党的政治独裁、倡导竞争性选举及经济资产私有化、非中央集权化的前景,应当对国际经济如何影响国内利益产生某些影响。

某些证据表明,8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国内结构的变化的确对其他问题领域——如环境和安全政策——的国际、跨国及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Checkel 1993; Darst 1994; Evangelista 1995)。在经济领域,我们预料变化并不那么显著。私有化、特别是大型工业企业的私有化进展缓慢,在没有其他可行性的情况下,加上政治抵制和官僚抵制,由国家控制和指导的诸多经济机构继续运行。然而,如果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还在持续的话,人们应当能够发现既有变化带来的某些影响,还能够预料未来变化的方向。

煤炭工业

探索国内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前苏联的煤炭工业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研究个案。它在国际经济背景下的地位类似于石油工业(参见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关于替代性商品的论述):70年代期间,世界市场上煤的价格上涨,但同期国内市场上煤的价格却停滞不前(见表5)。然而,与石油部门相比,对煤炭工业的相关行为体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人们却了解更多。其原因很简单,即始于1989年6月的煤矿工人罢工潮。罢工潮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动员,提供了煤

炭工业的相关人士利益的丰富证据——尽管这些证据主要是奇闻逸事,相对来说并不系统。

苏联煤矿工人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研究外部经济环境与内部制度遗产间相互作用的机会。这一个案提供了部门、地区及阶级冲突的证据,似乎支持了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研究思路所可能预料到的那些关系。然而,这一个案特别有力地支持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研究思路,其原因是,他们认为,在非常封闭的经济中,"大量的扭曲模糊了自由化带来的潜在受益者和受害者的身份"。

表 5 1970～1989 年苏联与世界的煤炭价格

(美元/吨)

年份	苏联价格[a]	美国价格[b]
1970～1973	14.26	8.13
1974～1985	16.35	25.17
1986～1989	23.58	24.93

注:所有价格至多是近似的,其意图仅是反映趋势。

[a] 气煤。

[b] 按照离岸价格计算的沥青煤和褐煤。

资料来源:OECD and IEA 1992.

地区性差异　煤炭工业之所以特别有价值,原因之一在于其地区性差异。[①]三个主要的煤产区——西西伯利亚的库兹涅兹盆地(库兹巴斯)、东乌克兰的顿涅兹克盆地(顿巴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占苏联煤产量的一半多(Hewett 1984:86)。它们的不同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相对容易开采的矿床上,库兹巴斯一般就有高质量的煤矿。按苏联的标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很高,部分是因为在西伯利亚工作的奖金很丰厚。库兹巴斯煤矿工人似乎很自信,他们的煤矿能够赚钱。在 1990 年,他们就已经与日本签署了出口合同,并且鼓动自己经营自己的煤矿(Mandel 1991:111)。(顿巴斯)的煤矿工人更悲观些——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按照拉特兰的描述,他

① 此处论述采用了如下文献的观点:Burawoy and Krotov (1992), Crowley (1993), Friedget and Siegelbaum (1990), Gustafon (1989), Hewett (1982), Mandel (1990, 1991); Rutland (1990).

们的煤矿“已经开采很多年了,煤几乎要竭尽了,井筒很深(超过1公里),里面温度很高,煤层很薄(平均不足1米),事故率高,薪水低”(Friedgut and Siegelbaum 1990: 6～8; 又见 Hewett 1984: 88～9; Mandel 1991: 112～3; Rutland 1990: 293)。卡拉干达煤矿的赢利性值得质疑。不仅如此,煤的质量——其热量含量——太低,达不到世界市场的标准(Mandel 1989～91: 26)。第四个地区——伯朝拉盆地沃库塔煤田和因塔煤田的特殊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由于坐落在科米自治共和国(俄罗斯的一部分)内的北极圈北部,沃库塔煤田气候很寒冷,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作为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以前的一个“孤岛”,它一直受到斯大林主义制度遗产的影响(Burawoy and Krotov: 1992)。

正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可能预言的那样,上述四个地区罢工委员会所倡导的经济政策与其自身的形势相符,其中库兹巴斯工人对经济自治和地区自我管理的热情最高,而顿巴斯和卡拉干达的地区委员会不那么愿意冒险失去中央政府补贴,沃库塔工人对莫斯科及其当地的代表表现出了最好战、最具敌意的态度。

阶级冲突　也许最具有揭示意味的是,对过度中央集权化的计划体系及该体系带来的效率低下和不合理,所有煤矿工人都表现出了批评和灰心失望。因此,在所有个案中,要求党的官僚计划者减少干预,使得地区经济自治和控制当地资源的要求似乎黯然失色,或者说至少两种要求合二为一了。煤矿工人更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荒诞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从而使自己的工作条件还算说得过去,他们不那么关心其煤炭是否获得世界市场的价格。关键的一点在于,苏联经济制度的影响太大了,在煤矿工人们看来,这种制度害处太大了,因此他们将行动矛头指向国内经济制度,而不是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做出反应。

因而,如果我们接受吉拉斯(Djilas)、沃思伦斯基(Voslensky)及其他学者的说法,则最初的冲突是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冲突,即工人们反对党的官僚中被任命职务的阶级。正如顿巴斯某罢工委员会的主席在描述1989年夏起初的抗议游行所说的,“这些集会不像很多人所标明的那样针对共产党,而是反对政治组织……不是针对共产主义者中的老百姓、普通共产主义分子,而是反对身处高位的共产主义分子”(Mandel 1989～91:16)。

工人们反对身处高位的共产党阶层,似乎与弗里登—罗戈斯基对资产特征的讨论一致。很多煤矿位于荒无人烟的村落里,这些村落的功能是"伙伴城镇"。凭借他们的手艺,这些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仿佛被拴在了他们的职业上(如果他们在这个缺乏竞争力的部门工作,他们对政府的要求通常包括恳求参加工作再培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身处高位的共产党阶层在决定将自己(国家)的资源——此处指国家预算的补贴——投资到何处的问题上,拥有相当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弗里登和罗戈斯基预言到,在煤矿工人和党的精英之间的阶级冲突比煤炭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部门冲突还要大。这种判断似乎符合苏联的情形。

部门、地区的冲突与协作　很多煤矿工人认识到潜在的部门冲突,有意识地培养与其他经济部门工人的良好关系。同时,他们还谴责中央当局采取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工人描绘成自私地捞取自己的利益、罔顾其他社会经济团体利益的人,他们"告诉所有人我们要求某些特定的短缺消费品"(库兹巴斯煤田工人 1990 年 2 月的话,载 Mandel 1989～91:8)。

与党的政治组织和中央当局发生冲突,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寻求与本地区其他工人的团结。因此,始于 1989 年 7 月的库兹巴斯罢工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地方代表会议,最终不仅包括煤矿工人,"而且将化工工人、铁路工人、钢铁工人、电厂工人、农业工人纳入进来——可以说涉及到所有经济部门"(摘自 1990 年 2 月库兹巴斯煤矿罢工委员会主席的话, Mandel 1989～91:8)。在顿巴斯和哈萨克斯坦也逐渐出现了类似情形。在煤矿工人和其他经济群体之间建立联盟有实际的好处,这些好处是地区性团结所无法表现出来的。新的、贸易和生产的水平网络建立起来,来替代此前由莫斯科统治的垂直网络(Mandel 1991:108～9; CIA/DIA 1991:3～4)。

很明显,尽管在部门团结方面做出了努力,相关部门的某些工人利益还是出现了冲突,而且在苏联制度之下,这些冲突很可能无法调和。例如,能源产品更高的批发价格可能会使煤炭业和石油业的工人获利,但却会伤害能源密集型产业中的工人。这是因为,在成本核算的新体系之下,他们的赢利下降,工人的工资会受到不利影响。在 90 年代早期,钢铁厂和造纸厂罢工的威胁,迫使苏维埃政府已经建议向企业增加燃料成本作为向市场经济的一步之后,又收回了这一

决定。同时,石油和煤矿工人要求其商品销售的更高价格(Rutland 1990:314～15)。在后苏联的市场条件下,一个部门的价格上涨对另一个部门引起“波浪式”影响(按照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描述),这种模式已经变得更普遍了。

鉴于前苏联煤区无法预测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我们很难就上述冲突的焦点和决定因素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各种矛盾不断涌现。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如果市场化意味着煤矿工人能够将他们的煤卖到更高的价钱,他们就支持市场化。但如果市场化意味着煤矿关闭、投机者肆无忌惮、食品价格上涨或将国家工业出售给私人或外国人,他们就反对市场化”(Rutland 1990:318)。因此我们说,尽管煤矿政治在很多方面与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模型有类似之处,但事情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就该模型的有效性提供一个可信的检验。不过,苏联解体以来的发展表明,在解释后苏联经济行为体的行为方面,强调国内制度安排影响的理论仍然比那些只强调国际决定因素的理论更有价值。

衰落之后:后苏联的能源部门

苏联终结、支持市场经济政策的领导人在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共和国执政,几乎没有给能源部门带来什么变化。例如,苏联解体之后两年,俄罗斯几乎没有煤矿的“自由市场”。沃库塔煤业集团由50家企业组成,包括几家煤矿。该集团接到了“国家命令”(goszakazy),要求每个煤矿将83%的产出交给政府,剩下的17%可以通过市场机制销售,这与它们以前的情形一样。必须完成国家命令的煤矿不得不以人为的低价格销售,这种价格还不足以挣回煤矿的生产成本,其中的差额由政府补贴来补偿(Burawoy and Krotov 1992:5～6)。

1993年之后,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仍然作为政府的垄断部门来经营。该年5月中旬,俄罗斯和国外新闻报道说,为了刺激竞争和增加产量,该产业有可能被分解并私有化。俄罗斯燃料和能源部长对此加以反对,他指出,“在俄罗斯,没有比燃料和能源综合企业更有效率的工业了”(Whitlock 1993)。他尤其反对按照地区来分解该产业的计划。俄罗斯的石油部门最终被改造成了由少数大型公司控制市场的局面,其中最有名的是LUKoil。国家对天然气的垄断变成了一家私有公司控制着95%的生产以及遍布前苏联的天然气出口

管网(Mursaliyev 1995)。

叶利钦政府没有打破国家能源垄断,而是将它们"私有化",其途径是给政府部长们控制能源部门的更大权力,而这种权力是他们在旧的政权下从未享受过的。私有化计划的关键人物是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担任天然气工业部的部长、自1992年12月以来担任俄罗斯总理的维克托·S.切尔诺梅尔金。切尔诺梅尔金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设立了一条直通天然气工业部的电话专线,直接指导着国家天然气垄断产业的私有化,以便保持对其股份的直接控制(Aslund 1995;Bush 1993; Erlanger 1995;Kiselev 1995; Mursaliyev, 1995)。[①] 他努力确保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内价格一直较低于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其目的是,当把俄罗斯的能源产品销往国外时,他和他的盟友能从价格差距中获利(Aslund 1995)。切尔诺梅尔金在帝国银行——俄罗斯最强大的银行——取得了控制性的利益,成为该银行的创立者——天然气工业部和LUKoil——的代表。

弗里登和罗戈斯基都使用过有关寻租行为的经济学文献。这些文献较详细地谈到了与后苏联能源垄断部门有密切关系的政治领导人如何采取行动,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要理解政治家们如何逐渐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地位及如何利用该地位,就有必要了解苏联制度的制度遗产。例如,切尔诺梅尔金曾利用自己对天然气管网的控制权,来寻求地区长官对其新政党(其绰号为"老板党")的支持。倘若这些长官拒绝加入该党,"他们就会从天然气公司或其下属部门收到了这样的信息:由于债务因素,减少运送到该地区的天然气"(Kiselev 1995)。这种要挟行为,使改革派经济学家、前任总理亚哥·盖达尔指出,"某一地区人民的福利取决于莫斯科的权力走廊,而不是取决于经济政策的常识"(Morvant 1995),这与苏联时期的情形一模一样。

苏联的遗产可能使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脱轨,不仅仅俄罗斯总理的国内政治对手有这种担心,例如,1995年7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① 如果这些股份的重新出售没有什么限制,那么谁最初控制了这些股份也就不成问题了。然而,1994年上半年,存在很多这样的限制,即不准许外国人购买国防和煤矿部门、石油和能源综合企业中及某些开采性产业的股票,即使战略上不那么重要的产业要销售给外国人产品,也必须得到财政部的批准(Bush 1994)。感谢赛勒斯特·瓦伦德尔(Caleste Wallander)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EBRD)总裁雅克·德拉若斯亚尔预言:如果俄罗斯不解决使其前国家垄断部门与政府部长之间产生鸿沟的腐败问题,“俄罗斯将变成以一小撮有权势的院外活动分子为中心的、扭曲的市场经济”(Parrish 1995)。同样,鲍里斯·叶利钦的顾问、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警告说,“俄罗斯能源部门的腐败非常严重,它可能会悄无声息地威胁着民主和稳定”(Aslund 1995)。很清楚,苏联时代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主义经营管理及与之相伴随的效率低下和腐败依然存在。无疑,制度环境将继续塑造着相关经济和政治行为体的行为。

五、从理论视角看苏联的个案

本文的证据支持‘颠倒的第二意象”,即国际经济环境影响了苏联的国内政治,甚至可能对苏联解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苏联的个案中,对国际化假说最强有力的陈述几乎找不到多少支持的证据。苏联的社会经济团体并没有通过组织起来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对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化直接作出反应。苏联的地区行为体并没有通过寻求对出口产品更大的控制,对出口产品上涨的价格作出反应。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从莫斯科分裂出来,主要目的并不是利用世界市场的价格变化来消除孤立造成的机会成本。的确,现在很多人强烈渴望回到以前莫斯科所喜欢的、对能源采取补贴的时代,以便把能源卖掉换取美元。

然而,似乎有证据有力地支持另外一些期望。这些期望涉及到既有制度在造成国际化国内后果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制度在苏联的个案中明显存在。实话说来,这些制度是专门设计出来以达到限制国际接触的影响的目的,其方式是:通过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均衡,通过集权性国家组织的贸易行为,通过分配资源、在计划目标而不是市场信号基础之上做出生产决定(包括出口导向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制度基本按照人们的意图发挥作用。不过,有选择地进入世界市场的策略最终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用政治术语说,向国际经济开放既滋养了普通民众的期望,也滋养了精英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在旧的制度环境中不可能实现。在经济领域,苏联出口收入的下降(主要原因是80年代早期出现的能源价格下跌)、诸多

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共同导致了很大程度上的隐性预算赤字。从表面上看,贸易额减少恶化了国内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使俄罗斯的经济遭受重创。最后,在其与东欧盟国的关系中,苏联试图将行政指令制度要素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和财政惯例合而为一,这种努力并没有提供一种万灵药,很可能加速了苏联集团的终结。

苏联的个案加强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直接派生出的政治模型,尽管理论上温文尔雅,对指导我们理解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却是不充分的。不仅如此,苏联的证据显示,我们需要超越这样一种要求,即"注意政治的制度环境,以此补充偏好和偏好变化的分析"(Garrett and Lange)。无疑,也许我们的解释很吝啬,但在有效性方面会得到回报,我们必须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偏好本身的原因方面。[①] 行为体的策略、行为乃至其目标都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塑造着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也塑造着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认识,甚至在制度本身已经消亡之后依旧如此。苏维埃中央计划、外贸垄断等这些已经不存在的、人们不再信任的制度遗产,可能依然影响着行为体的认识和行动。[②] 制度遗产及偏好根源这一主题所具有的含义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显然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① 这是 Thelen and Steinmo (1992)的一个中心论点。

② 让我们思考几个司空见惯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在当今的俄罗斯,即使从私有化的木材公司也很难买到所有型号的木材,除非那种长度只有 3～6 米的木材,原因是这种长度的木材是"政府标准",这是从计划时期继承下来的;建筑公司——即使是国外的公司——也应该遵照政府所公布的标准,包括基于建筑的规模建一座楼要雇用多少人,尽管这个数目,可能是美国完成同样工作所需要的 4 至 5 倍(National Public Radio 1994)。关于影响工人经济行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参见 Evangelista (1996)。

第八章

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谢淑丽

1978 年 12 月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政策对此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早在 1979 年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做出了抛弃自给自足经济、向世界经济开放的历史性决定。所谓的开放政策，即欢迎外商投资、扩大外贸并把外贸权下放。开放政策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激发了关键部门和地区对改革的关键性政治支持，正因如此，在其后 15 年内，尽管阻力重重，中国的改革得以持续进行。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过去的 40 年中，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对中国改革时代之前的对外经济政策、对改革的开始以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成功，发挥了何种作用？

马修·伊万杰利斯塔在第七章对苏联的分析认为，在证明国际化对国内政策后果的影响方面，苏联政权是一个“棘手”的案例，原因在于，其政权的重重制度使国内人士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经济的信息。由于这种自我封闭，那些从国际竞争保护中获益最大的集团联盟——资金密集型重工业、内陆省份及党和军方控制的组织——得以维持他们的权力。其他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迅速增长，提高了那些采用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苏联政权的代价，但那些国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代价。1949 至 1978 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历史表明，国内体制可以有效地抵制国际经济发展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国际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邓小平及其同事决定在 1978 年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互无联系的事件使人无法做出绝对的解释。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增强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会实施某些政策，以开放其经济。但是由于国内体制问题，某些集

团可能意识不到国际上提供的获利机会,或使它们无法组织起来利用这些机会,因此,人们很难观察到这种可能性的增强。中国决定改革其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的直接背景,是体制内的领导权交接。1976年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逝世,引发了接班问题,激发雄心勃勃的领导人通过倡导政策革新来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此时,国际化就为政治家提供了联盟的机会。虽然受到国内体制的限制,国际主义者联盟还无法自动形成,但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可以促成这种联盟。邓小平及其助手们利用了国际化所创造的结盟机会,吸引了那些通过参与世界经济而可能获利的群体,即轻工业、农业及沿海省市。这些部门和地区拥有中国最富足的资源——劳动力,从而拥有了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

中国与国际经济之间的栏墙一旦降低,国际化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改革进程就开始发挥重大影响。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中国的相对优势刺激了其经济增长,并造就了改革的强大政治势头。可以预见,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内陆省份处于封闭经济体系之下,一直受到保护并享受补贴,自然反对开放政策和国内改革。国际竞争的挑战使它们更加意识到政府保护的重要性。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原则提供优惠政策,并继续实行补贴,保护通过改革而急速扩大的国内市场,从而赢得了这些"输家"的支持。不久,重工业和内陆省份羡慕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和出口方面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取得的显著成功,也加入了改革的大篷车,要求享有更多的外资和世界市场。

1978年以前的中国告诉人们,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在与国际经济力量的较量中仍占上风,而1978年之后的中国让人们了解到,国际经济力量如何使中国改革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取得成功。

一、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与共产党国家

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种进口替代的极端形式(Lardy 1992:16)。制度仿佛形成了一堵厚墙,把国内经济从世界经济潮流中孤立开来。对外贸的集中管理、通过行政命令制定价格及对外联系不畅,使自给自足经济得以维持,使人们无法了解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及其对中国各种行业的影响。也使利益集团无

法形成。因此,即使利益集团认识到执政党政策与己不利,也可能难以提出政治要求。

多年来,毛泽东对革命的农业群众运动发表了许多论述,掩盖了中国和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真实的相似性。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都致力于迅速发展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都建立了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一旦中国的国内发展战略确定下来,进口替代型的贸易体制也就很自然地建立起来。进口产品——主要是工业设备和材料进口——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自给自足的工业经济体系。[①] 在通过原材料进行平衡的中央计划制度之下,中国无法满足国内的工业需求(在迅速增长的政策下,供不应求是很常见的),只能通过进口得以满足。支持某一特定进口规模的财政需求,决定了出口的规模。货币不可兑换、定价过高不利于出口,并且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造成了壁垒。惟一有权力逾越这一壁垒的组织是政府的外贸垄断部门,其贸易公司掌管着所有的贸易往来,并且用进口赚来的利润来补贴出口。[②]

在中国极端的进口替代政策之下,最大的赢家是重工业(不仅包括其厂长,还包括工人)、内陆省份、军工部门[③] 及实行政治和经济管理的中央部门——我们姑且称这些部门为“共产主义联盟”。[④] 由于被切断了与世界出口市场的联系,占中国人口80%的农业人口遭受损失,本来世界市场可以使农产品的价格上涨,高出中国由行政命令所维持的低价格。轻工业和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虽然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因而具有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但由于不能参与世界出口市场,所以无法享受该优势所带来的实惠。无论在城

---

① 与卡明斯(Cumings 1979) 的观点相反,拉迪(Lardy 1992:30～1) 认为,20 世纪50 年代,当苏联向中国出售工业设备时,中国采用了出口替代发展战略。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与苏联闹翻后,中国的战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59 年“大跃进”之后,中国食品进口猛增;但是 60 年代期间,中国继续实行完全的设备进口计划,当时主要从日本进口。

② 如果外贸部管辖下的一家贸易公司连续出现净损失,外贸部就从另一个盈利公司抽出钱来,重新分配财政利润,这样做轻而易举(Lardy 1992:6)。跨单位补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实行多重汇率制(Lardy 1992:28)。

③ 拉迪(Lardy 1992:23)指出,在所有的贸易交易中,军方都受到了优惠待遇。

④ 我在 1984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联盟”由三个集团组成,即重工业、内陆省份和中央机构(1984) 。我现在相信,军方也属于这个受到政策优惠待遇和保护的集团联盟。

市还是在农村，行政手段压抑了消费水平，外国消费品无法进入市场，加上优质国产消费品匮乏，这些都伤害了消费者的积极性。

中国的政治制度加深了人们对控制资本者的政策偏见。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模仿当时的苏联。这些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发展优先也是从苏联那里采用过来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优先发展工业而不是农业，优先鼓励生产而不是消费。作为消费者的市民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在共产党内部，无论从普通党员的人数来说，还是从中央委员会成员来说，代表工业利益的人数比例过大，而代表农业利益的人数比例不足。中国精英阶层的核心主要由三大阵营组成：中共中央及中央政府的官员、省级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官员、军方人士。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任命下面的党、政、军官员。通过其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这些官员建立起独特的政权模式，我称之为"互惠负责制"(Roeder 1994；Shirk 1993)。

中国共产党把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工作的权力下放给国务院及其下属各部委。在这些政府机构中，工业制造者的呼声更受重视。国务院大约有15个重工业部，但只有几个部与农业有关，只有两个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与轻工业有关。由于与人民解放军的密切联系，重工业的影响力更加显著；[①] 6个(后来增加到8个)机械制造部中，5个部生产军工设备，并由人民解放军管理。由于没有真正代表地区利益的立法机构，经济上比较强大、人口比较密集的沿海省份政治上的发言权甚小，从而加强了有利于内陆省份的再分配发展战略。在政策上，这些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权力分配向大规模增长出口替代战略——中国从苏联借鉴过来的——倾斜。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享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拥有的影响力与其经济能力并不相称。

在制度安排上，经济所有权和公共财政也特别青睐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重工业部拥有很多下属工厂，并且直接从北京发布行政指令、进行管理。而轻工业和纺织工厂处于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农业生产属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由于没有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轻工

① 1964年之后，在一种密封体系之下，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完全剥离，其目的是保护国内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免受国外竞争。

业部、纺织工业部及农业部的官员被视为政治上的轻量级人物，在中央投入资金的拨款上不受重视。公共金融体系以国有工厂利润为收入基础，它进一步强化了以行政命令制定价格的制度，从而使工业富有（即有利可图）、农业贫穷（即无利可图）。在政策制定上，中国的制度安排向快速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倾斜，其政策后果是损害了中国的消费者和农民，使重工业、内陆省份、军事部门及中央管理部门形成的"共产主义联盟"获利。

制度塑造着政策，但政策也会影响制度。自给自足的进口替代政策强调行政控制，从而强化了党和政府中央部门的作用。无疑，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这种制度后果是很满意的。作为当时中国短缺资金的"所有者"，党政官员从这种高度的政府保护中获得了好处，并且通过其定量供给和分配资金的权力来获取行政租金。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策者控制着所有资金，决定哪些部委和地方部门有权力通过购买国内设备或进口设备来扩大规模。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分离，使外贸部得以严密控制外汇，收取全部的硬通货，以支付进口品和补贴出口。[①]在这种对资本密集型城市工业倾斜的政策之下，为了预防大规模的城市失业，中央政府对城乡之间的移民严格限制。进口替代也许导致了经济上的非理性，但是它却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实施这一控制的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外贸部、公安部以及党的中央部门——自然十分希望保持这种政策的长期存在。

二、70年代没有政策变化的国际化

国际经济机会结构中的趋势——即70年代开始的国际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自由化、世界贸易规模的增加，加大了中国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机会成本。然而，当时"共产主义联盟"的权力很大，中国无法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所以这些趋势也就无法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直到毛泽东逝世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正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表明的，对所有实行自给自足经济的国家来说，70年代开始的经济国际化增加了机会成本。由于被剥夺了贸易机会，那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和部门损失更大。很明显，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富足且教育程度相对良好的劳动力。因此，

对劳动力以及劳动力密集型的公司、部门以及地区来说，封闭经济所造成的机会成本最为惨重，因为国际化提高了这些地区和部门产品的影子价格(shadow price)。

亚太地区经济的变化展现出特别诱人的机会，对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丰富的沿海省份及整个中国来说，抵制这些机会的代价昂贵。早在60年代之初，亚太地区的诸多发展就已经增加了参与该地区经济的诱惑力。长期以来，除致力于相对自由的贸易之外，美国的亚洲大战略一直把重点放在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尽管对东南亚的重视不如前面所述国家和地区——与日渐增长的美国市场连接起来(Cumings 1984)。日本是第一个利用该机会的国家，但自60年代早期，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效仿日本。1958～1960年间，台湾进行了外向性的经济改革，韩国在60年代早期采取了类似行动，新加坡则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之后采取了类似行动(Haggard 1990)。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投资热潮，一方面服务于当地市场，一方面促进电子等行业产品的出口。到70年代，日本也开始投资于这个地区，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之后。日本投资成为促使该地区一体化、创造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方面的主要力量。随着日元升值及劳动力成本的增高，日本将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了韩国和台湾，其目的是为了发展高科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大约10年之后，韩国和台湾也发展到该阶段，通过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国家来提升产品循环。这些国家包括东南亚，可能也包括中国大陆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都乐意通过向邻近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像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不仅拥有廉价劳动力而且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投入资金、转让技术，从而加快升级过程。

尽管种种诱惑近在咫尺，中国的农业、轻工业、沿海省份及消费者似乎仍然感觉不到要求中国经济向这一地区或向世界开放的压力。在当时的体制下，关于国际经济趋势的信息滞塞不畅，使那些可能从这些趋势中获益的集团无从获得这些信息。不仅如此，这些集团发言权甚小，即使已经意识到自己正为封闭经济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也无法要求实施开放政策。

1971年，当"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大行其道时，毛泽东开始

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震惊了当时的国内外人士。中国重新调整外交政策的动机是出于战略考虑，而非经济考虑。当时，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1969年和1971年，苏联的威胁导致公开的中苏边境冲突——以及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危及了中国的安全。20年来，冷战所造成的意识形态鸿沟，使中国无法利用其处于美苏之间的战略三角位置所潜在的平衡作用。毛泽东的大胆举措打破了这一禁忌，通过帮助美国找到从印度支那体面撤军的办法，中国争取到华盛顿的潜在军事支持以对抗莫斯科。

从短期看，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和战略关系的重新定位，对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它为这些政策的终结开辟了道路。当不准与外国人接触的禁令解除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开始到国外旅行，并且亲眼观察到中国的技术、经济落后与外国现代生活之间的差距。对他们来说，中国与美欧之间的差距不足为奇。但是，中国与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差距，使他们颇感震惊和羞愧。对这些亚洲国家，中国人向来有一种优越感。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精英们一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要恢复威信，就必须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活水平。精英们在经济进步和缩小与外国差距的政治必要性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方面，他们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70年代中期，邓小平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对中国人民的福利和国家安全来说，经济封闭是有害的。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之下，他的这一观点遭到激进分子猛烈的批判，被斥之为"服务于外国老板的贩夫走卒"[①]。邓小平认为，经济落后使中国处于可能被苏联从军事上击败的危险之中。加速经济现代化的途经是，从西方进口技术、设备及管理技术。毛泽东开始改善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政治关系，已经为这种进口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建议扩大贸易（当时他只字未提外国投资），但是遭到了其激进政治对手的阻挠，邓小平再一次遭到流放，直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邓小平才又回到北京。由于对邓小平的批判，1974～1977年间的对外贸

① 参见郑拓彬（音）：《在改革和开放政策下，推动中国的对外贸易》，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2页，转引自 Huan Guocang (1987: 42)。

易停滞不前。

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政治上软弱，声望相对来说不那么显赫。他重提了邓小平关于增加出口及进口更多技术的思想，但是将它们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且使这些思想彻底回到了"共产主义联盟"的旧方向上。华国锋将大跃进的基础放在石油出口上，这一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中国能源和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主要集中在内陆省份）形成支持华国锋的核心。在华国锋的发展战略中，丝毫没有提及市场改革。相反，他提出的是高度集中的加速进口替代做法，其目标是发展重工业，以石油出口为先导。1976～1978年，华国锋的路线可以被解释成对如下变化作出的反应：重工业要根据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他们刚刚获得关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影子价格这十年间的变化信息做出调整。由于毛泽东外交上的开放，这些重工业部门意识到：对它们来说，政府的保护越来越重要。因此，它们尽力确保他们在体制中的特权，使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永远持续下去。

三、领导地位的竞争与政策创新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邓小平重新掌握国家政治权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提出另一种政策，帮助他在官僚体系内建立自己的支持者同盟。华国锋那边似乎拥有传统的"共产主义联盟"（重工业、内陆省份、军事部门及中央官僚部门）。为了创建改革联盟，邓小平将目光投向了轻工业、农业、沿海省份及省级官员。吸引这些地区和部门的是邓小平的中央权力下放、市场化及经济开放思想。

邓小平实行国内市场改革、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政策，可被视为在权力交接方面的战略。当然，像任何国家的政治家一样，邓小平无疑相信他所支持的政策符合国家利益。在共产主义国家，改革的最初动力必须来自上层，来自第一阶层的精英，他们试图在第二阶层的精英——这些人构成了选举群体——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由于不允许处于第二阶层的部委、省及下属官僚形成帮派或呼吁变革，从而防止人们公开要求政策革新，由于不存在公开政治竞争——例如选举——的独立范畴，权力竞赛依附于官僚内部政策过程。权力与政策完全交织在一起，T.H.瑞格比将这种政治风格描述为"隐形政治"

(Rigby 1964)。

1978年底,邓小平对华国锋的挑战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鼓舞。当时,经过重新估计,中国的石油储藏量下降,进口工厂设备、扩大重工业的计划无法持续下去(Cumings 1989:210)。1978年的年度计划建立在对石油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之上,因而实质上遭受惨败。在做出打开国门、进口技术的决定之后,中国的领导人突然认识到,除了石油之外,他们几乎别无他物可供出口来换取硬通货。经济危机感弥漫着党的领导人会议。

邓小平利用了这一经济危机,削弱了当时主导中央政府的石油集团所倚重的重工业体制。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纲领出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权力下放及国内经济逐步市场化;(2)欢迎外商投资、促进轻工业制造产品出口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从近来的国外出访中可能了解到,在他的这些思想中,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主体框架会产生促进国内改革的巨大后劲,因为香港、日本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为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拓宽了地区市场①,这些国家和地区愿意向中国转让资金和技术。

在邓小平看来,从政治意义上讲,新的对外经济思路极为合理。它使邓小平获得了开放政策的自然受益者——轻工业和农业、沿海省份及省级官员——的支持,使那些让进口替代自给自足经济长期存在的中央决策者及工业官僚束手无策。尽管邓小平的改革措施可能并非自觉性的战略,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及世界经济压力的背景之下,从政治上讲,这一路线是成功的——它巩固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并建立起改革同盟。1978年之后的10年里,邓小平的开放政策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得以贯彻执行。其核心成分包括以下内容:②

- 扩大出口,尤其是轻工业制造品的出口。其途径是下放中央权

---

①　改善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为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金融和技术援助提供了条件,但经济倒退和保护主义限制了中国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制造品的市场。

②　尽管具体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邓小平之外,很多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政府官员都牵涉其中,但比其他任何改革政策的特征更为显著的是,开放政策总是与邓小平个人联系到一起,并归因于邓小平本人。

力，使刺激出口与对外贸易的管理更加协调。彻底结束中央对外贸易部（今天称为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部）的垄断，贸易权分散到各个部和省，准许它们保留一部分外汇收入。鼓励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村办企业出口。

- 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获得外国的技术、投资、经营以及国际市场营销的知识。为吸引外国投资，将审批权力下放到各部委和省级官员。
- 在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建立特别经济区，准许这两个省份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四、国内政治制度与改革战略

权力交接可能促使邓小平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但为什么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没有遭到官僚的阻挠呢？中国怎么可能实施对外经济改革，同时又不改变政治制度呢？其答案在于，中国所实行的共产主义比苏联更为灵活，因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像苏联那样集中，制度化的程度也低于苏联。考虑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具体情况，可以将改革分解到中国官员的具体利益中去，从而使他们在改革中获得新的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中央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从来不像苏联那样广泛和有效，地方政府的作用比较强大。毛泽东率先提出了"让各省自己办"的政治战略，后来邓小平采用该战略推动经济改革。在"大跃进"（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69年），毛泽东试图克服头脑僵化的中央官僚对他的加速发展、革命集体主义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抵制，许诺省级官员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并扩大省级官员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力量。由于毛泽东的率先提倡，中国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处于国家计划的控制之外，不少活动由各省管理。中央的党政机构对市场改革所造成的阻力不像苏联那样强大。以往中央行政权力的下放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各省政治家可以成为一支改革力量，对抗较为保守的中央。尽管这些省级官员由中央组织部门任命，在互惠的责任制之下，他们在选举中也拥有关键影响。

在赋予制度而不是个人决定权方面，中国也落在苏联之后。[①] 1957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立了中央委员会在选举党领导人方面的绝对权力。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拥有同样的宪法权力，它实质上仍然与其他的党派精英分享权力，其中有些是已经退休的老干部，甚至没有什么正式的职位。权力中心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实际上从革命前辈所组成的非正式群体流向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机构。在苏联，最高领导人想把好处分给哪些人、决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权力都受到党集体领导原则的很大限制。在中国，自由度相对来说要大得多。

中国共产主义制度比较松散、制度化程度较低，这一特征意味着，在中国推行经济改革而无须根本性地改变政治游戏规则比在苏联更可行。然而，因为改革政策必须通过共产主义的党政体系，因此，这些政策是以独特的方式出台的。

正如我们以上所谈到的，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壁垒被部分拆除，国际经济力量便引发中国国内对改革潮流的积极反应。然而，中国掌权的各个共产主义政治组织以不同方式疏导这些反应。国际经济力量与中国国内政治制度交融的结果，形成了中国改革政策的轨道。这一轨道，把中国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区别开来。中国式经济改革的特征是，循序渐进、行政上的权力下放及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合同制(particularistic contracting)。

循序渐进

为了避免引起强大的“共产主义联盟”的反对，改革是循序渐进推行的。改革的领导者没有正面攻击中央计划、贸易机构及各工业部享受的种种外快和权力，而是通过建立不受正常国家规定约束的企业新形式——如私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及经济特区，从而对政府官僚形成包围圈。因此，双轨制得以创建起来，市场轨道所提供的高价格和外汇收入把制造商从中央计划那里吸引了过来。中央计划仍然存在，但是经济的增长可以超出计划(Naughton 1995)。在

① 中国从个人权威到制度权威的演化耽误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企图保持其革命领袖的地位，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斩断了制度化(当时被轻蔑地称为“修正主义”)的进程。

完成其计划指标之外,国有企业可以参与到市场轨道中。充当更有利可图的市场轨道门卫的官员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个人回报。

改革派领导人还给予"共产主义联盟"中重要人士和集团一定的好处,以获得这些人士对改革的默许。在中央对国家投资的分配上,重工业继续享有优先权,内陆省份仍然获得财政补贴。继续扩大石油出口(国际石油价格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下跌),由外国石油公司出资开采近海石油,以及外商对煤炭业的大量投资,使能源工业也很满意。中央领导人特别努力吸引外国投资,使中国的航空制造业、机动车辆制造及其他重型设备现代化。[①] 当沿海省份获得了优惠的外汇截留权以后,这项权力也同时扩大到几个贫穷的内陆省份。优惠的外汇截留权使军工企业出口也享有很高的补贴。

循序渐进的战略还包括,保护国内市场不被外国产品挤垮,不使中国"恐龙"式的重工业彻底垮掉。1992年,只有当邓小平和其他改革的领导人认为加入关贸总协定对于实现其经济目标至为关键时,他们才一致同意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大量进口产品涌入中国(如何贯彻市场开放的协议一直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一直在国际竞争面前采取保护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国内私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合资企业的新挑战,中国工业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行政管理权下放

中国的对外经济改革主要是将行政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下放到公司一级的经济权力几乎没有。管理外贸、批准外商投资项目及控制硬通货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官员。中国的开放政策结束了中央的外贸垄断,把权力分散到各级机构。但是,还不能说这就是贸易自由化。在选举中占据关键席位的各省官员是开放政策的最大受惠者。

以前,经济管理权下放给各个省市,使他们对其辖区的所有轻工业工厂拥有计划和财政权力。尽管某些重工业工厂也交给了当地管理部门,但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重工业仍然由中央各部委直接管理。因此,即使在最近改革之前,地方官员与轻工业的厂长经理们就已经联系密切。改革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① 参见:"New Industrial Policy Released", China Daily, June 17, 1994: 1.

在改革前期(1980 年),财政收入权的下放,赋予各省及省级以下官员发展当地工业的新动力,外汇截留权的下放又刺激这些官员增加出口。基于与当地企业的密切联系,这些官员演化成了官方企业家,他们推动外向性经济,推动技术更新,推动当地工业规模的扩展。[①]由于中央计划和中央政府在投资总额中的比例逐渐缩小,地方政府对北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它们转向国外寻求资金、材料进口和市场。这一过程的自然受惠者是沿海省市,这些地区劳动力集中、劳动力教育程度良好,而且当地人们仍然记得共产主义时代以前与海外的商业联系。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合同制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国经济改革思路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我所称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合同制"。涉及外贸和外商投资的新举措,就像那些涉及国内工业管理和金融的举措一样,根据每一具体单位(省、当地部门或公司)进行商谈。首先,选定少数单位进行改革试验,这些单位不仅享有此前未曾享受过的自由,而且还享有其他优惠待遇,以保证试验能够成功。[②] 很自然,其他单位也会要求得到同样的好处。随着改革范围的扩大,每一级别的党和政府的官员——从中央到各县——都慷慨地送出改革合同,建立拥护自己的派别或集团。实行对不同单位一刀切的改革建议一概不被通过,而针对具体情况实施不同准则的建议却受到青睐。从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背景考虑,经济改革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合同制"模型是成功的,因为它模仿了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模型,即通过讨价还价商定生产、供应和贸易配额,在传统的中央计划下建立起政治支持网络。而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合同制改革受到支持,还因为它是一种手段,使具有重新分配内涵的改革变得不具有这种内涵或减弱了这种内涵的分量。企业和当地部门心里有底,实施改革不会使它们的情况更糟。

---

①　如下文章提供了绝佳案例: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s Countrysid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s from Rur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 1991: 716～41.

②　"试验"一词用词不当。中国的改革试验同先前毛泽时代宣传其政策并为这些政策建立官员拥护的模范农场、工厂和地区极为相像。

实践证明,在建立各级部门对改革的支持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缺乏内部制约机制和中国文化传统导致了这种体制特征)是一个有利条件。中国式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合同制为实施改革的官员创造了政治资源。

循序渐进、权力下放、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合同制,是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的改革派政治家们利用劳动力丰富的地区或部门对经济开放的积极反应,并向那些与资金相联系、经济开放损害了其利益的地区或部门委曲求全的三种手段。在政治改革之前继续进行经济改革,有某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政治家们也能够向以前受宠以及受保护的地区或部门——例如内陆省份和重工业部门——发送可信的补贴承诺,以减少过渡期的成本。在开放政策之下,对改革的输家而言,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合同制比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要好。到某一时期,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中国就会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吸收选举出来的代表,这些代表可能会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和重新制定规章制度。但到那时,国内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削弱要求采取保护主义的声音。

五、国际化与改革大篷车

邓小平及其政治同盟设计出改革的总方向之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了反响,并且主要是积极的反响。通过把经济开放与国内经济的市场化结合起来,改革派领导人建立起了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政治支持。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壁垒倒塌,弗里登—罗戈斯基模型非常恰当地描述了其后所发生的情况。其利益与劳动力相连的地区或部门(轻工业、农业、沿海省份及地方官员)争先恐后地利用外国企业所提供的机会。外来的投资者——最突出的是来自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华裔商人及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的商人——被中国内地巨大的国内市场及其丰富的劳动力所吸引,大批涌入,建立合资企业。1978 年,外商投资总额几乎为零,到 1993 年增长到约 60 亿(Lardy 1994: 632)。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取得成功,1965 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33%,到 1990 年增至 74%(China: Foreign Trade Reform 1994)。1979 至 1993 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6.1%,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10 大出口国

(Lardy 1994:30～37)。

通过将产品销往海外,引进外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沿海省份赚了大钱,结果,人人竞相效仿,甚至那些一开始反对开放政策的重工业和内陆省份也不例外。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省份劳动力不那么富足,在国际经济面前是个劣势。然而,同其他国家相比,内陆省份仍然拥有比较优势。而且,与沿海地区商业上的战略联合,使内陆地区也能分享开放政策的实惠。尽管在共产党领导机构内部,保守派反对改革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消失过[①],但在过去10年间,各级政府机关对改革的支持呈现滚雪球般的增长,到90年代,支持开放政策的同盟已经超越了轻工业、农业、地方官员和沿海省市的核心部门和地区,甚至很多内陆省份和重工业也包括在内。在国内促进开放的政治联盟方面,外国公司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政治动力是进一步解除对外经济关系的条条框框并使这种关系市场化,而不是恢复中央控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在强大的各级政府机关支持之下,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不可逆转。

在国际竞争中落后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刺激了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功。中国的低科技产业拥有丰富的、技术不熟练的劳动力和简单的组织形式,因此能够对国际需求做出迅速而高效的反应,占领出口市场很大的份额。相比之下,苏联的产业技术复杂、组织形式繁琐、所依赖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更高。因此,它们对新的国际机会反应速度更慢,调整的代价更高。相对来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全球竞争的调整简单而迅速。这也许并不能解释中国改革举措的时间表或中国对改革政策的选择。不过,这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一旦这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中国的经济就会腾飞。[②] 当然,经济成功产生了减少过渡成本的资源,证实了改革派领导人的政策选择是正确的,经济成功又转化成对改革的政治支持。

---

① 参见如下文章:Joseph Fewsmith,“Reform, Resist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in Joseph (1994): 7～34.

② 中国从开放中获得的好处,最初大多来自贸易而不是资本。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尽管有大规模的外国投资,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仍然是部分融合。正如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指出的,从商品贸易改革中所获得的好处远远少于资本贸易的潜在好处。因此,中国要接近自己的帕累托最优化前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感谢蒂姆·菲茨帕特里克(Tim Fitzpatrick)使笔者注意到这一点。

经济特区的创立是个例子,说明了国内对国际经济的需求如何在中国建立起支持改革的大篷车。1979 年,中共中央授权给两个沿海省份——广东和福建,准许它们采取特殊的贸易和投资措施,准许它们建立特区来吸引外商投资。特区有权在税收、租金等方面对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优惠待遇。特区还几乎完全不受旧计划制度的控制,更接近于建立一种市场经济。起初,中国只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广东三个(深圳、珠海、汕头),福建一个(厦门)。[①]

在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沿海省市,建立与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韩国、台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类似的出口加工区,其经济原理是很明显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工业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愿意把资金和技术转让到中国,这是它们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生产转移到他国和地区的计划之一。不仅如此,它们还迫不及待地渗透到长久以来一直对它们封闭的、广阔的中国市场。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中国人——即海外华人——手中的资金是中国另一种潜在的资产。经济特区位于华南,离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较近,这些地方原先曾经是大多数海外华人的故乡。经济特区使中国能够利用这些国际资金来源,刺激其经济发展。

从当时中国领导权交接这一背景考虑,经济特区的建立也存在某种政治逻辑。在取代华国锋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邓小平刚刚开始巩固权力。如果大规模实施激进的改革措施,那些"共产主义联盟"中的保守人士可能不会接受,但是,如果这些措施仅限于少数的几个试验区,则会被他们接受(Crane 1990:28～29)。邓小平还会解释说,将经济特区建在与香港、台湾邻近的地区,会有助于促进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统一(Crane 1991:37)。[②]

将经济特区限于仅四个城市,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利用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政治优势,建立起对改革的支持。邓小平

① 例如,经济特区开运用劳动力市场之先河,而不是将劳动力进行行政性分配。

② 正如几位学者(Chen, Jefferson, and Singh 1992: 212～213)指出的,作为贸易伙伴、金融商以及中转站,香港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台湾也越来越如此。截止到 1988 年,向香港的出口,占中国内地出口总额(3/4 是再出口)的 40.8%,中国内地进口总额的 30.8%来自香港(其中 2/3 以上在中国内地加工,并通过香港重新出口)。1993 年对中国内地 3.2 亿的外商直接投资中,2/3 来自香港和澳门。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 43%集中在广东。

也可能不是第一个提出经济特区政策的人，但是他本人很快对特区密切关注（Naughton 1993：509）。经济特区的地位包括给予广东和福建两省慷慨的财政和外汇收入合同权。准许这些地区享有这些特权，为邓小平在省级官员中赢得了政治信誉。

在引导地方官员抛弃自给自足的经济、面向世界经济方面，独特的地缘位置是一个强有力的战略。经济特区所享有的特殊补贴和自由刺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然进一步激发了运气不如经济特区的地区的羡慕心理。上海一直自视为中国的经济首都，因而对经济特区的种种优惠待遇，尤其感到不平。[①]（邓小平后来承认，没有把上海划为经济特区是一个错误。[②]）最初，内陆省份反对它们与沿海经济特区之间的经济鸿沟越来越大。那些感到自己被甩在后边的地区先后有三种反应。起初，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攻击经济特区和开放政策，批评其向外国人出卖国家主权、容忍腐败和文化堕落，以此破坏经济特区的形象和开放政策（Crane 1990：36）。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地区也试图从开放的特区获得好处，尽管这些好处与沿海地区相比不过是芝麻比西瓜。通过在特区——主要是深圳——建立企业或公司，内陆省份也想分一杯羹。由于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可获得外国资金和进入国外市场，它成为国内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在这里，公司可以买卖钢材、汽车、消费品及其他几乎无所不包的商品。深圳还建立了自己的货运公司，承运这些货物。（这种对地区间贸易迸发出的巨大需求，使深圳从中受益。在这之前，由于地方官员对财政和工业权力下放的利己反应造成了行政壁垒，使这种巨大需求长期以来受到压抑。）在很多人看来，经济特区的满足内需的转向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特区本来是面向国外的（Tossing 1991：274～5）。实际上，经济特区与内陆地区之

---

① 1985 年，当笔者采访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时，甚至还没等笔者开口提第一个问题，汪就开始长篇大论地抱怨中央对广东省及其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

② 在 1992 年的一次讲话中，邓承认了他的错误，"回顾过去，我最大的错误是制定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把上海包括在内。否则的话，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甚至整个国家，就改革和对外开放来说，今天可能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新华社 1993 年 11 月 5 日电，载 FBIS，China，November 5，1993：32）.

间的经济纽带为两者都创造了经济实惠,扩大了改革的政治支持基础。[①]

对内陆省份来说,另一个好处是沿海地区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及整个中国出口加工产业的巨大增长,导致国内基础材料的影子价格上涨,而这些材料主要由中国内陆地区生产。采集这些基础材料的内陆省份对改革的抵制逐渐变弱,开始要求摆脱计划束缚,享受市场经济的回报。随着沿海地区出口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国内移民的限制放宽了,成千上万的内陆地区劳动力利用了沿海地区出现的新机会。这些移民往家中的汇款已经成为内陆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

最后一个影响是,拥有特殊的贸易和投资特权的特区的建立,激发内陆地区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享有同等特权。经济上的羡慕心理可产生强大的动力。某些一开始对开放政策怀有敌意的省级官员很快便提倡将特区式自由扩展到全国。这种压力导致了中央在 1984 年将特区式自由扩大到 14 个沿海城市,又在 1985 年扩大到三个大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福建南部)。1987～1988 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提出了新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赢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内陆地区的官员仍然不满,1988 年,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主张打开国门所带来的利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区。结果,中央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自主权扩大到许多内陆省份和地方部门。1989 年之后,赵紫阳去职。中国政府继续将外贸和投资权扩大到下级和地方,并决定在上海浦东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新开放区,上海一直认为自己在特区政策上受到冷落。李鹏领导的国务院准许地方政府——不管是内陆还是沿海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外贸和投资开发区。其结果是,开发区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在 1992 年的头四个月,各地建立了 150 个开发区(Shi Jian 1992: 28)。[②] 通过有选择性地准许某些地区成为享有特权的开放区——

---

① 如卡明斯(Cumings 1989:218)指出的,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中国对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的相对优势。这些工业化国家国内购买力不如中国,因此,当保护主义导致这些国家不能进入美国市场时,这些国家便陷入了麻烦。

② 1993 年,国务院要求所有地方开发区的成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地方开发区不受节制的扩展造成了几个负面的经济后果:各地方展开"政策拍卖",通过减税来吸引外国的投资者;开发区建设导致经济过热和资金、能源、交通、原材料短缺;农田被侵吞。

开始是少数地区,逐渐扩大到更多地区——中国领导人扩大了地方官员对改革的支持。[1]

国际化积极影响中国改革的另一个例子,是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权的下放过程。决定打破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对外贸管理的垄断,实质上是减少中央控制以增加贸易额并使部门机构的利益与开放政策联系在一起。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的垄断之下,十多个部属贸易公司控制了所有的外贸交易。到1990年,各部委和省市建立的贸易公司超过五千个。1987年底,仅广东一个省就有近九百个贸易公司(Lardy 1992:39)。

邓小平及其同事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地下放贸易权的道路,而不是迅速地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选择包括:在过渡时期,维持人民币不可兑换,分配给各省、部委、市及企业——尽管给企业的权力要小得多——不同的截留部分出口外汇的权力,作为刺激出口的手段。因为国内的经济开放,释放出人们对进口生产线和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外汇截留权制度带来颇有价值的选择性实惠,官员们可以把这些实惠分送出去,或者自留备用。[2]

在过去10年间,中央的权力部门把比例越来越大的外汇收入分配给地方政府,分给企业的比例要小些。[3] 作为对省、市级官员的支持,1979年开始实行的外汇截留条例,准许当地部门所管理的公司保留40%的出口收入,而各部所管理的公司只能保留20%。从80年代早期开始,某些地区(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以及边远的内陆省份新疆)和部门(石油、机电、军工企业、科技教育)获得了尤其慷慨的外汇截留权。1982年,国务院为各省制定了固定的外汇截留比例,从3%到25%不等(各省平均外汇截留比例是8%)。1985年,各省的外汇

① 1992～1993年,韩国和日本的对外投资潮集中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和天津。北方地区这一投资所激发的经济发展动力使支持开放政策的阵营扩大,超出东南沿海地区。

② 1985年和1986年,中央政府通过严格控制当地官僚手中外汇的使用,暂时冻结了这些人手中的外汇。这一举动是对海南汽车进口丑闻所采取的行动。在这次丑闻中,海南官员利用他们可以获得外汇的优惠条件进口汽车,然后在广东和其他省份重新销售。这一行动也是针对贸易赤字而采取的措施。

③ 到80年代中期,外汇总额的42%掌握在各省和出口单位手中。只有58%由中央政府所控制。一般说来,地方上所截留的外汇中,一半到了企业手里,另一半到了"拥有"这些企业的政府手里(Lardy 1992:56～57)。

截留比例增加到最低25%。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比例提高到30%。准许7个内陆省和地区(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云南、贵州和青海)保留一半的外汇收入。机电出口产品的制造部门享有的外汇截留比例提高到65%。在同一年,中央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准许大部分省可保留计划内出口收入的25%,可以保留计划外出口收入的70%、80%或100%。1986年,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黄浦、广州、西疆四个开发区有权保留其全部的出口收入。1987年出台的一项政策鼓励轻工业、工艺品及服装出口,其手段是提高这些产品出口收入的外汇截留比例(本段的有关信息引自Lardy 1992:53~57)。

中央逐步扩大以上外汇截留方案的实施范围,其目的是促进出口,为改革建立起支持阵营。尽管所有的省份在首都和各产业内都有自己的游说活动,并且其利益都通过各部委充分体现出来,尚没有证据表明是由下及上的要求促使了这些政策的实施。[①]

在双轨制之下,国家预算继续通过外贸来抵消国内货币的损失,对出口的刺激仍然不足以补偿国内快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需求。中央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另一种形式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合同制,即外贸合同。所有的省和国有外贸公司与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签订合同,列出出口收入的具体数目(按外汇结算),上缴给中央政府的具体外汇额及外贸交易中的国内货币利润和损失。这些合同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通过讨价还价得以商订,准许各省享有不同外汇截留比例的做法长期延续下来(Lardy 1992: 102~103)。

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中国在改革外贸和鼓励出口方面所实行的循序渐进、中央权力下放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式的思路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通过创造一种有选择性地享有外汇和进口的制度,双轨制的延续赢得了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开放政策的支持。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与轻工业部门的利益密切相连,地方政府自会努力推动出口。

外贸管理权下放的同时,还伴随着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的下放。

---

① 一位学者(David Zweig 1994: 6)评论到,农村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积极反应使中央领导人感到惊讶。1988年中央扩大这些农村非国有公司的外汇截留权和进口审批权的政策,不仅反映出基层进行的游说,而且反映出中央决定促进农村地区出口和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有了这两种形式的权力下放,地方官员可以放手,获取外国的技术、设备和资金。财政改革使他们可以直接分享当地产业的利润,进口一条彩电生产线或与外国公司建立一个合资企业可能意味着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一旦中央的控制放宽,地方官员像经验丰富的商人一样,通过提供减税及其他诱人的好处忙不迭地寻找外国企业,贸易额和外商投资额急剧增长。[①]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权力下放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加剧各省之间对外国企业的争夺,结果,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在外国公司面前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Shirk 1990)。[②]

结论: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政策

中国个案向我们展示了国际化对国内经济政策影响的复杂情况。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经验证实了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发现,即苏联式政治和经济制度阻碍了国际化对国内发展的影响。指令性经济下的外贸垄断和通过行政命令来制定价格,使国内的利益集团无法了解国际价格变化情况,结果,无论是这些集团的意向偏好还是其行为都不能反映国际化进程。不仅如此,经济利益集团没有权力组织起来影响决策。这些集团的利益只能通过党和政府的各部门表达出来。这些部门和机构自50年代便建立起来,目的是为了加强当时短缺的资金持有者的权力,并以此使快速工业化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持续下去。苏联式的制度使重工业、内陆省份、军工部门及实施政治和经济管理的中央机构形成的"共产主义联盟"处于僵化状态,而劳动力最丰富的部门和地区——即农业和沿海省份——发言权甚微。1978年之前的中国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苏联式的制度压倒了国际经济因素。但是,面对世界

① 直到80年代下半期,随着汇率的提高,对出口单位的税收补贴也增加了,出口才获得迅速增长。

② 然而,各省和各地区之间争夺外资对地方官员的经济决策有显著的影响。在改革早期,地方官员利用其新获得的经济权力来补贴赔钱的企业,建立保护机制;他们几乎不注意提高效率,或向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逐渐地,在对外国投资者的竞争中,他们开始推动公司提高效率,以便集中资金建设机场、电信及公路设施。这些设施能创造出吸引外国投资者的环境(Rawski 1992:11～12)。

经济,有些集团毫无竞争力。要保护这类集团,就需要强制性体制。这也表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压力是强大的,要将其拒于国门之外,需要付出巨大的政治努力。

1978年之前,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国际化,通过提高中国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机会成本,增加了中国出现政策变革的概率。在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农业及劳动力丰富的沿海省份,国际机会结构建立起了赞成改革的潜在同盟。然而,苏联式的制度使中国的自我封闭得以持续,阻碍了任何改革的可能性。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改变中国对世界经济态度的行动只能来自上层,来自像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他通过提出革新政策赢得了支持。

另一方面,一旦邓小平率先开放中国经济,国内强大的积极反响证实了国际化对地方集团的偏好及其行为的强大影响。支持改革联盟的核心是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所预言到的,即在国际竞争中拥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也就是农业、轻工业和沿海省份。国际经济的吸引力产生了推动改革前进的国内经济政治驱动力。外国投资者争先恐后地投入资金,表示支持。然而,国际因素并不能决定改革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这些是由国内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一旦最高领导人站在改革一边,苏联式的政治制度虽然依旧存在,但这并没有阻止改革,并且具有令人吃惊的灵活度。在维持与劳动力相关的集团支持方面,在这一制度舞台上打造出的中国改革极为有效,它在争取那些控制资金的集团并将它们吸引到改革阵营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第四部分

国际经济危机与发展中国家

第九章

发展中国家金融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

斯蒂芬·哈格德、西尔维亚·马克斯菲尔德

发展中国家政府历来对资本流动、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活动及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施加控制。然而,在过去10年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资金流动自由化,解除金融中间人国际业务所遵守的条例,开放了它们的金融体系。表1显示了这些国家为金融自由化所作的努力。[①]本章旨在解释"金融国际化"这一基本趋势及不同国家在金融改革速度和范围上的差异。

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国家促进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开放国内金融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很让人费解。越来越多论述经济改革先后次序的经济学文献强调,资金账户自由化成为一个最佳政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很多资料翔实的例子已经说明,不成熟的、构思不佳的自由化措施引致诸多国家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包括70年代后

我们感谢皮特·贝克、本杰明·科恩、戴维·考尔、杰弗里·弗里登、罗伯特·考夫曼、罗伯特·基欧汉、安德鲁·麦金泰尔、海伦·米尔纳、约翰·奥戴尔、曼纽尔·帕斯托、本·施奈德、杰弗里·温特斯对本文初稿的评论。本文与《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所载的论文稍有不同。

① 我们对自由化的定义包括两大政策领域:资本账户所遵守的规则,以及金融机构的国际行为所遵守的规则。关于第一个领域,《经合组织资本运作准则》使人们注意对以下活动的限制:直接投资或撤离资金;买卖证券、房地产业务、与商品和服务业的国际贸易直接有关的信贷、跨边界金融信贷和借贷、金融机构的账户、个人资本转移、资本资产的地理移动、非居民资金的处置。经合组织没有具体讨论外国商人或机构进入金融服务业所遵守的规则,只是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所遵守的更大范围的核心机制。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诸多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业——的贸易自由化,使得与之相伴随的资本账户交易自由化成为必然"(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 27)。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很少,但研究数量正越来越多。不过,在这些研究中,几乎没有几个人重点研究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问题。其中的两个例外是:Maxfield 1990, Winters 1996。又见:Frieden 1991b; Haggard and Maxfield 1993; Woo 1991: 176～203.

期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及最近墨西哥等南方国家的试验(Bisat, Johnston and Sundarajan 1992; Corbo and de Melo 1985, 1987; Edwards 1984, 1995; Mckinnon 1991)。这些例子都表明,现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过正在完成自己金融市场的国际化(Goodman and Pauly 1993; Pauly 1988; Rosenbluth 1989)。

表 1 金融市场国际化的类型

	自由化方向	
	内 向 性	外 向 性
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1.管理外国直接投资规则的自由化,包括部门限制、调查行为和优先要求 2.外国进入国内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自由化 3.控制国内企业从国外借贷、国内银行国际运作的规则的自由化 4.解除对外国人购买国内短期债券的管制	1.解除对国民向外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的管制 2.解除对外国国民和公司资本和投资收回本国的限制,允许其自由化 3.解除对无形付款(包括利润和红利)的限制并允许其自由化 4.解除对本国居民和非居民拥有外币账户的限制 5.解除对国内居民买卖短期外国证券的管制
准入的自由化	允许外国银行、证券企业及其他非银行金融中间机构的自由进入	允许或鼓励国内银行、证券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国外分支机构和国外网络

资料来源: OECD,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Paris: OECD, 1990), pp.11～1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Payments System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 pp.29～31.

即使资金流动自由化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诸多政治问题一直存在。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统治者所支持的部门利益为什么容许政策革新呢?不仅是那些受保护的金融部门,就是政府本身,在资金控制上也有很大一份好处。越来越大的金融一体化,使政府受到外汇和资金市场的约束,迫使它们对财政和货币采取更强有力的管制(Andrews 1994; Frieden 1991b; Goodman and Pauly 1993; Kurzer 1991, 1993; Winters 1994)。只要资金账户自由化侵蚀国内的金融控制,它会清除工业政策和保护人的工具,减少政府通过出售低于世界市场利率的政府债券来自己筹措资金的机会(Alesina and Tabellini

1989; Giovannini and de Melo 1993; Roubini and Sala-i-Martin 1992)。

考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策上的共同趋势,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国际范围内的体系压力正在起作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这已经限制了政府在涉及国际金融政策时的政策选择。这些压力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

第一种机制是,越来越多的贸易和金融相互依赖对与政策相关的经济利益集团的优先选择和能力产生了影响(参见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文章)。越来越大的相互依赖扩大了与国外有联系的国内行为体的重要性,增加了那些可能从更大程度的金融市场开放中获益、因而要求这种开放的利益集团范围,从而在更加国际化的方向上影响了政治力量的平衡。相互依赖还意味着,在国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代表外国投资者的人士有更大的政治发言权。高度发达工业国家的金融公司已经成为越来越活跃的、要求市场开放的院外游说分子,并且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继续对自由化施加多边压力及双边压力。不仅如此,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数额、复杂性的增加,使资金控制越来越难以实施,因为规避这些管制和倒买倒卖的空子五花八门。

有人采用这些利益安排的变化来解释发达国家的资金账户开放,就发展中国家近来的政策发展来说,这些变化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背景。但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开放的直接原因更多是第二种国际压力——国际收支危机——所引起的。乍看起来,这一观点可能有违直觉。更确切地说,我们可能预料国际冲击会与越来越封闭的经济有关系。然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85～1990年——时值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账户方面实行的自由化措施数量不仅超过了紧缩措施,而且自由化措施还急剧增加:1985年,它们只采取了22项自由化措施,1988年达到高峰,共计62项,1990年降到49项。[①]

这种趋势的原因,与金融进一步一体化条件下国家不得不为内向性经济危机处理方式付出高昂代价有关。在危机面前,保持或增加金融开放给外国的投资者这样一种信号:他们能够偿清其投资债额;这样做还

---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仔细惧和比较了所有政策变化,并把它们归类于“自由化”或“紧缩化”。计算这些措施的总数有轻重不分的危险。但这些结果确实对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整体画面。以上数据来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

显示出政府有意保持对财政和货币的管制,最终增加资金流入。

在本章的第一、二部分,我们要探讨将经济相互依赖、国际收支危机与政策改革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在其余部分,我们将考察四个中等收入国家——即印度尼西亚、智利、墨西哥和韩国——所进行的改革努力,探讨这些观点的合理与否。

一、经济相互依赖与金融国际化的政治压力

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the Hecksher-Ohlin model)中,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Alesina, Grilli, and Milesi-Feretti 1993a; Edwards and van Mijnbergen 1986: 141～148; Hanson 1992: 2)。因此,标准的福利分析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用来辨识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建构关于资本账户的政治经济学。在一个封闭的、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上资本的回报率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回报率。解除资本管制导致资本流入,劳动力从中受益。

然而,弗里登(Frieden 1991b)认为,按一种更加合理的具体因素模型(specific-factors model)分析,这种分配性后果很不一样。在资本贫乏的国家,具体因素模型很奏效,因为这些国家可以获得低息贷款,而流动资产持有者所得到的回报却更低。政治上享有特权的代理人可以从政府对优惠信贷的控制中获得好处,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大,金融服务主要的群体消费者会发现,处于保护之下的、效率低下的国内金融市场及有限地享有国际机会,都要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Frieden 1991b: 437; Haggard and Maxfield 1993: 313～316)。

尽管弗里登的简约模型指出了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政治的重要特征。因而,这一模型对资本账户自由化可能遭到的抵制言过其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储蓄者所获得的回报可能低于世界利率,因为对金融中间机构征税的方式是,限制储蓄利率、高通货膨胀及缺少获得外国资产的机会。尽管流动资产持有者拥有的资源堪与回报更高的市场相媲美,这些市场的非正式性质也可能意味着相应的风险。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一个特征是存在着实质性的政治风险。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2)指出的,在资本贫乏的国家,流动资本持有者不仅可以通过资本流入的自由化而且通

过资本流出的自由化获得好处。当地投资者通过获得向国外投资的自由获得了保险,尽管收益要低些;来自国外的投资者以较低的风险代价获得更高的预期回报。

需要延展弗里登的分析,来理解国内和国外金融中间机构的利益,因为他们在自由化进程中有实质性的政治发言权。除非我们把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与资本出入境权的自由化区分开来,否则无法理解他们的利益。国内金融中间机构从资本的自由出入中获益,因为这些流动创造了充当外国商人购买国内债券的中间机构、经营国内对外国资产长久压抑之需求的机会。如果考虑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结构,开放资本账户还会提供倒买倒卖的机会,因为如果金融市场的组织形式有着供不应求的性质,则国内利率和国际利率不可能很快接轨(Galbis 1986)。随着其代理机构国际业务的扩大,国内的金融机构也可能施加压力,要求资本账户自由化。例如,罗森布卢森认为,日本解除金融管制"是由金融机构推动的,大藏省有时还与政治家们合作,目的是建立起一整套他们在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竞争所需要(曾经需要)的规则"(Rosenbluth 1989:5)。[①]

然而,如果资本流动自由化伴随着资本入境权的自由化,这些好处可能会积累到外国金融机构头上,这些机构拥有广泛的国外资金筹集渠道、更先进的技术、对国外市场机会更深刻的了解。因此,金融部门可能会支持资本流动自由化,但在外国公司进入权方面可能会采取保护主义立场。

在处于保护的市场上,长久压抑的金融服务需求会使外国金融机构更愿意减少进入权的障碍。因为"新兴市场"越来越大,将自己封闭在市场之外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大,外国公司成为积极要求自由化的院外游说分子。在争取利益的外交支持方面,美国金融公司尤其显得咄咄逼人。这些政治压力已经形成诸多层次,有目的地施加影响——从关贸总协定服务业议程的确立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地区性谈判,到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之间的双边会谈。

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不仅改变了有限选择的分配,还可能侵蚀政府在维持统治方面的有效性(Mathieson and Rojas-Suarez 1993)。政府有很多限制资本账户交易的动机,包括保持政策的自主性、得到

① 欲了解关于德国银行的类似观点,请参见 Goodman and Pauly 1993。

低成本资金及分配租金。规避这些统治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越来越大的相互依赖增加了规避统治的动力和机会。随着可贸易商品部门的扩大,各公司通过故意过高或过低虚报规避资本管制的机会更多,就像非法贸易的增长一样。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海外投资,在监控外国金融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运作和交易方面,政府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另外,随着海外旅游的增加以及电信的进一步普及,个人更容易巧妙地规避资本管制,即使在仍然存在控制金融机构国际交易的地区同样如此。

总之,国际贸易和投资纽带的增加及国际金融市场深化所创造的机会,可能导致利益集团——包括外国公司——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金融国际化,从而削弱政府统治的有效性。不过,相比解释某些国家实施自由化而其他国家却没有,这些广泛变化在解释总体趋势上可能更有用。在此,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国际收支危机与金融国际化

传统的观点认为,国际收支危机会产生某些压力,要求加强资本管制,以限制撤资、要求增加贸易保护以对付短期的国际收支限制。很多国家看起来都符合这一模型,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对1982～1983年债务危机的最初反应提供了相关个案(Reinhart and Smith 1995)。然而,正如导言部分引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所表明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这一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在以上提到的三个国家,短暂封闭很快就被自由化措施所代替。

要了解个中原因,让我们简单陈述一下国际收支危机。[①] 在危机发生之前,某个国家实行的是现期账户差额制,由公共和私人资本流入来提供资金。国外债权人判断为,外债不断增加说明该国没有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他们不愿意继续按以往的规模提供资金。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或者是由世界经济的不利形势如贸易条件的变化引起的。尽管从原则上

① 两种关于国际收支危机的经济模型相互对立,并主导了最近几十年来的探讨。克鲁格曼强调经济根本状况的变化(Krugman 1979),而奥博斯特菲尔德强调投机性行为的重要性(Obstfeld 1986)。

讲,外来资金来源的减少可以通过谈判循序渐进地进行,但更通常的情况是,对汇率处心积虑的批评、急速的撤资及突然失去外来借贷源使这种减少显露无遗。

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才会运用自由化政策变革来对付这些危机呢?这些情况包括: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一直很低;国际流动资本丰富;政府有信心能够通过出口创造外汇;运用更封闭的政策来处理危机,其代价更低。然而,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这些情况都不具备。70年代,当资本充足时,对外国金融的依赖程度急剧增加,但是,紧接着债务危机之后,债权人大批从发展中国家撤离。不仅如此,众所周知,除东亚新兴工业国之外,大多数中等收入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战略创造了一定规模的出口,但并不足以避免反复出现的国际收支困难。

在这些情形之下,危机很可能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危机会加强持有和创造外汇的部门的政治地位。这些部门包括:流动资产持有者、出口部门、私有的外国债权人和投资者、外国的金融中间商及多边金融机构。这些部门的联盟并不需要从政治上组织和发动起来,提出自己的主张,尽管这是他们通常的做法。他们的权力还在于能够提出强有力的政治威胁,如威胁撤出资金或不愿意提供贷款或投资。个人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协调的行动,这一事实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难,而这种困难通常困扰着实行权力下放的政治行为体。

外汇的持有者和创造者赞成资本账户自由化,尤其是在危机过后,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退出资本的可能性。就应付政府未来行动而言,开放的资本账户是一种保护。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通过增加政府对债权人和挣外汇者的可信度,资本账户自由化有助于解决短期和长期的外汇问题(Bartolini and Bondar 1992; Perez-Campanero and Leone 1992; Reinhart and Smith 1995; Vinals n.d.)。资本账户自由化是一种信号,其目标是诱使资本继续流入(Rodrik 1995)。

这种信号并不局限于非连续性的政策变化,而且有可能延伸到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加大了政策倒退的代价,尤其是通过将执行那些政策的权力,下放给某些可能将来执行这些政策的机构(通常是中央银行)。因此,随着外汇的相对短缺越来越严重,它不仅会改变总体经济中的联盟平衡,而且会改变政府各部门甚至决策机构的权力平衡(参见本书第三章加勒特和兰格的分析及如下文献:Maxfield 1995;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简言之,与国际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相关的各部门变化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利益集团和政府本身,要求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但是,危机也很有可能实质性地增加赞成自由化力量——无论政府内外——的权力。其直接的因果机制是政治家们的认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会使投资者消除顾虑,从而最终诱使资本流入。以此为对照,我们预料,在开放程度很低又已经避免了危机的国家,要求自由化的压力是最小的。无论是通过借贷还是通过商品繁荣,它们可以轻易地获得信用和外汇,政府也得以享有难得的权力,如维持管制、精心选择外国投资者和金融公司等。

本文其余部分力图通过考察资本账户政策在四个国家的历史,来评价上述观点。这四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智利和韩国。尽管这四个国家不是随机取样的,在选择这些国家时,笔者根本没有考虑它们所经历的国际收支危机的数目或严重程度,也没有考虑它们在资本账户政策上的重大变化。选择它们作为较大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具有广泛性,这些国家被人们称作"新兴市场"。

三、关于四个国家金融国际化的比较分析

一个国家制定国际收支平衡措施及其参照体系或为国际收支制定国际金融政策并非直接进行的。国际收支的数量指标可能极具误导性;在某个国家,数目巨大的现期账户赤字,可以自发地得到资金;而在另一个国家,小数目赤字却是人们信心下跌、出现危机的信号。国际储备的年变化率提供了国际收支形势合理而精确的估计。世界储备的急剧恶化有可能是衡量国际收支困难的一个好指标。然而,这一指标必须有该国家对付这些限制能力的质的评价作补充,其中包括它在债权人和投资者眼里的信誉、国际流动性程度及该国通过扩大出口进行调整的能力。

把量的指标和质的判断结合起来,我们发现了上述四个国家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限制时所经历的十一个阶段:1965～1966 年(在时间上早于我们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量的系列描述)、1975 年短暂时期、1981～1982 年以及 1986～1988 年的印度尼西亚;1976 年、时断时续地从 1982 年债务危机到 80 年代后期的墨西哥;1971～1975 年及 1981～1982 年的智利;1971 年以及伴随着 1974 年和 1980～1982 年两次石油

冲击的韩国。

政府的总体政策立场也很难评价;这种评价必须基于不同领域复杂的政策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总是相关。不仅如此,自由化计划的开展通常需要跨越很多年,因此,某一年所采取的行动可能起始于以前的某个时期。然而,为了给这四个例子提供一个比较框架,我们设计出了一种计分方案,对 1970～1990 年各国金融政策开放程度分别打分。这一计分表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兑换安排与限制的年度报告(参见表 2)。它们的衡量数据,正好概括了我们对四个领域的交易——国内和国际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金融服务和资本转移的收支、投资和借贷、直接投资——所遵守的规则。这一指标从开放程度最低的零分(四个领域都是零分)到 12 分(四个领域都是 3 分)不等。有关于这个图表计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本文附录部分。

表 2　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智利、韩国的国际化、危机与金融政策

	金融开放度	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外汇储备的百分比值变化
印度尼西亚			
1970	8	21.7	24.4
1971	9	21.3	15.7
1972	9	30.2	66.7
1973	9	39.7	28.9
1974	8	57.9	46.0
1975	8	42.6	- 155.1
1976	8	38.8	70.0
1977	8	38.3	40.3
1978	8	34.8	4.5
1979	8	39.3	35.4
1980	8	47.1	24.7
1981	8	42.5	- 7.5
1982	8	41.3	- 59.5
1983	8	39.2	15.5
1984	8	37.9	22.1
1985	8	32.2	4.0
1986	8	29.0	- 22.8
1987	9	34.6	27.6
1988	10	38.2	- 10.8
1989	10	42.7	7.4
1990	10	46.7	19.4

续表

	金融开放度	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外汇储备的百分比值变化
墨西哥			
1970	6	8.5	13.2
1971	6	8.5	24.5
1972	6	10.3	23.0
1973	6	12.4	15.9
1974	6	13.4	6.3
1975	6	11.4	10.5
1976	6	10.0	-16.4
1977	6	10.1	28.0
1978	7	13.5	10.5
1979	7	17.2	11.1
1980	7	21.4	30.0
1981	7	20.8	27.8
1982	4	17.7	-388.5
1983	7	20.5	78.7
1984	7	25.1	46.2
1985	7	23.7	-48.2
1986	7	14.6	13.5
1987	7	22.3	54.5
1988	8	27.2	-136.1
1989	8	26.0	16.6
1990	8	25.5	35.8
智利			
1970	4	27.1	15.4
1971	0	20.3	-50.2
1972	0	16.9	-43.0
1973	0	21.5	25.6
1974	5	37.8	-66.2
1975	5	35.8	36.0
1976	7	41.7	624.7
1977	7	36.8	5.3
1978	8	34.9	155.6
1979	8	45.6	77.8
1980	9	41.5	319.1
1981	9	33.9	-60.4
1982	9	26.0	-43.5

续表

	金融开放度	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外汇储备的百分比值变化
1983	9	28.2	12.2
1984	9	33.3	13.1
1985	9	37.2	6.4
1986	9	43.4	-4.0
1987	9	50.7	6.5
1988	9	59.4	26.1
1989	9	63.7	14.8
1990	9	61.0	67.2
韩国			
1970	5	32.6	9.4
1971	5	34.2	-39.9
1972	5	37.7	17.1
1973	5	56.3	40.9
1974	5	68.0	-219.2
1975	5	60.3	64.5
1976	5	62.0	60.3
1977	5	62.7	33.6
1978	5	62.8	-7.4
1979	5	61.8	6.6
1980	5	64.2	-1.1
1981	5	66.7	-9.1
1982	5	60.7	4.5
1983	5	60.1	-19.7
1984	5	66.1	14.8
1985	5	64.9	4.0
1986	5	62.6	13.6
1987	5	71.8	7.4
1988	5	74.5	71.0
1989	6	66.3	18.8
1990		57.9	-2.8

资料来源：外汇储备的变化引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各期)。外汇储备的变化即黄金减去总储备的变化，可以特别提款权(SDRs)的美元价值、储备地位和外汇兑换来衡量。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来自：World Bank, World Tables(各期)。进出口以关税为基础。金融开放度是作者根据以下资料计算出来的：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Restrictions(各期)。关于计算方式的解释，参见本文附录部分。

在自由化的八个时期中,七个时期都始于国际收支危机。印度尼西亚(1971 年) 和智利(1974 年) 的自由化都发生在危机之后,当时的危机导致政府被推翻,并导致根本性的政策变革。[①] 从某方面讲,1976～1980 年的智利改革是皮诺切特改革行动的持续,但它是智利历经军事政变、1974～1975 年石油危机,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之后才开始实行的。1978 年的墨西哥自由化也是 1976 年危机的结果。很明显,1983 年的墨西哥自由化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墨西哥很快倒退到 1982 年更加封闭的政策立场上。我们也必须把 1988 年的改革看做是墨西哥在经历五年金融干枯、1985 年石油价格下跌之后为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而作的努力。石油价格的变化也有助于解释 80 年代末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这一规则的惟一例外是 1990 年的韩国,当时,美国压力似乎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我们的案例表明,韩国自由化是十多年来自由化努力的高潮,这些自由化努力始于 80 年代早期韩国所经历的国际收支问题。不仅如此,在这十年间,韩国对国际收支平衡持强硬立场,这也可以解释自由化计划本身的循序渐进。

四个样本国家的改革努力可能是由危机刺激起来的,但国际收支平衡困难总是导致金融开放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将一个国家排除在外。1981～1982 年,智利经历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随后并未出现进一步资本账户开放,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 70 年代中期爆发的危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开放。实事求是地说,智利政府并没有放弃开放资本账户的承诺。

至于其他三个国家的情形,我们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资金的能力。其中明显的反例——1975 年和 1981～1982 年的印度尼西亚,1971 年、1974 年及 1981～1982 年的韩国——恰恰就是这两个既有高国际流动性和借贷能力(70 年代),又有强大的出口业绩(四个时期都是如此)可以迅速缓解短期国际收支问题的国家。同其他危机情形相比较,这些发展使政府领导人无法认识到,应把国际储备的减少视为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吸引资本流入的要求。石油业繁荣甚至导致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待外国投资者的立场

① 引发 1971 年改革的国际收支危机出现于 1965～1966 年,因此在时间上早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数据。

有所倒退。

四、四个国家的金融国际化:个案分析

印度尼西亚

从1949年独立到60年代下半期,印度尼西亚在对待资本账户交易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对的限制性政策。[①]政府要求,服务业的收入必须受到申请执照的限制,并且控制外国投资者的国内汇款。60年代上半期,印度尼西亚历经数次国际收支危机,这些危机与不连贯的货币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印度尼西亚对危机的处理手段是,出台多重汇率制度,它使印尼货币卢比(Rupiah)越来越贬值。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储蓄银行所主导的金融体系遭受了严重混乱。1965年,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危机突然恶化,苏哈托与共产党和军方之间脆弱的联盟关系更加紧张,并导致了1965年秋天政权的血腥崩溃。到1965年12月,"国家点钞机里所剩的惟一东西是一些官僚的手,他们正摸索着寻找剩下的哪怕一丁点美元"(Palmer 1978:7)。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6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改革是印尼新政府对1965～1966年危机所做出的反应,这些改革努力的高潮是1971年政府承诺实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这些改革措施的直接原因是吸引外国资本,尤其是多边机构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想保持国内流动资金持有者的信心,尤其是华裔商人的信心,但是,后一种想法不如前者那么强烈。正如帕姆尔总结指出的,"由于缺少外汇和外部信誉……首先要清除的障碍……是在外国政府眼里重新获得一定信誉"(Palmer 1978:15)。数不胜数的外国顾问参与了稳定政策的制定。但在建立促进资本流入、防止投机性资本流出的政府方面,他们的意见与印度尼西亚的技术官僚——尤其更重要的是总统本人——的意见完全一致(Cole and Slade 1994; MacIntyre 1993:135～141; Palmer 1978:15)。

---

① 欲了解该时期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概况,请参阅:Booth and McCawley 1981; Palmer 1978; Robsion 1986; Winters 1996.

改革是分阶段进行的。1966年,印尼实行了一项债务延期偿付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苏哈托"新秩序"政府开始实行稳定化计划。同一年,政府还实施了外汇市场自由化、卢比贬值、彻底取消多重利率制度的初步措施。1976年,印尼通过重要立法,使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包括允许他们在汇出利润、红利及撤资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从1968年开始,政府已经能够获得贷款,以美元开账户,并且可以把这些账户转换成卢比(Arndt and Suwidjana 1982)。当时,印尼政府还通过了其他法令,旨在帮助银行吸引和确保储蓄额,银行本身也开始主动提供贷款以及美元开出的账户。1970年4月,在取消多重利率制度时,印尼政府曾通过法令暂时关闭了这些银行,但1971年印尼政府颁布了允许货币完全自由兑换的新法令,这些银行又恢复了营业。

政府还鼓励外国的金融中介机构进入印度尼西亚,作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手段,尽管当时国有银行仍然占据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政府放宽了外国银行进入印度尼西亚的限制,1968年至1971年间,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国银行数量大大增加,包括美国第一花旗银行、东京银行、美利坚银行及切斯·曼哈顿银行(Grenville 1981: 104;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1971, 2: 9)。政府还首次准许国内和国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营业活动。1970年,政府解除了对大多数股票转让的限制,允许以美元或卢比的形式持有股票,尽管80年代改革之前,股票交易所一直不甚活跃。

尽管出现了这些自由化的浪潮和制度变化,那些反映政府维持对信贷分配的控制利益的重要限制依然存在。60年代晚期,外国银行就已经获准进入印尼,但政府仍然阻挠外国银行在雅加达之外建立分行,其目的是阻止国际银行挑战当时竞争力相对薄弱且处于政府保护之下的国有银行(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for Indonesia, 1971, 1: 9)政府尤其不愿意那种可能威胁印尼农村信贷分配的竞争,这种信贷分配是维持保护人—代理人网络的一种手段,而这种网络构成了苏哈托政权的基础(MacIntyre 1993; Winters 1992)。

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印尼银行的国际业务也受到限制。1985年,随着国际机会的增加,当地银行开始进行游说活动,要求准许它们建立更多的代理机构和代表处,扩大自己的海外业务。它们

认为,国际业务的扩展有助于促进海外与印尼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在非石油类商品方面的贸易和投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1985, 1: 12)。印度尼西亚央行拒绝了这些要求,部分原因是它害怕这样会导致人们要求互惠互利,甚至反过来要求解除对外国银行在印尼业务的限制。

继续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限制的第三个方面是,禁止外国商人参与雅加达股票交易所的活动。70 年代早期的自由化之后,外国银行开始从当地银行撤走业务,其原因在于,在印度尼西亚之外,他们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筹集资金(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1973, 1: 6～7; Palmer 1978: 43)。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雅加达股票交易所的优惠出售,是为了向那些不受外国银行青睐、政府控制的补贴式信贷分配制度造成损失的公司和企业提供资金(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1977, 1 : 6 and 1977, 4: 6)。

这些限制继续存在,到 70 年代中期,印尼政府甚至又出台了新的限制政策。1973 年,印尼实施信贷封顶和利率管制,这最初只是一项稳定性措施,其目的是控制与石油收入上涨和收支盈余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然而,这些控制也赢得了政府干预主义者的支持,正是这些人把国家的财富慷慨地分送给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内日益增长的群体代理人网络。

国有的帕塔米纳石油公司 1975 年面临债务问题,但石油收入复苏和借贷的重新兴起使政府对外商投资持一种更谨慎的选择性干预态度。这一政策变化解释了 1974 年开始实行的更具限制性的条例。与 6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形成对照的是,政府认为,1975 年的国际收支危机并不表明应该改变资本账户政策。印度尼西亚迅速重新制定了债务清偿日程表。印尼是第一个利用所谓"巴黎俱乐部"更改债务日程的国家。石油与通过欧洲美元市场获得资金相结合,使印尼政府领导人轻易地避免了自由化改革。

随着国际借贷机会的萎缩,自 80 年代开始,一个关注国际收支平衡的新时代来临了。1983 年,政府解除了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一项重大管制,但是直到 80 年代后期,世界石油价格开始下跌时,外界的压力才开始陡然猛增。1984 年和 1985 年曾经出现过几次撤资事件,之后又发生了两次严重的撤资高潮:一次发生在 1986 年末,一次

发生在1987年年中。撤资不仅引发了汇率调整,而且导致金融的进一步开放。

1988年10月,印尼政府公布了内容广泛的一揽子自由化措施(Cole and Slade 1994; McKendrick 1989; MacIntyre 1993: 157～159; Winters 1992)。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允许外国参与雅加达股票交易所。这一措施当时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因为这意味着可能增加外商对印尼公司的所有权,在当时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1985, 4: 8; 1987, 4: 12～13)。然而,在与民族主义的较量中,经济政策制定人所管制的目标及可能带来巨大利益的前景最终占了上风,外商获准参与。1989年,雅加达股票交易所开始繁荣,这主要是海外需求刺激的结果。1989年第四季度,外商持有雅加达股票交易所所列全部股票额的数量估计达到1/3(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1989, 4: 10～11)。

1988年10月的一揽子措施也影响了银行业。银行业除进行国内改革外,还解除了外国银行在印尼的业务限制,其目的是增加外国资金的流入。政府解除了不准外国银行在雅加达之外设立分行的禁令。[①]国内银行、出租和代理业务、证券贸易公司、保险公司、信用和消费者资金公司也被准许与外国银行建立合资企业,国内一方所有权最低是15%。如此以来,7家日本银行、里昂信贷公司(Credit Lyonnais)与当地合伙人进行了建立合资企业的谈判。解除这些限制,准许外国银行进入印尼,自然意味着促使资本流动的进一步自由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海外借贷的有关限制被解除,部分原因在于1988年的银行改革。

印尼大部分政策变革的时间安排说明,国际收支地位一直是资本账户政治的决定因素之一。印尼金融的第一次自由化浪潮出现在1965～1966年政治经济危机同时发生之后的五年内,其高潮是1971年急剧开放资本账户。这些变化一直持续到1974年,这时政府收紧了资本账户交易所遵守的条例,特别是制定了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更多条款。1975年危机爆发时,由危机所诱发的政策变革模型可能

---

① 以下资料引自: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1988, 2: 13; No.1: 9; No.2: 10; 1989, No.3: 15; 1989, No.4: 10.

预言，政策变化会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然而，通过货币贬值和巴黎俱乐部的债务新日程表，危机很快得到了处理。这次危机被认为是一次短期流动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充足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石油收入大幅度流入国内，削弱了进行重要政策改革的必要性。直到 80 年代，印尼经历石油价格下跌、遭受国际收支困难，第二次金融自由化浪潮才出现，这次浪潮主要集中于开放金融部门、解除对外国投资的限制。

智利

从 40 年代到 60 年代，智利一直对资本账户的交易施加限制。当时，还存在某些自由化。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当选总统后，这一趋势逆转，从 70 年代一开始，智利对资本账户的限制急剧增加。最初，这些变化与政府的政治计划有关，该计划内容之一是，铜工业国有化，对跨国企业实行更严厉的限制措施。然而，到阿连德政府的统治末期，这些限制表明，政府在通货膨胀面前挖空心思地节约外汇，智利国内外完全丧失了信心，智利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Griffith-Jones 1981）。

这一危机直接导致了 1973 年的军事政变。皮诺切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政策，最初集中在解除国内的条条框框上，解除这些条例的结果是，出现了新的私有部门行为体（Arellano 1983：7；Dahse，1979；Hastings 1993：210～218；Silva 1991，1993）。短期交易利率的自由化，对产生新的非银行金融中间机构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这类金融中间机构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因为直到当年的晚些时候，政府才解除了对商业银行储蓄的管制；直到 1975 年商业银行私有化之后，这种解除管制才完全有效。金融新机制的第二支柱可以追溯到 1974 年 5 月。当时，除一家国有化商业银行外，所有的银行都挂牌出售，很显然，私有部门组织是支持这类措施的。少数企业家购买了这些银行，这些企业家形成了新一代经济集团，该集团把传统的进口替代活动与更大程度地参与出口金融活动结合起来。政府取消将银行划分成不同种类（商业、投资、抵押）的做法，鼓励以集团为基础的新银行更大胆地进行各种金融业务。由于有最低管理条例的监控，银行更喜欢向集团内部的相关公司借贷，从而导致制造业和金融部门的急剧集中。

不过,政府的金融市场政策并不仅限于国内市场。就像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所预料到的那样,智利已经出现了对外控制的自由化,其根本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者。1974 年,政府解除了对外国投资者资本流动的限制,使智利投资法成为最开明的拉美投资法。政府还鼓励外国银行进入智利的金融市场。

埃德瓦多·席尔瓦(Eduardo Silva)提供证据表明,这些早期的国内改革措施,使金融市场上的一群玩家——金融代理人、更国际化的新兴集团、外国银行——更加强大,却是以牺牲更传统的进口替代集团为代价的(Silva 1991;1993)。这些新兴行为体通过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而获益,其原因包括:他们更频繁地参与金融活动;尽管解除管制,国内利率仍然极高,创造了极大的倒买倒卖机会(Vylder 1989:61)。有的公司缺少机会,它们通过成为一个集团的成员而获得信贷,因而批评对资本的控制,它们认为自己为维持高利率做出了贡献。同属一个阵营的左派人士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循序渐进的速度及继续控制借贷数量,给那些私有部门中有优惠便利获得外国资金的集团提供了租金(Vergara 1986:95)。席尔瓦(Silva 1991:243~248)指出,负责执行金融市场改革的经济团队与私有部门中已经国际化的部分——包括金融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维斯卡沃尔(Wisecarver 1985:194)总结指出的,"由于整个金融共同体的压力,资本账户终于开放了"。

但是,这些部门压力与国际收支危机同时存在,危机对政府管制自由化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为了应付阿连德政权倒台前最后几个月爆发的高通货膨胀,为了处理石油危机和铜价格的进一步狂跌所导致的新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压力,1974~1975 年,皮诺切特新政府进行了一项正统的稳定计划试验。这项正统的稳定计划以持续的高达三位数的通货膨胀而告失败,这次失败导致了稳定政策的关键性调整,新的经济团队——名噪一时的"芝加哥小子"——提出了调整计划,将政策重点放在汇率上。[1]

---

[1] 1976 年 12 月,财政部长亚哥·卡维斯(Jorge Cauas)辞职,赛吉奥·德卡斯托(Sergio de Castro)取而代之。帕布罗·巴罗奥纳(Pablo Baraona)从中央银行迁任经济部长,阿尔瓦罗·巴顿(Alvaro Bardon)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德卡斯托、巴罗奥纳和巴顿都曾在芝加哥大学读过研究生,当时,"芝加哥小子"全面控制了智利的关键性经济决策职位以及对皮诺切特本人的支持。

新团队设计稳定政策的目的是，影响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期望值，增加国外和国内债权人的信心。其政策假设是，通过汇率调整引导稳定，最初通过使汇率像缓慢移动的固定架那样起作用，然后通过固定汇率使国内、国际资本市场融合起来，通过减少预期的贬值率降低国内利率。要实现这些技术目标，资本流动自由化至为关键。但是，中央银行官员也把开放资本账户看做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节制，和表明政策意图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一政策在1982年遭到惨败，赛吉奥·德卡斯托对这一计划的认识还是值得引用的："这些重新定值和贬值计划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向国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公众并没有能够迅速理解某些客观事实（财政赤字的大幅减少、国际收支盈余）"（转引自 Douglas 1985: 61）。

1977年9月，商业银行获得许可，首次可以从国外贷款，尽管在总量、期限方面带有各种限制条件，并且禁止直接的倒买倒卖。1977年之后，中央银行在资本账户的管理条例上进行了无数次小的改动。爱德华兹（Edwards 1987: 55）认为，直到智利1982年危机爆发前夕，资本才得以完全自由流动。不过，1979年6月标志着政策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即对银行从国外贷款的限制大幅增加。惟一没有变化的是借贷总额的限制——包括国内外的总借贷额——不超过本身资本和储蓄的20倍。1980年4月，政府取消了对每月资本流入的限制；1980年6月，准许商业银行向国外出借资金；1980年9月，准许商业银行向外国金融资产投资。

很多作者深入讨论了紧接这一全球性货币试验之后发生的危机，在此不再赘述（Carbo 1983; Foxley 1983; Hastings 1993; Ramos 1986）。在国际债权人的极大压力之下，智利政府很不情愿地承担了私人金融债权人的国外义务，很多金融机构的重新国有化非常有效。从短期看，处理债务危机需要对涉外的金融交易实行控制，但是这些控制并不能长久。80年代早期，一帮与私有部门联系更广泛的实用主义经济团队走马上任。正是在他们管理金融期间，出口开始繁荣，所谓的"智利奇迹论"开始流行。尽管这批人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大力提倡开放思想，但政府对资本账户开放的根本立场一直未变。

概括而言，智利的发展经历了如下阶段：阿连德当选标志着三年紧缩管制的开始，随着国际收支困难猛增，这种管制也迅速大批出台。政权变更之后，紧接着出现了自由化，政权变更本身可以说是严

重经济危机的结果。皮诺切特军人政府当权之后,立刻进行了实质性的自由化措施,后来,在渡过 1974～1975 年国际收支困难之后,智利又实行了第二轮开放措施。截至 1981 年,从资本流动、资本出入境权来说,智利的资本账户已经高度开放了。

与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不同的是,在实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之前,智利首先打碎了国内金融管制。结果,智利出现了重要的国内金融利益新集团,它们从解除对外国商人金融活动的限制中获利。这有助于解释 80 年代早期的严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政府对开放资本账户的承诺。

墨西哥

同其他三个国家相比,墨西哥致力于货币自由兑换——包括外国投资者自由汇出利润和资本——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必须用较多篇幅讲述墨西哥的这段历史。让我们从革命过程中和革命之后出现的撤资、金融不稳定性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讲起。20 世纪 20 年代,在墨西哥的金融体系内,同时流通着黄金、银比索、纸比索、美元。在墨西哥银行的帮助下,人们更喜欢储存黄金和美元,由于国家金融体系没有呈现出任何政治或政策的稳定复苏迹象,当时的墨西哥银行正经历着内出血。

由于毗邻美国,墨西哥不可能通过合法行为或行政性行为截断资本外流,墨西哥政府对这一点确信不疑。1930 年,其政府认定只能通过政府保证完全兑换来限制投机性资本流动。20 年代,墨西哥深陷国际银行(大部分是纽约银行)的债务之中,它竭力支付必要的最低限度债务服务费,以便继续利用国际信贷市场。墨西哥政府与国际债权人谈判,其结果是建立了一笔支持向完全兑换制过渡的资金。这一机制“把外国债务与兑换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使人们重新恢复信心……改变外资匮乏的做法”(Diaz 1982; Gaytan 1980: 184)。

为处理 30 年代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墨西哥政府曾经考虑实施资本控制,但最后放弃了该想法。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 年)的人民主义经济纲领导致金融体系越来越严重的美元化,因为当时官方并不禁止在墨西哥银行开立完全自由兑换的美元账户。1934 年至 1937 年间,美元储蓄与总需求储蓄的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此

后,直到1982年金融危机才又出现过这种现象。卡德纳斯不想限制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其中央银行行长认为,兑换管制会损害国际贸易,因而永远不会实施之(Martinez 1980; Maxfield 1990: 72)。整个60年代,政府未对墨西哥居民或非居民的流入、流出资金账户的交易实施任何兑换限制。服务业的收费也不受限制。其间,外国投资者的汇款金额几近外汇流出量的10%。

承诺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并不意味着外国商人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政策是开明的,也不意味着墨西哥金融机构可以在海外自由活动。1924年到1941年,政府准许外国银行分行获得墨西哥财政部准许后,可以在墨西哥从事银行业和信贷服务业务,但禁止它们从事证券交易。1941年,墨西哥政府进一步限制外国银行的活动。从那时起到70年代,墨西哥政府实施更严厉的限制措施,限制相关业务,加上其财政部不准许新的外资流入墨西哥,使得在墨西哥的外国银行数量大大减少。1973年,墨西哥通过立法,明令禁止外国银行在墨西哥建立分行,尽管它准许外国银行驻墨西哥的办事处进行业务活动,但禁止它们参与国内金融代理(Martinez 1991; Quijano 1985)。[①]

这种保护主义立场反映出墨西哥银行的选择。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墨西哥银行缺乏竞争力,这些银行更喜欢管制性环境,这种环境给它们的业务带来滚滚红利。但是,这种封闭还反映出墨西哥政府的动机。政府出于工业和农业政策原因,更容易借助保护主义控制一部分国内银行借贷。也许更重要的是,50年代和60年代,墨西哥政府为其工业政策提供资金,包括扩大国有企业部门,其中采取的一种手段是,对国内银行预先提出要求。如果银行接受这些要求;作为回报,政府实行一种金融政策机制,对这些银行造成的相关损失进行补偿,另一种手段是保护这些银行免受外国银行的竞争。

1976年,墨西哥经历了20年来的第一次国际收支危机。在渡过国际收入急剧下跌和随后的贬值后,墨西哥人又很快欣喜若狂,因为石油出口收入飙升,商业银行借贷急剧增加。但是,这次危机的确为某种金融自由化提供了机遇。1977年通过、1978年开始实施的法律准许墨西哥银行在国外设立支行,这一方面是为了向日益增多的国际客户提供服务,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欧洲货币市场。

---

① 当时在墨西哥活跃的惟一外国银行分行——花旗银行被准许保留其执照。

1982年,墨西哥成为第一个经历债务危机的拉美大国。当时的症状再普通不过了,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现期账户赤字之后,随即发生了外国撤走金融支持和大规模撤资事件。当政府宣布以美元开立的账户不能自由兑换,对外汇进行更广泛的管制,并于1982年将墨西哥银行国有化时,愤怒的墨西哥人怒斥把墨西哥美元转换成“旧美元”(ex-dollars)的做法(Tello 1984)。

这一民族主义的反应似乎表明,危机既可能导致对外汇和资本的管制,也可能导致自由化。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管制并不长久。在这种情形下,国内政治和国外压力起了作用。首先,民众强烈反对这些管制。后任总统马蒂拉德(Miguel de la Madrid)公开反对这一政策,公开表示尽快解除这些管制。然而,新政府的政策立场很难说是人民主义的;相反,它标志着政府朝着政治舞台的技术官僚方向急速滑去(Centeno and Maxfield 1990: 57~86)。这种右倾反过来又与外部考虑紧密联系起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墨西哥结束兑换管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墨西哥的协议内容之一,这种支持对墨西哥就债务问题与国际私有债权人谈判成功极为关键。

危机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恢复短期管制。它开启了一个经济剧烈改革的新时期。在渡过1988年国际收支困难之后,经济改革进一步加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关的改革内容也包含其中(Hufbauer and Schott 1993: 61~65; Maxfield 1993: 253~257)。应该注意到,改革包括解除国内金融市场的实质性管制条例,将危机之后被国有化的银行重新私有化并对外开放,接受外国竞争。长期以来,美国银行试图自由进入墨西哥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它们提供了机会。尽管存在着强大的外界压力,墨西哥政府期望看到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功,刚刚私有化的银行成功赢得了进入条款及某些市场份额的限制。但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导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速了自由化的时间表(Maxfield 1995b)。

我们如何解释墨西哥政府承诺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及资本流动的变化呢?当然,很久以来,毗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就限制了墨西哥政府控制货币的潜在效力。但是,墨西哥政府却能够制定出一种体系,既维持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又限制了外国投资者的行为,从而保护了国内金融体系。对债务危机的最初处理方式是实行封闭政策,但是该政策在几个月之间又颠倒过来,重新实行更开放的资本账户。

1988年国际储备的减少,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出现,最终导致墨西哥的金融国际化,完全结束对外国银行的限制。有趣的是,1995年,墨西哥政府并没有逆转其国际金融政策,尽管当时墨西哥国内经历了痛苦的调整。

韩国

如果从比较角度来审视韩国的国际金融政策,便会发现有两个显著的事实。首先,同其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相对具有免疫力,一直未受其困扰;其次,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之低令人吃惊,尤其将其强大的出口意识考虑在内。1971年危机、尤其是1974年的危机促使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展开辩论。但是,直到1979年初,这个国家开始出现国际收支平衡困难时,它才提出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计划,允许更多外国银行进入国内。这一计划的实施一拖再拖,最终只有部分内容获得实施。其原因恰恰与韩国有能力渡过石油危机有关,与其持续出口能力有关。这些状况限制了政府内部支持进一步自由化人士的影响力。根据我们的分析,1990年的政策调整并非是为了回应国际收支的困难。美国的强大外交压力及1993年政府更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正如韩国在过去10年间的做法一样,其反应是谨慎的、循序渐进的。

韩国政府一贯干预金融市场。[①] 干预的动机与工业政策的实施有关。1961年通过军事手段夺权以后,银行系统被国有化,对出口商的优惠信贷成为韩国以出口带动增长策略的关键因素。在60年代早期,政府借助从国外贷款,来为资本产品的进口提供资金。但是接受国外贷款是由国有银行充当中间人,并且需要政府的批准和保证。令人吃惊的是,除了少数几个出口加工区外,外商直接投资所遵守的条令限制性极大,而个人拥有外汇所遵守的条例比公司所要遵守的条例甚至更加苛刻。[②]

1971年韩国遭遇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导致国内出现一些重要的

---

① 欲了解韩国金融政策概况,请参阅:Choi 1993; Cole and Park 1983; Woo 1991.

② 关于如下文献的评述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韩国自由化的证据:IMF,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60年代各期)。

金融改革。但是国际收支平衡很快得以恢复,对外金融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73～1974 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政府甚至更严重依赖金融补贴和国外借贷,努力发展重工业和化工业。第一次危机推动政府实行更多国家干预。致力于发展重工业的人士与日益壮大的、反对过度发展重工业的技术官僚之间辩论激烈、时有冲突。此后,1979 年初,朴正熙总统默许进行大范围的调整计划(Haggard, et al.1994: Ch.3)。内容之一是要求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①] 1979 年朴正熙总统遇刺、1980 年经济政治危机打断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但全斗焕 1980 年 5 月夺取政权之后,以金杰宜(Kim Jae Ik)为首的技术官僚改革派重新获得了权力,开始实行一系列涉及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重要金融改革。

1981 年 1 月,政府宣布了准许外商通过投资信托资金间接投资国内股票市场、韩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计划。这一措施的动机之一是促使国外资金渠道多样化,而不仅仅依赖银行借贷(Euh and Baker 1990: 44～47; Mahler 1988: 10～11)。由于其充满活力的出口业绩,韩国在 80 年代早期一直成功地持续获得外国的资金。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能说韩国经历了拉美债务大国所经历的危机。但是,在第二次石油风暴之后,这个国家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现期账户赤字,银行在向韩国借贷时比过去更谨慎。当时的人们认为,自由化是获得更多外国资金渠道的手段。

该计划的早期阶段强调将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自由化,但是这一策略极其注意循序渐进,直到 90 年代初期,韩国才形成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整体计划。直到 80 年代下半期,其国内公司才有权从国外筹集资金。只有 14 个最大的公司有权通过可兑换的股票来直接贷款,后来,它们必须获得财政部批准才可以这么做。该模式符合政府对大型企业集团(chaebol)的优惠待遇。

政府对国外金融中间机构进入韩国采取了高度保护主义的立场。封闭且受到高度约束的金融体系是导致政府采取该立场的部分原因(Euh and Baker 1990: 19～43)。而且,韩国国内银行正在私有化,资本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发达,相当一部分经济官僚仍然与利率控

① 欲了解改革的概况,请参阅:Park 1995。欲了解有关 19 世纪 80 年代金融市场改革的政治状况,请参阅:Choi 1993 and Rhee 1992 .

制捆绑在一起。不仅如此,银行不得不经营不再创造利润的资产,这些资产大多是 70 年代末大力发展重工业时的政策性贷款(Choi)。外国商人进入只会使金融领域的调整愈加棘手。不仅银行部门情况如此,在受到高度保护的保险和证券行业也是如此。

尽管韩国产业实行了国际化,大型企业集团对于国内解除管制和国际化仍然忧心忡忡。首先,尽管它们非常欢迎进入金融领域并获得独立进入国外金融市场的机会,但它们仍然严重依赖国有银行的优惠资金。其次,尽管政府试图使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很多大集团依然是家族式企业。规模较小和中等规模的公司更是如此。这些公司担心外商进入资本市场会使政府放松管制。最后一个原因是,就快速向国外开放资本流动而言,大型集团依赖出口实际起到了控制速度的作用,因为它们担心资本流入会对汇率造成压力,1979 年之后智利恰恰发生了这种现象。直到 90 年代,这仍然是一个重要考虑。①

在不存在严重国际收支限制的情况下,要求政府进行自由化的压力微乎其微。事实上,1985～1988 年,韩国的现期账户存在巨大盈余,1987 年达到高峰,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8%。这些盈余形成的压力,恰与危机情形下遭受的压力相反。一方面,在 1987 年和 1988 年,政府放松了对资本出口的控制,鼓励公司预先偿还外债,向外扩大对外投资。另一方面,盈余迅速累积产生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严峻问题,还产生了放慢资本流入自由化初步时间表的要求。1989 年,当现期账户盈余变为赤字时,政府也回到控制资本出口的传统做法上。

韩国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国际收支平衡,而是来自美国政府。1988 年贸易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确定一个国家是否通过操纵汇率阻止有效的调整,或获得竞争优势。美国财政部发现,当时韩国正操纵其汇率,1990 年 2 月,两国发起了财政政策会谈。会谈的前提是韩国货币(won)升值不够,因为持续的资本管制限制了对它的需求(Balassa and Williamson 1990)。就在这些怨言出现的同时,美国银行方面也怨声载道,抱怨自己在韩国的业务遭到歧视,有意进入有利可图的韩国市场的美国证券公司也有同样的怨言。

① 读者可参阅如下论文:Dornbusch and Park 1995 .

1988 年之后,对美让步与维持政策自主性、有选择地准许外国商人进入、减少对国内金融公司的竞争压力之间获得了平衡。1990 年 3 月,政府开始实行一种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通过加大定期存款的限制,外国银行获得韩国资金的问题——它们就此报怨多多——得到解决。1991 年 6 月,政府重新修订了外国资本管制法案,开始朝着限制名单制度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制度之下,除非是明令禁止的交易,否则一概准许。

然而,政府继续实施管制的企图阻碍了自由化的措施。开放资本市场、准许多种投资、允许外国商人参与证券交易的有关规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92 年 1 月,外国人可以直接购买韩国的证券,尽管政府限定外国人的股份不得超过一个公司股票总额的 10%,限定单一外国公司所持的股份不得超过一公司股票总额的 3%。考虑到某些规模最大的公司有权发行可兑换的股票,达到这些限定数目很容易(Business Korea, February 1992: 27)。1992 年 3 月,在与美国进行的金融政策会谈中,韩国财政部出示了一份文件,简要介绍了一项关于金融领域"完全"自由化的新蓝皮书。其中规定,第一阶段包括各种小规模的措施,如允许国外银行定期储蓄发行量的微小增加,准许一些国外金融机构进行股票交易,扩大每日外汇的浮动。但是,该计划估计,自由化将来的阶段取决于国际收支平衡、低通货膨胀及缩小国内外利率差距。而美国认为,这种情形只有在国内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May 1992: 20)。

围绕准许外国商人进入国内金融领域的争议表明,政府采取了同样的努力来平衡国内外压力。当政府宣布准许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标准时,政府考虑的因素包括,该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内产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合资企业比外国独资企业更受青睐。不仅如此,政府对资金的要求太高,准许进入的企业经营范围太含糊不清,结果很多外国公司甚至不愿意提出申请。日本的申请者都遭到拒绝,原因是韩国不能进入东京的市场。而金融分析家解释道,韩国公司害怕拥有大量现金的日本公司,政府名单是专为对付美英贸易压力量身订做的(Business Korea, January 1991: 28~29 and April 1991: 49~50)。

由于不存在严重的外汇限制,韩国的自由化进程极为缓慢。通过增加借贷和进一步扩大出口,韩国处理了石油危机。一部分经济

领域的官僚发现了朴正熙统治晚期加强控制政策的缺陷,但是政府与巨型集团公司的密切联系也限制了政府自身的行为。规模最大的公司继续享有信贷优惠,国内金融部门继续受到很大程度的保护。而且,政府保持了政治优势,即有能力将金融体系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向自己青睐的集团或个人调配资源的手段。

结　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两大外来压力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的改变。首先,与弗里登—罗戈斯基的模型一致,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相互依赖加深、金融市场一体化加深所提供的机会导致国内金融国际化的“优惠版图”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进一步加强了外国行为体进入市场的获益。变化中的利益安排为我们理解不同阶段的自由化提供了重要背景。

但是,我们特别强调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立场造成的类似后果。危机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内部和经济领域中的国际化力量。政治领导人试图打消国内外债权人、投资者的顾虑,这种努力成为各阶段资本账户开放的动力。与此相比,在容易获得资金、商品繁荣、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下,政府与投资者讨价还价的权力有所加强,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政治家继续实行控制。

我们的研究有所发现,但是,集中探讨国际因素的政策、政治后果的研究思路还存在经验上和理论上的弱点。我们认为,强调这些弱点很重要。首先,经济开放程度和继续保持封闭造成的机会成本变化缓慢,因此很难评价各部门利益累积的力量何时朝着政策改革的方向倾斜。在不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部门进行管制的利益非常强大或“需要精心处理”。

另外两个问题对国际化假设形成了更为深刻的挑战,迫使我们回到本书加勒特和兰格提出的重大制度问题和政治问题。首先,我们发现,一种政策模式不能完全解释政府进行干预和自由化的动机,其中不同部门对国际化的立场构成促动性的因果机制。政府在实施控制和自由化时存在政治动机,这些动机超越了构成弗里登—罗戈斯基研究核心的要素和部门分析。这包括政府在资金方面存在优势,它能够利用金融体系达到执行产业政策、发挥保护人作用的目

的。

第二个问题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即从某些方面讲,居于本文研究核心的"国际"变量——如外来冲击、经济开放度、经济封闭的机会成本等——本身就是昔日政府政策的功能。例如,当我们探究以上四个国家国际收支危机的起因时,我们首先发现,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都深深卷入危机之中;其次,在政府甚至政权发生更换之后,才会出现政策创新。

在20年代和30年代,墨西哥政府重新支持货币自由兑换,这发生在革命造成金融政策长期混乱之后。随后墨西哥实行的金融改革的确是为了尽力减轻外国债权人的负担,但该改革形式恰恰是为了迎合新兴的人民主义精英巩固权力的愿望。墨西哥政治领导人利用金融市场的方式与各部门的做法并无二致,只是反映出更广泛的政治动机。例如,政府通过外国金融管制,不仅为进口替代产业和农业提供资金,而且为自己提供资金。资本账户规则的随后变化不过是进一步政策调整和重新安排政治阵营的一项内容罢了。70年代早期埃彻沃里亚(Echeverria)总统制定了限制外国投资者的法律,这不过是针对保守主义、不平等日益严重而做出的更广泛的政治行动之一。反之,80年代的自由化是对埃彻沃里亚和洛佩兹·帕蒂罗(Lopez Portillo)政府失败做出的反应。

在印度尼西亚和智利,构成资本账户自由化背景的国际收支问题可追溯到昔日的动荡岁月,即苏加诺(Sukarno)人民党政府和阿连德政府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不可持续的汇率政策。这些国际收支危机的解决,并不仅仅因为继任政府改变了路线。相反,危机有助于政权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支持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联盟进行根本性重大调整的标志。在智利,皮诺切特利用手中权力,制定出经济重组的新路线。金融市场政策不过是自由化新战略之一,该战略的目的是彻底铲除阿连德上台的条件。与此形成的对照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允许资本账户自由化,但继续利用市场分割和金融管制分发保护人红利,以此稳固政治支持的基础。

最后,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严密控制、长久以来促进出口的动力有助于我们理解韩国如何成功避免了国际收支困难。国际收支困难使其他三个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时烦恼不已。但是,如果不考虑到1961年韩国军方对政治的干预,就无法理解这种增长路线。这次干

预根本改变了韩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实质。像其他国家一样,国内外金融控制是维持政权更广泛的政治战略之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干预和政治控制的手段难以改变,尽管韩国存在着实质性的"国际化"。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详细探讨这些国内因素的性质。我们遵循了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路线(Haggard and Kaufman 1995: Ch.5; Haggard and Maxfield 1993; Maxfield 1990)。本文的目的是集中探讨国际化的重要影响。但很明显的是,就我们所考察的个案而言,在国际化如何影响资本账户的政策制定方面,国内政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能把这些国内政治限制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集团的冲突或利益。

在结束本文之际,我们要说,这种国内政治变量将来可能越来越衰落。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我们以上分析的政策变化将加速这种一体化——在未来的决策中,国际限制在资本账户以及更一般性的经济政策方面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附录

本附录是关于国际金融政策开放度的,总结了特定政策领域的四种不同指标。其赋值则是以从 0 到 3 的四个刻度为基础,因而其总量值在于 0 到 12 之间。四个政策领域的赋值规则如下:

一、商业银行的国际运营

0 分:国内私有银行没有或存在最低限度的国际运营;或禁止外国银行进入,或对所有对外交易实行实质性管制。绝大多数对外金融交易由国有银行办理。

1 分:国内银行的所有对外交易都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并限定其项目和银行的纯外汇数量。外国银行的国际运营受制于政府的许可及其他限制条件。

2 分:国内外银行的国际交易受到某些法律限制,但在这些限制之内有实质性的自由。

3 分:国内银行的对内、对外交易拥有实质性自由。外国银行的运作拥有实质性自由,总体环境不存在歧视。

二、金融服务(包括利润和红利、资本收回本国)的支付

0 分:所有金融服务的支付包括利润和红利收回本国都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限制资本收回本国。

1 分:金融服务的支付和资本收回本国受到限制,但确保利润和红利收回本国。

2 分:确保金融服务的外汇交易有实质性自由。确保利润、红利和资本收回本国。

3 分:确保所有金融服务的外汇交易有完全自由。确保利润、红利和资本收回本国。

三、证券投资与私人借贷

0 分:不存在对内和对外证券投资;政府协调所有外国借贷。

1 分:国内居民没有或很少能够接触到外国证券;国内企业没有权力在国外发行债券或相关权力受到限制。对外国人持有国内证券实施实质性限制。对国内证券企业的外国业务和外国证券企业的国内业务实施实质性限制。政府对所有外国借贷实施管制。

2 分:建立了国内居民购买证券和国内证券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的机制,尽管存在限制。对国内外证券企业的运作实施某种限制,特别是继续实行对国内企业有利的歧视政策。海外借贷自由,获得政府许可尤其如此。

3 分:国内居民购买证券、国内证券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外国人获得国内证券有实质性自由。建立了对外国证券企业的一般性非歧视机制。海外借贷拥有实质性自由。

四、外国直接投资

0 分:存在实质性的部门限制,所有投资必须经过审查,对贸易行为、就业、国内资本及其内容等存在广泛的要求。

1 分:存在部门限制,但某些部门和(或)项目开工不需要或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审查。对贸易行为、就业、国内资本及其内容等存在某些要求。

2 分:存在部门限制,但主要存在于邮政、电讯、能源、公用事业和采掘业;其他大多数行业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或只审查大型项目。对贸易行为、就业、国内资本及其内容等要求不多。

3 分:部门限制甚少,自由对外投资,没有或存在最低限度的相关限制。对贸易行为、就业、国内资本及其内容等没有要求。

所有相关信息的数据来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nual Reports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各期)。又见: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xchange System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ptember 1989);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xchange System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1992).

第五部分

结　　论

第十章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结论

海伦·V.米尔纳、罗伯特·O.基欧汉

在结论部分,我们将参照此前各经验论证的章节所提供的证据,回答导论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思路是,首先详述导论中提到的连接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因果机制或途径,然后评价该部分提出的假设。我们的目的是,系统性地总结我们已经发现的国际化对集团利益、政府政策和国内制度的影响,并探讨这些制度对国际化本身的某些影响。

我们首先明确三种具体的途径,世界经济变化通过这些途径改变国内政治。这些途径包括: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我们的分析与本书导论第三部分直接相关,并着重探讨其所论及的广泛联盟进程以及假设1和假设2。结论第二部分将回答导论中推论1和推论2所提出的问题:自给自足的国家是否仍然受到影响?谁是国际化的赢家?谁是输家?在结论的第三部分,我们将评述导论第四部分涉及的国内制度影响,包括阻止国人了解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冻结国内联盟、疏导对价格变化的政治反应等。国内制度能够完全阻止国际价格信号的情形非常少见,但是这些制度却经常干预那些信号,使变革的速度减慢。在结论的总结部分,我们将提出关于世界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制度之间联系的见解。

一、国际化与政治变迁:三种途经

在导论部分,我们区分了国际化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的三种途经:影响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以及随后造成的政治联盟;引发危机;削弱政府自主性及其政策的有效性。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这些"途径"上。

政策偏好和联盟

弗里登和罗戈斯基认为:正如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国际化可以导致行为体政策偏好的变化。举例言之,我们预测国际化导致某些商品相对价格的上涨,与这些商品生产有关的集团会因此要求实施自由化。或者,伴随急速增加的原料出口,国际化可能导致资本的流入;这种流入反过来会导致汇率的实际增值,并给可贸易商品的制造商们制造困难("荷兰病"),他们可能反对这种汇率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会影响资产持有者采取政治行动的动力,国际化会强化或威胁集团所得到的回报。作为回应,他们可能被诱使采取政治行动:例如,他们可能进行院外游说活动,通过实施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政策保护自己的租金;或者反过来说,采取进一步的自由化措施,以更有利可图的方式获得使用贵重资产的能力。总之,相对价格变化将改变资产所有者的回报(因为其价格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其政策倾向的可预见变化。

国际化不仅影响国内行为体的偏好,还会影响它们的国内影响力。例如,解除资本控制、消除贸易壁垒意味着,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金融资本、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公司——获得了与非流动性生产要素(如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蓝领工人)和依赖当地资产的公司进行讨价还价时的优势。因而,为了增加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声音"),刚刚获得授权的行为体能够以"退出"相威胁(Hirschman 1970)。国际化可以通过影响偏好和权力来影响国家政策。

按照这一观点,国际化还可能影响政治制度。其中,政治制度反映强大行为体的偏好:当行为体改变偏好、新政策得以实施时,有可能出现制度变迁。

本书有诸多偏好和联盟变化的证据。就发达国家而言,日本和美国都体现出相关证据。罗森布拉斯描述了出口增长与多国关系如何改变了日本商业的倾向。以国际业务为主导的大公司不再忍受对其他国内行为体的高度保护,它们认为,向占据优势的自民党提供巨额竞选赞助的做法不再有利可图。日本公司的倾向和政治行为发生变化,部分原因在于其日益增加的国际竞争力。对弗里登来说,联盟变化是美国货币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化导致对货币政策的

争议,它使部门之间直接相互作对,并将国会直接牵扯在内。

有意思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显示出这种国际化效应。伊万杰利斯塔指出,50年代开始的苏联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之一是创造出一个"新新阶级"。这一阶级从国际化中获益,成为勃列日涅夫死后席卷苏联的改革运动的基础。他指出:"据某些解释,正是国际经济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苏联在50年代对国际经济的部分开放,为改革派联盟提供了最初的基础,而这一联盟又使戈尔巴乔夫得以掌权。"但他强调说,国际化只是解释苏联初步改革的一个原因。

中国也似乎出现了类似过程。如谢淑丽所说,国际化有助于某种行为体群体的出现,邓小平与这一群体结成联盟。农民、轻工业、沿海省份及消费者所组成的这一联盟从中国经济开放中受益,他们成为拥护邓小平、开始经济改革战略的政治关键。

可以说,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相对价格模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政府可能试图把哪些集团吸引到自己的联盟中,以回应国际经济的变化。例如,谢淑丽甚至暗示到,当邓小平筹划自己的改革战略时,他的脑海里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模型,"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从近来的国外出访中可能了解到,在他的这些思想中,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主体框架会产生促进国内改革的巨大后劲"。

在欠发达的国家,国际化也产生了新的利益集团和联盟。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指出,国际化给欠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造成了新压力,而银行和其他金融资产持有者对这些政策越来越感兴趣。随着流动资本资产所有者退出的余地越来越大,政府不得不更认真对待这些利益集团,因而要求改革的压力飙升。

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

假设1声称,国际化意味着,随着可贸易商品部门的扩大,人们对世界价格趋势和冲击更加敏感,因此加大了外来压力造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可以演化为重大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人们还预料,围绕世界经济问题,国内将兴起政治辩论。我们所讨论的大多个案似乎都支持这一假设。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对世界经济的经济、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大一直是重要话题之一。当货币面临压力时,世界经济的影响变得愈加明显。一个国家的货币面临压力,对政府而言是一

个信号,表明资产持有者已经丧失了信心,或者说他们讨厌政府的政策。随着国内市场的日益国际化,这一限制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当政府采用那些能够造成大规模的持久财政赤字或通货膨胀的政策时,国际市场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对该国货币造成灾难。80 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经历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个案。但是,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都遭受过这种压力,1992 年 9 月和 1993 年 8 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欧洲政府试图固定其汇率(即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原因之一,就是减缓货币浮动及其危害性后果。我们现在可以预见,一个货币联盟(EMU)进行更为广泛的协调,将是欧洲国家得以避免国家货币浮动及其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

但是,各国政府却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它们在一种资本流动的环境中固定汇率,则牺牲了制定和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造成影响其财政政策的压力。大规模的财政失衡——尤其是财政赤字——对利率造成压力,从而也对汇率形成压力。对今天的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一个核心问题是,当货币和财政管束面临强大的国际压力时,如何维持它们范围广泛的福利制度?如加勒特所指出的,金融市场已经将重要的先行利率强加给那些左派—工党政府所管理的国家。由于资本流动的跨国壁垒已经拆除,这些利率已经增加。因此,他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可能是社会民主的丧钟”。国际金融市场丧失信心造成一国的国际收支困难或财政危机,可能导致重大的政策和制度改革。

在第九章中,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指出,对很多欠发达国家来说,国际收支危机已经成为关键的政治转折点。这些国家是小国,缺少遮掩条件,难以经受不利于其本币的持续国际压力。相比富庶的、拥有长期民主历史的民主国家制度而言,人们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更容易被击碎。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的政策变革是:自由化,促进面向国际的集团利益,赢得富国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精英的掌声。但是,正如 1994～1995 年冬天墨西哥危机所昭示的那样,开放可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极易受到丧失信心和撤资的伤害。

在东欧和苏联,国际化的明显后果实在惊人: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抵制调整,但变革一旦发生,却是根本性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地避免了国际化引发的危机,但是,随着它对国际市场和资本流动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外来冲击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削弱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早在很多年以前,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 1968)就指出,国际化可能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削弱政府控制贸易和资本的效用和市场交易能力。按照弗里登和罗戈斯基框架,以上说法意味着,国际化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化改变了经济代理人——如公司——在现行政策面前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又改变了这些政策的影响力,削弱了它们对政府的重要性。因此,即使没有社会集团的压力,政府也可能改变其政策。

各章提供的证据表明,某些政策手段的有效性(如资本控制及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受到国际化的侵蚀:国内的传统管理和特权与推动对外经济平衡的政策直接发生冲突。在美国,近来资本和商品市场的国际化已经降低了利率政策的效用,弗里登已经在第五章中分析了这一点。正如加勒特所指明的,对于大批民主工业化国家来说,经济越来越向贸易开放,可能会削弱政府利用资本税收和货币政策的能力。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剩余劳动力的增加造成更低的税收和更高的利率。但是,对这些社会民主政府来说,贸易规模大、资本流动性强都不会对其财政政策构成限制;它们往往倾向于政府的更高消费和财政赤字。不仅如此,某些形式的国际化对国内行为体的限制可能更小。加勒特还提供了1960年至1990年间欧洲的证据,这些证据将贸易影响和金融一体化的影响区分开来。这些证据使得他关于世界经济的观点有些与众不同。加勒特通过跨国定量分析指出,相比贸易一体化,金融市场一体化似乎更有可能给欧洲左派—工党政府带来苛刻的限制。加勒特和弗里登的分析为我们的第四个假设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这个假设是:国际化,特别是以资本流动性为表现形式的国际化,削弱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自主性和有效性。[①]但是,加勒特的分析表明,社会民主政府确实仍有选择。他指出,"但是,随着国际化增强的出现,左派—工党政权和财

① 托贝·埃文森(Torben Iversen)饶有趣味的论文证明,并非所有欧洲社会民主政府采用了凯恩斯式政策。对于没有采用这些政策的国家来说,国际化强加给它们的限制要少一些(参见Iversen 1994)。强调选择权在于政府而不在于政府所面临的限制这一观点的其他学者包括:Helleiner 1994; Moses 1994.

政扩张之间的关系增强了,而不是受到贸易和资本流动增强的限制”。尽管国际化带来压力,政府仍然有政策选择,财政政策可能是可供选择的最重要手段。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各种经济政策的效用似乎特别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压力的伤害。考虑到这些国家往往是国际经济中的小角色,而且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这种易受伤害性并不令人吃惊。在分析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智利和韩国的例子时,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指出,资本控制手段在这些国家经济的国际化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小,这是政府决定结束这些手段的原因之一。政府控制打消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各公司的国际化也使控制效果越来越差。这些国家的政府认识到具体情况已经改变,再加上收支平衡危机,促使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计算自身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并至少推行部分的市场自由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价格信号也影响到了政府的倾向。马修·伊万杰利斯塔的分析表明,苏联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隐性通货膨胀,导致这些政策变得没有效果,甚至反生产力。他指出,“尽管苏联的中央计划者们尽了最大努力来使苏联的经济与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隔绝开来,从一个方面讲,他们却一败涂地。即使关键的贸易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从来没有以国内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苏联经济却遭受与西方同样的后果,即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又反过来导致巨额预算赤字及其他问题,这些都削弱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伊万杰利斯塔强调,即使不存在国际变化,这种通货膨胀也可能出现,他指出,世界经济相对价格的变化使传统的政策手段代价日益高昂,促使人们寻求也许更加有效的新政策。价格信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策。谢淑丽认为,70 年代后期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相信,持续的经济封闭会抑制增长;向世界经济开放能够增加中国的国家实力,提高共产党的威望。

实际上,国际化已经使人们置疑“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的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国家更加大规模地参与经济,只会使人们更支持很多发达国家的开放(Ruggie 1982)。当前流行的观点似乎是:干预越少越好;在一种没有条条框框约束的环境中,经济会走向繁荣,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越来越反对急速调整的代价,但也许会选择新形式的政府干预——很多干预措施是为了约束和限制这种开放。国家放

弃对市场的管制,则其政策自主性会越来越弱。但是,这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在国家寻求并发现新的干预形式后,这一阶段也就结束了。

二、检验推论

导论的第一个推论指出,考虑到自给自足经济造成的高昂的机会成本,国际化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国家有重要影响。但是,伊万杰利斯塔对苏联的分析使人们怀疑这一假设。伊万杰利斯塔的分析表明,自给自足的经济与国际经济几乎没有关系,并且苏联的很多集团都不认为他们的偏好是潜在相对价格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样,1978年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制度阻止有关自给自足经济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的信息进入国内。改革并非不可避免。它要求领导人发动一切因素实现其偏好,并选择政策方向。

因此第一个推论必须有强有力的理由,才能为人们所相信。即使国际化在继续进行,实行非民主化政治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国家也能长期存在。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谈到的,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随着效益的每况愈下,公众的不满可能爆发,政府的合法性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我们的第二个推论是,国际化增加国际流动资本——不管是公司还是金融中间机构——的权力。按照这一观点,国际化给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大的退出机会,因此相比资本流动性差的公司或劳动力而言,它们对政府的影响也更大。由于民主政府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经济形势繁荣则政府获益;经济形势恶化则政府受损。因此,政府不得不担心撤资因而缺少流动资本投资的威胁。了解资本撤出存在更为可信的威胁,这些集团对决策的影响力更大。正如贝茨和里恩所总结的那样,“那些拥有更多流动要素的部门对公共政策有更大的影响力”。鉴于资本通常比劳动力更有流动性,这就意味着国际化将赋予资本更大的优势。“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之下,对于有害政府政策做出的最有效的市场反应,是把资产转移到其他更有利的辖区。(这一)做法意味着,国际资本是有可能控制公共政策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国有资本、农业和劳动力不同”(Bates and Lien 1985: 59, 63)。

尽管本书各章无意专门探讨该问题,它们却支持了如下一般性判断:与非流动性的公司和劳动力相比,国际化往往更偏爱流动资本。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将尤其加强金融资产持有者的权力。在工业化国家,与非熟练的劳动力相比,资本日益增大的权势或通过非熟练劳动力的低薪或通过高失业率反映出来,尽管人们对其效应大小还持有争议(Cooper 1994; Wood 1994)。为了促进出口,政府可能不仅仅改变其政策;它们甚至可能改变其制度以打消投资者的顾虑,使自己的新政策听起来可信。在第九章中,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提供个案,分析了欠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然而,该一般性判断的两个必要条件很重要:首先,国家之间以及在不同的问题上差别很大。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指出,在欠发达的国家,如果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开放对劳动力有利,但却是以牺牲国有资本为代价。不仅如此,一旦投入资本,其获得资产的流动性就降低,具体部门更是如此;因此,本章提出了不仅要考察部门利益还要考察要素利益的重要性。

其次,国内制度可能使有组织的集团获得优势,赋予它们权力和发言权,因此国际资本不能完全利用其流动性。国际化的输家可能利用根深蒂固的制度来阻挠或疏导对面向国际的资本造成危害的变化。如果社会对其富裕居民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些居民还想留在国内,则借助它们的企业,这种阿尔波特·赫什曼所称的“防守性战略”(defensive strategy)可能奏效(Hirschman 1978)。例如,尽管日本日益嵌入国际经济,其国际企业的领导人却一直不能推行他们所渴望的全部政治改革;落实已实现改革的过程也很漫长。可以说,甚至在一个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人们所预期的国际化接轨也会大打折扣。当然,从中短期看,预先存在的联盟和制度阻碍了这些变化。因此,我们关于国际化对流动资本有利的假设肯定是有理有据的。

三、国内制度的三种影响

国内制度的性质并不仅仅由经济有效性来决定,它反映了社会价值及某一社会中主要行为体的倾向。正如导论第四部分所概述及本书各章所支持的那样,对将国际化与相对价格变化联系起来的过

程,国内制度似乎发挥着三种影响:阻挠价格信号传播到国内;冻结现有的国内联盟和政策;疏导对相对价格变化的政治反应。正如加勒特和兰格所指出的,有助于组织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正式政治制度非常重要,不能忽视。

阻挠价格信号传播到国内

国内制度能阻挠国际环境传来的价格信号。在中国、苏联等政府干预强大的国家中,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成为国内、国际经济之间的一堵"墙",削弱了国际市场上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伊万杰利斯塔指出,"尽管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未能完全保护苏联经济免受世界市场变幻莫测的影响,它们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还继续存在),扭曲了国际经济变化对苏联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墨西哥、智利及本书没有讨论到的其他欠发达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韩国的工业干预和资本管制政策,其目的也是阻挠国际价格信号传播到国内,或至少将这些信号改头换面,尽管其管制程度比苏联要轻。

即使在没有国际化的情况下,极为强大的国内制度可塑造国内行为体的倾向。伊万杰利斯塔认为,80年代后期以前的苏联等国"行为体的策略、行为乃至其目标都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塑造着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也塑造着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认识,甚至在制度本身已经消亡之后依旧如此"。

苏联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的分析还表明,在欠发达国家中,制度化要么难以引发国内行为体面对价格变化而希望出现的政策倾向,要么不能促使这些集团对国家主动施压。像苏联个案所展示的,国内行为体可能要么不受世界价格变化的影响,要么不能克服将自身潜在利益转化成政治行动所要求的集体行动。因此,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我们的案例所提供的证据充分满足了导论的第二个假设:国际化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从长远来看,国内制度阻挠价格信号进入国内的能力越来越令人怀疑。同一时期的债务危机推动智利、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进行经济自由化。极富戏剧性的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已经实行自给自足经济制度多达30～6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遭受日益严重的困难。苏联对世界经济采取了"选择性进入"的回应方

式,试图获得国际交往的好处,同时又不改变计划经济的实质内容。然而,正如伊万杰利斯塔所说的,“有选择地进入世界市场的策略最终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用政治术语说,向国际经济开放既滋养了普通民众的期望,也滋养了精英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在旧的制度环境中不可能实现”。现在,苏联制度正躺在托洛茨基所说的“历史骨灰盒”里。国际化可能也是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

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统治者不同,70 年代后期上台、在此之前遭受迫害的中国新领导人能够而且愿意改变政策。谢淑丽认为,当中国精英在 70 年代能够到国外访问时,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落后使他们震惊。因此,他们推行重大经济变革的动力十足。国际压力诱发了国内的政策变革。“一旦最高领导人站在改革一边,苏联式的政治制度依旧存在,但这并没有阻止改革,并且具有令人吃惊的灵活度”。

关于国内制度阻挠对价格信号做出敏感反应的能力,我们能提出什么一般性结论呢?从短期看,国内制度可以构成世界经济和国内政策后果之间的障碍。但长远观之,过去 15 年世界经济的大范围变化证明,国内制度不能抵制这些压力。最终,阻碍价格信号导致严重的效率低下,这反过来又降低了生活水准,从而缓慢地、但却稳步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但是,正如加勒特和兰格所指出的,在更专制的国家,这一过程可能缓慢得多。只要政府能够将这些好处分给自己的核心支持者,不理睬或压制更多的反对意见,那么对这些变化的抵制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制度越抵制,变革过程就有可能付出越高昂的代价,且更具有危险性。

冻结联盟和政策

即使不能有效阻挠价格信号进入国内——工业化国家很难成功做到这一点,既有制度也可能通过冻结联盟和政策来否定或改变世界经济的影响。国际价格信号可能进入国内经济中,但是,政治可能以消耗战的模式冻结起来。利普赛特和罗坎(Lipset and Rokkan 1967)指出,在欧洲国家,党的制度被“冻结”在原地。与他们的论断相似,本文也认为,支持现存政策的联盟也困在原地。“路径依赖”大概还引发出抵制变革的意识(Arthur 1994; David 1985; North 1990, Chapter 11)。彼得·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所描述的“国内补

偿”战略制定出来,其目的也许是为了维持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与国家的竞争力保持一致(Katzenstein 1984, 1985)。加勒特指出,尽管存在国际化(也许正是因为国际化),社会民主国家一直能够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一证据使第二章弗里登和罗戈斯基的观点——世界经济变化往往导致新的利益集团和联盟产生——有理有据。利益集团和联盟的出现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它们也许得付出很高的代价才能进入政治制度。

某些经验性章节支持了这一观点。日本近期的历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日本自民党抵制政治改革,在这一问题上四分五裂,最后因其抵制行为而丧失政权。正如罗森布拉斯所指出的,“在国内,支持自民党的利益集团构成发生了几次变化,这意味着如果在等同条件下,政策也应该跟随发生变化。但是,日本的个案显示政治制度在塑造和引导政策制定者动机的重要性。当制度将其自身作为独立力量时,例如,创造进入政治舞台的障碍,它们可能产生不再确切反映社会力量平衡的政策”。在苏联、韩国和西欧,国内联盟对变革的抵制也很明显。因此,既有制度能够扭曲、调和国际价格信号的证据十分普遍。

但是,在持续的相对价格的重大变化面前,这些既有制度和联盟不可能无限期地抵制变革。80年代,北欧社团主义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表明,即使是成功的、高度合法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拒绝根据世界经济的急剧变化做出调整(Kurzer 1993; Thelan 1993)。加勒特强调,尽管实质性的政策差异长期存在,国际化已经对社会民主政府的税收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及支持这些政策的联盟造成了严重限制。罗森布拉斯在分析自民党在日本统治地位的衰落时,用了一句更具有总结意义话,他说:“在某些转折点,要求变化的压力——滤过国内利益集团——变得足够强大,迫使制度本身发生实质性变化。”对本书中所研究的大部分国家来说,这种实质性的变革已经出现了

一旦政策发生调整,允许价格信号影响国内经济,制度可能不得已而改变,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通过三个国家的个案分析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注意到,国际化与国际收支危机结合起来,经常导致“制度变迁加大了政策倒退的代价,尤其是通过将执行那些政策的权力,下放给某些可能将来执行这些政策的机构(通常是中央银行)”。罗森布拉斯指出,日本选举制度的根本性变革部分是国际化

压力造成的。

因此,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既有制度可以对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国际化甚至也会使人们置疑已经牢固建立起来的制度——例如日本选举制度、瑞典的社会民主制度及苏联的共产主义统治。但是,不同国家在调整幅度乃至在改变经济政策时维持权力的基本结构上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例如,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指出,韩国的金融政策改革落后了。

疏导对变化的反应

国内制度还通过疏导对国际变化的反应来调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本书对各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尽管这些国家都进行了面向新自由化的改革,它们的改革方式并非一模一样。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贸易和金融模式都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例如,如果加勒特的观点基本正确,那么,通过贸易实现的高度国际化与国际金融的高度一体化应该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些选择中,既有制度可能很重要,但不同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模式也会造成不同影响。

本书案例提供了证据,表明不同的国家在应对日益发展的国际化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中国的选择是不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这与苏联形成鲜明的对照。韩国缓慢地进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与智利、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较早进行的快速自由化运动形成对比。西欧国家保持了不同的消费模型,这表明,这些国家在面临类似的国际经济压力时有能力选择多样化的战略。既有制度对国际压力进行过滤,不同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做出反应。

没有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能够成功地预言这些选择,或预言根据变化做出调整时会成功还是失败。领导人在采取行动造成改变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国际价格信号并不自动地造成某种后果:也许需要邓小平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或萨利纳斯式的政治家气魄来刺激改革的潜在受益者,形成一个改革赢家组成的联盟。

制度、战略和政策

所有以上三种机制都表明,针对日益发展的国际化,根本不存在对优先政策的自动定义,也不存在政策和制度变化的自动道路。从短期来看,既有国内制度可能阻挠价格信号;从中期来看,可能扭曲

和篡改这些信号,决定领导人和国内集团的政策偏好。但是,随着国际化的深化,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越来越深入,要求改变那些阻碍或扭曲价格信号的政策和制度的压力会越来越难以抗拒。在如何应对这些压力上,政治领导人可能有某些灵活性,但是,要求政策共识的压力可能极为强大,全球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趋势似乎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对国内政治来说,国际经济压力并不是惟一重要的外在压力。国际体系产生的政治压力也会起重大作用。在所有个案中,这种政治压力都影响了结果。在哈格德和马克斯菲尔德所考察的欠发达国家个案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稳定性计划的影响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为换取新的贷款,这些国家同意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包括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很多其他例子中,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共同发挥作用,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变革(Haggard and Kaufman 1992; Little, et al. 1993, esp. ch.12; Nelson 1992)。在这些个案中,外生的政治压力可能与国际化造就的经济压力同时发挥作用。在日本和韩国的例子中,国际力量发挥的作用也很明显。在这两个国家中,美国施加政治压力,诱使它们改变政策。美国的"报复"威胁促动了这些变化。最后,西方向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强加的战略性贸易禁令促动了两国的变革,其原因在于,禁运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政策的机会成本。国际体系内部大权在握的行为体——诸如美国等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能影响某一国家的国内政治,而且随着国际化进一步深化,其影响甚至会越来越大。

结　论

本书表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已经对国内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际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削弱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自主权,而这主要是由越来越大的资本流动性而不是贸易造成的。第二种值得注意的影响是,国际化为领导人创造出推行重大国内政治改革的必要政治空间。正在兴起的国际化使得容易受到外在经济冲击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多。因此,国际化已经引发了国内经济危机——通常在国际收支领域或货币价值方面,它反过来激发了重大的政治

变革。

国际化还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来造就新的政策偏好和联盟。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府经常想尽办法,设置壁垒,阻止相对价格变化影响国内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的代价越来越高。但是,依靠政治制度,这些代价却得以长期被消受。因此,国际化的压力与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和制度的抵制长期相互作用。

从短期来看,国内制度阻挠和冻结所造成的影响很强大的。但从长远看,国内制度似乎不能继续抵制国际化的影响:在限制的压力和机会的引诱下,制度甚至会发生变迁。因此,制度的第三种影响——即它们塑造了领导人为适应国际化而制定的调整战略——可能最为强大。进入80年代,对那些与国际经济交易隔绝的政治经济体系来说,这尤其是一个"要么调整要么消亡"的问题。但从根本上看,如何进行调整受限于既有政治制度以及关键过渡阶段国家领导人的性格。

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似乎敲响了大学里进行的不合时宜地区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丧钟。如果不把所要比较的国家置于共同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则跨国比较毫无意义。同样道理,对于理解政策和制度变迁的差异性来说,那些认为所有国家根本相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提供有限的见解。如果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不能相互借鉴,人们就不能一贯地理解它们。

不仅如此,国际化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所启示。戴维·安德鲁(David Andrews 1994)认为,应该把资本的流动性看做是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跟无政府状态相类似。我们对国际化的研究加强了他的论点。对大多数经济来说,这些外在的流动性已经变得极为强大,因此,这些经济只能通过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避免这种体系。像无政府状态一样,暴露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之下已经成为各国所面临的事实。它们要想对这个事实置之不理或者企图改变这一事实,只能靠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没有国家能付得起这种代价。因此,跟无政府状态一样,面临国际经济的相似的压力,各国以不同的方式、根据自己情愿的程度和能够付出的代价处置之。正如国际政治的情形,各国的情愿程度及其能力取决于其国内环境——其领导人、政治和社会制度及国内集团的偏好。如果说,无政府状态将造就自助和

国家均势行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环境,则国际化的启示就是,它将造就政治领导人必须取悦的新听众——国际金融市场。

在大规模国际化面前,政府有某些可能性选择。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隔绝于这种外在压力之外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太高,只能通过短期到中期战略来实现。操纵国际市场同样是一个短期的策略,墨西哥在 1994 年底就发现了这一点;即使这些市场缺乏有关政府及其行为的完善信息,要想维持根本性的不平衡必须付出可观的代价。与其他国家协调也是一种可能选择(又见 Helleiner 1994)。在战后时期,西欧就以欧洲联盟的形式选择了这种战略。最近的欧洲货币联盟协议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另一步。但是,考虑到国际合作的困难,这种战略也有其局限性。

最后,国家可以向国际市场压力做出让步。这往往意味着,采用强加金融"纪律"、推动竞争的政策,或抛弃那些阻碍以上两个目标的政策。对这些国家来说,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战略要求可信的承诺;实际上,最初的国内经济越不受管束、越没有竞争力,就越需要诚信。要获得这种诚信,就需要经常重新设计和制定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例如,在欧洲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地方,独立的中央银行被视为显示出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诚信。这个例子表明,国际化造就的国际压力可能会强有力地影响国内制度。例如,欧洲对外开放的小国发现,社团主义是二战后 40 年间令人舒服的一种制度设计(Katzenstein 1985)。将来,在国际市场要求可信的新自由化政策的形势下,我们可能会发现新的制度创新来满足这一需要。

本书是对最近历史进行分析,无意就未来提供轻而易举的预言。事实上,几乎没有几个政治学家预料到 80 年代出现的巨大变化——共产主义崩溃、全球采取新自由化政策及波涛汹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鉴于此,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最稳妥的预言将是,下个世纪的变化不大可能按照线性模式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不一定是未来的潮流,历史还没有走到终点。

现代资本主义一直发展不均衡,其台风式的"创造性摧毁"——这是熊彼特的用语——一直造就着政治抵抗。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如果不能持续地变革其生产工具并因此改变生产关系,并通过改变这两者来改变整个社会关系,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Marx and Engles, 1848/1959: 10)。用熊彼特的话说,马克思及

其最伟大的批评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恰恰削弱了保护它的社会制度,并不可避免地创造出"它本身不能在其中存活的条件"(Schumpeter 1942/1950:61)。资本主义也许比马克思和熊彼特所认为的更有弹性,但是,前苏联最近的遭遇表明,资本主义有能力摧毁长期存在的社会制度。

参考文献

Adzhubei, Aleksei. 1989. *Te desiat' let*. Moscow: Sovetskaia Rossiia.

Akhromeev, S. F., and G. M. Kornienko. 1992. *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 Moscow: Mezhdunarodye otnosheniia.

Akhtar, M. A., and Ethan S. Harris. 1987. "Monetary Policy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 An Empirical Analys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Quarterly Review* (Winter): 19–34.

Akhtar, M. A., and Howard Howe. 1991. "Th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of U.S.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Research Paper no. 9110.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lesina, Alberto, Vittorio Grilli, and Gian Maria Milesi-Feretti.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 Controls." Working Paper no. 4353.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 Controls." In Leiderman and Razin, eds., *Capital Mobility: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esina, Alberto, and Nouriel Roubini. 1992. "Political Cycles in OEC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 4: 663–8.

Alesina, Alberto, and Jeffrey Sachs. 1988.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1984."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 1 (February): 63–82.

Alesina, Alberto, and Guido Tabellini. 1989. "External Debt, Capital Flight, and Political Risk."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7: 199–221.

Alt, James E. 1985. "Political Parties, World Demand, and Unemploym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4 (December): 1016–40.

Alvarez, R. Michael, Geoffrey Garrett, and Peter Lange. 1991. "Government Partisanship, Labor Organ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2 (June): 539–56.

Amann, R., and J.M. Cooper, eds. 1982.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mann, R., J. M. Cooper, and R. W. Davies, eds. 1977.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oviet Indust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Gary, William Shughart II, and Robert Tollison. 1988. "A Public Choice Theory of the Great Contraction." *Public Choice* 59, 1 (October): 3–23.

Anderson, Stephen. 1987. "The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Japan." Ph.D. di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rews, David M. 1994.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te Autonomy: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8, 2 (June): 193–218.

Arai, Kunio. 1988. *Senkyo, joho, yoron* [*Elections, Inform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Tokyo: Nihon hoso kyokai.

Arato, Andrew. 1978. "Understanding Bureaucratic Centralism." *Telos* 35 (Spring): 73–87.

Arbatov, Georgii. 1991. *Zatianuvsheesia vyzdorovlenie (1953–1985 gg.): Svidetel'stvo sovremennika*.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Arellano, Pablo. 1983. "De la Liberalizacion a la Intervencion: El Mercado de Capitales en Chile, 1974–83." *Coleccion Estudios Cieplan* 11: 5–49.

Arndt, H. W., and Njoman Suwidjana. 1982. "The Jakarta Dollar Market."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8: 35–65.

Aronson, Jonathan. 1977. *Money and Power: Banks and the World Monetary 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Arthur, W. Brian.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sahi shimbun. Various issues.

Aschauer, David Alan. 1990. *Public Investment and Private Sector Growth*.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slund, Anders. 1989.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Russia's Sleaze Sector." *New York Times*, July 11.

Auerbach, Robert. 1990. "A Budgetary Bias for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2, 3: 407–30.

Bahry, Donna. 1987. *Outside Moscow: Power, Politics, and Budgetary Policy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alassa, Bela, and John Williamson. 1990. *Adjusting to Success: Balance of Payments Policy in the East Asian NIC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aldwin, David. 1980.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 4 (Autumn): 471–506.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1993. *Sixty-Third Annual Report*. Basle, Switzerland: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1995. *Annual Report*. Basle, Switzerland: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rber, William J. 1985. *From New Era to New De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o, Robert. 1973.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An Economic Model." *Public Choice* 14, 1: 19–42.

1989.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03–25.

Bartolini, Leonardo, and G. Bondar. 1992.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Italy." Working Paper 92/2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rtolini, Leonardo, and Allan Drazen. 1994.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s a Signal." Mimeo.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search Department.

Batchelder, Ronald, and David Glasner. 1992. "Debt, Deflation, the Great Depres-

sion, and the Gold Standard," in John Rollins, ed., *Money and Banking: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Virginia: Durell Foundation.

Bates, Robert H. 1981.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tes, Robert H., and Paul Collier. 1991.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Zambi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ates, Robert, and Da-Hsiang Donald Lien. 1985. "A Note on Taxation, Development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14, 1: 53–70.

Bawn, Kathleen. 1993. "The Logic of Institutional Preferences: German Electoral Law as a Social Choice Outcom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4 (November): 965–89.

Bayoumi, Tamin. 1990. "Savings–Investment Correlations." *IMF Staff Papers* 37: 360–87.

Beck, Nathaniel. 1991. "The Fed and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9 (April): 25–38.

Beck, Nathaniel and Jonathan Katz. 1995.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with Time-Series-Cross-Section Dat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3 (September): 634–47.

Becker, Gary S.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371–400.

Bhagwati, Jagdish. 1984. "Why Are Services Cheaper in Poor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94 (June): 279–86.

Biddulph, Howard. 1983. "Local Interest Articulation at CPSU Congresses." *World Politics* 36, 1 (October): 28–52.

Birman, Igor. 1990. "The Budget Gap, Excess Money and Reform." *Communist Economies* 2, 1: 25–46.

Bisat, Amer, R. Barry Johnston, and V. Sundarajan. 1992. "Issues in Managing and Sequencing Financial Sector Reforms: Lessons from Experiences in Five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92/8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lake, Robert. 1967. *Disrael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Booth, Anne, and Peter McCawley, eds. 1981. *The Indonesian Economy During the Soeharto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wman, John, and Richard Keehn. 1974. "Agricultural Terms of Trade in Four Midwestern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September): 592–609.

Branson, William, and James Love. 1988. "U.S. Manufacturing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 Richard Marston, ed., *Misalignment of Exchange Rates: Effects on Trade and Indus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oz, Lawrence. 1993. "Wresting the Sceptre from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Bryant, Ralph. 1980.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Interdependent N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Bunce, Valerie. 1985.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Bloc from a Soviet Asset to a Soviet Li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 1 (Winter): 1–46.

Burawoy, Michael, and Pavel Krotov. 1992. "The Rise of Merchant Capital:

Monopoly, Barter, and Enterprise Politics in the Vorkuta Coal Industry." *Harriman Institute Forum* 6, 4 (December): 1–15.

Burlatskii, Fedor. 1991. *Khrushchev and the First Russian Spring*. New York: Scribner's.

Bush, Keith. 1993. "Gas Industry to be Privatized."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Daily Report* 66 (April 6) (electronic version).

1994. "Privatiz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Daily Report* 38 (February 24) (electronic version).

Bykov, Aleksandr. 1988. "Ne neft'iu edinoi." *Literaturnaia gazeta* (February): 14.

Cain, Bruce, John Ferejohn, and Morris Fiorina. 1987. *The Personal Vote: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Electoral Independ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lder, Kent. 1988. *Crisis and Compens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Japan, 1949–198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lleo, David P. 1982. *The Imperious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lmfors, Lars, and John Driffill. 1988. "Bargaining Structure, Corporatism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Policy* 3 (October): 13–61.

Cameron, David M. 1978.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4 (December): 1243–61.

Campbell, John Creighton. 1991. *Why Policies Chang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Elder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and Enzo Faletto.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rans. by Marjory Mattingly Urquid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sella, Alessandra. 1992.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orking Paper 1.6, Series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Center for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stles, Francis, and Peter Mair. 1984. "Left-Right Political Scales: Some Expert Judg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2: 73–88.

Ceglowski, J., and S. Hilton. 1987. "Interest Rate and Exchange Rate Effects in Selec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Research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U.S. Monetary Policy*.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403–500.

Centeno, Miguel Angel, and Sylvia Maxfield. 1990. "The Marriage of Finance and Order: Changes in the Mexican Political Elit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4: 57–8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S.). 1986. "Economic and Energy Indicators." Report no. DI EEI 86-002, January 17.

1988a.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al Review." Washington, D.C.

1988b. "Revisiting 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 Glasnost: Implications for CIA Estimates." Report no. SOV 88-10068, Septemb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U.S.). 1991. "Beyond Perestroyka: The Soviet Economy in Crisis."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to the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May 14.

Checkel, Jeff. 1993. "Ideologies on the Loose: (Re-) Defining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Post-Soviet E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SRC-sponsored conference "Bringing Russia Back In: IR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the Former USS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February.

Chen, Kang, Gary H. Jefferson, and Inderjit Singh. 1992. "Lessons from China's Economic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6: 201–25.

Cherniaev, A. S. 1993. *Shest' let s Gorbachevym: podnevnikovym zapisiam*. Moscow: Progress.
China: Foreign Trade Reform. 1994.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Choi, Byung-sun. 1993. "Financial Policy and Big Business in Korea: The Peril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Stephan Haggard, Chung Lee, and Sylvia Maxfield, eds.,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hen, Stephen D., and Ronald I. Meltzer. 1982.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Action*. New York: Praeger.
Cole, David, and Yung-chul Park. 1983.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Korea, 1945–197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e, David, and Betty Slade. 1994.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onesian Financial Refor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 Richard. 1968.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72.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ies." *World Politics* 24, 2 (January): 159–81.
1994. "Foreign Trade, Wages and Unemploy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701.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November.
Corbo, Vittorio. 1983. "Chile: Economic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970." Documento de Trabajo no. 86. Santiago: Pontific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Instituto de Economía.
Corbo, Vittorio, and Jaime de Melo. 1985. "Liberalization with Stabilization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Overview and Summary." *World Development* 13: 863–6.
Corbo, Vittorio, and Jaime de Melo. 1987. "Lessons from the Southern Cone Policy Reform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 111–42.
Corden, W. M. 1986. *Inflation, Exchange R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x, Gary W. 1987. *The Efficient Secret: The Cabi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Victorian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x, Gary W., Matthew McCubbins, and Terry Sullivan. 1984. "Policy Choice as an Electoral Investment."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1: 231–4.
Cox, Gary W., and Frances M. Rosenbluth. 1995. "Factional Cheating on the Party Endorsement: The Case of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rane, George T.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monk: M. E. Sharpe.
Crawford, Arthur. 1940. *Monetary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Deal*.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Crowley, Stephen. 1993. "From Coal to Steel: The Formation of an Independent Workers' Move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1989–199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ukierman, Alex. 1992. *Central Bank Strategy, Cred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Cumings, Bruce.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odern China* 5 (October): 411–62.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Winter): 1–40.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Turn Outward."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2nd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Curtis, Gerald. 1988. *The Way of Japanese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ahse, Fernando. 1979. *El Mapa de la Extrema Riqueza*. Santiago: Editorial Aconagua.

D'Arista, Jane. 1971. *Federal Reserve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Policy: 1915–1935*. Staff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Domestic Financ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arst, Robert. 1994. "Transnational Bargains, Expert Intervention, and Ideological Conversion: The 'Westernization'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avid, Paul.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332–7.

Deardorff, Alan, and Robert Stern. 1987. "Current Issues in Trade Policy." In Robert Stern, ed., *U.S. Trade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DeGaulle, Charles. 1971. *Memoirs of Hope: Renewal and Endeavor*. Transl. by Terence Kilmarti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de Kock, Gabriel, and Thomas DeLeire. 1994. "The Role of the Exchange Rate in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 Time-Series Analys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Research Paper no. 9412.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Destler, I. M., and C. Randall Henning. 1989. *Dollar Politics: Exchange Rate Policy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estler, I. M., and Hisao Mitsuyu. 1982. "Locomotives on Different Tracks: Macroeconomic Diplomacy, 1977–1979." In I. M. Destler and Hideo Sato, eds., *Coping with U.S.-Japanese Economic Conflict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Destler, I. M., and John Odell. 1987. *Anti-Protection: Changing Forces in United States Trade Politics*.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eutsch, Karl, and Alexander Eckstein. 1961.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clining Sh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tor, 1890–1959." *World Politics* 13, 2 (January): 267–99.

de Vylder, Stefan. 1989. "Chile, 1973–1987: Los Vaivenes de un Modelo." In Roberto Garcia, ed., *Economía y Política Durante el Gobierno Militar en Chile, 1973–1987*. Mexico, D.F.: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Diaz, Eduardo Turrent. 1982. *Historia del Banco de México, Vol. 1*. Mexico, D.F.: Banco de México.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Dornbush, Rudiger, and Jacob Frenkel. 1979.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Theory and Evi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ornbush, Rudiger, and Yung-Chul Park, eds. 1995. *Financial Opening: Policy Lessons for Korea*. Seoul: Korea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Dos Santos, Teotonio.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5 (September): 235–46.

Douglas, Hernan Cortes. 1985. "Stabilization Policies in Chile: Infl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pression, 1975–1982." In Gary Walton, ed., *The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of Chile*. Greenwich: JAI Press.

Dowrick, Steve, and Duc-Tho Nguyen. 1989. "OECD Comparative Economic Growth 1950–85: Catch-Up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 1010–30.

Drazen, Allan, and Vittorio Grilli. 1993. "The Benefits of Crisis for Economic Refo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3 (June): 598–607.

Eckes, Alfred Jr. 1975. *A Search for Solvency: Bretton Woo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41–197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Various issu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he Economist. 1993. "Intel: The Coming Clash of Logic." (July 3): 21–3.

The Economist. 1990. "Japan's $3 Billion Election." (February 3): 31–2.

Economist Survey. 1993.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Rude Awakening," July 3.

Edwards, Sebastian. 1984. "The Order of Liberalization of the External Sector." *Princet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56.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ction.

Edwards, Sebastian, and Alejandra Cox Edwards. 1987. *Monetarism and Liberalization: The Chilean Experiment*. Cambridge: Ballinger Publishing.

Edwards, Sebastian, and Sweder van Wijnbergen. 1986.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and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7, 1 (February): 141–8.

Eichengreen, Barry. 1992.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rrangements for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oject on "Integrating the World Economy" (September).

Eichengreen, Barry, and Peter Garber. 1991. "Before the Accord: U.S. Monetary-Financial Policy, 1945–51." In R. Glenn Hubbard, ed.,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Cri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ichengreen, Barry, Andrew Rose, and Charles Wyplosz. 1994. "Speculative Attacks on Pegged Exchange Rat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pstein, Gerald A., and Thomas Ferguson. 1984. "Monetary Policy, Loan Liquidation, and Industrial Conflic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Open Market Operations of 193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4 (December): 957–83.

Epstein, Gerald A., and Juliet Schor. 1992.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Capital Controls in OECD Countries." In Tariq Banuri and Juliet Schor, eds., *Financial Openness and National Aut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langer, Steven. 1995. "Russia's Premier: Too Popular for His Own Good?" *New York Times*, June 26.

Euh, Yoon-dae, and James C. Baker. 1990. *The Korean Banking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Evangelista, Matthew. 1995. "The Paradox of State Strength: Domestic Structure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USSR and Rus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1 (Winter): 1–38.

Evangelista, Matthew. 1996. "From Each According to Its Abilities: Compet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Post-Soviet Energy Sector." In Celeste Wallander, ed., *The Sources of Russian Conduct After the Cold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Evans, Pete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eter, Dieter Reu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eter. 1992. In Haggard and Kaufmann, 1992: 139–81.

Fainsod, Merle. 1963. *How Russia is Ruled.*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lin, Valentin. 1993. *Politische erinnerungen.* Munich: Droemer Knaur.

Federal Reserve System. Various issu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Washington, D.C.: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1986.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October).

Feinberg, Richard E., John Echeverri-Gent, Friedemann Müller, et al. 1990. *Economic Reform in Three Gian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Feldstein, M., and C. Horioka. 1980.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e Economic Journal* 90 (June): 314–29.

Flaherty, Patrick. 1991. "Perestroika and the Neo-Liberal Project." 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tch, eds., "Communist Regimes: The Aftermath." *Socialist Register 1991.* London: Merlin.

Flanagan, Robert, David Soskice, and Lloyd Ulman. 1983. *Unionism,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Incomes Polic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Forsyth, P. J., and St. J. Nicholas. 1983. "The Decline of Spanish Industry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2: 601–10.

Foxley, Alejandro. 1983. *Latin American Experiments in Neo-conservative Econom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ankel, Jeffrey A. 1985. "Six Possible Meanings of 'Overvaluation': The 1981–1985 Dollar."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59.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1991.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in the 1980s." In B. Douglas Bernheim and John Shoven, eds., *National Sav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The Making of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the 1980s." In Martin Feldstein, ed.,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anzese, Robert. 1995. "Central Banks and the Wage Bargain." Manuscript. Harvard University.

Freidel, Frank. 1990.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French-Davis, Ricardo, and Jose Pablo Arellano. 1981. "Apertura Financiera Externa: La Experiencia Chilena en 1973–1980." *Estudios Cieplan* 50.

Frieden, Jeffry. 1991a. *Deb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tin America, 1965–198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b.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 4 (Autumn): 425–51.

1994a. "Making Commitments: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In Barry Eichengreen and Jeffry Friede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b. "Exchange Rate Politics: Contemporary Lessons from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 1 (Spring): 82–103.

Friedgut, Theodore, and Lewis Siegelbaum. 1990. "Perestroika from Below: The Soviet Miners' Strike and its Aftermath." *New Left Review* 181: 5–32.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Schwartz.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unabashi, Yoichi. 1988. *Managing the Dollar: From the Plaza to the Louvr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albis, Vicente. 1986. "Financial Sector Liberalization under Oligopolistic Conditions and a Bank Holding Company Structure." *Savings and Development* 10: 117–41.
Garrett, Geoffrey. 1993. "The Polit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and Thatcher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 (January): 521–47.
Garrett, Geoffrey, and Peter Lange. 1986. "Performance in a Hostile World: Economic Growth in Capitalist Democracies, 1974–1980." *World Politics* 38, 4 (July): 517–45.
1991. "Political Responses to Interdependence: What's 'Left' for the Lef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 4 (Autumn): 539–64.
Garrett, Geoffrey, and Christopher Way. 1995. "The Sectoral Composition of Trade Unions, Corporatism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Barry Eichengreen, Jeffry Frieden, and Jürgen von Hage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Gaytan, Ricardo Torres. 1980. *Un Siglo de Devaluaciones del Peso Mexicano*. Mexico, D.F.: Siglo XXI.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43.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ovannini, A., and M. de Melo. 1993. "Government Revenue from Financial R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953–63.
Goldberg, Linda. 1990. "Nominal Exchange Rate Patterns: Correlations with Entry, Exit, and Investment in U.S. Indust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324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Golden, Miriam. 1993. "The Dynamics of Trade Unionism and Na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June): 439–54.
Golden, Miriam, and Michael Wallerstein. 1994.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Era in Sixteen N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 September 1–4.
Goldstein, Avery. 1991.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stein, Judith. 1989. "The Impact of Ideas on Trade Policy: The Origins of U.S.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Poli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3, 1 (Winter): 31–72.
1993. *Ideas, 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lub, Stephen. 1986. "The Current-Account Balance and the Dollar: 1977–78 and 1983–84."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57.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Goodman, John B., and Louis W. Pauly. 1993. "The Obsolescence of Capital Controls? Economic Management in an Age of Global Markets." *World Politics* 46, 1 (October): 50–82.
Gorbachev, Mikhail. 1987.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ourevitch, Peter A. 1977.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8: 281–313.

1978.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4 (Autumn): 881–912.

1979. "The Re-emergence of 'Peripheral Nationalisms': Some Comparative Speculation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 303–22.

1986.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urevitch, Peter, Christopher Allen, Stephen Bornstein, Andrei Markovits, Andrew Martin, and George Ross. 1984. *Unions and Economic Crisis: Britain, West Germany and Sweden.* Boston: Allen and Unwin.

Gowa, Joanne. 1983. *Closing the Gold Wind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Bretton Wood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een, George. 1981.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Financial Policies." In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Greene, Margaret. 1984. *U.S. Experience with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September 1977–December 1979.*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taff Studies, no. 128. Washington: Federal Reserve.

Gregory, Paul, and Robert Stuart. 1986.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3r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renville, Stephen. 1981.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Formal Financial Sector." In A. Booth and P. McCawley, eds., *The Indonesian Economy During the Soeharto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ier, Kevin. 1987.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Federal Reserve Policy: An Empirical Tes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4, 2 (October): 475–86.

Griffith-Jones, Stephany. 1981. *The Role of Finance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Totawa, NY: Allanheld, Osman.

Grilli, Vittorio, Donato Masciandaro, and Guido Tabellini. 1991. "Political and Monetary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Financial Policies in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13 (October): 342–92.

Gudgin, Graham, and Peter Taylor. 1976. *Seats, Votes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lections.* London: Pion Press.

Gustafson, Thane. 1989. *Crisis Amid Plenty: The Politics of Soviet Energy Under Brezhnev and Gorbachev.*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Stephan. 1988.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Explaining 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1 (Winter): 91–120.

1990.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Stephan, and Robert Kaufman. 1992.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Stephan, and Sylvia Maxfield. 1993. "Political Explanations of Financ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tephan Haggard, Chung Lee, and Sylvia Maxfield, eds.,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Stephan, et al. 1994.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Adjustment in Korea, 1970–199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ll, Peter A.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 1989.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Coordinated Wage Bargaining."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31, 1 (Spring): 1–23.
Halliday, Fred. 1992. "A Singular Collapse: The Soviet Union, Market Pressure an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Contention* 1, 2 (Winter): 121–42.
Hanson, James A. 1992. *Opening the Capital Account: A Survey of Issues and Result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Hastings, Laura. 1993. "Regulatory Revenge: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le." In Stephan Haggard, Chung Lee, and Sylvia Maxfield, eds.,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elleiner, Eric. 1994. *Sta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ewett, Ed A. 1984. *Energy,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Hewett, Ed A., with Clifford G. Gaddy. 1992. *Open for Business: Russia's Return 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Hibbs, Douglas. 1987.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cks, John. 1931. *The Populist Revo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31, 1 (October): 90–107.
[1945] 1980.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2nd e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Reflections on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Leon N. Lindberg and Charles S. Maier, eds. *The Politics of Inflation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Hobsbawm, Eric J.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9.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Hoffmann, Erik P., and Robbin F. Laird. 1982.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onsho, Jiro. 1985. *Keidanren.* Tokyo: Toyo keizai shimposha.
Hough, Jerry F. 1986. "Attack on Protectio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 Com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2 (Spring): 489–503.
1988. *Opening Up the Sovi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Huan Guocang. 1987.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1978–1984."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Hufbauer, Gary Clyde, and Jeffrey J. Schott. 1993. *NAFTA: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Ichikawa, Taichi. 1990. *Seshu daigishi no kenkyu* [*Research on Second-Generation Diet Members*]. Tokyo: Nihon keizai shimbunsha.

Inoue, Kyo. 1993. "Aitsugu shinseiji shudan no kessei to sono haikei, jisso [The Backgrounds of the New Political Groupings]" *Zen'ei*. 2,629: 69–8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World Bank,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A Study of the Soviet Economy*. 3 vols. Paris: IMF, World Bank, OECD, EBR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2.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ugust.

1992.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Payments System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Various issu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Various issues.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seri, Hirofumi. 1988. *Habatsu saihensei* [*The Reorganization of Factions*] (Tokyo: Chuko shinsho).

Ishikawa, Masumi, and Michisada Hirose. 1989. *Jiminto: choki shihai no kozo [The LDP: The Structure of Longterm Dominance]*. Tokyo: Iwanami shoten.

Iversen, Torben. 1994. "Wage bargaining, Monetary Regim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 September 1–4.

1995. "Power, Flexibility and the Breakdown of Centralized Wage Bargain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Jichi sho gyosei kyoku, ed. 1988. *Zenkoku shichoson yoran* [*National Survey of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Tokyo: Daiichi hoki shuppan.

Johnson, Chalmers. 1986. "Tanaka Kakuei, Structural Corruption, and the Advent of Machine Politics in Jap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2: 1–28.

1995.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Norton.

Joseph, William, ed. 1994. *China Briefings*. Boulder: Westview.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78. Special issue on "Congressional Supervision of Monetary Policy."

Katz, Richard. 1980. *A Theory of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eter J., ed. 1978.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wato, Sadafumi. 1992. *Nihon no seito seiji, 1890–1937* [*Japan's Party Politics, 1890–1937*]. 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Nye, Jr. 1972.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4 (Autumn): 725–53.

Kettl, Donald F. 1986. *Leadership at the F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iewiet, Rod, and Matthew McCubbins. 1991. *The Logic of Deleg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51. "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 30–46.

ed. 1970.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selev, Stepan. 1995. "Chernomyrdin Gains the Upper Hand." *Moscow News*, 24–5 (June 30–July 6).

Kitschelt, Herbert.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bayashi, Yoshiaki. 1987. *Keiryo seijigaku* [*Quantitative Political Science*]. Tokyo: Seibundo, Showa 60.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mer, Gerald. 1971.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March): 131–43.

Krasner, Stephen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auss, Ellis, and Michio Muramatsu. 1987. "The Conservative Policy L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tterned Pluralism." In Kozo Yamamura and Yasuki Yasuba,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1, The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uss, Ellis, and Bradford Simcock. 1980. "Citizens' Movements: The Growth and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st in Japan." In Kurt Steiner, Ellis Krauss, and Scott Flanagan, eds.,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vis, Irving B., and Robert E. Lipsey. 1983.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National Price Levels."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52.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Krehbiel, Keith. 1991. *Information and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rueger, Anne O. 1992. *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Blackwell.

Krugman, Paul R. 1979.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 311–25.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93a. "Toward a 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New York: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3b.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190. 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1994a. "Competitiveness: A Dangerous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73 (March/April): 28–44.

1994b.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November/December): 62–78.

Krugman, Paul R., and Maurice Obstfeld. 1988.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and Co.

199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Kurzer, Paulette. 1991. "Unemployment in Open Economies: The Impact of Trade, Fin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4 (April): 3–30.
1993. *Business and Bank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uzmin, Dmitri. 1990. "Joint Ventures: The Upward Trend." *Vestnik* 1, 1 (March): 51–4.
Laba, Raul, and Felipe Larrain. 1993. "Can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Outflows Increase Net Capital Inflows?" Mimeo. Santiago: Pontifica Universidad Catolica de Chile, Economics Department.
Lake, David A. 1988. *Power,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mbi, Nikolai. 1963.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Germany, 1868–1879.* Beiheft 44,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Lange, Peter, George Ross, and Maurizio Vanicelli. 1982. *Unions, Change and Crisis: French and Italian Union Strateg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1945–1980.* New York: Allen and Unwin.
Lardy, Nicholas R. 1992.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pril).
Lee, Dwight R., and Richard B. McKenzie. 1989.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lining Tax Rates." *National Tax Journal* 42: 79–83.
Leiderman, Leonardo, and Assaf Razin, eds. 1994. *Capital Mobility: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 Zhisui. 1994.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Ligachev, Yegor. 1993.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New York: Pantheon.
Lincoln, Edward. 1990. *Japan's Unequal Trad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Lindblom, Charles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Stein Rokkan, ed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Lipton, Michael. 1976.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ttle, I. M. D., Richard Cooper, W. Max Cordon, and Sarath Rajapatuana. 1993. *Boom, Crisis and Adjust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hmann, Susanne. 1995. "Federalism and Central Bank Autonomy."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hmann, Susanne, and Sharyn O'Halloran. 1994. "Divided Government and U.S. Trade Policy: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4 (Autumn): 595–632.
Londregan, John, and Keith Poole. 1990. "Poverty, the Coup Trap and the Seizure of Executive Power." *World Politics* 42 (January): 151–83.
Lowi, Theodore. 1979. *The End of Liberalism: 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
Lucas, Robert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1 (July): 3–42.

Luke, Timothy W., and Carl Boggs. 1982. "Soviet Subimperialism and the Crisis of Bureaucratic Centralism."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5, 1 and 2 (Spring/Summer): 95–124.

Mabuchi, Katsu. 1989. "Okurasho shuzeikyoku no kikan tetsugaku [The Organizational Ideolog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ax Bureau]." *Lebaiasan* 4: 41–58.

MacIntyre, Andrew. 1993.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Indonesia." In Stephan Haggard, Chung Lee, and Sylvia Maxfield, eds.,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ckie, Thomas, and Richard Rose. 1991. *The International Almanac of Electoral History*.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Maddison, Angus. 1991.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gee, Stephen. 1980. "Three Simple Tests of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In: Oppenheimer, ed., 1980.

Mahler, Walter. 1988. "The Allocation of the Windfall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Korea Capital Market." Working paper no. 8813.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Mandel, David. 1990. "The Rebirth of the Soviet Labor Movement: The Coalminers' Strike of July 1989."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3: 381–404.

1991.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Soviet Economy." 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tch, eds., "Communist Regimes: The Aftermath." Socialist Register 1991. London: Merlin.

Mandel, William. 1989–91. "Soviet Miners Speak." *The Station Relay* 5: 1–5.

Mansfield, Edward D., and Marc Busch.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n-Tariff Barrier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4 (Autumn): 723–49.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Summer): 5–38.

Marrese, Michael, and Jan Vanous. 1983. *Soviet Subsidization of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 Soviet Perspective*.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rtinez, Fransisco Borja. 1991. *El Nuevo Sistema Financiero Mexicano*. Mexico, D.F.: Fondo de Cultural Economica.

Martinez, Guillermo Ortiz. 1980. *La Dolarizacion en Mexico: Causas y Consecuencias*. Serie de Documentos no. 40. Mexico: Banco de Mexico,

Maruyama chosakai, ed. 1985. *Zeisei kaikaku ni mukete* [*Towards Tax Reform*]. LDP document.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 1959.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Lewis Feuer, ed.,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Mathieson, Donald, and Liliana Rojas-Suarez. 1993. "Liber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Experiences and Issues." Occasional Paper no. 103.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xfield, Sylvia. 1990. *Governing Capit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Business Interests and U.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n.

1993. "The Politics of Mexican Financial Policy." In Stephan Haggard, Chung Lee, and Sylvia Maxfield, eds.,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a.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Ban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5b. "Mexican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Kent Calder, et al., *Letting Capital Loo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yhew, David R. 1974.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cCubbins, Mathew, Roger Noll, and Barry Weingast. 1987.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Control."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3: 243–77.
McCubbins, Mathew, Roger Noll, and Barry Weingast. 1989. "Structure and Process, Politics and Policy: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Agencies." *Virginia Law Review* 75, 2 (March): 431–82.
McCubbins, Mathew D., and Frances M. Rosenbluth. 1995. "Electoral Strate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y Making in Japan." In Peter Cowhey and Mathew McCubbins, eds., *Policy Making in Japan and the 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Guire, Robert. 1981. "Economic Causes of Late-Nineteenth Century Agrarian Un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4 (December): 835–52.
McKean, Margaret. 1981. *Environmental Protest and Citizen Politics in Jap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Kendrick, David. 1989. "Acquir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ircraft and Commercial Banking in Indones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cKeown, Timothy J. 1989. "The Politics of Corn Law Repeal and Theories of Commercial Poli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3: 353–80.
1991. "A Liberal Trade Order: the Long-Run Pattern of Imports to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5, 2 (June): 151–72.
McKinnon, Ronald I. 1988.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 83–103.
1991.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edvedev, Roy. 1974. *On Socialist Democracy*. New York: Norton.
Mikhailov, V. M. 1993. *Ia – "Iastreb."* Moscow: Kron-Press.
Milgrom, Paul,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Medieval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 (March): 1–23.
Millar, James R. 1985. "The Little Deal: Brezhnev's Contribution to Acquisitive Socialism." *Slavic Review* 44, 4 (Winter): 694–706.
Milner, Helen V. 1988. *Resisting Protectionism: Global Indus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Various years. *Chiho jichi nenkan [Local Government Annual]*. Tokyo: Jichi kenshu kyokai.
Moe, Terry M. 1990. "The Politics of Structural Choice: Toward 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 In Oliver Williamson, ed., *Organization Theory: From Chester Barnard to the Present and Beyo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dy, Stephen S. 1991. "Fallen Star."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1–5.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Various issues.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New York: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Morvant, Penny. 1995. "Gaidar on Domestic Politics." *OMRI Daily Digest*, 33, Part I, February 15 (electronic version).
Moses, Jonathon. 1994. "Abdication from National Policy Aut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22 (June): 125–48.
Mundell, Robert A. 1957.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7: 321–35.
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Fixed Ex-

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s* 9 (March): 70–7.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 (November): 475–85.

Murphy, Kevin M.,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5 (October): 1003–26.

Mursaliyev, Azer. 1995. "Chernomyrdin Rising to the Top." *Moscow News*, 20–1 (June 2–8): 10.

Mussa, Michael. 1979.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In Dornbush and Frenkel 1979: 160–204.

National Public Radio (U.S.). 1994. "Report from Moscow," September 30.

Naughton, Barry. 1993.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491–514.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al, Larry. 1985.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Quantitative Evidence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2 (June): 219–26.

Nelson, Joan ed., 1990.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cy Change: The Politics of Adjustment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ren, James, and Laurie Kurtzweg. 1993. "The Soviet Economy Unravels: 1985–1991."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Transition, Vol.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and Barry Weingast. 1989.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803–32.

Notermans, Ton. 1993. "The Abdication of National Policy Aut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21 (June): 133–67.

Obstfeld, Maurice. 1986. "Rational and Self-fulfilling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72–81.

Odell, John. 1982. *U.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rkets, Power, and Ideas as Sources of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Donnell, Guillermo. 1974.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fer, Gur. 1988. *Soviet Economic Growth: 1928–1985*. Santa Monica, CA: Rand.

Officer, Lawrence. 1986. "The Efficiency of the Dollar–Sterling Gold Standard, 1890–190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3: 1038–73.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ppenheimer, Peter, ed. 1980.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ondon: Oriel.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1988.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OECD Countrie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0.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The Soviet Agro-Food System and Agricultural Trade: Prospects for Reform*.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89*. OECD Economic Outlook.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1992. *OECD Economic Outlook* 52.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1992. "Russian Energy Prices and Taxes." Report no. IEA/NMC(92)6, June 11.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EA.
Ozawa, Ichiro. 1993. *Nihon Kaizo Keikaku* (Blueprint for a New Japan). Tokyo: Kodansha.
Palmer, Ingrid. 1978. *The Indonesian Economy Since 1965*.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Parrish, Scott. 1995. "EBRD President Cautious About Russian Economy." OMRI Daily Digest, 129, Part I, July 5 (electronic version).
Parrott, Bruce. 1983.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ternal Politics, and Trade with the West." In Bruce Parrott, ed., *Trade, Technology, an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auley, Louis W. 1988. *Opening Financial Markets: Banking Politics on the Pacific Ri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earson, Margaret M. 1991. *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tro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ejovich, Steve. 1990. "A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of Perestroika." *Communist Economies* 2, 2: 157–76.
Pempel, T. J. 1987. "The Tar Baby Target: 'Reform' of the Japanese Bureaucracy." In Robert Ward and Yoshikazu Sakamoto, eds., *Democratizing Japan: The Allied Occup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erez-Campanero, J., and A. M. Leone. 1992.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Uruguay, 1974–87." In V. Sundaragjan and T. Balin, eds., *Banking Crisis: Cases and Issu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erkins, Dwight H. 1968.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n Chinese Central Planning." In Alan A. Brown and Egon Neuberger, ed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entral Plann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7–98.
Peterson, Peter. 1973. "Understanding United States' Attitudes on Trade." *Euromoney* (November).
Piven, Frances Fox, ed. 1991. *Labor Parti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rter, Michael P.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Putnam, Robert, and Nicholas Bayne. 1984. *Hanging Together: The Seven-Power Summi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Quijano, Jose Manuel. 1985. "Finanzas Latinoamericanas y Banca Extranjera." In Jose Manuel Quijano, Hilda Sanchez, and Fernando Antia, eds., *Finanzas, Desarollo Economica y Penetracion Extranjera*. Pueb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Puebla.
Rae, Douglas. 1967.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amos, Joseph. 1986. *Neoconservative Economics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amseyer, J. Mark, and Frances M. Rosenbluth. 1993.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Politics of Oligarchy: Institutional Choice in Imperial Jap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wski, Thomas G. 1992. "Progress Without Privatization: The Reform of China's State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no. 28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July.
Razin, Assaf, and Andrew Rose. 1994. "Business Cycle Volatility and Openness." In Leiderman and Razin, eds., *Capital Mobility: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inhart, Carmen M., and R. Todd Smith. 1995. "Capital Controls: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Mimeo.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mnick, David. 1994.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hee, Jong Chan. 1992. "The Limi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South Korea." Paper prepare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Chicago, September 3–6.
Rigby, T. H. 1964. "Crypto-Politics." *Survey* 50, (January): 183–94.
Riker, William H. 1980. "I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quilibrium of Majority Rule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432–46.
Robison, Richard. 1986.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Sydney: Allen and Unwin.
Rodrik, Dani. 1989. "Promises, Promises: Credible Policy Reform via Signaling." *Economic Journal* 99: 756–72.
Roeder, Philip G. 1993.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gowski, Ronald. 1987. "Trade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2 (Spring): 203–23.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37.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79–102.
Rosecrance, Richard, and Arthur Stein. 1975. "Interdependence: Myth or Reality?" *World Politics* 27, 1 (October): 1–27.
Rosefielde, Steven. 1980. "Was the Soviet Union A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turbances of the 1970s? An Exploratory Essay on the Macrostability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In Egon Neuberger and Laura D'Andrea Tyson, ed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turbance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Transmission and Response*. New York: Pergamon.
Rosenberg, Hans. 1943.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urope, 1873–1896."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3: 58–73.
1967. *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zeit: Wirtschaftsablauf, 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in Mitteleurop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Rosenbluth, Frances McCall. 1989. *Financi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pan's Response to the Strong Yen: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Market for Favors." In Gerald Curtis, ed., *Japan'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Change*. New York: Sharpe.
Rostow, Walt Whitman. 1978.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oubini, Nouriel, and Xavier Sala-i-Martin. 1992.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9, 1 (July): 5–30.

Ruggie, John Gerard.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379–415.
Rutland, Peter. 1990. "Labor Unrest Movements in 1989 and 1990." *Soviet Economy* 6, 4, reprinted in Ed A. Hewett and Victor H. Winston, eds., 1991. *Milestones in Glasnost and Perestroyka: Politics and Peopl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Ryzhkov, Nikolai. 1992. *Perestroika: Istoriia predatel'stv*. Moscow: Novosti.
Samuelson, Paul. 1948.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Economic Journal* 58: 163–84.
Samuelson, Robert J., ed. 1990. *The Economist Book of Vital World Statistics*. New York: Times Books.
Scharpf, Fritz. 1991. *Crisis and Choice i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chonhardt-Bailey, Cheryl. 1991a. "Lessons in Lobbying for Free Trade in 19th-Century Britain: To Concentrate or No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1: 37–58.
1991b. "Specific Factors, Capital Markets,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and Free Trade: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World Politics* 43: 545–69.
Schumpeter, Joseph A. [1942]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rd. ed. New York: Harper's.
Schwartz, Justin. 1991. "A Future for Socialism in the USSR?" 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tch, eds., "Communist Regimes: The Aftermath." *Socialist Register 1991*. London: Merlin.
Shepsle, Kenneth A. 1986.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Herbert F. Weisberg,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Shevardnadze, Eduard. 1991. *Moi vybor: v zashchitu demokratii i svobody*. Moscow: Novosti.
Shi Jian. 1992. "Policy Auctions in Development Zones Viewed," *Zhongguo tongxun she* (Hong Kong), November 4,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China Report*, November 25, 1992, 28–29.
Shindo, Muneyuki. 1986. *Gyosei kaikaku to gendai seiji*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Tokyo: Iwanami shoten.
Shirk, Susan L. 1984. "The Domestic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Mao Er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China: The Bargaining Game." In Hadi Soesastro and Mari Pangestu, eds., *Technological Challenge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melev, Nikolai, and Vladimir Popov. 1989. *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Shonfield, Andrew. 1965.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ugart, Matthew, and John M.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lva, Eduardo. 1991. "Capitalist Coali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Authoritarian Chile, 1973–1988." Ph.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3. "Capitalist Coalitions, the State, and Neoliber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hile, 1973–88." *World Politics* 45: 501–25.

Singer, Daniel. 1991. "Privilegentsia, Property and Power." 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tch, eds., "Communist Regimes: The Aftermath." *Socialist Register 1991*. London: Merlin.

Smith, Hedrick. 1990. *The New Russi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Snyder, Jack. 1987/88.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A Waning of Soviet Expansion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3 (Winter): 93–131.

Solomon, Robert. 1977.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1945–1976*.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Soma, Masao. 1986. *Nihon senkyo seidoshi*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Electoral System*]. Fukuoka: University of Kyushu Press.

Soskice, David. 1990. "Wage Determination: The Changing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6, 1: 36–61.

"State Council Issues Development Zones Circular." (1993). Xinhua, May 15, 1993,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China Report*, May 18, 1993: 43.

Steel, Ronald. 1980. *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Stolper, Wolfgang Friedrich, and Paul A. Samuelson.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 58–73.

Swenson, Peter. 1992. "Union Politics, the Welfare State, and Intra-Class Conflict in Germany and Sweden," in Miriam Golden and Jonas Pontusson, eds., *Bargaining for Change: Union Politic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ylla, Richard. 1988. "The Autonomy of Monetary Authorities: The Case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 Gianni Toniolo, ed., *Central Banks' In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Takahashi, Yoshikatsu. 1991. *Seiji kaikaku* [*Political Reform*]. Tokyo: Ashi shobo.

Tello, Carlos. 1984. *La Nacionalizacion de la Banca*. Mexico, D.F.: Siglo XXI.

Temin, Peter, and Barrie Wigmore. 1990. "The End of One Big Defl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7: 483–502.

Thelen, Kathleen. 1993. "West European Labor in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46, 1 (October): 23–49.

Thelen, Kathleen, and Sven Steinmo. 1992.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dd, Walker. 1992. "Disorderly Markets: The Law, History, and Economics of the 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 and U.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Research in Financial Services* 4: 111–179.

Traxler, Franz. 1994. "Collective Bargaining: Levels and Coverage."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July.

Treml, Vladimir G. 1980. "Foreign Trade and the Soviet Economy: Changing Parameters and Interrelations." In Egon Neuberger and Laura D'Andrea Tyson, ed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turbances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Transmission and Response*. New York: Pergamon.

Trotsky, Leon. 1937.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Tsebelis, George. 1995. "Decision Making in Political Syste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3 (July): 289–325.

Turner, Philip. 1991. *Capital Flows in the 1980s*. BIS Economic Papers, no. 30. Basle, Switzerland: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pril.

Tzeng Fuh-wen. 199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sian Survey* 31, 3 (March): 270–84.

Unger, Irwin. 1964. *The Greenback Er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Finance, 1865–187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Various issues.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Upham, Frank. 1993. "Privatizing Regul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rge Scale Retail Stores Law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 Gary Allinson and Yasunori Sone, eds., *Political Dynamic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ergara, Pilar. 1986.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the Chilean State Under the Military Regime." In J. Samuel Velenzuela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Military Rule in Chile: Dictatorships and Opposi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Vinals, Jose. n.d. "Spain's Capital Account Shock."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477.

Visser, Jelle. 1991. "Trends in Trade Union Membership."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OECD.

Voslensky, Michael. 1984. *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An Insider's Report.* New York: Doubleday.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kate giin no kai [Young Dietmembers' League]. 1992. Press release, May 29.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ltz, Kenneth. 1970.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Kindleberger, ed., 1970.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Warren, George, and Frank Pearson. 1935. *Gold and Pric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Waterbury, John. 1993. *Exposed to Innumerable Delusions: Public Enterprise and State Power in Egypt, India, Mexico and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aver, Kent R., and Bert A. Rockman, eds. 1993. *Do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ingast, Barry, and Mark Moran. 1983.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or Congressional Control? Regulatory Policymaking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675–700.

Whitlock, Erik. 1993. "Oil Sector Slated for Competitio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Daily Report* 94, May 18 (electronic version).

Wigmore, Barrie. 1985. *The Crash and its Aftermath: a History of Securities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9–1933.*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Wigmore, Barrie. 1987. "Was the Bank Holiday of 1933 Caused by a Run on the Doll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 3 (September): 739–55.

Williamson, John. 1992.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Bernhard Fischer and Helmut Reisen, eds., *Towards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Development Centre Policy Brief no. 4.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lliamson, Oliver.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nd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Winiecki, Jan. 1989. "Lar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Soviet-type Economies: The Ruling Stratum's Main Rent-seeking Area." *Communist Economies* 1, 4: 363–83.

Winters, Jeffrey A. 1992. "Banking Reform in Indonesia: External Linkages and Created Cris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3–6.

1994. "Power and the Control of Capital." *World Politics* 46: 419–52.

1996. *Power in Motion: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Indonesian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isecarver, Daniel L. 1985.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Chile." In Gary Walton, ed., *The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of Chile*. Greenwich: JAI Press.

Woo, Jung-en. 1991.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ood, Adrian.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Woolley, John T. 1984. *Monetary Politics: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Politics of Monetary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Nixon, Burns, 1972, and Independence in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tary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Jun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83. *World Tables*. 2 vo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 Joint Program of Ac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Dali L. 1991. "China Adjusts to the World Econom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acific Affairs* 64, 1 (Spring): 42–64.

Yanov, Alexander. 1977. "Détente after Brezhnev: The Domestic Root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Policy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Zaslavskaya, Tatyana. 1990. *The Second Socialist Revolution: An Alternative Soviet Strate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Zevin, Robert. 1992. "Are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More Open? If So, Why and With What Effects?" In Tariq Banuri and Juliet B. Schor, eds., *Financial Openness and National Autonom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Zysman, John. 1983.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译后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的结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国家层面上,各国经济都呈现出一种根本性变化,即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大幅提高,并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种发展促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由于经济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有必要研究国际化对政治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所深深打上的世界经济之烙印。冷战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转型时期的到来,世界政治的内涵大大丰富,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体系架构即将出现。然而,国际化的发展,带给国家的并非仅仅是福音,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正确认识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前提。

罗伯特·基欧汉与海伦·米尔纳共同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缘起于1989年美国政治学会的亚特兰大年会,历时数年,方得成书。诸学者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经济的描述和美国、日本、中国、苏联等国经济政策选择的分析,勾勒出世界经济国际化进程对传统国内政治的影响概貌,并对世界经济与国内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理性反思。本书堪称研究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互动关系的精品论著。

本书翻译工作由姜鹏、董素华承担。具体分工是:前言、第一章至第六章由姜鹏翻译;第七章至第十章由董素华翻译。

同本书英文版的发表、出版过程类似,本书的翻译过程也是艰辛而漫长的,其间不乏中美学者之间的直接学术交流。译者谨对以下

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清华大学门洪华博士、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法事业部主任金娟萍女士在联系版权和译文修改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秦亚青教授与基欧汉教授、谢淑丽教授的学术交往确保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门洪华博士承担了本书的通校工作;

应门洪华博士之邀,苏长和博士为本书撰写了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法事业部耿协峰博士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其细致而专业的编辑作风为译文添采增辉。

译　者

2003 年 8 月